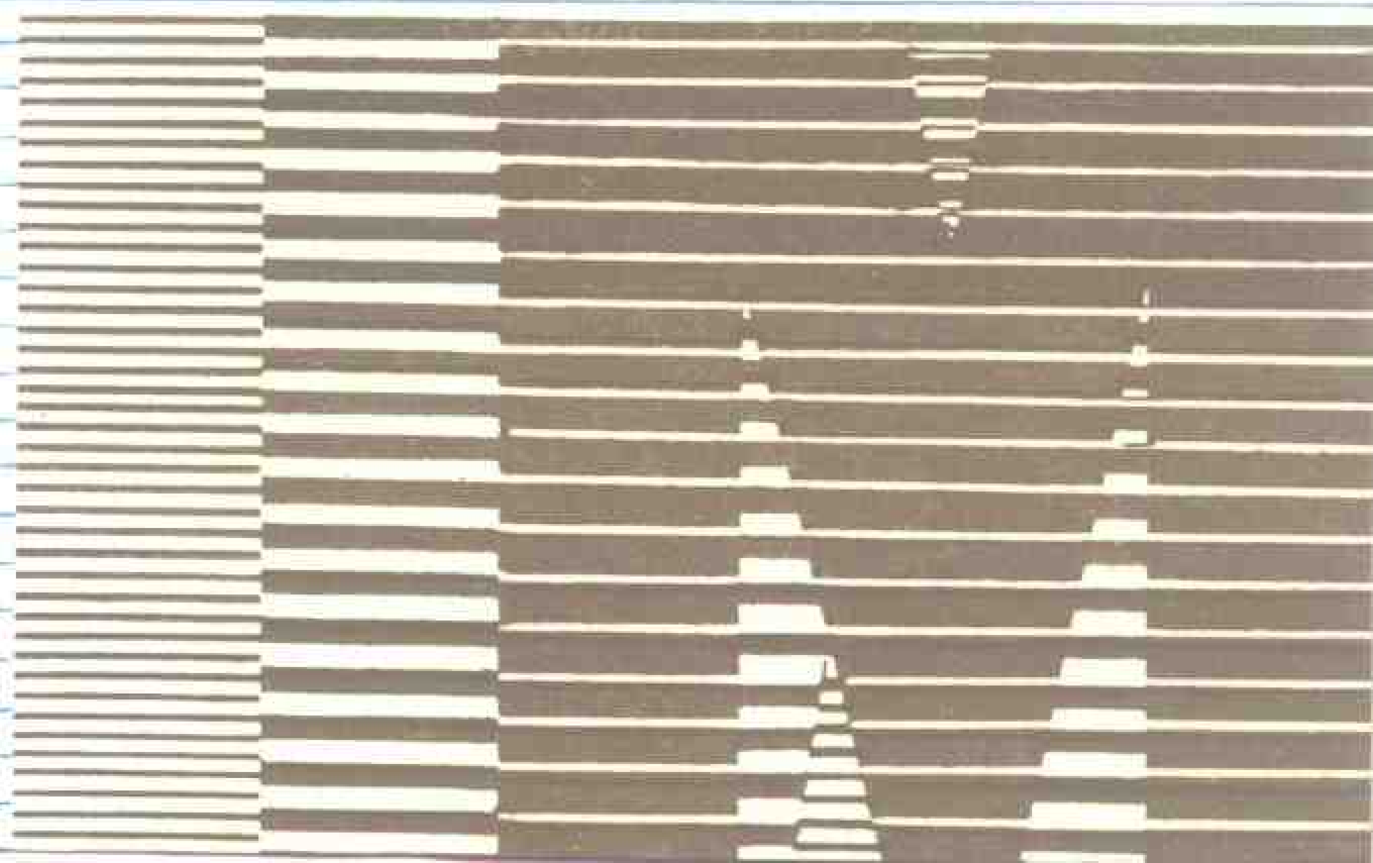
MAKESI ZHU YI ZHE XUE SHI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北京出版社

主　　编　黄楠森　庄福龄　林　利
本卷主编　宋一秀　孙克信　苏厚重

第六卷




2 019 5704 3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 第 六 卷

##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上）

北 京 出 版 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卷）**
Makesi zhuyi zhexueshi (Diliujuan)
主　　编　黄楠森　庄福龄　林　利
本卷主编　宋一秀　孙克信　苏厚重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875印张　498,000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45
ISBN　7-200-00761-7/B·7
定　价：12.00 元

**主　　编**　黄楠森　庄福龄　林　利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孙克信　孙伯鍨　庄福龄　宋一秀
余其铨　余源培　吴仕康　张念丰
苏厚重　林　利　易克信　施德福
徐　琳　高齐云　商英伟　黄楠森
曾盛林　靳辉明

**本卷主编**　宋一秀　孙克信　苏厚重

**参加编写者**（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良华　许全兴　孙克信　宋一秀
苏厚重　佟玉琨　魏俊章

##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卷，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19年到1949年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发展。本书在搜集和挖掘丰富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地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比较全面、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同时，还如实反映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斗争。

# 编者的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头绪纷繁复杂、内容十分丰富的历史。我们认识到，要写好这部历史专著，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既要密切地联系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全面、系统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及其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作斗争的历史进程，阐明它对中国革命实践的伟大指导作用；又要着重地突出地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线索，恰如其份地评价它的理论价值、历史意义和历史局限，从而科学地阐明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十分严肃而又艰巨的任务。我们在编写过程中，主观上虽力求达到上述要求，但究竟做到了什么程度，这要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们来评定。

在本卷征求意见稿油印出来后，我们曾采取书面审稿和召开小型座谈会相结合的方法，征求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应邀参加审稿的有：杨超、王淇、刘嵘、丁守和、杨春贵、赵永茂、杨瑞森、吴仕康、刘敬诚、鲁修文、金邦秋、陆云彬、徐素华等同志。他们都非常热情、认真，有的看了好几遍，写了长达一、二十页的书面材料，有的在审稿座谈会上作了详细、中肯的发言，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其中大部分意见在我们修改时已采纳写进本书中。在此，我们谨向这些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卷各章的作者是：第一章，佟玉琨；第二章，许全兴；第

三章，孙克信、于艮华；第四章，苏厚重、魏俊章；第五章，宋一秀。陈荣冠同志曾一度参加过本卷的编写活动。本卷各章在作者多次进行认真修改的基础上，由宋一秀、孙克信、苏厚重统稿和定稿。最后，由黄楠森、庄福龄进行审定。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感到本卷中的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由于编写者学识和水平所限，加之统稿定稿时间仓促，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们不吝赐教。

本卷主编

1988年3月

E030/13

# 总　序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任何一门其他科学一样，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的萌芽、产生、形成、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人物、著作和思想摆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其含义、意义、是非得失和历史地位。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我国哲学界十多年来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编写就是这些活动中的一个项目。

本书的编写是1983年作为我国六五计划中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科研重点项目之一确定下来的，1986年又列入七五计划。全书编写人员55人，全是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哲学工作者，都努力把编写过程同教学过程、科研过程密切结合起来。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规律，做到理论和实践统一，科学性和战斗性统一，逻辑和历史统一，观点和材料统一，使本书对我国四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占有翔实而丰富的历史资料，一切论断均有充分材料作根据，同时，经过鉴别，充分吸收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丰富成果，使本书能达到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三、对每一本重要的哲学著作和每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都做

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评价，恰当地估计其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从而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反对形而上学的非历史观点和相对主义观点。

四、以革命导师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为主线，但也给予他们的战友、学生和专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以应有的地位和足够的篇幅，特别是对当代哲学家的思想应给以充分的重视。

五、以揭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为主，但对其他部分如自然辩证法、军事辩证法、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哲学史思想等也视各个哲学家思想的不同情况给予适当的介绍和评价。

本书共八卷，八卷的顺序与时间的顺序不完全一致，这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特色。八卷内容可以分为四部分：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发展（第一、二、三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战友和学生的思想），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苏联的传播和发展（第四、五卷），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第六、七卷），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国外的研究和发展（第八卷）。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40周年，决定1989年先出版第六、七卷，其他各卷按顺序随后陆续出版。此外，还将出版与正文配套的资料八卷。

# 目 录

**第一章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1921年）** ………… 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 2
一、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矛盾 ………… 2
二、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 ………… 6
三、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 …………1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 …………18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入 …………19
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传播 …………29
第三节 五四时期三次大论争及其哲学意义 …………57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58
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 …………71
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85
第四节 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94
一、向革命民主主义和近代唯物主义的转变 …………95
二、向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 ………… 107
三、毛泽东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 ………… 118
简短的结论 ………… 120
**第二章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初步运用（1921年—1927年）** ………… 12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宣传 ………… 124
一、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 124
二、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史学要论》的基本思想 ………… 132
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 ………… 143

四、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 …… 152
五、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宣传，《现代社会学》的基本思想 …… 163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 …… 174
一、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 174
二、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 186
三、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 196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 205
一、中国国情的最初分析，民主革命纲领的制订 …… 206
二、民主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 210
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 223
四、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哲学根源 …… 234
简短的结论 …… 240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1927年—1937年）** …… 24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研究和普及 …… 244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苏联等国哲学家著作的翻译出版 …… 244
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中的历史作用 …… 250
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哲学大众化运动 …… 257
四、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 267
第二节 三十年代哲学、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论争 …… 278
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 …… 278
二、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争 …… 286
三、关于“哲学到何处去”等问题的论争 …… 294
四、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论争 …… 303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日益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 308
一、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提出 …… 308
二、《反对本本主义》发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 314
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活动及其特点 …… 320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由初步形成到系统化的过渡 …… 328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328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哲学思想 …… 333
三、刘少奇论白区工作中党的政策策略辩证法的运用 …… 351
第五节 《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 361
一、“两论”的写作和流传 …… 361
二、《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373
三、《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 388
简短的结论 …… 414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1937年—1945年）** …… 41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系统阐发 …… 417
一、《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的发表 …… 417
二、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 420
三、战争中的主观和客观 …… 427
四、战争和政治、战争和革命 …… 432
五、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 437
六、兵民是胜利之本 …… 443
七、朱德《论解放区战场》及其哲学意义 …… 447
第二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 …… 452
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 452
二、运用辩证法两点论，制定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 454
三、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右两种倾向 …… 461
四、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及其哲学意义 …… 463

第三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 …… 467
一、整风运动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 468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阐述 …… 470
三、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 …… 476
四、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 …… 479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立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 487
一、《新民主主义论》论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 488
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揭示 …… 492
三、革命发展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 …… 499
四、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法 …… 504
五、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 …… 508
第五节 美学、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实践 …… 509
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 …… 511
二、生活实践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 513
三、普及与提高、政治与艺术的辩证法 …… 516
四、哲学方法论和文艺创作的关系 …… 517
五、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 520
第六节 伦理道德修养与无产阶级世界观 …… 523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523
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 …… 526
三、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道德评价理论 …… 528
四、道德遗产的批判与继承 …… 529
五、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 …… 531
六、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 533
第七节 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 538
一、宇宙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 538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 540
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 542
四、抓中心工作，辅以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 …… 548

第八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对各种唯心主义流派的斗争 …… 55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及其中国化 …… 551
二、对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批判 …… 562
三、对战国策派哲学的批判 …… 569
四、对新理学的评述 …… 574
五、对新心学的评述 …… 579
简短的结论 …… 581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色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1945年—1949年）** …… 583
第一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 583
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与革命的两手策略 …… 585
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 595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新发展 …… 605
一、十大军事原则 …… 606
二、战略决战中的战略战术 …… 613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 621
一、坚持彻底的辩证法，将革命进行到底 …… 622
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及其哲学意义 …… 627
三、唯心史观的破产，唯物史观的胜利 …… 636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 …… 644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 …… 644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 647
三、党的主要领导人倡导加强理论学习 …… 651
简短的结论 …… 655

# 第一章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1919年——1921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共同思想武器，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理论财富。它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随后经过40年的丰富和发展，于80年代在俄国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其后，又经过40年，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又获得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客观普遍真理，不仅适用于世界的西方，而且也适用于世界的东方。"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适用于中国，中国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生动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

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①哲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一定时代自然、社会和思维矛盾运动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它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且它的发展和传播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决非偶然，而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 一、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欧洲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然而，世界历史发展并不平衡，当时中国社会却发生着另外一种变化。

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②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开始逐渐深入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经营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对中国实行直接的经济剥削，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这样帝国主义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9页。

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口岸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它劳苦大众。

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成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和封建地主阶级、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统治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到处致力于保护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农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

这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以后的新变化。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① 这样，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从原来的封建社会转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代的前期，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近八十年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

随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鸦片战争后，不仅原有的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还增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4页。

“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①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②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对中国人民实行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中愈陷愈深；另方面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这些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③。

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也就使此后的中国革命具有了新的性质。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革命，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单纯农民革命。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任务对外是推翻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民族革命，对内是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这就决定了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十月革命以前，这种革命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十月革命之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大大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属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了。从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④。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4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列宁在《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①

在中国，当时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错在一起，构成一幅极为奇特的矛盾之网。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曾深刻而又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幅矛盾交错的状态。他指出："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②他接着进一步指出，伴随着上述各种矛盾发展而来的，反动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反动政府与青年学生之间的种种矛盾就日益尖锐化。

毛泽东的分析，充分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反映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基本的社会历史条件。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98页。

## 二、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

毛泽东曾经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无产阶级。"①

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是产生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企业里。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二十年里，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伴随着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也逐渐增加，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工厂、办运输，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剥削中国人民。到了19世纪60年代，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工厂渐渐多起来。在外国人开办的工厂里做工的中国穷苦劳动人民成为直接受外国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主要是外国工厂的工人以及外国轮船上的船员和香港及沿海通商口岸的船坞工人、码头工人。这些工人和海员是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的一支重要力量。

此外，中国近代无产阶级也诞生在洋务派所开办的工矿企业中。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政府的上层统治者十分羡慕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因此，他们打着所谓"自强"的旗号，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军事工业和其他工业，兴起了一场"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是搞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李鸿章曾经提出："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其具体办法是，"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②在洋务派主持下，中国开始有了官办企业，特别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1—1422页。

②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第5卷，第34页。

是军事工业。

186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庆办起军械所。1862——1864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和苏州办起洋炮局，1865年，又分别在南京和上海办起金陵机器局和江南制造局。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办起造船局，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办起机器制造局。1874年，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办起机器局。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办起山东机器局。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办起铁政局和湖北枪砲厂。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甘肃、广东、福建、山东、湖南、四川、吉林、山西、浙江、云南、湖北、台湾等省都相继办起了军火工厂①。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又兴起官督商办企业的热潮。1872年，李鸿章主持创办了轮船招商局，1877年，他又创办开平矿务局。1893——1894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办了织布、纺纱、制麻、缫丝等制造局。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随着军火、造船、纺织等工厂的开设，一批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纷纷来到这些工厂做工，这些人便成为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破坏，又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开始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分离，从而产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新兴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部分经营新式企业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而一部分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则成为中国无产阶级。

到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爆发的时候，中国近

① 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

代产业工人的总数，已达近十万人。其中，在外国资本主义直接开办的企业中的无产阶级大约有三万四千人；在洋务派办的军事企业中的无产阶级约有一万人，在洋务派办的矿山、冶炼、纺织等企业中的无产阶级约有二万四千人，在民族资产阶级办的工厂、矿山等企业中的无产阶级约有二万七千人。这近十万名工人便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当时的无产阶级队伍，除了上述的产业工人外，还有海员、船员、码头运输工人、城市建筑工人、手工业雇佣劳动者、商店店员，以及农村中的雇农和其他的城乡无产者。这些无产者的总数比上述产业工人的数目要大得多。但是，产业工人，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海员，是整个无产阶级队伍的核心力量。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乘机得到迅速发展。如轻工业的纺织业，由1913年的48万余枚纱锭，增加到1919年的65万余枚纱锭。面粉加工业，在1900年只有两个工厂，到1916年增加到67个工厂，到1918年增加到86个工厂。此间，其他轻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据当时商业部统计，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六千余万元，到1920年增长到一亿五千余万元，增加了150%。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迅速成长和壮大。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产业工人已达六十万人。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产业工人已经扩大到了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人，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及商店店员达到一千二百万，农村的雇农及其他城市无产者的队伍更为广大。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

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①。

中国无产阶级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劳动阶级，它不但和那些与落后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劳动农民不同，而且也与中国现代大工业出现前的各种手工业工人不同。它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先进阶级。因此，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之外，还有它的许多特殊的优点。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它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受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这些剥削和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更坚决、更彻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了少数的工贼以外，整个无产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由于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重压迫，这就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才有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部分是从破产农民转化而来的，所以他们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数量不多，但集中的程度却很高。一是无产阶级所分布的地理位置相对集中。外国资本在中国办的企业，洋务派官办的企业，以及初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几乎都设立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因此形成中国产业工人在地区上高度集中的状况。据估计，1894年除了矿工以外的全国产业工人总数中的80%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等四个大城市，而上海一个城市就占47%。二是无产阶级人数在企业中相对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0页。

中。由于中国近代机器工业主要是由力量雄厚的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创办的，而不是由手工业作坊发展而来的，因此形成了中国产业工人一开始就集中在较大的企业中。1894年，雇佣工人在五百名以上的企业约有四十个，所雇工人数量占全国工人总数的60%以上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种状况又有所发展。1914年至1920年，在五百人以上工厂做工的工人数量已占工人总数的85%。由于中国产业工人高度集中，因而使得他们同分散的、从事手工操作的其他城乡劳动者相比较，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是他们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斗争中革命力量最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无产阶级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858年，在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的斗争中，两万多名香港的市政工人和搬运工人举行罢工，并回到广州参加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斗争。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给以香港为其军事补给站的法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1911年辛亥革命前安源矿工和川汉铁路筑路工人曾举行起义，配合了当时的革命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无产阶级的成长，其斗争规模日益扩大。1913年，汉阳兵工厂工人曾反对以贬价纸币发放工资而举行罢工斗争。1915年安源矿工为反对德国工程师袒护压迫工人的工头而举行罢工。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的四十一年中，工人罢工斗争共计有一百零五次，1912年到1919年，工人罢工斗争达一百三十多次，仅1918年，全国工人罢工斗争竟达二十五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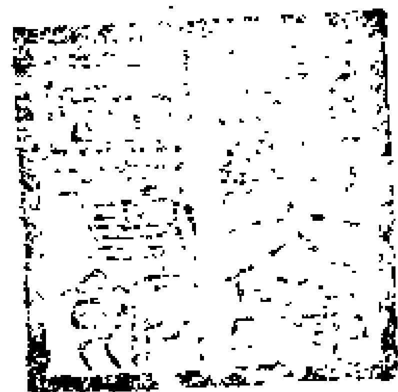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下爆发的五四运动，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而成为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工人阶级也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五四运

① 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

动以后，中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新局面。一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另方面，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转化。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日益成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

## 三、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经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证明了中国的军事、经济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也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洋务派竭力效仿西方的"船坚炮利"，大搞洋务运动的同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则主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包括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所谓"新学"。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大，主要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郑观应指出："泰西之强，强于学……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而已"②。因此，他们主张，要救国一定要学习包括近代自然科学在内的西学。王韬说："中国诚能以格致（即自然科学）一变从前之陋，则再越百年，不难驾西人而上之"。③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既反对封建顽固派对中国旧学亦即对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抱残守缺的顽固态度，也斥责洋务派一味效仿西方的"船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西学》。

③ 王 韬，《格致书院课艺》。

炮利”，不过是“遗其体而求其用”①。但是由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再加上他们的代表人物与地主、官僚、买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很难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因此，他们鼓吹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虽然曾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但终究声势微弱，影响并不很大。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曾给清王朝的统治以沉重打击。但由于洪秀全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所传来的基督教的思想影响，搞一个“拜上帝会”的迷信组织发动农民革命，希图借用新的宗教信仰来拯救农民，医治社会。虽然“拜上帝会”的宗教教义、“天父皇上帝”的无上权威，曾激发过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狂热性，但宗教毕竟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使得整个农民革命队伍，笼罩着神秘主义色彩，最后终于陷入宗教迷惘而不能自拔。李大钊在分析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讲的很深刻：“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②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尤其是民族矛盾更为严重，“瓜分豆剖”之势已迫在眉睫。“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③。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为了“自强”、“保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场“戊戌变法”运动。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他们上书言事，奔走呼号，办报纸，设学会，著书立说，极力鼓吹要救亡图存，只有变法维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851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6页。

新。1898年，康有为泣血顿足，向皇上呼吁："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①他们还认为，"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在如何学习外国这一点上，他们既不同于洋务派注重船坚炮利，发展实业；也不同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把重点放在学习外国的经济，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而是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及其政治制度，但又不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搞君主立宪制。康有为提出："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②资产阶级维新派，就其借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来反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来说，有一定进步意义；就其不彻底推翻帝制，不彻底否定封建礼教来说，又是腐朽、落后的。反封建主义的不彻底性决定了戊戌变法运动必然要失败。但维新派代表人物，特别是严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等资产阶级名著，对中国人了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开发民智，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最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库中找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和孟德斯鸠的资产阶级共和思想，结合中国的历史特点，结合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造三项历史任务，于1905年提出他的三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折）》，《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十二），《七次上书汇编》第102页。

②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十二），《戊戌奏稿》第34页。

民主义学说。孙中山抛弃资产阶级维新派“托古改制”的软弱方式，而是直率地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理论根据，以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为榜样，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英勇气概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攻击。他指出，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权，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①由此他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并号召国民，“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②孙中山高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发动了辛亥革命，最后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虽然赶跑了皇帝，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斗争。当时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这个弱点，极力提倡封建道德，鼓吹复古思想，为复辟帝制、重新确立封建统治秩序制造舆论。

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看到，仅仅赶跑一个皇帝并不能摧毁封建专制主义。要救国，就一定要彻底铲除“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向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开火。陈独秀指出：“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③如果不将国民从封建主义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唤醒民众，只是空谈宪法、国会，那

①②　《孙中山选集》（上），第75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07页。

么"再造中国之新体制"①必将毫无结果。所以，一定要唤醒多数国民之自觉。于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发动下，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当时称《青年杂志》，1916年9月出版的二卷一期改为《新青年》）杂志为标志。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鼓吹"科学"，旨在追求一个象西方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革命，以反对封建旧思想；鼓吹"民主"，旨在要求进行一场象西方17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对封建旧制度。新文化运动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封建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的核心和灵魂。一切封建主义的旧政治、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旧文化，无不贯彻着专制主义的原则和精神。只有彻底批判专制主义，才能彻底动摇和打破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文化传统，粉碎封建统治阶级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才能唤醒国民之觉悟，才能接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达到"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②的目的。而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是孔孟之道，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不能不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吴虞指出，孔教"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③陈独秀指出，要"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④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是猛烈的，

---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175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48页。

③ 《吴虞文录》卷上。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48页。

然而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推翻封建主义的思想统治、肃清其流毒。一方面，意识形态毕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旧的腐朽的意识形态首先是旧经济，其次也是旧政治的反映。破坏旧思想，虽然可以推动旧政治、旧经济的变革，但旧思想的彻底铲除和新思想的确立，却有赖于旧政治的变革，特别是最后决定于旧经济的根本变革和新经济的发展。在当时封建主义旧经济、旧政治还占居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要彻底完成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另方面，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还算是进步的，但在世界范围内，相对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来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已属旧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用这种陈旧的思想武器当然不可能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更不可能给中国人民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达到救国的目的。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新文化运动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网罗，动摇了二千多年来的封建文化统治，打破了对孔教的顶礼膜拜，促使人们的思想解放是前所未有的。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思想界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掀起了一股要求进步、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热潮。禁锢思想的闸门打开了，各种学说，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介绍到中国，“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① 在学习、研究、辨别各种社会思潮的过程中，一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逐渐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对曾经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开始对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陈独秀在《法兰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6页。

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①李大钊在1917年5月，也即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前已经预见到："此次战争告终，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皆将与之俱终，而世界之自由政治、民主主义必将翻新蜕化，以别开一新面目，别创一新形式，蓬蓬勃勃以照耀二十世纪之新天地。"②李大钊这里所讲的翻新蜕化了的民主主义，实质上是新式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

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生怀疑和动摇，开始对社会主义有了初步认识的时候，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从此以后，中国革命不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崭新的思想体系、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而这崭新的思想体系、科学的世界观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十月革命的教育。毛泽东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③十月革命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指路明灯。另方面，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教育了先进的中国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0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49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1页。

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先进的中国人从多次的失败中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宣告破产了，而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和封建主义思想武器一样，也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于是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请来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于思想。”③如果说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外部条件，那么，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内部条件。正因为当时的历史具备了这样两个条件，所以在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而被介绍到中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历程。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影响密不可分。

###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最早影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最早影响是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是世界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当时刚从欧洲游历归来的中国人王韬[①]曾译撰了大批报导，并于1871年将这些报导汇集起来，补充一些其他材料编成《普法战纪》，其中对巴黎公社的斗争作了“三月十八日，法京民心大震”，“三月二十二日公举人员”等记述。当时，中国人尽管还不清楚巴黎公社的性质及其伟大意义，但巴黎公社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的斗争被介绍到中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起了先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者是科学共产主义者。中国人最初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是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后。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更为广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斗争更加蓬勃发展，有些国家开始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的

---

① 王韬（1828—1897）江苏苏州人。1845年中秀才。1849年到上海，在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后来到香港办报纸，并为外国传教士译书。他曾跟随英国人理雅各（1815—1897）游历英、法、俄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他是中国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政治影响也日益扩大，这在当时中国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1873年—1881年）中得到某些片断的反映。《西国近事汇编》在报导欧洲工人革命时，曾经将共产主义者音译为“康密尼人”，将共产党音译为“康密尼党”①。而对俄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工人斗争，则作了更多的报导。当时，李凤苞②在其《使德日记》（1878—1879年）中，也记述了德国工人运动情况。在日记中，李凤苞将共产主义音译为“廓密尼士”，将社会民主党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并指出，“‘莎舍尔德玛噶里’，各国皆有之”，“在俄国曰‘尼赫力士’③在法国曰‘廓密尼士’”。这些记述和介绍在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影响。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思想的早期介绍

在中国人不断报导欧洲工人斗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其生平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人最初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1898年夏，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委托胡贻谷（也有称胡颐谷的），将英国人克卡朴所著的于1892年布克莱（Black）书局出版的《社会主义史》一书翻译成中文，以《泰西民法志》为书名，由上海广学会④出版。美国人伯尔纳在其所著《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书中曾经提到，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系统讲解多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⑤此书专辟有

① 《西国近世汇编》卷二。

② 李凤苞，字丹岩，上海崇明人，1878—1884年任出使德国大臣。

③ 尼赫力士，今译为“民意党”。

④ 广学会是基督教于1887年在上海设立的出版机构。创办人是英国传教士威廉士。1890年，该会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万国公报》是该会出版的刊物之一。

⑤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光明日报》1987年9月16日。

“马克思”一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思想。书中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斯都被大家承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认为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①但由于《泰西民法志》一书发行量有限，传播范围不太广泛，未曾引起中国人很大的反响。但这里应当提到的是，克卡朴所著《社会主义史》一书的李季中译本在中国流传较广。1920年10月，李季将克卡朴所著《社会主义史》一书的第5版，即1913年辟司（Prase）增订本译成中文，蔡元培作序，以《社会主义史》为书名，由新青年社公开出版。此书出版后，当时长沙文化书社等进步书店曾经销过此书。

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中国人蔡尔康笔述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颉德（Ban Jam in kidd）所著的《社会的进化》一书的前四章，译名为《大同学》，同年出版了单行本。书中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文中说：“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客偲立于资本者也”。又说：“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

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刊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著的《近世政治史》一书的中译文。该文在介绍万国工人总会（即第一国际）和社会党的历史时，提到了马克思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文中指出：“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各国工人之首领均会集于伦敦，名曰‘万国工人总会’。”“麦克司自为参事会长，总理全会。”文中还指出：“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

①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光明日报》1987年9月16日。

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以上都是译著，而不是中国人撰写的著作。

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著作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者、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他在一些文章中，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零散的、片断的介绍。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即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1903年9—10月，他在《新民丛报》第40—43号上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再次提到马克思：“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

梁启超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生平的同时，也曾简要介绍过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他在1904年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曾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① 梁启超是改良主义者，他虽然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但他并不主张在中国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在1904年3月写的《新大陆游记》一文中，指出：“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编者注）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

在中国最早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是1903年赵必振翻译、日本人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第二编专辟“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

① 《新民丛报》四十六、七、八号合刊，1904年2月14日。

思）及其主义”一章。在“其履历”、“其学说”二节中，分别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称赞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长于文笔，其议论之精致，为天下所认识……为一大经济学者”，称赞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有力之同志”，“与马陆科斯（马克思）相亲善，终始同其难苦”。该书对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予以高度评价，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其学理皆具于其《资本论》，大耸动于学界，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其学识之深远，其思想之精致，与从来之社会主义者，大异其趣。”同年 9 月，日本人幸德秋水著，中国达识社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也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当时，中国则已经有人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是历史唯物论。1903年 2 月东京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上所载马君武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曾指出这一点，他说：“马克司（即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①

1903年10月，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上所载署名大我的文章——《新社会之理论》也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了简要介绍，作者虽然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但已经认识到“劳动者，为地主、资本主垄断其生产机关，由是生屈从、生社会之穷困、生精神之卑屈，为政治上服从之原因。”②文章还简要介绍了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指出，共产主义“创于法人罢勃（Baboeuf），其后劲则犹太人埋哈司（即马克思）”。简述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这在中文报刊上还是第一次。

① 《译书汇编》第11期，1903年 2 月16日。

② 《浙江潮》第 8 期，1903年10月。

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2号刊载了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署名蛰伸。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较为详细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并摘译其著作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其中《马尔克》（即马克思）一节，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文中介绍说："马尔克者，名卡尔尔Karl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Trier（即特利尔）。父为辩护士"。"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始冀为大学祭酒……"。"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Friedrichs Engel（即弗里德里·恩格斯）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即布鲁塞尔）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者宣言。"

1906年5月，《民报》第4号"译丛"栏内刊载日本巡耕所著的《欧洲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一文，文章称赞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社会主义学说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此其学说创自德儒卡玛Karl marx（即卡尔·马克思）殷杰Engels(即恩格斯）二氏。近乃风靡全欧。"同年6月，《民报》第5号刊载朱执信所著《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指出社会主义"自马尔克（即马克思）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8月，《民报》第7号刊载廖仲凯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一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指出，正是由于1872年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裂，才使"社会主义亦因之得救"。

1907年，世界社出版的《近世六十名人》一书中，刊登了马克思1875年在英国伦敦拍摄的肖像。这是我国最早见到的马克思的肖像。

这个时期，中国人翻译国外论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著作是不少的。如1902年12月，上海《翻译世界》杂志编译了日本人村井知至著的《社会主义》一书；1902年11月，中国国民丛书社翻译出版了幸德秋水著的《广长舌》一书；1903年2月，《新世界学报》翻译了日本人久松义典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一书，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单是1903年，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10篇以上，翻译出版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达七部之多。

（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早期介绍

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介绍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理论主张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的篇名介绍到中国来，间或也介绍一些著作中的主要观点。如1903年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赵必振翻译日本人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在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理论时，也简要介绍了马克思所写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当时译作《共产主义宣言》、《哲学的贫困》（译作《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作《经济学之评论》）以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作《英国社会劳动之状态》）等著作的写作过程，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资本论》的内容，称赞“马陆科斯之《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称《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书中还摘引了《共产党宣言》最后的一段话，译文是：“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以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就目前已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最早的一段译文。

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著作的篇名，不仅在译著中被介绍到中

国来，而且，在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文著作中也曾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篇名。1903年2月，马君武撰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在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之后，文章末尾还特意附录了马克思著作的书单，列举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五本名著①。这里所附录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目录，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书目，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文字记载中所见到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

另一种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方式，是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的同时，较多的将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原文翻译成中文，这较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篇名，又前进了一步。这是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出现的新情况，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情、赞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反映。

1905年11月，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和宣传家朱执信，以蛰伸的笔名在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2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不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纲领，并提及到《资本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著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并直接翻译它的部分内容。

1906年6月，《民报》第5号上刊载勇斋（即宋教仁）翻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最后的一段话。译文是："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

① 见《译书汇编》第11期，1903年2月15日。书中所附马克思著作书单是用西文写的。书目中误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当作马克思的著作。

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同年9月，《民报》第7号发表了梦蝶生(即夏叶生)写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也译介了《共产党宣言》十项纲领的主要内容，并指出，“观其共产党之宣言”，“可证其主义之非乌托邦者。”

1907年以后，中国无政府主义团体，出自本身的需要，也陆续介绍和翻译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片断。1907年12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刊物《天义报》的第13、14卷上刊载了震述的《经济革命》一文，文章最后以附录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卷刊载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序言》，这是迄今看到的恩格斯著作最早的一篇完整的中译文。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说明了《共产党宣言》形成的过程和基本思想，这篇序言的发表有助于当时人们对《宣言》基本思想的了解。1908年3月，《天义报》第16—19卷合刊号上发表了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第1章《绅士与平民》（即《资产者与无产者》），同期还登载了摘译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译为《家庭、私有财产及私有制之起源》）第二章关于《家庭》的译文。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为了证明无政府主义的正确，因此他们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们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虽然在客观上有助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主观上却不能正确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资产阶级民主派更为活跃。他们以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从此民族，民权主义的政治革命已经完成，应该转向以民生主义为中心内容的社会革命了。因此，在他们所理解的意义上对社会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当时孙中山就曾表示“竭力赞

成”社会主义，主张“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去”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介绍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同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及其著作的介绍也增多起来。如果说辛亥革命之前，介绍和译载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主要是在国外出版的一些刊物上，那末，辛亥革命后，在国内出版的刊物中，也陆续开始译介马克思及其学说和直接译载马克思主义著作。

1911年8月，上海《东方杂志》曾登载钱智修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一文，认为“社会主义者，以改变现社会之组织为整理国民生活之手段也。”“近世社会主义之开山，咸推德人楷尔·麦克（Kurl merx）。其《资本论》所述，意在集中土地、资本于社会，以经营共和的生产事业”②。1912年5—7月，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1、3、5、6、8期上以《理论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连载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这是国内最早译载恩格斯的一本著作。同年6月《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蛰伸（朱执信）译述，煮尘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即马克思）之学说》，文中全译了《共产党宣言》十项纲领，并有一节专门介绍“资本论之概略”。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演说中，介绍了马克思的功绩，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之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热之言论矣。”并认为“马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③。正如列宁所

① 参见陈布雷：《大总统与社会党》，《民立报》1912年1月1日。

② 《东方杂志》第8卷，第6号，1911年8月19日。

③ 《总理全书》之七，《演讲》（上）。

指出的，由于孙中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所以他并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逐渐介绍到中国来，但也仅仅是限于介绍和译述，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主要是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阶级状况所制约。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及五四运动时期。

## 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传播

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迅速引起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烈向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从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十月革命“给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一条通向被压迫国家最遥远的角落的道路。从前社会主义者很难在被压迫国家或压迫国家的非无产阶级中间阶层中公开露面，现在他们却可以公开地在这些阶层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希望人们倾听他们的话，希望人们也许会听从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象十月革命这样一个有力的证据。”② 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宣传和介绍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 （一）热情讴歌马克思主义

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一般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认识程度的不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82－283页。

义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真理之外，与当时中国先进分子以满腔热情歌颂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与改革社会的巨大威力密不可分。

十月革命后，第一个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改造社会巨大威力的是革命先驱者李大钊。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几篇文章，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马喀士（马克思）的功业”①，并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②。李大钊把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机的联系起来，用十月革命的胜利雄辩地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改造社会的革命理论，是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过了的客观真理。这比起以前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只是一般地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无疑更具有说服力，因而对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高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认识，并愿意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1919年4月，北京《晨报》连载的《劳动政府治下之俄国》一文，运用十月革命后俄国对土地、银行、产业、财政、选举、军事、保险、教育、以及男女平等问题的解决，颂扬了“马克思的学说在现在各种社会新思潮中可算得最稳健的主张，最有科学的基础。”当时，陈独秀、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都曾以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客观依据，热情讴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是改造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理论武器，从而都为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599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595页

(二)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介绍、翻译和出版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著作的传播方面,《新青年》杂志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早在1917年初,就有人向《新青年》提出介绍社会主义的要求。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把他主编的6卷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①,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摘译了《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述。其中《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译文是第一次见诸中国人撰写的文章中。1920年5月1日,该刊7卷6号又编成《劳动纪念》专号。以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同年9月1日出版的8卷1号,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从西方和日本报刊上搜集到的有关苏俄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情况的材料。先后译载了33篇,其中震瀛(袁振英)译有24篇,李汉俊译有3篇,杨明斋和李达各译有两篇,陈望道和张慰慈各译有一篇。同年11月1日的8卷3号上,刊载了列宁于1919年3月19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的一部分,(震瀛译标题为《民族自决》)。12月1日的8卷4号上,刊载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全文,(震瀛转译自1919年纽约《苏俄Soviet Russia》周刊,标题为《过渡时代的经济》)。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青年》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论文、关于研究苏联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论文及通讯等共137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大量

① 这篇文章分上下两篇,先后刊登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第5号的实际出版时间是1919年9月。

介绍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发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在1919年4月6日的第16期上，摘译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几段译文，标题为《共产党的宣言》，译者署名舍。同时全文译出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十项纲领。编者在译文前加了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进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斗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另外，还刊登了倍倍尔所著的《傅利叶》一书中关于说明"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的一部分。陈独秀在第18期上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文章对十月革命加以肯定和赞扬，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另外，"五四"运动后，北京的《晨报》副刊也宣传过马列主义。该副刊是1919年2月改组的，由李大钊参加编辑工作。1919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该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与《新青年》相配合，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起过重大作用。同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101周年诞辰，刊登了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著）一文。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论述。同年5月9日起至6月1日，《马克思研究》专栏又连载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标题为《劳动与资本》。这是该著作最早中译文，由食力从日文转译的。从6月3日至11月1日，该报又连续译载了柯祖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7月18日至24日，连载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概要》一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作了逐段介绍。

1919年1月在北京创刊的《国民》杂志，在"五四"运动后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从2卷1号起刊登了李泽彰译的《共产

党宣言》第一章。1920年10月，还曾刊载了马克思著、费觉天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初版序言）。北京出版的青年学生刊物之一《曙光》，曾译载了列宁在1919年和1920年的一些著作和演说。如在 1 卷 6 号上刊登了《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的全文（标题为《旧治更新》，王统照译）；2 卷 1 号刊登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标题为《过渡时代之经济》），还同时刊出《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大会兰宁之演说》，即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文，译者均署名为WPK。

1920年创刊的《少年世界》和《共产党》月刊也曾从事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少年世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二种出版物，只存在一年时间，大量刊载了介绍苏俄的文章。如第 7 期上译载了列宁在1919年发表的《伟大的创举》中的一部分，标题为《李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这是列宁著作的早期中译文之一。《共产党》月刊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理论性机关刊物。该刊第 1 号载有震寰根据1920年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译出的文章，标题为《俄罗斯的新问题》，第 6 号载有朗生译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的宣言》。

1920年 8 月，恩格斯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后半部分，由郑次川译成中文出版，译名为《科学的社会主义》。

1920年 8 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上海新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该书第一个铅印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一出版，便受到广大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第 1 版印刷 1 千本，很快销售一空。同年 9 月再版。《共产党宣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印刷两次，这在国内外马克

思主义著作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1920年10月，《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号，连载了恩格斯著、恽代英译的《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部分内容）。同年10月，英国人柯卡普著、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一书，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

1921年1月，考茨基著、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一书，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1921年5月，《共产党》月刊第4号，刊载了列宁著、P生译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部分内容。同年5月，荷兰郭泰著、李达译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出版。其中重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著名论述，译文更为完整。书中还翻译了恩格斯1888年1月为再版《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中的两段话。说明贯穿《宣言》中的核心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主要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对于历史的贡献，如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的贡献那样重要。

（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团

在北京，1918年底，李大钊、高一涵曾在北京大学组织过“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先是公开的，后来成为秘密的。这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刘仁静、何孟雄等十九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登出启事：“本会叫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该研究会主要活动是：搜集、采购各种文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小型的收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图书室，名为“亢慕尼斋”（即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音译，“斋”即书舍之意）。据1922年2月6日《马克斯学说研究会通告》所载，那时研究会已有马克思主义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英文书籍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革命与反革命》等著作；中文译本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袁让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李汉俊译的《资本论入门》、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等著作。研究会还组织一些外文好的会员，将搜集到外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译成中文，其中有《共产党宣言》的最早油印本。研究会曾定期举行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讨论会、演讲会。当时李大钊常到会演讲《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研究会也曾组织会员进行专题研究。第一组研究唯物史观；第二组研究阶级斗争；第三组研究剩余价值；第四组研究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当时共有十个研究小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当时北京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心，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为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在湖南，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和组织的，成立于1918年4月的《新民学会》，经常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讨论各种问题，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并于1919年7月中旬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发表过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1920年7月，新民学会留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尼集会，提出新民学会宗旨应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在1921年1月1日国内会员在长沙召开的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这样，新民学会就从互助、向上的进步团体，发展为立志改造社会的革命团体。1920年9月16日在长沙又正式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赴俄国进行勤工俭学。1920年8月开设了“文化书社”，

主要“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社会改造原理》、《社会问题概观》、《新青年》、《劳动界》、《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晨报》等书刊。

在武汉，1917年10月8日由恽代英等人发起和组织了《互助社》。在“五四”运动中，《互助社》的成员们在武汉三镇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后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肖楚女等人又于1920年初在武昌横街成立了“利群书社”。书社和毛泽东主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建立了密切联系。“利群书社”从成立时起，“就致力于介绍新文化的工作，推销了许多进步的书报杂志”，发行了《共产党宣言》等大量的革命书刊，恽代英还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同年10月出版了《互助》月刊。1921年夏季，“利群书社”在黄岗林家大湾召开大会，长沙文化书社派易礼容为代表参加。会议开了三天，一致表示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利群书社”曾出版过一个供内部读的小型定期刊物《我们的》，发表了很多反对国家主义派、反对无政府党、反对胡适的崇美思想（当时特别表现于崇拜杜威）、反对张东荪的实业救国论的通讯与短文。《互助社》和“利群书社”的这些活动，在武汉地区的知识青年中间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地区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同志发起和组织的《觉悟社》，成立于1919年9月16日，并出版了《觉悟》杂志。当时，北京的《晨报》评价《觉悟社》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可以说是天津的小明星”。（1919年11月25日）《觉悟》杂志第1期，在当时的人们

看来，“全是攻击社会现状的文章”，其中“讨论的各问题，全是长篇而有秩序，为现在各出版物中所未有”①。《觉悟社》曾邀请过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到天津作讲演。李大钊给大家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演讲了《庶民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伟大胜利，使大家受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启发和教育。邓颖超曾回忆，觉悟社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反对孔孟之道、打破封建习俗”等问题，并“谈论着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②

在江西，袁玉冰、方志敏、黄道等人发起和组织的《改造社》，于1921年1月1日成立。同年5月1日出版了《新江西》杂志。该刊物主张发展“德谟克拉西”（民主）的真精神，打破一切威权和阶级制度，主张劳工神圣，并且要使他们有觉悟，能自动，引着他们到光明的路上去。最终的目的，在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改造社》虽然人数不多，但组织比较严密，对社员的要求也很严格；同时它的骨干又都是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所以战斗力较强，在反对江西军阀统治和传播新文化特别是传播马列主义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四川，王右木于1920年在成都约集革命青年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以后在读书会的基本成员中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支部。

在济南，王烬美组织了“励新学会”，出版了“励新”半月刊。1919年冬，当地的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齐鲁报社》。1920年改为《齐鲁书社》，销售了《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

---

① 《新人》1卷4期《文化运动批评号》（上），1920年8月18日。

② 《中国青年》第7期，1949年5月4日。

法研究》、《俄国革命史》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日益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1920年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小组，接着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宣传、介绍、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活动就更加有计划、有系统，不仅数量大大增加，接受教育的群众面也大大扩大了。

（四）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第一个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是李大钊。1919年，李大钊首先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此后李大钊又相继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唯物史观。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是社会科学的一大理论贡献。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时曾经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① 在李大钊于1919年《新青年》第6卷5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以前，中国人在自己写的文章中，除了马君武于1903年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说过"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这句话之外，几乎对唯物史观无所论述，更不清楚唯物史观的理论贡献。为了使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个正确认识，李大钊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历史观的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①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或称"历史的唯物论。"② 这是中国人撰写的文章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种称谓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并非偶然，而是时代的产物。他说："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以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李大钊指出，十八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宗教政治势力全然扫地，而资本主义经济异军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所以"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③

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以往的历史观有本质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对下述问题的不同回答上，"就是在这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社会生活里，那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④ 李大钊指出，持有唯心史观的思想家，往往"用思想感情等名词解释历史的发长"，⑤ 由于他们不懂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346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51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68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360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361页。

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①而“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②唯物史观认为，“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③即是说，“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④李大钊指出，由于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⑤这种伟大的功绩，一方面表现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⑥同时由于唯物史观的创立，也为社会学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⑦

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创立的另一伟大功绩，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唯物史观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点，就在两派对于历史的认识的相异——就是历史观的相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346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362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360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346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52页。
⑥ 《李大钊文集》（下），第347页。
⑦ 《李大钊文集》（下），第369—370页。

异。”①空想社会主义以为宇宙间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绝对真理的存在，只要诉诸于人间的理性，只要人间能理解此真理，把握此真理，无论何时何所，此真理都能实现。“此真理实现之时，即是理想社会实现之时。”这显然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则不同。“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主张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意他不愿意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②由于唯物史观的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便“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③

第二，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曾作过明确地阐述，他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④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他又指出：“社会亦有基址（Basis）与上层（Uberbau）。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333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334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334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59页。

意识。”① 在上述论述中，李大钊指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他又指出了在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上层建筑也会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他说：“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② 这里正确地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中的辩证关系，把社会形态看作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体。

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李大钊进一步分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孔子思想为什么能占居统治地位达二千余年的原因，他说，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是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孔子学说之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而是因为孔子思想“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沈沈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③ 到了近代情况不同了。由于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现在经济上产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346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67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179页。

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而“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了①。总之，“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②“宗教、哲学都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③。李大钊在这里用唯物史观阐明了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旧的意识形态行将灭亡，新的思想和学说必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学说，李大钊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条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要件。”从经济上说明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上说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所以李大钊指出：“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④。“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经济，由小产业制度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⑤

李大钊还阐述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他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183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177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139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59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53页。

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①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更替，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的。李大钊说：“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②李大钊还进一步指出，当生产关系还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关系是不能打破的，新的社会组织也不能诞生。他说：“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命运，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③这里，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阐述得非常准确、生动。

第三，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关于什么是阶级的问题，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引证《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论断之后，指出：“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59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59—60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60页。

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生产方法中采取敌对形式的最后”。他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上所以会出现“阶级对立”的现象，“全是因为一个社会团体，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余值（即剩余价值——编者注）的原故。”①在这里，李大钊指出了所谓阶级就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而划分的各个社会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李大钊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了以往历史上诸多政治事变，同时也指出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②这里实际上是指出了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政治斗争，归根结底都是阶级斗争。

关于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变革中的作用，李大钊也作出了明确的阐述，他说：“社会组织固然可以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那些居于有利地位的阶级，除去少数有志的人，必都反对改造。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③。因此，阶级斗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④。当然，阶级斗争同样是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创建社会主义的手段。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62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61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17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18页。

争。”①

李大钊还阐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存在的历史性及其消灭的途径。他指出：“在原始社会，经济上的技术不很发达，一个人的劳动，只能自给，并无余裕，所以不发生阶级。后来技术日精，经济上发展日进，一人的劳动渐渐有余裕。这个余裕，就是剩余劳工。剩余劳工，渐次增加，持有生产手段的起来乘机夺取，遂造成阶级对立的社会。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灭阶级的最后手段。”②“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③因此，阶级和阶级斗争并非永恒存在，他们只存在于阶级社会。“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④这里，李大钊指出了阶级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阶级斗争有其发生、发展和消灭的客观规律。

李大钊还阐述了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三部分理论组成。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这里所说的三部分理论，实质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⑤由于阶级斗争学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50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17—18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18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62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50页。

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①

第四，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原理。

历史是谁创造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一切唯心史观根本分歧点之一。为了让中国人比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李大钊除了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之外，还在1920年所编写的《史学思想史讲义》②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原理。

首先，李大钊指出，以往历史学家的一个根本缺点是宣传英雄史观，而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他说："从前的历史，专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好一点的，亦只在夸耀自国的尊荣。凡他所纪的事实，都是适合此等目的的，否则屏而不载。”③“而一般人民，将永沉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④李大钊指出，“这种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们采夺。”⑤

李大钊指出，以往历史学家有意片面夸大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他们重视王者、圣人、英雄、豪杰而崇之，以为具有旋转乾坤的伟大神德。李大钊认为，他们的历史观实质是“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50页。

② 《史学思想史讲义》是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为讲课而编写，其中包括《史观》、《鲍丹的历史思想》、《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11篇文章。有些文章后来在《新青年》、《社会科学季刊》上公开发表过。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362页。

④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363页。

观。”①

李大钊分析了英雄史观的唯心主义实质，指出英雄史观往往与神权、天命相联系。他说：“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接相依的关系。”②

其次，李大钊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他针对当时有人误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物质经济条件是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因的原理与承认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对立起来的错误，指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③正因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承认人类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所以它也必然同时承认人类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这是因为，唯物史观主张“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④因此，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⑤社会历史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265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364—365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360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364页。

的进步与变动。”①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基础。”②“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大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③与人民群众的作用相比较，个人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④这样李大钊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历史发展的原理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有力地批驳了英雄、豪杰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再次，李大钊阐述了唯物史观与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所产生不同的历史作用。李大钊指出，由于唯心史观“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⑤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因而它“给人以怯儒无能的人生观。”⑥这种唯心史观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就是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既已认定自己境遇的难苦，都是天命所定的，都是超越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那么以自己的势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出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要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⑦所以唯心史观的说教，归根结底就是要“一般人民老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363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239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365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363页。
⑤⑥ 《李大钊文集》（下），第364页。
⑦ 《李大钊文集》（下），第363页。

老实实的听他们宰夺。”因此，这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完全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①。

唯物主义历史观则相反，由于它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因此它“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②唯物史观唤醒了人民，使人民群众能正确认识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能自觉他自己的权威，而不再是被动的、否定的生物。因而使人民群众变成活泼而积极的分子，愿意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③，而不再听天由命。李大钊还指出唯物史观更重要的历史作用是，唤醒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使他们认清了自己所肩负的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李大钊说：“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④

第五，提出了破除唯心史观，确立唯物史观的任务。

李大钊认为为了适应社会改造新潮流的需要，中国人应破除唯心史观，树立新的唯物史观，变革思维方式。他指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长期宣扬英雄史观，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达二千年之久，因此唯心史观在中国十分盛行，流毒甚广。他说：“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

---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363页。

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364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64页。

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①因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之英雄史观则“应运而生”。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且“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②。唯心史观束缚着人民的思想，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辛亥革命之后，帝制复辟派不甘心失败，又重新祭起孔子亡灵，提出“定孔教为国教”，到处办“孔道会”、“尊孔会”，一时间复辟逆流甚嚣尘上，以至于“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③然而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已经和现时代的新潮流格格不入了，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改造和进步。李大钊指出，时代变了，人们的历史观也应该彻底改变。“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④为了迎接这种新历史的到来，李大钊指出：“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与治斯学者共策勉之。”⑤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注重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还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武装人们的头脑，变革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指导研究历史和改造中国社会，这正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特点。

五四运动时期，除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过较为系统地阐述之外，陈独秀、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等其他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268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365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268页。

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也都不同程度地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陈独秀针对当时某些人误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成是一种自然进化学说的错误观点，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① 他进一步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个基本理论，可以得出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② 最后他总结说："照我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末，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不仅是对于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了"③。陈独秀在这里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驳斥了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成是一种自然进化学说的错误观点，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陈独秀还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以强调阶级斗争学说，就在于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采用革命手段才能达到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自己才能上升为统治阶级。他说："马克思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

①②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57页。

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① “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②

陈独秀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他摘译了《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论述。他说：“其实马格斯在《哥塔纲领批评》中明白的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底中间，有一个由这面推移到那面的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底革命的独裁政治’。”③ 他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阶级的必由之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④

李达在介绍唯物史观时，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原则之首：“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⑤ 他还较系统地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说：“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⑥ 他指出：“依唯物史观所说，新社会的组织，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8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9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97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96页。
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31页。
⑥ 《李达文集》第1卷，第30页。

是旧社会组织中各种固有势力发展的结果。资本制度发达至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资本制度自己掘自己的坟坑。可是某种社会形式中固有的生产力，若在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期限以内，决不会倒灭的。这种社会形式发展的结果，内中新生产力的利用和发达，当然要与这种社会形式发生冲突。资本的独占成为生产关系的桎梏。于是生产机关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遂与资本主义不能两立，而新社会组织于是起来代替了。”①这里阐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原理。

李达还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学说。他指出：“人类的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②“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复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③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职能便是剥削资本，组织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他说：“无产阶级藉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④他指出：“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同时他也指出：“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⑤指出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在我国属于首次。李达还批驳了欧洲社会党改良主义的“议会政策”，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经过阶级斗争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社会革命的目的，简直成了一种空想。”⑥

蔡和森在法国留学期间，认真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不断地把他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唯物史观的理论介绍到中国。1920年9月，在给毛泽东的通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

---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35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30页。

③④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31页。

⑥ 《李达文集》第1卷，第53页。

主义学说的出发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①又说："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②唯物史观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他说，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

蔡和森还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指出："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上没有第二阶级，无产阶级以下没有第三阶级。"③他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④"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⑤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⑥

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明确提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⑦。把唯物史观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并指明了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是它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期间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1月，他因领导反帝爱国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仍向难友们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着重讲述了唯物史观、资本论等基本观点。

---

① 《蔡和森文集》，第63页。

② 《蔡和森文集》，第74页。

③ 《蔡和森文集》，第74—75页。

④ 《蔡和森文集》，第79页。

⑤ 《蔡和森文集》，第64—65页。

⑥ 《蔡和森文集》，第79页。

⑦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在旅欧学习期间，他组织了共产主义研究会，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批判实用主义、行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努力宣传共产主义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曾发表文章介绍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指出："唯物的历史观有二要点：其一乃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之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第一说谓人类社会生产机关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此实为社会之基础构造。一切社会里之政治法制及其精神上的构造，皆随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第二说谓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随之而变动。"他还指出："所谓阶级，即经济上利害相反之阶级。其分别则一方为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之手段者；一方肆其压服掠夺；而一方则受压服掠夺者也。此两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而表现，若亚细亚者，若欧洲古代者，若封建者，若现代资本家者。"①

此外，胡汉民在1919年10月《建设》杂志第1卷第3号上所发表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一文，也在一定程度上介绍了唯物史观。他指出，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的方法变化，一切社会的关系跟着变化；一切主义、理想，皆是历史的生产物，又是移动的生产物。"他在12月《建设》杂志第1卷第5号上发表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再次简介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并节译了《神圣的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法兰西政变论文》、《经济学批评》等著作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论述。

① 《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中华新报》，1919年11月11日——12月4日连载。

总之，在五四运动时期，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比较完整、系统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 第三节　五四时期三次大论争及其哲学意义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敌对思想的斗争中发展和传播开来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①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五四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爆发，特别是"六三运动"之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也在成长壮大，日益成为运动的主流，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谈论社会主义、社会改造问题的热潮也日趋明显。五四运动本身虽然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它和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联系，已经愈来愈紧密。从此之后，一方面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断加强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另方面，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敌视，开始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场大论争已经不可避免。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3页。

##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胡适首先发起的。胡适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业资本家的家庭，从小受程朱理学封建主义思想教育。以后在上海读书，又接受了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1910年到1917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接受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教育，成为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得意门生。

### （一）论争的经过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他曾参加了当时国内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写过一些有关文学改良的文章，对于提倡白话文，促进文学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胡适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并且要在中国推行实用主义，推行不触动现存制度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1919年6月，胡适利用陈独秀因在五四运动中散发传单而被捕、李大钊被迫离京避居家乡的机会，掌握了《每周评论》的编辑权，改变了这个刊物的方向，连续两号刊载杜威的演讲录（第26号、27号），并于7月20日发表了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攻击，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当时上海的中国少年学会会员也有人提出"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的主张，而负责总会会务的王光祈则极力表示赞同这一主张。

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发表之后，当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公武（即蓝志先）于1919年8月3日在《每周评论》第33期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反对胡适的主张。他指出，胡适"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因而犯了"因噎废食的毛病"。并指出，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

步”，当时还有些人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理论。如1919年 9 月30日在《晨报》上发表的《总的解决与零碎解决》一文，提出应当在“总解决”的前提下谋求零碎解决的主张。但这里所谈的“总解决”也是一种抽象而空洞的理想目标，并非指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因而本身仍有改良主义倾向，对胡适派的批驳也不得力。

李大钊在离京返乡时就看到胡适这篇文章，但来不及研究。到昌黎五峰山后，他认真研读了胡适的文章，看出其真实目的，立即动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并于 8 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上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将胡适观点的改良主义实质昭然于世。

在遭到李大钊的反驳之后，胡适又于 8 月24日、8 月31日，分别在《每周评论》第36号、《努力周报》第37号上，迭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11月又在《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再次鼓吹他的改良主义和实验主义学说。

胡适文章发表之后，又有一些其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存有糊涂观念的人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参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新群》杂志第 1 卷第 2 号上所刊载的《怎样去研究社会改造问题》（1919年11月）、《社会改造与共同讨论》（1919年12月），以及《社会问题之面面观》（1919年12月）等文章也都在宣扬改良主义而反对马克思主义。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期间，李大钊不仅公开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于1920年 3 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以研究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和吸引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1920年 8 月，在有天津的觉悟社和北京的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参加的北京陶然亭友谊联络座谈会上，李大钊再次阐述了革命团体标明主义之必要，指出：“盖主义不

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联合之行动”①。

“问题与主义”之争一直延续到1921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大会上。会前，李大钊曾用书面表示了北京会员的意见，认为学会确有标明主义之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在会议上，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先进分子坚决主张学会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便使少年中国学会成为革命的组织。后来，终因会员之间信仰不同而发生分化；少年中国学会也彻底分裂，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遂告结束。

（二）论争的主要观点

论争双方的主要观点和根本分歧，是围绕着以下三点而展开的。

1.关于问题。

胡适在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基于他的实用主义的理论提出许多所谓“应该赶紧解决”的具体问题，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者们发难，说什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人国际联盟等问题，都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因此他奉劝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进一步要求别人也“多提出一些问题”来研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具体问题，以达到他的少谈些主义的目的。胡适的论点颇具迷惑性。他提出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的问题，也是人们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们所忧虑的一些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回避这些问题，不就所谓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反击胡适的挑战是不力的。1919年8月3日，蓝公

①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

武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首先就胡适提出的所谓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蓝公武认为，问题是需要研究的，但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怎样研究问题，才于社会改造有益，是必须搞清楚的。首先，他认为，凡是构成一个问题，必定是社会生活遇着了一种困难。困难的发生有三种情形：一是旧存的制度和新的理想发生了冲突；二是新变化的生活（外来的或自发的原因）和旧事物的冲突；三是社会中有扰乱迫害的事实发生。由于有这三种不同的情形，所以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就不能一律并论。其次，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常不相同。他认为，问题本因实际利害而引起，但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各部分人的利害关系常不一致，故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亦常不相同。有世界性的问题，有一民族的问题，有一个地方的问题，也有一个阶级的问题，所以对待问题，要有所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再次，他认为，问题之发生，固然起于困难，但构成一种问题，还需靠主观的反省，也即需自觉去认识。如无主观的反省，自觉的认识，即使遇着极不合理的事实，也未必能成为问题。比如专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国行了几千年，并没有人觉得它不合理，构成一种问题。只是到了最近数十年，由于西方思想的输入，人民有了比较，起了反省，便成了极大的问题，由此产生出辛亥革命。

基于以上分析，蓝公武认为，研究问题，一定要研究社会上具有“共通性”、“共同点”的问题，也即“革命的问题”，而不是胡适所谈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样一些琐碎的个别问题。如果不去研究社会诸多问题中具有共通性、共同点的问题，那么，人力车夫的问题，如何能成为小学教员的问题，小学教员的问题又如何能成为女工的问题，以至于成为社会普遍共同关心的问题呢？由此，他认为，“故凡是革命的问题，一定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点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

问题，才能发生效力。”若如胡适所鼓吹的那样只是去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而不去研究社会成员普遍关心的共通性问题，怎么能发动民众去解决社会改造问题呢。

蓝公武强调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社会普遍关心的共同性问题，这是对的，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他仍然没有把问题讲的很深透。他虽然提到阶级利害冲突是不一致的，但没有把阶级分析方法贯彻始终；他虽然指出革命的问题具有社会共通性的特点，但是他对革命缺乏阶级分析，更没有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社会制度问题，是政权问题。他关于问题的发现需靠主观反省，而人类的主观反省又主要是少数天才有识之人的事的论述，又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在更高的层次上阐述了应该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的观点。他认为，要想解决社会改造问题，必须着力研究“社会问题”，而不是胡适所鼓吹的那些枝节问题。所谓“社会问题”，是指“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即多数人共同感觉不满意的问题。例如，社会“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并非仅指胡适所谈的女子卖淫问题，而是指全社会女子的社会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并非仅指胡适所谈的人力车夫问题，而是指全社会工人阶级的解放问题）、社会“经济组织”问题，亦即社会生产关系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提出“社会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目的在于求得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只有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①

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37页。

系的原理。指出，在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等诸多社会问题中，只有经济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①李大钊这里所说的经济问题非指人力车夫、教员等的就业问题以及经济收入问题，而是指社会经济组织，即“经济的构造”问题，也即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基础问题。这样，他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就抓住了根本，找到了关键。在他看来，所谓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就是要对社会经济组织，社会经济构造进行根本改造，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建立新的“集产制”，也即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不推翻旧的“经济制”，不改造旧的经济组织，那么胡适所罗列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所以他明确指出：“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②就如何研究“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的论争来看，李大钊阐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同时也指出了胡适鼓吹的改良主义的实质，因而对胡适改良主义的批驳是更为深刻有力的。

2.关于主义。

胡适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们在中国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种种非难。

首先，把矛头指向主义本身，曲解主义的性质，把主义看成是一种“抽象的名词”。他说，凡是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图简便，便用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37页。

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①他认为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主义里面。

对于胡适把主义看成是一种抽象名词的论点，蓝公武进行了驳斥。蓝公武指出，有许多主义，他的重要部分，并不在于从具体主张变成抽象名词，而是在于那未来的理想。人们信仰某种主义，也决不是膜拜那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信仰他的理想”。“故理想乃主义的最要部分，一种主张能成主义与否，也全靠这点。”②他还进一步指出，正因为主义是一种理想，所以，“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是态度”③。正因为主义是多数人的理想，是人们共同行动的标准，所以他指出，“主义好象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明灯”④。

李大钊则明确指出，主义就是人们“共同趋向的理想”⑤，人们宣传某种主义，就是在宣传某种理想，传播某种理想。同时，主义又是人们判别社会生活“满意不满意的尺度”⑥。因而，“主义”是人们改造社会的“工具”，是改造旧世界的锐利武器，而决不是如胡适所说的是一种抽象的名词。这样就从主义本身的性质及其社会作用上有力地驳斥了胡适对主义的非难。

其次，胡适把矛头指向对主义的宣传。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而研究问题却是很难的，因此，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对此蓝公武

①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

②③④ 蓝公武：《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3号。

⑤⑥ 《李大钊文集》（下），第32页。

予以反驳。他指出，难易只是相互比较而言，没有绝对的标准。宣传和研究主义并非容易。“要把一种主义的内容和意义，明白得十分透彻鼓吹到社会上去，使社会的若干部分，成为信徒，发生主义的运动，这事恐怕就很难。”①而解决问题，看起来很难，如果不问结果，糊里糊涂了结，则又很容易。可见，“主义的易，不易在主义本身，而在随便乱谈；问题的难，不难在解决方法，而难在解决后的好结果”。而问题解决的结果好坏与否，又需做出判别，“这个标准，就是一种主义。”②如果象胡适所说的，让人们放弃对主义的研究，舍弃主义这个理想和人们行动的标准，而只是就问题研究问题，要求出一个好结果，“那自然是极难的了。”可见，胡适认为人们宣传和研究主义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是毫无道理的。

再次，胡适宣称“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③。他借口主义是一种抽象的名词，便认为宣传主义，容易被人利用，有搞假冒牌号的危险。他说，比如讲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人们都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对此，蓝公武指出，这种顾虑大可不必。人们宣传和研究主义，并非纸上谈兵。“因为主义进于鼓吹，已不限于纸上了。”④“人家受他的鼓吹，信奉他的主义，必定要问这种主义的内容和他的影响结果。”怎能说宣传主义就是偏向纸上呢？再说，无耻政客，也决不能利用主义的宣传来骗人。王揖唐虽然讲社会主义，但他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依然还是一个王揖唐主义，绝没有人去上他的当。政客害人，并不是谈主义带来的危害。早在没宣传

①② 蓝公武：《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3号。

③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

④ 蓝公武，《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3号。

某种主义时，政客们不是也在害人吗？倒是我们现在在研究商酌之时，不能自己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才是一件最抱憾的事。

李大钊指出，有冒牌主义的出现，并不奇怪，任何主义的宣传和流行，都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连王麻子剪刀出了名，还有旺麻子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茶叶出了名，还有汪正大来混他的招牌，何况是一种"主义"的流行呢。"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①因此，不能因为有许多冒牌主义的存在就不宣传我们自己所信仰的主义。"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正因为有冒牌主义存在，我们就更应当宣传我们的主义，"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②。

3.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

由于胡适曲解主义的性质，并对主义的产生作出唯心主义的解释，因而他认为主义是无用的，在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上，必然持割裂的态度。他认为，主义都是"有心人"想出的某种救世的法子。因此，凡是主义，"里面有一部分是当日时势的产儿，一部分是论主个人的特别性情家世的自然表现，一部分是论主所受古代或同时的学说影响的结果"，因此决不能把主义"当作有永久价值的真理"，否则"那就上了古人的当了"③。由此，他武断地说，对于中国问题，"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④。

对此，蓝公武反驳说，尽管主义是某时某地的产物，但"一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35页。

③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努力周报》第37号。

④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

地有效的主义，在他地也未必无效”。我们只问主义是否有效，而“不必问他是外来的或是自生的。”① 因为一切主义，都含有几种理想，“其中有现时可适用的，有现时不可适用的；甲地可适用的，乙地不可适用的；极端的如是，温和的亦复如是”。② 这是选择应用上的问题，和外来输入的主义无关。因此说“外来主义无用，未免有几分独断。”③

李大钊针对胡适把问题与主义割裂开来的企图，明确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④。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就必须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这样，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发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李大钊指出，我们“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⑤ 因此，不能只研究问题，而不谈主义。

李大钊还进一步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

①②③ 蓝公武，《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3号。

④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32页。

适应实际的可能性”。李大钊又指出，尽管主义的本性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但变可能性为现实性，还须人的主观努力。他说：“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社会主义者，一定要认定我们的主义，“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①

李大钊针对胡适反对谈主义，实质就是反对谈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原则问题，十分明确地表示，“我是喜欢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因为“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李大钊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②这样，李大钊通过对主义与问题关系的辩证论述，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驳斥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谬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 （三）论争的实质及其哲学意义

关于问题与主义论争的实质，在政治上，表现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还是实行彻底的革命的改造。在哲学上，则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实用主义唯心论的斗争。胡适鼓吹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而反对根本解决，实质就是在推行他的实验主义，也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方案。从这种改良主义立场出发，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37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36页。

进行种种诽谤和责难，实质是反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的改造。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反对胡适改良主义的斗争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论证了中国必须推翻旧的社会经济组织，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必要性，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

这场论争的哲学意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与胡适派改良主义哲学的较量，而且还在于它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斗争。它在客观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普遍性与具体性的统一，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在真理问题上，决不允许以真理的具体性排斥、否定真理的普遍性；也决不允许以真理的相对性排斥、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反之亦然。

胡适从他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出发，片面强调真理的相对性，而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他曾明白指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作为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① 他把主义、学理看成是“参考印证的材料”，实质上就是印证主义、学理对主体是否有用，有用的才是真理，无用的便不是真理。他认为，“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② 由于他坚持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因此，他极力否定真理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他说：“天下没有永久不变的

①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

② 《胡适文存》卷二，第435页。

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那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①尽管有时他也讲“主义的应用，有时带有几分普遍性。”②但他这里讲的普遍性，是从主义在应用时可以作为参考材料意义上说的，并非指主义、学理本身就具有普遍性。所以他又说，“不可因为这或有或无的几分普遍性，就说主义本来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③由于他把真理的具体性、相对性同真理的普遍性、绝对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所以他才反复宣称“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李大钊在论争中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真理普遍性。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真理普遍性，它才会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有普遍指导意义，它才“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普遍性，所以它才能“包含着许多把它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总之，在李大钊看来，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真理普遍性，所以它才能“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适应实际的可能性，恰恰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普遍性。这样，李大钊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驳斥了胡适所坚持的实用主义真理观，论证了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只要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去作，就“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④。从而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理论指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 《胡适文存》卷二，第415页。

②③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

## 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

经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之后，马克思主义广泛地传播开来。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报纸杂志上宣传和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的中译本相继出版，列宁著作的中译文也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在1920年五一劳动节时，许多进步报刊和青年知识分子广泛展开了关于劳动运动的宣传。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并由此而掀起了一个学习苏俄和讨论社会主义的高潮。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收获。更为重要的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结合，中国共产党在积极酝酿成立之中。这种形势引起了马克思主义敌人的极大恐慌和仇恨，于是他们便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们的进攻，立即遭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坚决反击。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 （一）论争的经过

这次论争是从1920年11月正式开始的。研究系的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借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演的机会，抛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罗素于1920年10月到中国，次年7月离开。他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讲演。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社会改造原理》、《政治思想》、《到自由之路》、《哲学问题》等也都被译成中文发表。当张东荪跟着罗素到各地讲演之后，立即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文章，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主张。张东荪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当时的共产主义者的注意。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11月7、8两日，连续发表了《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和《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等文章，12月1日出版的《新

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也发表了陈独秀编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从此，讨论便热烈地展开了。

12月15日，张东荪在《改造》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全面地系统地发挥了他的观点，极力贩卖罗素的思想。1921年2月15日，梁启超在《改造》第三卷第六号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与张东荪相呼应。在这一期《改造》上，他们特别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专栏，组织一批观点相同的文章，以壮其声势。此后，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陆续在《改造》、《评论之评论》等刊物上出现。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也发表一系列文章，其中较重要的有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李达的《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何孟雄的《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应采用甚么方法》、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以及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等。这些文章对于张东荪一伙所鼓吹的"社会主义"的荒谬理论，给予了有力的批驳。

这次论争持续了较长时间，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才暂时告终。同时，这次论争的规模很大，国内很多刊物都对论争中所争论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一些进步社团内部也进行过类似的争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张东荪等人又在《时事新报》上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因此，从1921年底到1922年初，中国共产党又在《新青年》、《先驱》等刊物上，对他们进行了批评。由于张东荪等人提不出什么新的观点，所以争论很快就结束了。

### （二）论争的主要观点

这次论争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而展开的。

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只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反对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理由是，认为中国缺乏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之后，又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等文。他在这些短文里，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宣传社会主义，更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他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罗素先生观察各地情形以后，他也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而又非常沉痛。……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① 他极为称赞罗素的观点，并且加以发挥说："他好象是说，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少社会主义不妨迟迟。我以为罗素先生观察中国虽没有多久的日子，然而已得其诀窍，区区的这几句话就非常中肯。我对于教育与实业两层自然是完全赞同，至于劳农主义，我以为不患他不实现，而只患他实现得太早，故很以罗素先生的话为然。"②

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抓住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这一事实，

①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

② 《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大肆发挥，认为社会主义只适合于“近世欧美的大工业制度”①，而不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他们说，中国尚处于所谓“农业时代”，而不是“农工商”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还相距甚远。他们认为搞社会主义要有“生产器具”，但中国根本没有几个工厂，根本没有什么大机器。没有公有对象而谈社会主义，岂不白说。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对共产主义者说：你们“眼中直有欧洲工场的观念，所以说出不合情理的话来”②。既然中国没有这样的生产方法，就讲不到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以先发展实业为宜”③。

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也持相同观点。他也借口中国生产力水平低而反对搞社会主义。他说，搞社会主义，“必先以国内有许多现成之生产机关为前提”④。而“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若必勉强将国内现有区区百数十家之工业、矿业所收容工人多则千数少则数十者，施行共管制度，无论各该业现役工人所得利益多少，且未敢言也。籍曰诚有利矣，然食其利者最多亦不过数万人。其于全国数万万人失业救济之问题，丝毫无所补益，而固有之生产力，或因此大蒙打击，决非计之得也。故此法者，在他日生产事业相当的发展之后，容或有采择之余地，今日提倡，决非时也。”⑤他们还借口中国社会存在“四病”来反对搞社会主义。张东荪认为中国现状（一）大多数人民无知识，和原始人类的状态所差未必甚大，他称这个为“无知病”；

① 《社会主义与中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② 《外国学说与中国社会问题》，《太平洋》第2卷第9号，1921年1月。

③ 《我对于张东荪和陈独秀两先生所争论的意见》，《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④⑤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二）大多数人民困于生计，因本来物产不丰，加以连年天灾人祸，以致愈贫，他称这个为“贫乏病”；（三）自民国以来连年内敌以致兵匪愈增多，他称为“兵匪病”；（四）自前清以来关税外交完全失败，外国的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合而为一以压倒中国，他称这个为“外力病”。由于中国存在“四病”，所以他同意罗素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必没好结果”①。

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反对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理由是，认为中国缺乏搞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

张东荪认为，中国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工厂很少劳动阶级，他说：“劳动阶级，除了交通埠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单是没有。况且他们要发生阶级意识还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经验的教训。在他们的阶级意识未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者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②他认为，“现在只能谈到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态，而不能发生社会主义的运动”③；党是代表那阶级的，若他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因此，除了静待以外，无法发展。他甚至认为连社会主义的宣传也不应该进行。他说，工人听了不过是罢工，没有什么要紧；农民不识字，他们是不听的，……独是兵与寄生阶级之贫困者，一听便可入几分。因此，真的劳农主义决不会发生，而伪的劳农革命恐怕难免。至于伪劳农革命发生，不消说不能福民而必定是害民，……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因此，不必开展工人运动，不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更不应当搞社会主义。

梁启超更明确地说：“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今通行‘劳动阶级’

①②③ 《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15日。

一语，本含广狭二义。广义的解释，自然凡农民及散工悉含在内。狭义的解释，则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而社会运动之主体，必恃此狭义的劳动阶级。中国则此狭义的劳动者未能成为阶级，故谓之无阶级也。”①他还认为中国劳动者缺乏革命要求，说什么："又见夫劳动阶级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质亦带保守，不易鼓动也；”所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必能奉行也”②。

根据上述几种理由，他们断言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出路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只有“开发实业”，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能谈得上搞社会主义。梁启超说："资本阶级发生、则劳动阶段亦成立，然后社会主义运动仍有所凭借。”③

当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及其同情者对于张东荪、梁启超所鼓吹的理论进行了有力地反击。

他们首先揭露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大唱“开发实业”论调的实质。陈望道在《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一文中质问道："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曾说：‘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为什么不把你那‘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社会主义’再行赞美，鼓吹，——反而忍心诅咒呢？”④

李达指出，张东荪说来说去，“无非是不讲社会主义去开发实业罢了”。“东荪自已把假面具揭破了”，“现出原形”⑤。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李达指出，梁启超的言论

①②③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④　《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26页。

是误解了社会主义，误解了社会主义运动。其实质不过是“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①。

邵力子指出：“‘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在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并且也认为必要；不但认为救现在的中国应当如此，并且认为谋人类底幸福本须如此。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在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在应否增加富力开发实业的问题。……社会主义，只反对‘货藏于己……’的资本主义；所以资本主义当然不免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硬说要开发实业便不能谈社会主义；……东荪君难道也认定谈了社会主义便不能开发实业么？”②

《正报》记者爱世发表文章对张东荪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他指出：“某报记者(指张东荪)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要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还应该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③

陈独秀在《复张东荪底信》中对此也进行了驳斥，指出：“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劳动阶级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诸君何以不想想法子努力改造政府或训练劳动阶级来施行新的生产制，而马上便主张仍旧归到资本家呢？”同时，他针对杨端六说的“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资本来”和张东荪所说的“最大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视投资为危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58页。

② 《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新青年》第8卷，第4号。

③ 《正报记者爱世先生‘人的生活’》，《新青年》第8卷，第4号。

途”等言论，指出：“如此看来，先生等所迷信的资本主义，仍是一个空中楼阁。”①

李大钊在其最近被发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中指出：“不少人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着力于发展实业，以开发全国的事业，增加富力，从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广大的下层农民富裕起来，认为这是最稳妥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想法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因此，“在现存制度下谋求实业的兴盛，实质上就是要使我国的统治阶级与各国的资本阶级结合起来，这样只能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决不会带来其他任何好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②由此，李大钊指出，在中国要发展实业必先解决社会制度问题，他说：“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③

其次，驳斥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借口中国经济落后、缺乏劳动阶级，因而不能搞社会主义的理论。

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区别了开发实业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并且指出：“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我想无论何人都当承认的。”中国，“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④譬如我们要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着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6页。

② 《新发现的李大钊佚文》，《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446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65页。

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因为到那时，要想根本改造，实在是最难下手。而且，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的战场，要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资本主义，恐怕要糟到极点。对于梁启超发展资本主义“制造劳动阶级”的论调，李达反驳说：“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实现消除阶级的国家，中国既无阶级，又何须制造阶级？”①认为这同为了给女子放足，而故意先给“天然足”的女子缠足一样地荒唐。他说，其实“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②。他认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由于国际资本阶级的压迫，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无产阶级所受更甚。因此，只能说中国的社会与欧美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③。

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已发生深刻的分化，广大农村经济和手工业纷纷破产，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城市，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即工业无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农民，不但遭受到本国的地主、资本阶级的剥削，而且遭受到国际资本阶级残酷的掠夺和压迫，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更大的痛苦和更迫切的革命要求，因而社会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趋势。蔡和森说：“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因此经济上的压迫，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④在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为后盾的经济侵略

①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67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63页。

④ 《蔡和森文集》第75页。

下，“大机器生产日日浩浩荡荡的输进来，于是三代以上的手工业生产者一批一批的失其职业，造成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中国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如果不甘心饿死或者在兵乱中死去，就只有起来革命，因此，“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①

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客观的经济关系为基础，认为劳动人民的阶级自觉是革命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劳动群众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只要加以组织和训练就能成为巨大的革命力量，这决不是张东荪等人所可以任意抹煞和诋毁的。蔡和森认为：“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知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自来一般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以他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这真愚妄极了。”②中国社会的黑暗已达到极点，要想推翻反动统治，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只有依靠劳动阶级，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陈独秀指出，“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③。因此，中国劳动阶级必须团结组织起来，通过革命斗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按照共产主义的原理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

他们还用具体事实说明：“中国农民占全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④这样共产主义者就论证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①② 《蔡和森文集》第76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92页。

④ 《告中国的农民》，《共产党》第3号。

论证了完全可以通过革命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从而粉碎了张东荪等人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谬论。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驳斥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谓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使国家独立富强的谬论。他们指出，中国既已沦于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之下，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达到国家富强和保障中国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帝国主义决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实业，不会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使中国永远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根据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形势的变化，指出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经济体系，共产主义的曙光出现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李大钊说：“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者经营实业不可。”①

当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揭露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实质，不过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因而这个企图是不能得逞的。蔡和森指出：“我敢大声唤破这种迷梦，社会革命与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熏坏的改造家全无干涉。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

---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454—455页。

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院内供他的御用罢了。一旦无产阶级的生死迫来，有如1917年的俄国饥民要面包，兵士要停战，工人要工厂，农人要土地，乱七八糟爆发起来，任凭那些中产阶级学者及自命为理想的改造家，凭依军伐财伐而结为神圣同盟，也是遏制不住的。今日中国大多数的生活问题迫到了这个田地，贤人派的力量纵大，恐怕有点遏制社会革命的自然力不住。”①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次论争中不但批判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谬论，而且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当然，他们的宣传也有一些明显失误，如对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没有科学的认识，因而没有正确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步骤，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的阶段。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坚持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特别是提出要成立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

（三）论争的实质及其哲学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实质是关于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张东荪、梁启超虽然口头上标榜社会主义，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但在实质上是在鼓吹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宣传了在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

就采取什么办法解决中国的出路而言，不仅是走什么道路的斗争，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揭露了张东荪、梁启超的温情主义的改

① 《蔡和森文集》第76—77页。

良方案和他们所信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论证了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就为中国社会找到了真正的出路，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历史事实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次论战的哲学意义，不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推崇的罗素实证主义哲学的斗争，而且还表现在对中国改造的步骤上所反映出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

张东荪、梁启超等人鼓吹中国实业不发达，缺少“生产机关”，因而不能搞社会主义，这反映出他们无视中国社会的政治危机和劳动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强烈的革命要求，从而片面地认为生产力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就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观点。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张东荪、梁启超的批驳，从政治上讲，是对改良主义的批驳；从哲学上讲，是对片面强调经济决定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批驳。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正确地坚持了辩证法，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需要物质前提，而且还需要思想前提和政治前提。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离不开政治解放，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李大钊在批判机会主义时就曾经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①。并指出，“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②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38页。

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①。因此，要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不能仅着眼于经济问题，更不能仅就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而要着眼于政治革命，要利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说：必须"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②

当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固然需要物质前提，但不能由此而认定，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国家里发生，而不会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发生。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往往会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中国也是经济落后国家，所以也要搞社会主义才会有出路。蔡和森指出，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改良主义较为盛行。"所以社会革命不发生于资本集中，工业极盛，殖民地极富之英、美、法，而发生于殖民地极少，工业落后之农业国俄罗斯也。"并说，"由此就可推论中国社会革命了。"③李达指出："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得十数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在俄国实现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的大的原故。"④发表在1921年9月25日《觉悟》期刊上署名C.T.的文章指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生产社会化了很少；所以要实行社会主义，没有遗产可承，都要靠自己创造。""要救中国社会，应当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应当先使生产社会化；要使生产社会化，必须借助政治的权力；要借助政治的权力，必须先掌握政权；要掌握政

① 《蔡和森文集》第64页。
② 《蔡和森文集》第51页。
③ 《蔡和森文集》第75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56页。

权，必须先于革命”。①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批驳了张东荪等人的经济决定论，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扫除了思想障碍。

## 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20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现代工业不发达，小资产阶级大量存在的情况，给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除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信仰无政府主义外，还有一些政客如吴稚晖、李石曾之流，也用无政府主义作为自己伪装“革命”的资本。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初活动，是在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开始的。1907年7月21日，吴稚晖、李石曾等主办的《新世纪》在巴黎创刊。与此同时，在日本东京，刘师培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了《天义报》，次年又发行《衡报》。巴黎和东京成为中国留学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两个据点。

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1912年，在《新世纪》的影响下，刘师复组织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晦鸣学舍。“一九一二年五月，‘晦鸣学舍’发起于广州，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数年前《新世纪》所下之种子，至是乃由‘晦鸣学舍’为之。”②1913年8月28日，晦鸣学舍的机关报《晦鸣录》创刊③；与此同时，又大量翻印在巴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小册子。从1914年开始，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组织。1914年7月，上海、广州都成立了无政府主

① C.T.:《读费觉天君底从罗素先生的临别赠言中所见的政治支配经济策》，《觉悟》，1921年9月25日。

② 《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民声》第16号，1914年6月27日。

③ 《晦鸣录》，一名《平民之声》，只出二期，第三期改名《民声》，共出二十九号。

义同志社①；1914年5月，常熟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社②，南京组织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③；1916年南京组织了群社；1917年北京组织了实社；1918年山西组织了平社。

（一）论争的经过

在社会主义问题论争之际，几乎同时也进行一场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无政府主义者以"左"的面目出现，曲解和诋毁马克思主义。

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引起来的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给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散布创造了条件。因此，在1919年以后，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日益增多。如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北京大学学生朱谦之等人组织了奋斗社，出版了《奋斗》杂志；在天津有真社，出版了《新生命》杂志；在成都有均社，出版了《半月刊》。

早在1919年，无政府主义者就开始责难马克思主义。是年9月，黄凌霜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批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原则。1920年1月创刊的奋斗杂志，发表了《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三号登载了《"无强权主义的根据"及"无强权的社会"略说》一文，这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并根据这种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

1920年9月，共产主义者开始反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批驳。在《谈政治》一文发表不久，无政府主义者郑贤宗立即写信表示反对（发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这样，斗争就日

① 《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民声》第16号，1914年6月27日。

② 《风雨鸣声录》，《民声》第11号，1914年5月23日。

③ 《风雨鸣声录》，《民声》第8号，1914年5月2日。

益深入和尖锐了。为了彻底击败无政府主义者，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便组织了大规模的批驳。《新青年》陆续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劳动专政》等文章。《共产党》月刊每一期的《短言》都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驳。在这个刊物上登载了李达的《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两篇文章，对无政府主义的反动实质进行了彻底的揭露。此外，还发表了《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巴枯宁和无强权主义》等文章。

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广，所以这次斗争的规模也比较大，很多刊物都投入了讨论。又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所以这次斗争一直继续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告结束。

（二）论争的主要观点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持有以下错误观点：

1，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

无政府主义者遗恨（李勉成）毫无隐讳地宣称："我们在生存上要求绝对的自由，非达到'安那其'的境地不可。什么'德谟克拉西'、'布尔扎维克'，都不是绝对的自由"①。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也直言不讳地讲："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②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极力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主要是受到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影响。

无政府主义者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互助"、"性善"是人类天赋的本性，是社会进化的动力。

① 《安那其与自由》，《自由》第1期，1920年12月。

② 《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进化》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

人类所具有的"互助"、"性善"的天赋本性，决定了"自由"也是人类的天性。"自由也，无非顺乎人类天性自然之发育。"① 正因为自由是人之天性，所以"非铲除一切束缚、妨阻我们的东西不可"②。他们认为，自由就是"由自"。就是一切都要"随从自己，不是随从自己以外的东西（或人或物）"③。如果个人天赋的自由受到限制和束缚，那么，人类的本性便不能得到发挥，社会的进化也就要停滞。所以，要铲除一切束缚，"以求我固有之自由。"④

无政府主义者还认为，要想使人类社会繁荣昌盛，"必须使个人在社会中能尽量发展其才能。"⑤ 如果个人自由受到限制，那么，个人才能得不到发挥，社会也就不能够进化。总之，人类社会进步全靠"意志自由"，没有个人意志的绝对自由，社会就不能进步，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全部理论之根本出发点。

无政府主义者从个人绝对自由出发，还反对任何性质的组织和纪律、集中和领导。他们宣称，任何组织和纪律、集中和领导都是外来的强加于人的自由意志之上的东西，是不该存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示非常不满，认为只有个个赞同，才算真正"自由"，只有赞成的实行、不赞成的拆台，才算真正"自由"。

2，反对一切"强权"。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强权和个人绝对自由是对立的，因此必须反对强权。自称新虚无主义者的朱谦之在《革命哲学》等书中，

① 《复了僧君》，《自由录》第1集，1917年7月。

② 《安那其与自由》，《自由》第1期，1920年12月。

③ 《自由真谛底研究》，《自由》第2期，1922年2月。

④ 《三无主义之研究》，《社会世界》第5期，1912年11月。

⑤ 《'无强权主义的根据'及'无强权的社会'略说》，《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

提出要进行一场“宇宙革命”，“连天然强权都推翻”，要把世界弄得“虚空破碎，大地平沉”，才能做罢。虚无主义者反对强权，最主要一点是反对国家。在他们看来“国家是强权的总汇”①，因此反对强权就不能不反对国家，他们认为国家妨碍了自由。这是因为国家制定了限制自由的法律。黄凌霜引证刘师复的话说：“自有政府，乃设为种种法令，以绳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网罗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②无政府主义者还认为国家造成了不平等。无政府主义者无视阶级产生的真正原因，硬说“人类本极平等，国家要他们分成若者为奴，若者为主，若者为贵，若者为贱。”③无政府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国家不是抵抗他人的侵略，就是自己去侵略他人”，“所以，国家的存在，就是战争侵略存在的根由。”④

3，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强权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顾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硬说二者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少数人行使威权和多数人行使的威权并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行使个人以外的意志”⑤并且声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⑥

无政府主义者宣称，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弊病是：无产阶

① 《“无强权主义的根据”及“无强权的社会”略说》，《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

② 《师复主义》，《进化》第3号，1919年3月。

③ 《破坏论》，《奋斗》第5号，1920年3月。

④ 《无治主义学理上的根据》，《新中国》第1卷，第3号，1919年7月。

⑤ 《‘无强权主义的根据’及‘无强权的社会’略说》，《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

⑥ 《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奋斗》第3号，1920年2月。

级专政的存在，必将使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为："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资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资产阶级的势力都是金钱给与他们的，一旦金钱没有了，他们哪里再有势力来复辟呢？"①因此，有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是把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资料归公的观点，硬说成是要"使国家而成为一大资本家"②。他们污蔑俄国革命并未打破资本主义，"小资本家——个人——没有完全打消，大资本家——国家——反而完全成立。"并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所造成的"矛盾"③。

无政府主义者宣称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弊病是：利用强权，压制自由，剥削压迫劳动人民，造成社会不平等。他们硬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个人专政，污蔑列宁是"俄罗斯共和国的大皇帝"④；污蔑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利用强权，压制劳动者，说什么"俄国中央政府曾出告示，实行强迫主义，要将土地收归国有，不顾农民的生计如何。其它如干涉婚姻、教育、言论及出版，布尔札维克党，无所不用其强权手段，束缚人民的自由。"⑤所以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是专制。"⑥

无政府主义者宣称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个弊病是：抹煞个人，使社会退步。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是国家治理，"于是个人吃饭穿衣，以至于著书立说，都要仰赖国家。"国家"把个人所当作，所能作的事，一概干涉"。在他们看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以国家的权力来干涉个人"，"是要从物

① 《国家、政治、法律》，《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

②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7号。

③④⑤ 《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奋斗》第2号，1920年2月。

⑥ 《为什么反对布尔雪维克》，《奋斗》第8、9号，1920年4月。

质上干涉个人到精神上”。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们抱怨说：“这样子，岂不是抹煞个人，而使社会退步吗？”①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这些谬论，当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

首先，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这种自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李达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根据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宣扬绝对自由是人之本性，是荒谬的，是与现实相矛盾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是“单把相互扶助的本能，应用到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上去，却把相互斗争的本能置之度外了”。“一切无政府主义，对于人性的研究太乐观了。”②陈独秀说：“如果象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凡事要‘人人同意’，‘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吗？”③如果一个人要想实现“绝对自由”，那么他就必须脱离社会。李大钊进一步指出：“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的自由可以选择”④。李大钊还从理论上阐述了自由与秩序的辩证关系。他说：“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所以，“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人“绝对自由”是社会进步保障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

其次，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否定“强权”

① 《为什么反对布尔雪维克》，《奋斗》第8、9号，1920年4月。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90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94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437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438页。

的谬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指出：不能把“强权”与“罪恶”划等号。如果说“强权”是恶的，那么为什么恶呢？陈独秀指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如果用强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① 他还指出当资产阶级利用“强权”镇压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时，当然是坏的。但当无产阶级用强权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时，“强权”就变好了。因此，“反对强权”的主张，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②

最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驳斥了“绝对自由”，“反对强权”之后，还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他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说明国家执行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根据其本阶级的利益制定了法律，以便对付他的敌人。其它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都是国家的重要机器，都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把阶级差异、战争等都归于国家是错误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最重要的分歧点，就在于无产阶级用不用强力，该不该夺取政权，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指出，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固然很困难，但在征服他们之后，要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个时候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是很必要的方法”③。李达指出：“要推倒资本主义，必须厉行阶级争斗”④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把自己造成一个支配阶级。”⑤

①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页。
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37页。
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52页。

蔡和森更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十分必要的。"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①

（三）论争的实质及其哲学意义

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实质是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因而也可以把这场论争看成是关于社会主义论争的续篇。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场论争中，对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绝对自由、否定强权、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俄国革命的种种谬论的批驳，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因而为中国无产阶级指明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最根本的政治目标。

这场论争的哲学意义在于，通过论争，在客观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从政治上讲，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哲学上讲，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通过这场论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更充分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通过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又经过这场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通过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进一步论证，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更为广泛，更为深入人心。因而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更坚实的哲学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宣告了

① 《蔡和森文集》第51页。

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破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胜利。

三次大论争，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最有影响的重大理论斗争。任何一种先进的革命的理论和学说都不会自然而平安地发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哲学思想的传播，就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受到资产阶级的诋毁和责难，是丝毫不奇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不仅会发生在五四时期，而且还会发生在任何一次历史的、革命的重大转变时期。只要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条规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第四节 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五四时期的广泛传播，不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而且还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哺育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便不可能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另方面，没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迅速成长，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更为广泛的传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五四时期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体现。

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较为著名的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瞿秋白等人，而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较早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根本转变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此，我们着重介绍一

下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毛泽东（1893—1976），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世界观，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在政治思想上，曾经历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进而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在世界观上，则经历了从唯心论经过二元论，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毛泽东曾说："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①这个自我评价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历史真实的。

## 一、向革命民主主义和近代唯物主义的转变

从1911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是毛泽东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由唯心主义转向近代唯物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尤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的五年间，是他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②他还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③

### （一）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向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

毛泽东于1902年开始上小学，在私塾里读四书五经。1964年，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回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2页。

②③ 斯诺：《西行漫记》，第121、12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下同）。

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在私塾里，他还读过一些“杂书”、“闲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精忠传》、《隋唐演义》等文艺小说。他曾说过：“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①

1906年至1909年，毛泽东休学三年在家务农，白天劳动，晚间读书。这个期间他读过《盛世危言》一书，并受到一定影响。此书作者郑观应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他与洋务派的船坚炮利观点有所不同，他着重宣传教育救国论。他在《盛世危言》中写道：“泰西之强，强于学……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而已”。又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毛泽东读过此书后，很受感动，并激起他恢复学业的愿望。

1910年，他到东山高小读书。在这里，他除了读“经书”之外，还学过自然科学、历史、地理等“新学”知识。他还看过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深受“维新”思想影响，赞成君主立宪。1910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写下这样的批语：“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应象过去那样，“法令由君主所制订，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这说明他有了要求民主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说明当时他“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②。

1911年春，他以优异成绩进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来到长沙。1913年至1918年6月，又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抛弃康梁维新派对他的思想影响，开始转向民主主义。

1.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赞成资产阶级共和制。

在省中学，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同盟会会员于佑任主编的《民

---

① 《西行漫记》第108页。

② 《西行漫记》第114页。

立报》，并成了它的热心读者。当他见到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时，心情异常兴奋。激动之下，他奋笔疾书了一篇充满政治激情的文章，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表示支持推翻清朝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并建议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个建议表明他很崇拜孙中山，赞成他的民主革命纲领，但对康有为、梁启超仍有好感。说明当时他对孙中山与康梁之间的政治分歧并不清楚。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亡命国外，逐渐堕落为保皇派。1899年他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公开打出保皇旗号。年底，梁启超到檀香山从事保皇会活动。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声称“中国今日必不可以言革命”。对此，孙中山于1904年发表《敬告同乡书》一文，痛斥其保皇行径，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为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但是孙康这场论战发生在毛泽东居住乡间的少年时代，他不清楚孙康的政治分歧，就不足为怪了。毛泽东在建议中主张孙中山出任新政府的总统，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的革命地位是高于康梁的。

1911年4月20日，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受到很大鼓舞。10月底，他离开学校，在湖南起义新军中当了半年兵。这期间，他从《湘江日报》上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又读过江亢虎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并和同学们、士兵们一起讨论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已被袁世凯所篡夺。1915年，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这是对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反动。这件事激起毛泽东的义愤。为了揭露湖南帝制派劝进的丑恶嘴脸，毛泽东以“一师”

校友会名义，将梁启超等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编印成册，广为散发。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还揭露了帝制派搞的不过是“笼络名士”的手法，切不可上当受骗。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不惜卖国求荣，在1915年5月7日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二十一条，消息传来，毛泽东义愤填膺，在《明耻篇》上奋笔疾书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几个彪炳显赫的大字，抒发了他反袁反帝的爱国激情。

2.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主张个性解放。

这一时期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赞成孙中山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制，而且也表现在思想上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理性批判。

1915年9月，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创刊，揭开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展开猛烈抨击，对中国思想界起了巨大启蒙作用。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① 他号召青年们应当解放思想，敢于怀疑过去“天经地义”的旧观念，敢于冲击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束缚。毛泽东读过陈独秀的文章后，很受鼓舞，他完全赞成《新青年》的思想方向。陈独秀取代康有为、梁启超而成为他心目中的“思想明星”。在《新青年》启发下，毛泽东对封建专制主义有了深刻地认识。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指出：“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太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3页。

不易摧陷廓清。”

这个时期，毛泽东也极力赞成个性解放，他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压抑个人的“恶魔”，因此高呼“三纲五常在所必去。”他不仅主张推翻君主制，而且主张彻底铲除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三纲五常，说明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主主义者了。

（二）从唯心主义向近代唯物主义的转变

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以“贵我”为特征的唯心论思想倾向，这是与他在政治思想上主张个性解放相一致的。

贵我思想最早出现在1913年至1914年他所记述的《讲堂录》中。当时他写道：“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贵我）”。但当时还未展开论述。到了1917年至1918年他读到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后，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贵我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挥，较为系统了。

在本体论方面，他提出了“我即宇宙”的命题。他说：“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他认为“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所以“若除去我即无宇宙”。他还从团体、社会、国家等不同角度表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团体者乃个人，乃大个人也”，“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个人也”。“我即宇宙”的提法并不是一般性的哲学命题，而是具有世界本源的意义。他说：“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正因为我是宇宙的本体，所以他认为在万事万物中，唯我独尊。他说：“是故宇宙可尊者，唯我也，可畏者，唯我也；可服从者，唯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

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者，有之亦由我而推之。”“我即宇宙”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受了孟子主观唯心论的影响。他在《讲堂录》中记述说：“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大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他依据孟子思想加以发挥，认为肉体之我是小我，精神之我是大我，并把精神之我夸大成为宇宙。所以他说“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使宇宙一大我也”。

在伦理学方面，他提出“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个人主义伦理观。他说：“我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一曰现实主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他讲的利己主义并不排斥利他，而是“兼有利他”的。这种利己主义也绝不是指庸俗的物质享乐，而是指“精神的个人主义”，其目的是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实践至善”，造福于人。在当时强调个人主义伦理观，具有反封建、鼓吹个性解放的进步意义。

在历史观方面，他主张实现自我。他说：“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包含有发达自我和发显自我两个含义。发达自我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发显自我即“表彰自我之能力”，亦即发显心中的宇宙本体。他说：“发显者即本体，本体即发显，合无数发显而为一大本体”。人之所以能发显本体，是因“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实现自我思想有付诸社会改造的合理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实现自我的方法上。他说“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这种实现自我的方法绝不是低头拱手谈性命式的闭门修养，而是强调社会活动。这在他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不懂得革命实践对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决定性作用之前，对他

走出书斋，参加改造社会的活动，有一定积极作用。

这个时期，他的哲学思想还表现出明显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特征，因而他的哲学思想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他提出了“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命题。他说：“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又说：“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且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遂解散之”。他承认精神与物质共存，承认物质不灭，表明他的哲学思想有唯物论的思想倾向。这是他受康德二元论哲学思想影响所至。

在认识论方面，他承认“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这显然是唯物论反映论思想。但他又认为客观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不在于客观事物，而在于人的主观认识。他说：“事实本无区别，而概念有区别”。“对于客观世界遂以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成矣”。主观认识的差别决定客观世界的差别，这又陷入了唯心论。就他认为“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也有规定自然之力”来看，他肯定了人具有规定客观事物的主观能动性；就他认为“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一毫之创作”来看，又否认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

他的哲学思想的矛盾，还表现为辩证法思想和形而上学、相对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他承认事物的运动是永恒的。他说：“天地盖唯有动而已”。承认事物在斗争中发展，“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迴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另方面又抹杀事物的发展变化，认为“宇宙亦终左在同状之中”，“物质则万年无变化也”。又陷入形而上学。由于他对物质和精神的质的区别认识不清，不免陷入相对

主义。他说："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有限即无限……小即大、阴即阳、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等等。

他的哲学思想所以会出现上述矛盾，主要是因为当时他的哲学思想正处在兼收并蓄阶段。他既读过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老庄哲学，又学过近代康梁和谭嗣同的哲学；既受过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又受过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某些影响。他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真理，对各种学说都如饥似渴地研讨。因饥不择食，而良莠不分。因此其哲学思想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正是一个勇于探索救国真理的有志青年所必经的过程。这个时期他的哲学思想虽然唯心论占主导地位，但由于他除了攻读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外，还读了不少自然科学的书，并极为重视接触社会实际，因此，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也相当丰富，这是一种新的思想因素。这种新的思想因素代表着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扩大，并向着近代唯物主义迈进，为实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转变打下了基础。

### （三）激进民主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结束了学生时代，开始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1918年8月，他来到北京，在李大钊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广泛接触和研究各种新思潮，并和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直接接触。由于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表现为一种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正如他回忆时所说的："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① 他的激进民主主义集中表现为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

① 《西行漫记》第127页。

想。

第一，推崇新村运动。在“一师”读书的后期，他的政治思想就逐渐表现出某些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倾向，开始对资本家表示出不满情绪。他把资本家看成和三纲五常、君主国、教会一样，“同为天下之恶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封建专制制度不满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所谓“中华民国”的现实教育了他。“中华民国”并没有改变“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的不合理的现实，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这不能不促使他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表示怀疑和不满。因此在中华民国创建六、七年之后，在他的思想中又产生了“改建政体”的想法便不是偶然的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不仅说明了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更重要的是，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行不通。因此自辛亥革命后，许多有政治眼光的人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都开始表示怀疑。就连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本人也逐渐觉醒。他开始认识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外国的民权的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导师”。他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在寻找改造社会新方案过程中，开始同情社会主义，提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连带解决”。列宁在评价孙中山的思想时指出，由于孙中山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于是便形成了他的“主观社会主义”①。

毛泽东在寻求社会改造方案的道路上，曾一度转向空想社会主义。他热衷于试验新生活，推崇新村运动。“一师”毕业后，他曾和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岳麓山一带寻找地盘，想试验新生活，以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

此做为改造社会的样板。1957年毛泽东回忆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学到马列、想找个地方试验自己的新生活，所谓新村。“新村”为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所首倡。1919年3月，周作人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继而又在京津进行演讲，并组织“新村北京支部”。在这股新村浪潮推动下，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也提了一新村计划，并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公开发表，其中谈道：“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3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从他对新社会蓝图的描绘可以看出，新村计划是一种乌托邦。之所以会陷入乌托邦，关键在于当时他还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当时他认为搞新村试验将可以引起社会的同情和效法，因而可以实现新社会。“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不表同情于吾人者”。当时蔡和森虽然赞成这个计划，但已经觉察到这是一种乌托邦：“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①后来，新村计划也没有得到实施。

第二，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第二国际领导者们忽视了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忘记了东方，没有在东方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就使得无政府主义有可能先于马克思主义而传到中国。

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京后，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快便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他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

① 《蔡和森文集》第22页。

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①毛泽东虽然经常和朱谦之讨论无政府主义，但不会完全赞成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朱谦之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和老庄虚无主义哲学相结合的无政府主义，他自称为“虚无主义”。他说代替无政府主义的，原来还有虚无主义。“这虚无主义是更能够从根本上着想而求出根本的解决，他的革命就叫虚无革命，必革到‘虚空破碎大地平沉’而后止”②。他认为他的虚无主义也不同于克鲁泡特金的“凡物都是社会全体”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依虚无学者的意见，凡物都是错的，既不是‘我’所应有，也不是‘你’所应有；也不用集而置之于‘社会’，只是根本推翻，将一切的财产消灭净尽。”③可以看出，朱谦之的虚无主义比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走得更远，因而也就更加荒谬。

毛泽东是不会同意朱谦之的这套虚无主义思想的，他对社会改造和人生理想持积极态度。他积极搞新村试验，倡导新生活，怎么可能赞成“将一切财产消灭净尽”，“毁去乾坤”、“无天无地，无人无物”呢？他们二人之所以能经常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很可能是在用无政府取代强权方面有着共同兴趣和语言。

毛泽东不赞成虚无主义，从当时他的思想情况来看，他赞成的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对于当时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很大吸引力，特别是他标榜不仅反对封建主义国家，也反对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点，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力就更大些。他在

① 《西行漫记》第128页。

② 朱谦之：《革命哲学》。

③ 朱谦之：《现代思潮批评》。

《近世科学和无政府主义》一书中指出，“国家之存在，不外助资本家之发展，而资本主义兴盛，国家之权势与基础亦渐巩固”。因此他主张将资本主义制度连同国家一起废除。当时的《进化》杂志这样介绍过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废除资本制度，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寄生者、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这样的理想社会为经受封建专制主义压抑二千年之久的中国人所神往，为有志于改造中国的青年毛泽东所信奉是不足为怪的。

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鞭挞资本主义制度，对理想社会充满热望，它的错误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说无疑是一种反动。但是，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制度及革命任务都不同于欧美的情况下，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还有一定积极意义。当时，“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①，而中国进行的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立即提到日程上来。因此无政府共产主义否定强权、否定人压迫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有积极作用。青年毛泽东正是出于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但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因而一度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他所信仰的新村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其实质都是空想社会主义。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

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①。他信仰空想社会主义，说明他的思想超出了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水平。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同时，又提出反对资本主义。这就表现出“乌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观点要求根本消灭封建剥削者愿望的反映和‘同时’消灭资本主义新剥削者的幻想”②。尽管是幻想，但却表现出他的思想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历史趋向。正如列宁评价俄国民粹派乌托邦时所指出的：“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辨别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的一贯趋向。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趋向，并且考察出这种趋向同二十世纪头十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③

历史恰恰证明了这种联系，后来毛泽东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 二、向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

1919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了五四运动，之后又参加了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和湖南自治运动。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实践，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了向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

这一转变过程大致经历两个阶段。从五四运动到驱除张敬尧时期，转变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湖南自治运动到1920年冬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后，他首先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 （一）对十月革命热情歌颂

①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2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2页。

首先，他歌颂十月革命推动了欧洲革命，促进了东方民族的觉醒。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①

其次，歌颂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他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五四运动正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②

再次，为布尔什维克进行辩护。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中国反动派的惊慌，他们诋毁布尔什维克为过激党。对此毛泽东反驳说，不要"闭着眼睛，只管瞎说"什么"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陈词滥调。他在《湘江评论》上还发表了一些青年人的文章，这些文章指出，所谓的过激党，实则是些"舍命救国的志士，拿出良心来和国家争回权力，从强权者索还自由的志士"。

从以上可以看出，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锻炼，毛泽东以清晰的眼光、敏锐的观察力，看出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这不能不说明他的思想已经开始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范畴，以初步具有的共产主义思想来观察世界革命大势、观察人类命运，说明他的世界观开始发生部分质变，向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二）唯物史观的初步确立

①② 《湘江评论》，转引自《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05页。

首先，初步具有了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历史的思想。五四运动前，他把人类历史进化的法则看成是人类互助，五四运动后，他把历史进化的法则表述为民众的大联合。他说："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人类互助与人的联合表面看似乎没什么差别，其实不同。人类互助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基础上的，而人类的联合是建立在初步的阶级分析基础上的。他把联合分出不同的类型，如"强权者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民众的联合"，而这些不同的联合是以不同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他说："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与此相关，他对阶级的产生也进行了初步分析。他把阶级产生的原因归纳为三点，"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又把阶级分为"智愚的阶级"，"强弱的阶级"等等。这些分析并不科学，但毕竟有了阶级观念。正因为他有了阶级观念，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才能建立在初步的阶级分析基础上，他又能用大联合解释历史，这就说明了他的历史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初步具有了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历史的思想。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进展法则，按照这个法则，一切历史上产生的斗争（不论它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领域中发生的，或是在任何其它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实际上只是各个社会阶级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的表现。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这种理论形态的高度，但有了这方面的萌芽思想。

其次，初步具有了用物质经济生活条件观察社会的思想。他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他看到了世界上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大的是要解决人们吃饭这类经济问题。这和当时陈独秀的看法基本一致。陈独秀认为，"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我看人要吃饭，也无法将他止住"，"所以成了

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①。这说明十月革命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开始认识到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在评论赵女士自杀的文章中，毛泽东很注意从经济原因分析男女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他还从历史角度说明男女不平等起源于经济不平等。指出，上古之世，容易饱腹，“男女也处在平等地位”，后来人口增多，食物不足，生活竞争，于是“到了女子被征服于男子的死期”。这和恩格斯关于“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后果”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

在《湘江评论》中，他还从经济原因去分析各国的政治事件，指出，法、英、美等国内的罢工风潮是因为工人“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等经济原因引起的。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也是起于经济原因：“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

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认识到经济不仅影响人们的婚姻和社会地位，还会引起罢工和社会革命。这就初步接触到政治事变，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是“物质经济生活条件”这个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尽管还没有认识到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最根本的是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但能从经济上分析社会现象，这和他在“一师”时期认为“人类只有精神生活，无物质生活”的观点比较起来，确实是质的变化。

再次，初步具有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改造社会“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认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这说明他看到人民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23页。

群众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里永远居于多数，永远是历史的主体。这个思想是个了不起的变化。过去由于受到唯心主义思想束缚，他就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只强调英雄、个人的历史作用，把拯救中国寄托在类似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托尔斯泰这一类“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身上。这说明经过五四运动，他看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因而使他的历史观发生根本变化，初步树立起唯物史观。

（三）重视实际为特征的唯物论

这是他的哲学思想转向唯物主义的另一重要表现。

首先，初步形成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五四运动以后，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社会活动方面，因而对人生、社会等许多重大问题的哲学思考，从书斋的沉思中解放出来，转向现实斗争中的探讨。由于他对客观存在的实际有了广泛的接触，因而导致他对实际的客观存在有了深刻认识。他明确提出，探讨社会改造问题时，必须“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要搞“空虚的思想”。

“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就是要求人们发议论、办事情，提出改造社会方案都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学理、主观臆断出发，这与他在五四运动前片面强调精神作用，主张“只将全付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的观点相比，无疑是个质变。他把“人生社会实际”看成是人们想问题、发议论的立足点，说明他的哲学思想开始树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

其次，初步形成引入实际研究真理的思想。他批评戊戌变法时指出：“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有引入实际去研究真理，才能发现真理，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才能推动社会改造。为了做到引入实际去研究真理，他又提出以下的主张：

其一，必须破除对孔子的偶象崇拜。孔子思想是为统治阶级

服务的，历朝列代都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到了近代中国竟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这不能不使毛泽东痛心疾首。为了使中国以世界为伍，迎头赶上，必须使思想界"一改旧观之概"，破除对孔子的偶象崇拜。他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象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其二，必须破除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他说："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所谓演绎式的独断态度，就是脱离人生社会实际，凭着头脑虚构出来的玄想强加于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阀的恶劣之风。依据这种态度，人们不可能从实际出发，引出客观事物中固有的规律，而只能引孔孟之经，据儒家之典，发挥所谓的微言大义去牵强附会。持这种态度，构造出来的玄思带有很大主观随意性，于学术无补，于社会改造不利。因此必须破除这种独断态度。要破除独断态度，必须敢于狂妄。他说："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古今正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

其三，必须破除封建迷信。迷信与真理水火不相容，要研究真理就必须破除迷信。他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不仅要破除对思想强权的迷信，还要破除对鬼神的迷信，所以当时他写了不少宣传破除迷信的文章，努力普及"科学常识"。

再次，初步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这是他的哲学思想转向唯物主义的又一重要表现。他提出"我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所谓活事件，主要是指社会现象中客观存

在着的各种事物。傍着活事件来讨论，就是不能只在学理自身中搞繁琐论证和不着边际的穿凿附会，一定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讨论。这正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初步表达方式。

可以看出，经过五四运动，特别是经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他对理论和实际的辩证关系有了深刻地理解。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此文发表不久，毛泽东在1919年9月1日发起了"问题研究会"，主张结合主义研究问题。提出"问题之研究，应以学理为根据"，并提出要重视调查研究。他说："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这就使问题与主义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他认为要想改造中国，既要深入研究主义，又要了解中国国情，"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注意研究中国国情，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就为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实现世界观转变的主要标志

1920年7月，毛泽东第二次从北京回到湖南，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创办了文化书社，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着手组建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时期，毛泽东总结了湖南自治运动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仅仅搞"呼声革命"是不能达到根本改造中国

① 《毛泽东给周世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下同)，第63页。

的目的。他在1920年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谈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以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①与此同时，毛泽东结合斗争实践认真阅读了马克思著、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美国人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考茨基著、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三本书。这三本书分别出版于1920年8月、10月和1921年1月。社会斗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使毛泽东终于放弃了"呼声革命"的主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1921年1月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一步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后来毛泽东回忆时所说的："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来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②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志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他明确地认识到，一个革命的团体，不应该是"感情的结合"，而应该

---

① 《毛泽东给向警予》，《新民学会资料》，第75页。

② 《西行漫记》第131页。

是"主义的结合"；在众说纷纭的许多主义当中，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符合客观情况的科学真理。毛泽东于1920年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曾明确表示，赞同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观点。在1921年1月1日召开的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做了明确的对比，说明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认为当时世界上所谓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分为以下几种，一、社会政策；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式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他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式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

第二，坚信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手段。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完全放弃了以往的"温和"的"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主张用暴力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用这个恐怖的方法。"②他尖锐地批评了罗素所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指出："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接着，他批驳道："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23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148页。

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①政府、军队、警察都是“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特别重要的是，想通过教育的方法，“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教育不能改变他们“心理的毫末”，“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②毛泽东主张暴力革命并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总结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而得出来的结论。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正是以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当时称劳农专政）的基本原则，并决心为建立和巩固这个专政而奋斗而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这是）现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毛泽东除了完全同意蔡和森的意见外，还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重要性。他说：“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③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动、保卫和最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当时，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把主要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关于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148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149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第163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泽东完全同意蔡和森当时的下列见解：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坚持“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为资本家寻找“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同时，他还进一步批判了当时在长沙十分活跃的无政府主义，指出，那种没有权威，没有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想象的，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第四，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毛泽东深刻地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从中认识到这个革命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有列宁缔造的俄国共产党的领导。1920年9月，他在一篇评论湖南自治的文章中说，列宁建立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和反革命阶级，是因为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真正可靠的党。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向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情况，说明了第二国际的解体和第三国际建立的过程。特别是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历史、组织结构、组织原则和方法，都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认为，中国要进行社会革命，必须要建立一个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回信中说：“你这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① 并且告诉他，在国内，陈独秀等正在着手进行组建共产党的工作。毛泽东本人也在为建党而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并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②，主张按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建党。总之，这时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坚定地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实践上正在从事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工作。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毛泽东已经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163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162页。

## 三、毛泽东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

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体现着五四运动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中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 （一）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之所以能在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较为迅速地实现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转变，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在于他为了救国救民，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曾接受过封建主义教育，受过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后来又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甚至还一度受到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思想影响，他所以能较快地抛弃这些思想，就在于他一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便能迅速地发现她的革命锋芒之所在，她的理论威力之强大。因而他能深人研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尽快把握其革命真谛。

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只有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信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都曾以极大的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如同蔡和森所说的“猛看猛译”的热情，是很难于较短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个较为深透的了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但是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①

### （二）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在批判旧世界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是在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样也离不开社会革命斗争实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页。

毛泽东之所以能较快地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在于他勇于参加社会革命斗争实践。他从青少年时期就注重社会考察，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为工人办夜校，后来又投身于驱除张敬尧的斗争中去，搞湖南自治运动，以致后来又办文化书社，组织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筹建共青团和共产党。这些实践对于他的世界观的转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后来回忆他的成长道路时曾说过："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① 这正是他实现世界观转变，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共同道路。

### （三）从爱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共同道路，是从爱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是为争取民族、民主解放而奋斗的革命者成长的普遍道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正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为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而忧虑，他们才能千方百计地、不屈不挠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的《大哀篇》、陈独秀的《我之爱国主义》、毛泽东的"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所发出的呼声，无一不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激情的强烈性，才决定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定性，和对革命真理的热切向往。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证明，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被侵略、被压迫国家里的人民来说，只有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才能追求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① 刘衮：《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毛泽东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广泛传播的必然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广泛而深入地传播，有了更真诚的载体。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迅速成长，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因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组织准备。

## 简短的结论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历时不长，但却经过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深刻而广泛的论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胡适、张东荪、梁启超、黄凌霜、朱谦之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围绕着"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论争，归根结底，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应不应当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论争，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战胜了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思想，而且也战胜了刚刚传入不久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五四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这场论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其意义十分重大。从世界范围看，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场论争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传播的领域，特别是对世界东方的影响。

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西方文化。因此，就中国而言，五四时期这场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哲学能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论争，是中国近代早已开始了的关于中学与西学之争的继续。然而历史上西学鼓吹者所引进的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虽然相对于中国传统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思想来说，不失为先进的思想，并且在中国历史上起到过反对封建主义的积极作用，但资产阶级理论本身毕竟不是科学的世界观，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及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中国人真正找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找到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此，中国人民有了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工具，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先进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哺育了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迅速成长，因而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侧重在唯物史观方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变革，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为人们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唯物史观在中国首先得到广泛传播，是因为它给中国人民提供了观察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革命问题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某些个别理论的理解有失偏颇之处，但他们在总体上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因而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是永垂青史的。特别是李大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他的影响下，一批革命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在观念形态上以高度浓缩了的形式

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唯心主义向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成长，为他尔后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创立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 第二章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初步运用

（1921年—1927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在1922年1月至1922年2月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1923年“二七”惨案后革命运动暂遭挫折。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联合战线正式建立。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中国革命很快走向高潮，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当革命战争在胜利进行之中，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在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叛变了革命，而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又为右倾机会主义所统治，致使革命在反革命的打击下遭到失败。

封建主义思想在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攻击下已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地位，但它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继续顽固地向新思潮反扑。不过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已具有新的特点。外国输入的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和中国传统的腐朽的封建思想在反对无产阶级新思想的斗争中开始合流。此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已居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首位。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共产党内部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也逐渐展开，具有中国特点

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形成之中。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宣传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党的成立时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以下的特点：第一，开始有领导地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的重点是唯物史观；第四，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比较肤浅，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已由报刊杂志上的译介进到撰写阐述性的小册子和专著；第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指导中国革命实际运动，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 一、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在中国，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仅只有三年的时间。而在俄国，从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建立第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至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间经历了十五年。在这期间，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已写出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是哲学著作）。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理论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提高理论修养，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忙于实际运动，但他们也十分注意提高党的理论修养。

#### （一）积极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出版

机构——人民出版社，专门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9月1日）的《人民出版社通告》说："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通告开列计划出版的书有：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其中有《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等）；列宁全书十四种（其中有《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国际的破产》等）；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丛书十一种（其中有《俄国共产党党纲》、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考茨基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等），其他的九种（其中有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等）。通告最后说："以上各书，已有十种在付印，其余的均在编译之中，准备年内完全出版。"从所开列书目看，内容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重点则是与当时革命运动更有直接关系的科学社会主义，《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基本的哲学著作均未列入。同年11月，发往各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又提出：党的宣传工作须有切实的措施，"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由于反动势力的阻挠破坏，也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出版计划未能全部实现。1922年6月30日，中央局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已印行马克思全书二种，列宁全书五种，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

共十二种，每种各印三千份。

1923年，人民出版社与原有的新青年社合并，继续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党又在广州开设平民书社。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3年11月党在上海创办上海书店，负责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刊物《新青年》、《向导》、《前锋》等。1925年上海书店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随着革命运动波及全国，上海书店在长沙、南昌、广州、太原、安庆、重庆、宁波等地建立发行机关，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书店为中心的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的发行网，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有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差不多已经变成一种时髦的标志。在这种形势下，有的出版社为了迎合时代的新潮流也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当时中国最大的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季译的马克思的《价值价格与利润》（即《工资、价格与利润》）、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以及施存统译的《马克思学说概要》和《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等书。他们出版这些书并不表示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而只是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讨好读者。

（二）出版革命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革命刊物既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又是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工具。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都十分重视办好革命刊物，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全国性刊物有《新青年》（1923年6月改为季刊、1924年12月改为不定期刊，1926年7月出最后一期）、《向导》周报（1923年9月—1927年7月）、《前锋》月刊（1923年7月—1924年2月，共出四期）。北方党委的机关刊

《政治生活》(1924年夏—1927年)在北方地区影响甚大。这一时期有全国影响的刊物还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先驱》半月刊(1922年1月15日—1923年8月15日)和《中国青年》周刊(1923年10月20日—1927年10月10日)。这些刊物所负担的具体任务各不相同，但都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有的还发表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

1923年6月，《新青年》改组成季刊，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机关刊。它在改刊后不仅参加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发表陈独秀、瞿秋白批判张君劢、胡适等人的文章，而且在第3期(1924年8月1日)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与逻辑》的全译文和阿多那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的节译(该文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3月1日出版的《少年》第7期上发表)。这是两篇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较早中文译文。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论述了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辩证法的重要意义、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系、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关系，批驳了有的人对辩证法的攻击和歪曲。阿多那斯基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规律有五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实际是怎样就怎样；在实际的全部中研究实际；在运动中研究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都是具体的。同期还发表了《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这篇文章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结合革命实际，专门说明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同时又指出，此种反作用有一定的界限；二是正确指出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批判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论。这两点是当时许多介绍唯物史观的文章所没有涉及的。

《向导》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导报，主要是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指导实际运动。要不

要进行阶级斗争，这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最重要之点。《向导》激烈地批判了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理论。《向导》还开展了“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瞿秋白以《向导》记者的身份回答了读者的问题，阐述什么是阶级、划分阶级的标准、阶级斗争与联合战线的关系等问题，廓清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为了指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青年》第4期（1924年3月29日）刊登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并对所开列的每一本著作作了简介。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工资、价格和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俄国共产党党纲》以及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译著十六种，有《陈独秀先生讲演录》、《社会主义讨论集》、刘宜元编的《唯物史观浅释》和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讲义》等中国人自己写的著作。此外还向读者推荐了《新青年》、《前锋》、《向导》、《中国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日刊。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目将《陈独秀先生讲演录》列为第一本，并说：“凡是要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初学者都应该读一读”陈独秀的讲演录。为了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七周年，《中国青年》第77、78期（1925年5月）发表了任弼时写的《马克思主义概略》，文章通俗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由来”、“马克思与达尔文”、“唯物论哲学”、“辩证论”、“价值论与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学问的工具”和“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该文的特点是突出了为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读者以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文章号召青年应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在结尾说：“马克思的宇宙观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

科学柱石，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马克思主义是将社会主义的理论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研究无产阶级胜利方法和条件之科学。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研究一切学问，方才可以得到一个正确解答。”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学说，对于奋斗中的中国人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一时期一些进步报刊也不时刊载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上海出版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先后刊登过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河上肇的《资本制度解说》、考茨基的《改良与革命》、列宁的《共产主义与社会的进化》、李大钊的《社会主义释疑》、列宁的《帝国主义》和《马克思政治学》（即《国家与革命》）第一章、恩格斯的《空想及科学的社会主义》等著作。又如北京《晨报》副刊也在1922年2月—3月间连续刊登过列宁的《劳动俄国的建设事业》（即《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同年5月5日还出版了“纪念马克思专号”。1922年2月在北京创刊的《今日》杂志，自称“本志是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机关，差不多每期都有他学说的文章，……因为马克思对于学术上思想上社会改造上都有很大的贡献”（第1卷第4号）该刊共出版了3卷，10期。1922年5月出版了“马克思特号”，专门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和生平，还译登了《哥达纲领批判》的全文。该刊载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部分内容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第一、五、六、九章的译文。有些并非是进步的报刊也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刊登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主办的《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发表过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第3号）和《这一周》（第24号，“劳动节纪念号”）两篇文章。1923年5月5日出版了“马克思纪念号”（第25号），刊登了《马克思年谱及其著作》、《马克思对社会学的贡献》、《马克

思之重要学说》等文章，介绍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基本观点，称颂马克思的伟大贡献。该刊并非是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上述文章的刊登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有相当的影响。

（三）创办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人才

1921年10月，陈独秀与李达商议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以期培养妇女运动人才，开展妇女运动。1922年2月平民女校开学，李达任校务主任。陈独秀、陈望道、蔡和森等都为女校讲过课或作过讲演。

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办的第一个学校，上海大学则是党办的第二个学校。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1922年10月改名上海大学，其宗旨为“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上海大学章程》）。该校名义上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于右任先生任校长，但实际上主持学校工作的则是中国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校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担任社会科学的教员大多数是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瞿秋白讲授社会哲学、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蔡和森讲授社会进化史，施存统讲授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和社会问题，安体诚讲授现代经济学，邓中夏讲授中国劳工问题，恽代英讲授中国经济状况，肖楚女讲授农民问题、外交问题，董亦湘讲授唯物史观，杨贤江讲授青年问题。课程的讲义辑为《社会科学讲义》（1—4集）正式出版向社会发行，有的讲演稿则在报刊上发表。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阵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被反动军阀封闭。

在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方面，还有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于1921年8月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为革新社会

的准备”（《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学校主要通过组织学员自学、讨论的方式，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问题。1922年11月，李达任校长，并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学校于1923年4月出版了机关刊《新时代》。该刊发表了李达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全译文、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文章。在该刊第2号至第4号上连续刊登了李维汉的《观念史观批评》，这是我国批判唯心史观、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最早文章之一。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部分党团的干部都在自修大学学习或工作过。自修大学以及《新时代》杂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培养革命人才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国共合作后，为了替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培养干部，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名义于1924年7月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讲习所由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创办，以后又连续办了五届，以第六届规模最大。前五届的毕业生共454人，第六届的毕业生则达318人。第六届的所长是毛泽东。这一届共有25门功课，由毛泽东、彭湃、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讲授。1927年春，大革命的中心移到武汉，毛泽东又在武昌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有八百余人。由恽代英、彭湃、方志敏、夏明翰等讲授。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传播革命理论、培养革命人才、推动革命运动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五四时期，刚刚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诸种新思潮的一种。但是经过短短的六、七年的时间，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时期，它已成为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已取得革命的指导地位。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但也与中国共产党人上述的

种种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足，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弱点。但是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是其他国家所少见的，这又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优点。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的人是很多的。在这众多的人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的成绩尤为显著。

## 二、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史学要论》的基本思想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北方的党组织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以后，他积极宣传和实践党的民主革命纲领。1922年8月，他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谈判国共合作，并在1924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25年，在孙中山北上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坚决支持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他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三大”、“四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6月曾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就中国革命问题作了书面报告。李大钊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所仇视。1927年4月6日，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将李大钊逮捕。在狱中，他备受酷刑，但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同年4月28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他和其他二十位革命同志秘密绞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的主要精力是从事实际的革命

运动。因此，这一时期他的论著多数是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政论。尽管如此，直至1925年，他还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进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192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学要论》，是他多年来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结晶，也是他众多的学术著作中更为成熟的精品。《史学要论》是历史科学的概论，它对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方法、目的、历史科学的体系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作了很好的说明。贯串《史学要论》的基本思想则是唯物史观。

（一）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理论和实际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在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的时期，李大钊还不可能象我们今天这样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这一原则的许多精辟的论述。但从前面所述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根据丰富的历史知识，已初步领会了这一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明确地提出，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要注重应用，倡导用唯物史观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1922年2月29日，他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公开讲演会上说："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生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在演说结束时又说：希望诸君"去研究他（马克思）的学说，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这是我最盼望的。"①两年之后，即1924年5月1日，他又指出：在纪念马克思诞生的时候，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540、547页。

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倘能循此途辙，以达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①。

李大钊不仅这样教育大家，而且他自己也努力地去实践这一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以后，李大钊反复说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宣传党的“二大”纲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第7期上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作的揭露和分析，“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他极力美化帝国主义，胡说帝国主义“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已放弃“征服统治中国的企图”，“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我们现在尽可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②。针对胡适的谬论，李大钊在许多文章中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说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他指出，列强间在中国伸张势力的竞争虽然激烈，而于保持增进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则全一致。根据中国近代史，他说明了从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③。他指出：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答案，自然是“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④。为此，他大声疾呼：“国际帝国主义是我国民唯一的仇敌！”⑤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711—712页。

②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275、278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847页。

④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712页。

李大钊还正确地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封建军阀。他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来的历史说明：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总是勾结起来，镇压革命；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革命运动，是“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民族的传统政策”①。他说：“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压迫，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②

**（二）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

李大钊对历史和史学理论有精深的研究，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史学大家之一。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批判唯心史观，批判旧的史学，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他学术理论活动的最重要内容。这一工作，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就开始，党成立以后，他在承担繁忙的革命指导工作的同时，继续这一研究。

他指出，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理解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马克思以经济为中心考察历史，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当时有人主张，史家宜虚怀若谷，以冷空的智慧，观察史实，不宜豫存一先人为主的历史观。对此，李大钊说：“史实纷纭，浩如烟海，倘治史实者不有一个合理的历史观供其依据，那真是一部十七史，将从何处说起？必且治丝益棼，茫无头绪。”④无论何人，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受某种历史观的支配，一个人不可能不受某种历史观的制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853、776页。

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715、752页。

约，问题在于不要为偏执的谬误的历史观所支配。他指出：治史学的人，“往往为琐屑末节所拘，不能达观其大者远者”，“但若稍窥哲学的门径，此等弊害，均能以哲学的通识达观药之，稍一注意，即能避免。”①李大钊的这一见解十分正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李大钊还专门论述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他说：“哲学要宜人生界、自然界宇宙一切现象为统一的考察。”哲学研究的是宇宙的一般法则，因此，哲学“能对于特殊科学供给一般的原理及根本观念”，哲学也适用于历史科学。史学的理论不能不求助于历史哲学和一般哲学，史学的方法与一般论理学（含有认识论及一般方法论）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说：“哲学实为可以指导史的研究。”②又说：“史家的历史观每渊源于哲学。”③同时，李大钊还指出，历史的研究反过来也可以丰富哲学的理论，推进哲学的发展。因为“凡于特殊科学的研究上所能得的一般的见解，常有含蓄哲学的要素或暗示哲学的思索者，其影响感应每能及于哲学”，特殊科学的观察方法，思考方法，足以启示哲学新进路。他说：“史的研究的发达进步，亦有给新观察法、思考法于哲学的思索而助其进步的地方。”④李大钊对哲学与具体科学关系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

还在1920年，李大钊就指出：“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⑤在这一时期，他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说，历史上发生的事实，过去了，是不会变的，但是，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知识，史观与知识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旧的历史观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752、765、642页。

④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753、267—268页。

面目。用新的马克思的历史观去考察旧史，“必定忍不住要动手改作。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①他认为改作历史，推翻古人前案，并不算什么事，这是理所应当的事。由于反动派的残害，李大钊本人未能完成“改作”历史的任务。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遗憾。

（三）历史研究旨在探求历史发展规律

传统的历史学把前人遗留下的《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等文献典籍视为历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李大钊反复说明，对历史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指出：这些文献典籍是研究历史很重要的材料，“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他认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②应当指出，李大钊反复论说历史学以活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这不仅是为了批判旧的封建的历史观，而且也是为了反对胡适、梁启超等人提倡钻故纸堆的谬论，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李大钊指出：活的真实的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③人类社会生活表现为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719页。

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713、714页。

学术等各个方面。因此这些方面也莫不应包含在历史以内。他批评有的历史学家只研究政治，而把经济、文化等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的错误观点。他认为，应把人类的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看作一个整体，“不容以一部分遗其全体或散其全体”①。

李大钊指出：研究历史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故调查特殊的历史的事实而确定之，整理之，记述之，实为史学的重要职务。”他认为，史学家不仅要充分利用别人调查与确定的材料，而且要亲自下一番工夫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当自辟蹊径，不当依赖他人。但是，历史的研究不能停留于史料的考证、记述、整理上，“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即规律——引者）”②。当时的史学界普遍将历史研究的任务规定为对史实的确定、记录、整理，而不去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着重阐述了历史研究的任务旨在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他说：“各种学问的发展，其进展的程级，大率相同：大抵先注意个个特殊事实而确定之，记述之；渐进而注意到事实的相互关系，就个个情形理解之，说明之；再进而于理解说明个个事实以外，又从而概括之，推论之，构成一般关于其研究的系统的理论。”③他认为，史学的发展，也不能例外；史学停留于记述事实阶段，表明史学尚未发展到达科学的地步，而处于幼稚时期。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特别论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唯心主义史学家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否认历史学可以成为科学。针对这种观点，他说：“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见他，确定他了。”他承认，与自然现象相比较，“人事现象的复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717页。

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724、725—726页。

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①他指出，社会现象纷纭缠绕，交感互应，这就妨碍一般规律以其单纯的形态表现。然而，“此理法的普遍的存在，固毫不容疑，不过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之中，不易考察罢了。”②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李大钊指出，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变革，就能如自然科学一样发现因果律，发现社会的规律。

李大钊认为，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在于掌握历史规律，指导改造现实世界，创造新的世界。他说：研究历史，“必须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史象之法则，而与人生进路以豫见之导星”。③又说，“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的新世界，是真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研究过去，是为了寻出新世界，创造新世界。“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的态度。”④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是同“为历史而历史”的观点相对立的，同时也与为了现实的某种需要而去剪裁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不同。它深刻地揭示了研究历史的意义，揭示了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四）历史作螺旋状的前进运动

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还是退落的、循环的，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在中国历史上，退落的、循环的历史观占支配地位，根深蒂固，不可拔除。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在1920年就盛赞进步的历史观，反对循环的、退落的历史观，盛赞崇今派，反对怀古派。他有意识地介绍法国政治学者兼历史学者鲍丹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727页。

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728、690、763页。

(1530—1596) 关于人类历史是螺旋状的进步的思想。① 五四运动以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针对思想界的这股逆流，李大钊进一步阐述了历史作螺旋状的前进运动的思想。他不仅在1923年2月发表了1920年写的《今与古》一文，而且专门撰写了《时》一文。他指出："时是无始无终的大自然，时是无疆无垠的大实在"。时间与空间不同，在空间上是可以往返的。"至于时间，则今日之日，不可延留，昨日之日，不能呼返"。因此，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只有前进，不能回还的时的途程中，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往，只有努进"。他又说："时是有进无退的，时是一往不返的，循环云者，退落云者，绝非时的本相。即让一步，承认时的进路是循环的，这个循环亦是顺进的，不是逆退的，只是螺旋的进步，不是反复的停滞。"②

根据历史作螺旋状的前进运动的理论，李大钊大力宣传乐天努进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说："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面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③ 他总是告诉人们：人类是进步的，应当快快乐乐地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

在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工人运动处于暂时的消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机关内和群众中产生了悲观的情绪。李大钊用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290、669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763—764页。

人类社会是在曲折中前进的道理鼓舞大家前进。他说："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他生动形象而又深刻地指出："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叠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曲折回环，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中华民族现在所走的正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①

李大钊虽然对历史作螺旋式的前进运动还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但他对进步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宣传，对退落的循环的历史观的批判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极其有意义的。

（五）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这一时期，李大钊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继续批判英雄史观，并结合实际的革命运动，宣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只能依靠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

他指出，旧的历史学以政治为中心，其结果必然把历史归结为少数统治者的历史。因为以政治为中心，即是以国家为中心；国家的行动，每依主权者的行动而表现，这样必然以主权者或关系主权者的行动为中心以考察社会的变迁。他又说："旧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天生圣人则世运昌明，天降鞠凶则丧乱无已。"在本着这种历史观编写的历史中，"所能找出来的，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的自己。这种历史全把人们的个性，消泯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这种历史观成为当权的剥削者愚弄人民的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691—692页。

工具。若以经济为中心来考察历史，必然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结论。因为"一个智识的发见，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见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象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所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①。

李大钊在批判英雄史观时并没有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在纪念列宁、孙中山逝世的文章中，高度赞扬他们的历史功业。不过，他认为，"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异殊，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②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史学不能全置个人于度外。我们固然不迷信英雄、伟人、圣人、王者，说历史是他们造的，寻历史变动的原因于一二个人的生活经历，说他们的思想与事业有旋乾转坤的伟大，但我们亦要就一二个人的言行经历，考察那时造成他们思想或事业的社会背景。"③在历史科学中，重视人民群众的研究是应当的，但也不能由此忽视个人传记的研究。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李大钊反复指出：新的历史观和历史科学要教育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新的世界。他说，马克思的历史观，"引导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④他在指导革命运动时，紧紧依靠群众，善于引导和教育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761页。

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765、723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764页。

群众依靠自己解放自己。中国的农民由于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还不知道自己起来革命可以自救，希望有一个“真主”来解救他们。对此，李大钊指出：“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① 他热烈支持和赞扬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但不崇拜农民运动的自发性。他正确指出农民的弱点，号召革命党人、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农民运动，教育农民认识自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认识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明了农民运动应走的道路，将农民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的理论更加趋于成熟，他注重将唯物史观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指导史学革命。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第一传人。1936年出版的一本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写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是这样评价李大钊的学术思想的：“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彭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又说：“先生虽然早死，而先生之学说思想日发展而光大。”② 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公正的。

## 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874页。

②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8月版，第151、162页。

书记。"一大"以后，陈独秀便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职务，于同年9月回到上海主持党中央的工作。直至1927年5月，他一直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党成立后，他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批判当时的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受到毛泽东、瞿秋白等人的批评。大革命失败后，他拒绝党对他的批评和帮助，并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之后，与中国托洛茨基派公开合流。1931年5月为中国托派组织推选为书记。1932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在狱中仍坚持反对国民党反动专制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立场。1937年8月出狱。出狱后，虽然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立场，但思想上越来越消沉，倒退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四川江津。

（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

陈独秀在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时就根据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作出了"尊现实"、"薄虚文"的革命结论。他说："薄现实而趋空观"，其结果是"人治退化"，"民族微衰"；而"尊现实，"则"人治兴"，"迷信斩"。他明确地指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①。经过五四运动洗礼之后，他更注重实际运动。他反对把理论当作百病包治的"万应丸"，当作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②。

陈独秀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他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装饰品，认为马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6—37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73—479页。

克思主义之所以输入中国，我们之所以鼓吹它，就是因为中国社会需要它。他把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的精神归结为两条。"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他指出："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马克思的学说是从实际中抽取出来的。他"希望青年诸君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不要单单以马克思的学说研究而已。如其单单研究其学说，那么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完全失却。不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他又说："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他说："马克思所以与个别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凡能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不是在屋中饮茶吸烟，研究其学理，便可了事，这是研究孔子、康德的学问一样罢了。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为此，他"希望青年同志们，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诸君，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①上述言论表明，陈独秀确实领会了马克思学说的精髓。

陈独秀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时反复说明："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有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是根据社会之历史的进化和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种种的客观境界，不是空中楼阁主观的幻想。我们对于改造社会，不可只看见我们自己主观上意志上改造的必要，必须由客观上观察社会的物质的条件有何种改造的可能，要处处不离开唯物的历史观，不可陷于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7—178页。

唯心派的思想。”“第二个原则就是社会改造应有的步骤。”他根据《共产党宣言》指出，各国改造的步骤不能一致，各国不能同时一跳就到共产主义路上。“因为各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步各不相同。”“第三个原则就是每一步骤都须用革命方法。”他唯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不理解，不重视，便再三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的；他不独要有改造的必要，还要有改造的可能。马克思的根本原则，就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这点，然后才能明白他的主义，配谈他的主义。”①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改造中国，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和经济情形如何；并且先要明白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是怎样。他不仅这样宣传，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也努力去这样做。他是我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情况，制定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先导者。

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陈独秀曾大力宣传和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注重客观事实、注重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的精神，初步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原则。这是十分可贵的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本人并没有真正实践自己所提出的思想原则，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又是令人遗憾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和尔后的革命运动中，实践并大大发展了这一思想原则，这又是值得庆幸的。

（二）唯物史观的“两大要旨”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三本书，他将唯物史观归纳为两大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95—298页。

要旨：

其一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

其二是说："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或徐或速的革命起来。"①

很明显，陈独秀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根据唯物史观的要义，他得出了三个革命的结论："（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②

唯物史观在我国刚刚传播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对人类社会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认识不清。他们认为，马克思一面主张类似自然进化的唯物史观，一面又主张阶级斗争，主张社会革命，这两者不免自相矛盾。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则把唯物史观歪曲为机械唯物论，然后再加以攻击。胡适指责说：陈独秀"若不相信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等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③张君劢也攻击说："假如象马克思所

①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93—194、157页。

③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300页。

说：社会进化为生计条件所支配，而无假于人力之推动，则马克思之宣传与颠沛流离，岂不等于庸人自扰？”①梁启超说得更露骨：“唯物史观的人们啊！机械人生观的人们啊！若使你们所说的是真理，那么我只好睡倒罢，请你也跟我一齐睡倒罢！‘遗传的八字’，‘环境的流年’，早已安排定了，你和我跳来跳去干吗？”②

针对上述两种情况，陈独秀在不少文章中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关系，划清唯物史观与机械论的界限。他指出：自然进化的法则是客观的，但人类确能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同样，我们也可以利用社会的法则来改造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就是根据社会发展的法则，“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学说正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两者并没有什么矛盾。“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么，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③

他在回击胡适、张君劢、梁启超的歪曲时指出：“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范围内，唯物史观论者本不否认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必需，然其效力只有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④他又说：“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须有此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这客观上的可能才能够适当的实现。人们的意志是人们物质的生活关系造成的，人们的历史是人们贪欲无厌的意志造成的；这是我们所相信之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不同之点。”⑤

① 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人生观之论战》（上），第7页。

② 梁启超：《非“唯”》，《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461页。

③④⑤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57、379、407页。

因此，“历史的唯物论不否认个人之努力及其和宿命论不同，本是唯物史观中一部分重要的理论。”①很清楚，陈独秀既反对了唯心论，又反对了机械论，正确地说明客观物质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理论

陈独秀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为了指导中国革命，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突出地宣传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学说。

关于阶级斗争学说，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斗争的”。根据《共产党宣言》，他认为阶级斗争学说的“要义有二”，一是“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二是“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②。针对有的人将阶级斗争学说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陈独秀说：“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③他还指出：“共产主义者主张是：立脚在阶级斗争的原则上面，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④

关于社会革命，他指出，这“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

①②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93、195、194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95页。

的现象”。他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在如流不息的渐变中，积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往往出现组织上的顿变，革命便是这种顿变之代名词”。他进一步说明，社会“在每个进化阶段新旧顿变时，都免不了革命战争”，人类社会就是经过无数进化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才发展到今天这样。革命“是表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显著的现象，他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①

陈独秀不仅一般地宣传了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理论，更主要的是运用它来观察和指导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以后，他在《向导》上反复宣传只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国才有出路，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主张。他说：“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之中国，生产力实无由发展。所以中国盗贼繁多内乱频仍之根本原因，乃是军阀扰乱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人口过多。欲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道路；然而一班懦懦的人总想避开这道路，主张什么不合作主义，什么教育救国，什么重农救国，什么道德救国，什么基督教救国等等”②。

他指出：被压迫民族不可能通过向帝国主义请愿的方式取得独立，而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同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作斗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独立。他说：向帝国主义请愿独立，“除损失自己民族尊严外，可以说毫无效果”，“要想独立，便勿怕革命”，“要怕革命，便休想独立”③。他还正确地指出：“我们以为中国民族运动绝对拒绝外力援助，是个错误；然而想靠外力直接出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95、222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86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42页。

头替我们打仗，那更是错误。因为外人援助我们则可，外人代替我们来干则不可。”①很明显，这里实质上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革命离不开武力，如前所说，他认为新旧社会质变时“都免不了革命战争”。后来，他又说：“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②他还指出，军事斗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尤为重要，因为“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国内军阀，都是武装的，民众没有武装，如何能够得着革命的胜利？”③他反对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暗杀和任意暴动，认为要达到革命胜利，应实行“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科学的暴动”④。他在《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1926年6月26日）一文的一开头就说：“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国。我们或者可以说农民暴动是中国历史之骨干”。他充分肯定当时河南、山东、河北等省出现的红枪会、黑枪会、黄枪会、白枪会等农民自卫武装具有反军阀、反封建的性质，驳斥了反动派对它们的攻击。他指出：将农民暴动引导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旗帜之下，“是中国目前一个紧要问题”⑤。

应当指出，陈独秀虽然在口头上也讲“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但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中，他并不真正懂得革命人民掌握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他多次批评国民党在历史上专做军事运动，不注意群众运动的缺点，可他自己却完全忽视了军事运动，片面着重群众运动。在北伐战争中，他还认为，中国还没有到直接武装民众

①②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49、304、158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36页。

⑤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33、235页。

的时代，而只是武力与民众结合的时代。所以当直接武装民众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时，他却在空谈武力（主要是指蒋介石领导下的北伐军和北方的国民军）与民众结合，不去武装群众。结果，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①

陈独秀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他继续发扬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革命的批判精神，对思想界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本章第二节叙述。

陈独秀哲学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严重的缺陷，这正是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陷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加以说明。

### 四、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

瞿秋白（1899—1935），江苏省常州市人，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在少年、青年时代，他深切地感受到封建家庭衰败所带来的痛苦、忧愁、悲惨，也看透了封建阶级的腐朽和丑恶。1917年春，瞿秋白到北京，同年9月入俄文专修馆。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三年里，他的哲学思想由"避世观"演变为"厌世观"，"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为而佛教人间化的愿心"。另一方面，他又有"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工夫"，"为哲学研究不瘕"②。正当他在彷徨苦闷的时候，爆发了五四运动。他卷入旋涡，在运动中逐渐地抛弃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旧梦，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1919年11月，他和郑振铎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化，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1920年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世界观上转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9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页。

向唯物主义。

1920年10月，他应北京《晨报》之聘，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俄国，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①。留俄期间，他一面广泛地进行实地调查，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本通讯集和一系列专题报导。这时，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1922年2月，他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任助教兼理论课翻译，这就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底，陈独秀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瞿秋白担任翻译。

1923年1月，瞿秋白与陈独秀一道回国。回国后任《新青年》（季刊）和《前锋》的主编，并兼《向导》的编辑工作。1923年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参与大会宣言起草工作，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秋，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等课程，发表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他积极参加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1925年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从政治上、组织上和哲学上批驳了戴季陶主义。1927年，他发表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同年，他翻译出版了苏联哲学家郭烈夫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并在书末附了自己撰写的两篇文章：《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和《马克思主义之概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于1927年8月7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8页。

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其后，犯过“左”倾盲动错误。在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的“六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1930年9月，他与周恩来同志一起主持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的冒险主义错误。在1931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王明等人的打击、排斥。之后，他便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致力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俄国和苏联的文艺作品，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为中国的革命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他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1935年2月为国民党军队逮捕，同年6月18日在福建省长汀县英勇就义，时年36岁。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主要集中在1923年—1927年期间。

（一）哲学根本问题，唯物论与唯心论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主要宣传唯物史观，而对辩证唯物主义几乎没有涉及。在1924年以前，真正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解释哲学根本问题的文章寥寥无几。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论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他在《社会哲学概论》的一开头就指出：实际上哲学并没有什么高深，最初不过是一切知识的总称，随着认识的发展，各种科学从哲学中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接着他就介绍哲学的基本问题，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他说：“我”与“非我”，“意识”与“实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存在”）的问题，一直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各种哲学派对这一问题的种种不同回答，归结起来可分为两种：一种“都

以客观为出发点，或者是所谓实质、自然”，主张“客观之上加以主观，实质之上加以意识，自然之上加以灵魂”，这就是唯物论；另一种“以主观为出发点，或者是所谓意识、灵魂”，主张“主观之上加以客观，意识之上加以实质，灵魂之上加以自然”，这就是唯心论。而唯心论又分为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两种。他还指出，“然而有些人不能有一贯的思想，往往走到半路，而以唯心唯物的调和论自足。这种哲学家就是‘折衷派’。”①康德的二元论哲学就带有折衷派的色彩。

瞿秋白在论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指出：“精神不能外乎物质而存在；物质却能外乎精神而存在，物质先于精神；精神是特种组织的物质之特别性质。——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②为了论证唯物论的正确，他在《社会哲学概论》里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了“宇宙之起源”、“生命之发展”和细胞学说。接着他指出：“‘意识’的正确与否，全在乎他与自然界是否符合，——意识是外界的反映。自然界是一切现象的根本，亦就是人的意识的根本。外界的实质能确定‘意识’——这就是科学的基础。反乎此的一切学说，——唯心派的观点，决不能合于科学。”③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他还批评了不可知论。他说，认识必定有两方面的对象：一、所知；二、知者。“知者”便是主观。主观若要稍知客观，必定要客观对主观发生动作。唯心论的不可知论，“否认人类的智识，以为绝对不能知究竟界。其实把‘所知’和‘知者’统一了，并且承认他们的存在，那时物质和精神就只有先后之别，而不是相对待了。人类智

① 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转引自《上海大学史料》第269页，复旦大学1984年3月版。

② 瞿秋白：《现代社会学》，转引自《上海大学史料》第341页。

③ 《社会哲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300页。

识固然还不能完全认识客观，然而却能渐渐知道客观，把已知的整顿出系统来，那就得一更利害的武器，再向'所知'进攻——一直到完全认识为止。”① 他正确地指出："我们可以用日常的实践生活以至于自然科学的发明来驳倒独在论（即唯我论——引者注）以及主客观的唯心论。”② 总之瞿秋白已简要地说明了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

瞿秋白还正确地指出：我们应以辩证唯物论作为认识世界的指南。他说："总之，人对于宇宙的总概念必须先认明一切现象的根本，然后能明白研究这些现象，若是以唯心论为根本观念，我们的研究便无从校正，——因为'心'既是一切现象之源，而心却仅只是不可捉摸的抽象的'观念'。……所以心须就我们所知道的所能感觉的物质去研究，一切结论可以得而校正；以物质基础的考察，实际状况的调查，来与我们的理论相校，是非正误立刻便可以明白。——因为精神现象发生于物现象，而物质现象是可以实际去按察的。”他强调"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Dialectique)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③，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指针。为此，他号召革命者细细的考察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二）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规律

根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瞿秋白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唯物辩证法（他译为"互辩法"或"互辩律"）基本特征及其基本规律。

他指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及社会间的一切现象可以有两种观察法，一种以为一切都是静的，一成不变的。还有一种便以

① 《社会哲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288页。

② 《现代社会学》，《上海大学史料》第342页。

③ 《社会哲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288页。

为是变迁不居的。第一种是所谓静力观，第二种是所谓动力观。”我们略加考察，便可知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动’与‘变’之中，没有一种东西是停滞不变的。天下没有固定的形态，一切都是所谓‘历程’，（Process）。”他又说：“凡是研究一种现象，必须观察他的发生、发展及消灭，——换句话说，便是研究事物之动象，——研究事物于其变动之中，决不可以只看见事物的静的方面。”他称这种动力观叫做“互辩法”或“互变律”①。他进一步又指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他说：因为宇宙永远在动之中，——所以研究一切现象，应当看他们之间的联系，而不可以刻舟求剑的只见‘绝对的分划’。实际上宇宙的各部分互相联系，一部分小有变动便能影响到别部分，牵动全面。当然这种影响有大有小，宇宙的一切现象不断的互相联系，没有绝对与外界相隔离的东西。总上所说，他认为，“互辩法的考察一切现象，第一要看现象之间的不断联系，第二要看他们的动象。”②这就指出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瞿秋白进一步介绍说，把辩证法应用于社会的研究就应当坚持历史主义。具体地说：“第一，应当研究每一种形式的社会之个别的‘自性’，就是不可以一概的、笼统的推想一切时代，一切社会。”“每种社会的特性应当细加研究。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明了‘变动的历程’，各社会，既然各有特点，也就各有特别的发展律——特别的动律。”③这就要求研究每一社会形态的特殊规律，研究每一具体社会的特殊性。“第二，应当研究每种社会的内部变动的历程。”社会中的变迁是很复杂的，每一社会内部亦还有许多阶段，如，资本主义内有许多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财政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欧战中之国家资本主义，而每一阶段内还有“变更的过程”。“第三，应当研

①②③ 《现代社会学》，《上海大学史料》第346—347、348、350页。

究每一种社会的发生及其必然的消灭；——即研究其与别种社会的联系。”①很显然，这种分析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而丝毫没有公式化，没有教条主义。

根据《反杜林论》，瞿秋白扼要地宣传了矛盾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观点。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把矛盾规律放在与“量变质变”规律一起讲，瞿秋白在摘译这一部分内容时却把矛盾律单独作为一节，而把“量变质变”规律与“否定之否定”合为一节。这反映了他对矛盾规律的重视。他指出：“物的矛盾及事的互变便是最根本的原理，——没有矛盾互变便没有动；没有动便没有生命及一切现象。”②

在《现代社会学》里，瞿秋白介绍了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他指出：“不断的变易律是一切的根本。”“一切变易是起于永久的内部的矛盾，内部的斗争，希拉克利泰说：‘斗争是一切之母’。黑智儿说：‘矛盾——即动而前进”’。他还说明了事物之间的均势、平衡是暂时的，事物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值得一提的是：他介绍了布哈林的以系统的观点来考察矛盾的思想。他说：“凡是一个‘物’（个体）必定自成‘系统’，——从许多小部分结合而成的。所以个体之中又有个体。然而一个‘物’之外必定有环境，所以总体之外又有总体。地球以太阳系为其总体，而以山川河陆为其成分；——地球自成其为一个体——（对太阳系而言），山川河陆又各自成其为一个个体——系统（对地球而言）。人之于社会，社会之于自然界亦是如此。”③这样就有一个环境与个体之间的矛盾。“环境影响于个体，个体亦影响环境”。环境与个体之间的这种矛盾不是静的而是动的。

① 《现代社会学》，《上海大学史料》第351页。

② 《社会哲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307页。

③ 《现代社会学》，《上海大学史料》第352页。

个体因适应环境而变化。而环境又因各种个体之变化而变化。每一个体内部自成其为系统，内部也种种矛盾。在个体内部的矛盾与外部矛盾的关系问题上，瞿秋白受布哈林均衡论的影响。他说：“每一个体，内部的结构（内部的均势）之变易，应当跟着这一个体对环境的关系（外部的均势）而定，社会对自然界的均势之性质是以规定社会演化的根本倾向。”又说：“个体内部均势的变易常常是随着个体对环境之均势的变易而变易的。可以说，内部均势是外部均势的一种功能。”①这显然是片面夸大了外部矛盾对内部矛盾的影响。

根据《反杜林论》的思想，瞿秋白指出：“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否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②他的这些话抓住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当然，他对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的理解和说明还是很粗浅的。

（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瞿秋白和当时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重点宣传的也还是历史唯物论。十月革命后，苏联理论界普遍地把历史唯物论称之为社会学。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的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书中还就“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进行了专门说明。瞿秋白和当时其他人也都接受这种观点。他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基本上是阐述作为一般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现代社会学》中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章而已。

在宣传历史唯物论时，瞿秋白十分注意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他说：“人类所组成的社会生长在自然界之

① 《现代社会学》，《上海大学史料》第353、356页。

② 《社会哲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308页。

中，必须以劳力采制自然界的物质以为营养，人类社会方能存在。这种'以劳力采制自然界的物质'之过程便是所谓生产"①。关于生产，他认为由三种因素组成：（1）人所自有的体力及智力，亦即工力；（2）生产工具，即所谓技术；（3）生产资料，亦称为自然。"这三件名为'生产三力'——生产力。"②生产力是在生产过程中这三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三种因素若不使用，便不成其为生产力。他认为，人类不能够主观自由选择生产力。人类社会的发展每时期每地域总只能从现在的生产力之状态着手。在川流不息的生产力运动中，技术（即生产工具）尤其容易变革。他反复述说：生产力之状态是社会最后的根底的原理是历史唯物论的基础。

瞿秋白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的状态是人对自然关系之标准，社会内人对人之关系却依人对自然之关系而定。人与人的关系最根本的是经济关系，适应这种经济关系又建立起社会制度。所以生产力的状态变，经济关系也就变，随之，社会制度也就变。他说："因物质的经济关系之需要，社会中渐渐发生各种精神关系（政治、道德等）。这些精神关系当然受那物质关系的支配。——这是研究社会科学方法中之不二原则"③。又说："社会的精神生活，受物质生产的实际状况及其发展的程度之束缚。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大足以规定其精神生活。"④应当指出，瞿秋白在批判唯心论，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还正确地谈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他说："政治、思想里当然能返其影响于经济。不过经济是基础，政治及思想等只能做经济数量上的变更之助缘，而不能做经济性质上的变更之动因。"⑤瞿秋白

①② 《社会科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448、451页。

③ 《社会科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448页。

④ 《现代社会学》，《上海大学史料》第345页。

⑤ 《社会科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496页。

对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和科学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分章进行专门的阐述。他的说明虽然很简要，但却鲜明地贯串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

瞿秋白在阐述社会制度时专门说明了社会形态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他将人类社会区分为：原始共产制、宗法社会制、奴隶制或农奴制（封建）、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瞿秋白认认：这些制度的内容都是经济关系；可是他们的形式极为复杂。这种社会形式的复杂性是由各处的自然条件不同所造成的。他说："人类生产力——技术不发达时，社会的发展受自然界（地理、人种等）的限制。所以原始共产制的形式往往到处不同"，"甚至于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因地理环境而成就的种种差异的历史条件，依着惰性律的作用，处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影响逐渐小下来罢了。"① 他认为，生产愈发展，则自然界限制技术及工力的影响愈小；生产愈不发达，则自然界限制技术及工力的影响愈大。因此，可以说，"一种社会制度之形式上的差异程度和生产的发达程度适成正比例。""各种野蛮社会之形式，差异得很；各国宗法社会或封建制度之形式，差异便少些；各地资本主义的形式，差异便更少些。共产主义时期，人类已形成一个完全整个的社会，无所比较，更无所谓差异了。"社会形式上的差异，并不否定它们制度本质上的统一性。瞿秋白说："应当特别注意：这里所说差异仅仅是形式上的和外表上的，决不是内容上的差异——'天下老鸦一般黑'，资本主义到处都是一样的根性。"② 瞿秋白的上述说明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第一，影响不同地区、民族、国家社会制度形式上的差异不仅有自然条件，而且还有已经形成的传统、社会心理、文化以至一些偶然的因素；第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族之间的交往的发达，同一社

①② 《社会科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460、461页。

会制度形式上的差异在缩小，但这种差异的缩小并不会导致差异的消失。

瞿秋白还专门论说了社会的“过渡形式及复合形式”。他认为，每一种社会制度“不过是整个儿的历史过程里之一阶段；各阶段内既有许多小阶段，各阶段之间又有种种过渡形式；譬如资本主义之内有商业资本、工业资本、财政资本三阶段。其中商业资本是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形式。财政资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形式；不过每一大阶段之终了及开始时，社会制度必需经过一种突变（革命），所以革命的突变是各大阶段之间的界线。”①所谓社会的“复合形式”，是指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互相接触过程中演变的特殊的社会形式：“譬如澳州原人社会里忽然遇见白种的资本主义侵人，便成一种复合形式；中国的宗法社会与小商业社会遇见国际帝国主义的渗入，便成‘新封建军阀加帝国主义经济’的一种新复合形式。”他认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过渡形式”和“复合形式”都不过是社会“进化过程”和“同化过程”中的步骤。“这些步骤的迟速依当时生产力的状态而定；技术愈低，进化及同化的过程愈缓，技术愈高，进化与同化的过程也愈速。”②瞿秋白对“过渡形式及复合形式”的分析与举例未必完全正确，但却有可贵之处：要注意分析社会“过渡形式”和“复合形式”的特点，防止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作公式化、简单化的分析。

瞿秋白从1923年回国后便将在留俄期间学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向中国人民介绍。他的《社会哲学概论》的“唯物哲学与社会现象”这一部分，基本上是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摘译，《现代社会学》除第一章外，则几乎是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转译。但是，第一，《反杜林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

①② 《社会科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461、462页。

论》在当时均没有中译本；第二，当时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主要限于历史唯物论，很少涉及辩证唯物论；第三，瞿秋白的著作中也有结合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当时思想界的斗争之处，所以读来并不感到隔膜。基于这些，我们认为瞿秋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在介绍辩证唯物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瞿秋白是一位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反动哲学思潮的批判上和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探索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本章第二、三节再叙述。

### 五、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宣传，《现代社会学》的基本思想

李达（1890—1966）。1922年7月，李达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应毛泽东的函邀到湖南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新时代》，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他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和掠夺的本质，驳斥了胡适等人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的谬论，宣传了党的"二大"所制定的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他指出：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和本国有产阶级的三重压迫。他明确地宣告："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推倒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学说上也是有基础。"①

这一时期，李达着重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他在自修大学讲授唯物史观。当自修大学为反动当局封闭后，他又在湖南公立法政学校、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继续讲授唯物史观。在讲授的基础上，他以文言文写成了《现代社会学》一书。该书由湖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12页。

南现代丛书社于1926年6月在大革命高潮之中出版。正如李达在序言中所说："社会学者，社会科学之一，其研究之目的，在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其研究之方法，在追溯过去，以说明现在，更由现在以溯测将来。"① 他鲜明地指出：社会科学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社会学是有阶级性的，现代的许多社会学趋于空化灵化而愈无补于国计民生，"马克思固未尝著述社会学，亦未尝以社会学者自称，然其所创造之唯物史观学说，其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彼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改造社会之方针，其贡献之功实有不可磨灭者。"《现代社会学》一书是"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学者苟循此以求之必了然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结之所在，更进而改造之不难也。"② 可见，李达写作此书的目的十分明确，旨在宣传唯物史观，为中国人民提供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现代社会学》一书共十八章，约十七万字。全书除具有概论性的第一章"社会学之性质"之外，大致可分三部分。一是第二章至第五章，即"社会之本质"、"社会之构造"、"社会之起源"、"社会之发达"等章，主要论述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二是第六章至第十二章，分别论述"家族"、"氏族"、"国家"、"社会意识"、"社会之变革"、"社会之进化"和"社会阶级"等问题；三是第十三章至第十八章，即"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帝国主义"、"世界革命"、"社会之将来"等章，主要是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

《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和有关中国革命的宣传主要有：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36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37页。

### （一）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和构造、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它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和核心。为此，《现代社会学》用较大的篇幅反复阐述这一理论。

第一，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李达在说明社会之本质时首先力辟“契约的社会说”、“生物的社会说”和“心理的社会说”这样三种流行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他指出：“人类为生活计，不能不取得生活资料。欲为取得生活资料，斯不能不参加社会的生产”，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不“直接间接发生种种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之错综复合，形成社会之经济构造”①。因此“社会非由契约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机体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乃由加人生产关系中之各个人结合而成。”②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在社会本质问题上唯物史观与形形色色唯心史观的界限。

接着，李达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他说：人类相互之关系，“自其性质而类别之，可分为物质关系及精神关系。物质关系即经济关系，精神关系即政治、法律、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关系。此等根本关系之错综复合，构成“社会生活之全部”③。为什么经济是基础呢？这是因为“人之生存及活动，以一定之存在为前提，为条件，故人于营政治、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生活之前，必先获得衣食住之物质资料。”④他简要论说了政治、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等均有经济基础决定，由经济关系得以解释。

李达在着重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也指出了上层

---

①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3、241页。

③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4、245页。

建筑能动的反作用。他说：上层建筑虽然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造成的，“然上层建筑又影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此不可不知也”。不过，他指出，这种反作用是有限度的。他说：“唯吾人应当注意者，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成之变化，又受生产力之变化所规定，故上层建筑仅能成为经济之量的变化之助因，而不能成为经济之质的变化之主因也。”①这说明，上层建筑可以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但不能决定经济关系的性质。

第二，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李达指出：人们在生产生活资料过程中，必然“互相联络而发生一定之关系。惟其有此联络与关系，然后生产物始能完成，始能借交通机关分配于社会，供给社会消费。故生产关系包含交通（实指流通——引者）交换分配等一切经济关系。”②他对生产关系的理解是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相一致的。作者进而指出：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两者互有密切之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则生产力能在生产关系中发展。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若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

李达指出：如果离开了现有的生产力，任意地改变生产关系，同样也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他说：“假如一定社会组织内之生产力尚有发展之余地，而人类必欲一己意志企图颠覆，则生产力不但不能增进，反而有衰减之虞。盖生产力之继续发展为社会进步之主要条件，苟时机未至，遽欲谋社会组织之改造，适足以促该社会之退步。”③又说：“苟时机未至，而遽欲强制的实

①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9、245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232页。

行共产主义，则生产力必骤然衰减”①。可见，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一种是生产关系超过了现实的生产力。两者的结果一样，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李达的上述见解是十分深刻的。

第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与当时其他的唯物史观著作一样，《现代社会学》反复论说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最终决定作用。李达认为，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非由思想观念理论或精神而生，乃由物质生活关系发出者也”，“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即此生产力是也”②。总之，“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质生产历程，而物质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此唯物史观的社会本质说之概要也。”③《现代社会学》全书都贯串着这一彻底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二）关于阶级、国家、社会意识和社会革命的理论

第一，关于阶级。

李达正确地指出：阶级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手段共用之事实消灭、原始共产制因而崩坏而产生的。构成阶级本质的，既不是“所得之差异、财产之差异、职业之差异”，也不是“贫富之差异、劳动与偷闲之差异、精神劳动与腕力劳动之差异”，而是生产手段占有之不同，而最终决定阶级关系的是生产力。他为阶级下了这样的定义：“阶级者，社会的生产历程之结果，由生产条件产生而生，因生产手段之分配及社会人员被分配于生产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84页。

②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343、243页。

历程中所成之社会系统而生者也。”①

李达进一步分析了阶级概念，指出：“阶级确为经济概念，同时又为与此经济概念相适应之法律概念及政治概念；是故阶级概念宜总合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各方面之内容为一体；而由经济的见地鉴定之”②。这说明，构成阶级本质、划分阶级的标准，只能是经济。但阶级一旦形成，它的活动则又表现在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阶级概念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概念。把它仅仅理解为经济概念是片面的。当然，若把政治、思想也作为区分阶级的标准，则更是错误的。因为这离开了唯物史观的基础，陷入了唯心主义。

关于阶级的消灭问题，李达指出：阶级由经济的剥削而生，亦随经济的剥削之撤废而消灭。但他对此并没有作简单的、机械的理解，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后，可以将生产资料收归公有，一举消灭剥削，但在一定时期内，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这个阶级的政治思想还存在。只有资产阶级企图复辟的意识完全扫除净尽，无产阶级的统治宣告终结，然后可高唱全民政治。

第二，关于国家。

李达首先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将国家与社会混为一谈的谬论，指出：“国家者，社会历程中之产物，为阶级对立而发生者也，国家非即社会”③。接着他分析了国家的本质，指出：“国家为剥削的支配”，“国家为阶级的统治”，“国家为社会之机关”。因此，“国家哲学者所谓全民自由之国家，所谓实现法律的、道德的、政治的、自由之国家云云，直是痴人说梦耳。”④他通过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国家

①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317页。

③④ 《李达文集》第1卷，第322、341页。

的本质。他指出，现代代议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就其阶级的剥削的支配之性质而言，与封建国家无殊。最后，他说明了国家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

第三，关于社会意识。

李达以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关系为线索来说明社会意识的性质、作用和演变。他指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经济关系，在发生经济关系时，不能不发生相应之意识活动，各种经济关系之错综复合，构成社会之基础，各种意识之错综复合，构成社会意识。但是，他并不认为，任何个人意识都可构成社会意识，只有与该社会经济关系相适合、有维持该社会经济关系之作用的意识才成为社会意识。古代原始社会，无私有财产，无阶级区别，故此时的社会意识确为一切个人之共通意识内容。自私有制发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已无能代表全体社会人员之社会意识，有的只是阶级的意识。“唯有经济上强有力阶级之要求包含于社会意识之中，他阶级之要求概受社会意识之压迫”。① 封建社会的社会意识，即封建贵族之意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即资产阶级的意识。据此，作者对社会意识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社会意识者，各个人为谋取生活资料不能不服从其支配之意识也。”② 很明显，他所说的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只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李达认为，社会意识有“支配个人意识而有维持社会之作用”。社会意识的这种作用是由它“有统御各个人之拘束力”的缘故。他将这种拘束力分为“内的拘束力”和“外的拘束力”两种。“内的拘束力，能使个人之个性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中听命于社会意识。外的拘束力即社会的及法律的制裁，能强制个人

①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91、289页。

牺牲其个性，不得已而听命于社会意识”①。他认为，社会意识一旦形成，不易消灭，会变成一种传统的习惯力量。

李达指出：社会意识既适应于经济组织而成立，亦必随经济组织而变革。他在“社会之进化”一章里具体分析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如何随社会经济的进化而进化的。作者认为，古代无阶级社会的社会意识，与一切个人之目的相适合，是完全的社会意识，到了阶级社会则变成阶级的社会意识，畸形的社会意识，但社会之进化必有达到无阶级社会之一日，则社会意识亦必随达到适合一切个人之目的之一日也。他称此为“社会意识之完成”。

第四，关于社会革命。

李达指出：“革命为进化之母，社会无革命，则社会无进化，此历史之公例也”②。所谓革命即社会由旧而且低之生产关系进至新而较高之生产关系，并变更其上层建筑之全部者也。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说明了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他具体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增长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冲突，说明资本主义必然崩坏。作者进而指出，社会革命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不过他认为，社会革命之实现，“有缓进与急进、平和与激烈之别”。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是“急进而激烈”的革命。至于将来是否有“平和而缓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作者并没有加以简单的否定。他认为：“有必流血而成功者，有可不血刃而成功者，未可一概而论也。”③

李达还专门分析了社会革命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他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89—290页。

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67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第269页。

反复说明，只有当生产力在旧的社会组织内无发展余地之时，旧的社会组织才会崩坏，新的较高的生产关系才能产生。社会革命本在促进生产力之发展，倘若在物质条件未备，生产力在旧社会内尚有充分发达之余地的情况下发生社会革命，那革命终归于失败。这种革命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促使生产力衰减"，社会"归于退化"。①当时有人把唯物史观歪曲为机械论、经济命定论，认为既然社会革命系于经济条件，因此个人可以拱手无为，坐待社会之自然进化，不必从事社会革命。对此，他指出："社会组织之变革，一方面受物质条件所拘束，一方面又必待各个有意识的行动如能实现，故物质的条件与个人之努力，二者皆社会变革之要件也"。又说："社会之进化，须经历阶级斗争始能实现，故个人对改造社会之努力，即系构成此冲突之因子，实于社会之变革有绝对之必要"②。

李达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思想分析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指出："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③他认为，杰出人物并非"特殊天才使然，实社会关系有以玉成之也"。"伟人之所以异于常人者，以能知其大，能见其远，能解决前代社会所提供于当代之科学的问题，能发见由前代社会关系之发达所造出之社会的要求，能更进而鼓其特殊之智力精神，率先担当解决此问题满足此要求之大任耳。"④在物质条件与个人努力之关系上，他指出："方物质条件之未备也，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⑤因此"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诚宜细察

①② 《李达文集》第1卷，第284页。

③④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285、286页。

社会之潮流，熟审时代之精神。创造自身之历史促进社会之进步”①。他的这些论述正确地说明客观物质条件与个人主观努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关于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的论述

李达在书中不仅阐述了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批判了各种错误的社会理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而且还专门论述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

李达指出："民族革命云者，弱小民族脱离强大民族支配之谓也；社会革命云者，无产阶级脱离有产阶级支配之谓也。"两者形式不同，而其革命对象则一，即帝国主义。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相须并进而构成世界革命②。

李达对民族革命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指出：民族革命的对象除帝国主义之外，还包括本国的为虎作伥之封建阶级或帝国主义者之代表。他认为，在民族革命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民族革命运动由谁领导的问题："果必为资产阶级乎？抑为无产阶级乎？"他指出，民族革命虽为全民革命，但参加者有勇有怯，"弱小民族之全体人民，其最感帝国主义压迫之苦而觉知有革命必要者，莫如工农无产分子"③。又说："民族革命，虽系全民革命性质，而其中坚分子则为无产阶级而非小资产阶级也。"④根据列宁的思想，他分析了民族革命的前途，认为："无产阶级既能成为民族革命之中坚，则在成功之后，对于经济上之建设，必不赞成私人资本主义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非即社会主义"⑤。最后，他分析了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指出，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必须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实现。民族革命不能脱离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86页。

②③④⑤ 《李达文集》第1卷，第354、359、360、361页。

斗争单独进行，不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革命，是机会主义之民族革命。

《现代社会学》出版后深受革命人民欢迎。从1926年至1933年的七年间，共印行了十四版，为唯物史观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人在这本书的引导下开始懂得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的道路。正因为如此，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把该书视为洪水猛兽，对书的作者进行“通缉”。1928年湖南省零陵县反动当局所发布的“人犯通缉表”中开列李达的“罪恶事实”是“著名共匪首领，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称赤化甚力”。以上两方面的事实说明，《现代社会学》一书在当时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有重大的社会价值。

《现代社会学》是李达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它是继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之后又一本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书中论述的许多原理，虽然基本上还是介绍性质的，但对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有教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无论从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来讲，还是从所论述内容的深刻性来讲，《现代社会学》一书都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代表作。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青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达到的水平。

李达在1923年就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之在中国，已由是介绍的时期而进行实行的时期”①。《现代社会学》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掌握要有一个过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更需要一个过程。《现代社会学》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著作，很显

① 《李达文集》第1卷，第202页。

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痕迹。李达虽然在书中也曾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到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但总的来看，这方面做得是不够的。这是他自己也意识到的。他在1928年写的《三版例言》中说：“是书立论，大都以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为对象，对于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则未能多所说明，此虽在原则上不得不尔，然亦不得谓非是书之缺点也。”《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只是作一般性的论述，尚缺乏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论证，而且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人民群众的作用等重要原理未能加以介绍。当然，今天的读者还很容易发现现书中某些用语的不准确和个别观点上的错误。书中某些缺点带有时代的特征，我们不能苛求于作者。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以及它对中国社会所起的巨大作用，不能不引起它的敌人的激烈反对。这一时期，我国思想界发生过多次论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批判国家主义；批判戴季陶主义。

### 一、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 （一）论战始末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下进行的，尽管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提倡科学，崇尚科学，已成为一种时代特征。在当时，无人敢起来公开反对科学。正当中国在高喊“科学万能”的时候，在西方，有人却喊出了“科学破产”。出现这种情形，有其社会的和认识论上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惨重的灾难，一些不懂唯物史观的资产阶级

学者，把大战的责任归罪于科学，认为科学的发达导致了这场战争，科学万能的迷梦破产了。这是社会原因。此外，还有认识论上的原因。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自然科学发生了革命，放射性元素的发现，相对论的创立，使得一些原有的自然科学原理"崩坏"了。一些不懂得认识辩证过程的自然科学家感到困惑，喊出了"科学破产"。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首先跟着西方喊起"科学破产"。他认为，近代科学的昌明，给宗教和唯心论哲学以致命的打击，唯物论哲学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一种纯物观的纯机械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把一切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原则'之下"，否定了自由意志，否定了道德责任，造成"弱肉强食""抢面包吃"的社会。① 在他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对这种人生观的一种报应。他们公开攻击科学家的人生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君劢起来公开反对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挑起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张君劢（1887——1969年），原名嘉森，江苏省宝山县人，曾先后留学日本、德国，是柏格森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之一。1923年2月，他在清华大学发表《人生观》的讲演，主张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与科学不相容；人生观不受因果律支配，而为自由意志支配；因此，"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他提倡孔孟思想，企图复活宋明心学。

最先起来反驳张君劢的是丁文江。丁文江（1887——1936年），字在君，江苏省泰兴县人，曾留学英国，地质学家，是我国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开创者之一。在哲学上，他是一个马赫主义的信徒。1923年4月他发表了《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主张科学是万能的，科学方法是普遍适用的，科学

① 《梁启超哲学思想文选》第260、261页。

可以支配人生观。他称张君劢为“玄学鬼”。直截了当地提出“打玄学鬼”的口号，不过他宣传的却是“存疑的唯心论”（即不可知论的唯心论）。

随后，张君劢与丁文江又相继发表互相答辩驳难文章。参加论战的人越来越多。梁启超发表了《人生观与科学》一文，认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他好象很公允，实际上是站在张君劢一边，反对科学可以支配人生。在论战中，赞成玄学鬼张君劢的人并不多。丁文江维护科学的权威，因此获得较多人的赞同，心理学家唐钺发表了《心理学与因果律》、《一个痴人的说梦》等文章，从心理学角度说明一切心理现象是受因果律支配的，梁启超所说的“爱”和“美”等情感方面的事项并非超科学。吴稚晖发表了《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激烈地攻击上帝、神、灵魂，攻击复古倒退的东方文化派。他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那无始无之始，不过是“漆黑一团”的、混沌的、不能拿言语形容的怪物，这就是所谓的“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他把人等同于一般动物，认为人生无非是“吃饭、生小孩子、招呼朋友”这三件事。这就是所谓的“人欲横流”的人生观。在这场论战开始后不久，胡适发表了近于戏谑的短文《孙行者与张君劢》。他运用形式逻辑说明张君劢虽然反对科学，但“仍旧不曾跳出赛先生和逻辑先生的手心”，犹如孙行者虽然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但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

1923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将论战文章汇集成《科学与人生观》一书。胡适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叙说了论战的背景、双方的主要论点、并提出了“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胡适根据近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指出：宇宙在空间上是无穷之大的，在时间上是无穷之长的；宇宙及其中的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有规律的，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人们能考察宇宙间的

法则，利用这些法则来驾驭天行。他主张人类社会和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寻求出来的。但是他将人等同于普通的动物，否认人的社会性，用生存竞争来解释社会的变迁。很明显，胡适对宇宙（自然界）的看法是唯物的，对社会、对人的看法则是唯心的。他把这种建筑在近二、三百年科学常识之上的人生观看成是“一个大假说”，从而给“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打上了实验主义的印记。胡适把他提出的人生观称之为“科学的人生观”，认为以后的作战任务就是“宣传我们信仰的新人生观”。

以上可以说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第一阶段，论战的中心是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反对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提倡恢复中国传统的封建哲学，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动。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维护科学的权威，主张科学支配人生，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

正当科学派以为取得了胜利之时，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这场论战。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的序中指出：科学派虽然大肆攻击玄学派的唯心论，表面上得着了胜利，其实他们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支军队，这是因为他们素来不相信一种可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即唯物史观。他在序中，不仅批判了张君劢的自由意志论，而且批判了丁文江的存疑唯心论、胡适的多元论历史观。之后，胡适、张君劢发表了答辩文章，而陈独秀又发表《答适之》、《答张君劢及梁任公》两文。与陈独秀文章相配合，瞿秋白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和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也直接或间接地批判了论战中出现的错误观点。这是论战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没有第一阶段那样热闹，论战文章也没有结集成书，但它更为重要。这一阶段论战的性质与前一阶段不同。它已由资产阶级内部

不同派别的争论变为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唯心论的争论。无论是胡适，还是张君劢、梁启超，他们都把矛头对着唯物史观，原来科学派与玄学派的争论基本上沉寂下来了。陈独秀、瞿秋白则对两派中的唯心论都加以批判，为真正科学地解决人生观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武器。

（二）驳“自由意志论”

张君劢反对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的根本论据是：社会现象、人生与物质现象不同，它们为自由意志支配，无因果律可循。为此，他大讲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之不同，认为物质科学有一定的“公例”，精神科学无一定的“公例”。他还大量引用资产阶级学者的言论来“证明”，社会变化是无规律的，决不能预测，故决非科学所能解决的。

陈独秀在批驳张君劢时，首先指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是客观的，都有因果性，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其中的规律。他说，个人心理现象比物质现象复杂，社会现象比心理现象复杂，所以我们人类对于这些现象因果之认识便有比较精粗迟速之不同，并不是宇宙间现象中，一部分是有规律秩序的，一部分是杂乱无章毫没有规律秩序的。张君劢曾列举“我与我之亲族”、“我与我之财产”、“我与我所属之全体”等九种关系上所表现出不同的人生观，以说明人生为活的，不如死的物质那样“以一例相绳”。陈独秀逐一分析了张君劢所列举的不同人生观，指出：“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的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以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它们决不是“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他进而说：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心理变迁，“推求其最初原因都是物质的，而为因果律所支配，因此社会科学才有加以物质的因果的说明之可能”。他承认在一定范围内个人意志之活动，但“非绝对自由，因为个人的意志自由是为社会现象的因果律并心理现象的因果律

支配”。①

瞿秋白更具体地深入地论述了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性以及必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差异，自然界里只有无意识的盲目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人类社会则大不同，这里的行动者是有意识有目的人，但这种差异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历史进程之共同因果律，科学的责任便在于发现这些共同的公律。他说，研究历史现象，不能停留于人的思想动机，而要进一步研究阶级的、群众的动机，研究引起历史上巨大变更的长期运动的原因。“如此，方能发现历史进化的公律以及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域之特别公律”②。他具体阐述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指出：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精确些说，是生产力。“因生产力的状态而成当代的经济关系；因经济的关系而生政治制度；因政治制度而定群众动机；因群众动机而有个性动机。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足以为新时代的政治变革的种种因素中之一因素”、“历史的规律便在于此”。③所谓“情感是超科学的”，“先天的义务意识是超科学的”，都不能成立。情感和义务都可以用科学解释其因果。“总之，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④

张君劢等自由意志论者认为，若承认社会发展的因果律，就没有自由意志，而若承认自由意志，则无因果律。针对这种将必然与自由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瞿秋白依据恩格斯的思想，说明了必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自由’不在于在想象里能离自然律而独立，却在于能探悉这些公律；因为只有探悉公律之后，方才能利用这些公律，加以有规律的行动，而达某种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89页。

②③④ 《瞿秋白选集》第116、126页。

目的”。因此，“人的意志愈根据于事实，则愈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据于事实，则愈不自由。”①最后他说：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②。

张君劢在攻击唯物史观时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推定生计上之进化，遵正反合之惟物史观之原则。故资本主义之崩坏为不可逃之数。然自今观之，以欧洲而言，资本主义之成熟，英远在俄上，顾劳农革命，何不起于英而起于俄乎？”③陈独秀在回驳时说：“怀这样疑问的人，世界上很多，不止中国张君劢一人，都是因为不明白社会科学之方法论的缘故。”因果律虽是一切科学共通的原则，但特殊的社会现象则有特殊的因果关系。社会规律只能指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而不能预测社会发展的任何具体细节。“一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工业发达起来，其社会中劳动运动必将因之发生，此一社会科学之公例，在各国简直没有例外，而其劳动运动将发生于何日何地以及运动中之领袖将为何人，此事只有请问六壬卜算大家，社会科学无此神通。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预料资本主义必由发达而崩坏，崩坏后继之者必为社会主义，此乃就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一般趋向而言。至于资本主义之崩坏与夫社会主义之现实，果在何国开始及完成，又另有其特殊的因果关系。”④陈独秀认为，社会因果关系非常复杂，决不如张君劢所想象的那样简单。陈独秀对俄国革命何先于英国的解释未必完全正确，但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正确地指出了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指出了不能以一般规律代替对具体规

①② 《瞿秋白选集》第117、128页。

③ 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人生观之论战》（上），第5—6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85—486页。

律的研究，不能把复杂的现实世界简单化，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化。

（三）驳“思想事实之母”说和“存疑唯心论”

张君劢在反对唯物史观时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此区区一语中，而历史之真理描写尽净”①。对此，陈独秀说：“张君劢和一切唯心论者，“在社会动象中，只看见思想演成事实这后一段过程，而忘记了造成思想背景的事实这前一段过程，这本是各派唯心论之共同的中心的错误。他们只看见社会上一种新制度改革之前，都有一种新思想为之前驱，因此便短视的断定思想为事实之母；他们不看见各种新思想都有各种事实为他所以发生的背景，决非无因而生。”他正确地指出：“第一先有了物质的世界这个事实，第二才有所思想的人这个事实，第三又有了所思想的对象这个事实，然后思想才会发生，思想明明是这些事实的儿子如何倒果为因，说思想是事实之母？”②他又说：事实才是思想之母，思想没有超越事实的可能，超越事实的思想乃是迷梦！陈独秀的这些深刻的论述，不仅揭露了一切唯心论的认识论根源，而且还正确地指出了物质可以转化为思想，思想可以转化为物质的辩证法。他宣称：敢告一切唯心论者，倘不能论破我这辩证的方式，别的千言万语都是支遁之词。

陈独秀还驳斥了梁启超的二元论。梁启超本来的哲学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写的《唯心》一文中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质境虚幻，惟心造之境为其实。”③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日益传播的时候，他便打着超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幌子来攻击唯物论。他说：“近来‘唯什么’，‘唯

① 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人生观之论战》（上）第6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90页。

③ 《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39页。

什么'的名称很多，最主要者莫若'唯物论'和'唯心论'。"他认为，"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的，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①为此，他在1924年专门写了《非唯》一文。

陈独秀在驳斥梁的二元论时说："哲学上对于宇宙观及人生观，向分物质一元论和精神一元论两派（我不承认二元论能够成立）。唯物、唯心是沿用翻译佛典之名词，在西文里原没有什么'唯'字；但物质论者是说世间一切都是物质，精神亦为物质所生；精神论者是说世间一切都是精神，物质亦为精神所生；二者结论虽正相反对，其均为一元论则同，一元论便与'唯'无别。"②他从世界统一性的角度指出，二元论根本不能成立，最终必然陷于唯心论。他说："互相联系的森罗万象，本是一气呵成的整个世界，其根本或云都是物质，或云都是精神，却不能说是分途并进、各别为一世界如二元论者之想象。因此，二元论之归结，恒为客观的唯心论，即使他本不欲'唯'，而事实上令他终不得不'唯'；犹之唯心论者终必采纳宗教神灵之说，因为在有人类意识以前，单纯的物质世界久已存在，若不抬出神来，精神一元论的招牌便须自己取下。"他反复说明，二元论终不能成立，哲学上分唯物论和唯心论，并不是哲学家们为分门户，主观故欲其"唯"，而是探讨万象穷源尽委，客观的说明世界不得不"唯"，"唯就是一元论，唯物论就是物质一元论。"③陈独秀对二元论的批判，表明他自觉地站在物质一元论的立场，坚持和捍卫了哲学的党性原则。

应当说明的是，在1924年5月，即陈独秀说上述话的时候，《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

① 《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459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93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93—494页。

等经典著作还没有中译本，而中文书刊中正确介绍哲学基本问题的也不多见。因此，陈独秀的上述思想无疑是很可贵的，它有助于人们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有助于人们揭穿二元论的虚伪性。

丁文江激烈地攻击玄学鬼张君劢的唯心论，口口声声说，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但实际上却宣扬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他在《玄学与科学》一文中说："我们之所谓物质，大多数是记存的觉官感触，加上了一点直接觉官感触。"他认为：赫胥黎、斯宾塞、詹姆士、皮尔生、杜威以及马赫哲学，细节上虽不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以觉官、感触为我们知道物体唯一的方法，物质的概念为心理上的现象，所以说是唯心，觉官感触的外界，感觉的后面，有没有物，物体本质是甚么东西，他们都认为不知，应该存而不论，所以说是存疑"。很明显，这完全是唯心论的经验论和不可知论。

陈独秀在批驳"存疑唯心论"时指出："我们对于未发见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神灵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① 这完全正确，在人的视野之外，物质的具体的存在形态，确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人类的全部实践和整个科学的发展证明，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的特殊属性，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上只有尚未被认识的物质，而没有不可认识的物质。唯心论、不可知论常常把唯物论诬蔑为独断论。对此，陈独秀说："说我们武断也好，说我们专制也好，若无证据给我们看，我们断然不能抛弃我们的信仰。"②

陈独秀还揭穿了"存疑唯心论"的反科学性。他质问打着科学旗号的丁文江："你既承认宇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

①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54页。

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不可知论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这就必然为上帝、神灵留下地盘。所以，丁文江虽然激烈地攻击张君劢，其实，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是“五十步笑百步”①，丁文江并未能说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

在论战中，陈独秀还批判了先验论。有人主张：“人生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观的直觉而得的，决不是科学所能干涉。”所谓先天的形式是指良心命令人类做各人所自认为善的行为。对此，陈独秀说：“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情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②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道德观念也就不同。

（四）驳多元的历史观

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在我国迅速传播，影响日益增大。为了抵制和反对唯物史观，胡适打着超乎唯物和唯心之上的幌子，鼓吹多元论的历史观。他一面假惺惺地表示“极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另一方面则反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认为政治、思想、知识、教育等与经济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也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而“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问题”。胡适标榜他的这种历史观，用不着戴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色彩的帽子”。所以，他把这种多元的历史观称为“秃头的历史观”③。

针对胡适的所谓唯物史观不适用于人生观的谬论，陈独秀指出：“‘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93—494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53页。

③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299、300页。

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①。他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反复说明：“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②。胡适在为自己多元历史观辩护时说：“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也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原因”。对此，陈独秀说：“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③他进一步说：唯物史观的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而非基础之本身”。他以列表的方式指出：唯物史观主张经济决定制度、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的一元论，而胡适主张经济与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平行并列的多元论。他以思想、教育为例来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他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存在的。”④总之，他认为：“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⑤他形象地说：我们把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当做经济的儿子，而胡适则把他们当作经济的兄弟。这是唯物史观和多元历史观争论之焦点。

陈独秀揭穿了胡适的多元论的反科学性。他说：“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胡适口头上“颇尊重科学”，实际上却主张心物并列的二元论，因此，“张君劢必然大摆大摇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⑥所以胡适表面上主张多元论，骨子里还

①②③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77、354、379页。

⑤⑥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79、380页。

是唯心论，与张君劢走的一条路。

总之，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终结。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维护了科学的权威，宣传了唯物史观，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人生观问题当然不可能通过一、二次论战就能得到彻底解决。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正确解决人生观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指针和理论基础。

## 二、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尤其是1924年1月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式合作，建立反帝反军阀的统一战线后，中国革命很快走向高潮。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必然遇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抗，这一时期出现的国家主义派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代表。在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同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 （一）国家主义派的形成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欧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是较早提倡国家主义的一个人。1806年10月，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攻占了柏林。为了鼓励德国人民起来反抗外来侵略者，费希特发表了《告德意志国民》的演说，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国家主义。在演说中，费希特还提出：应使德意志民族成为“世界之恢复者，刷新者，且为万国中最光荣者”，“世界之解放者”①，鼓吹德意志民族“优胜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各国资产阶级利用“国家至上”，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对内欺骗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阶级斗争，维护资产阶级专政。

国家主义在五四时期开始传人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朱执信

① 转引自《朱执信集》（上），第355页。

在1919年9月《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的长篇文章。国家主义在少数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少年中国学会里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人信仰国家主义。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统一性质的进步文化团体，共产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共存于同一团体之中。这说明在那时国家主义的反动性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在那时，信仰国家主义的人也没有成为一个政治派别。

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政治代表的国家主义派是在1924年前后形成的。这个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便是上面提到的几个人。曾琦、李璜、余家菊在五四运动前后都去法国留学。当时的法国，正值国家主义思潮大为流行，他们便从中吸取“养料”，并在中国留法学生中宣传国家主义，攻击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12月，曾琦、李璜纠集了留法学生中的右派，在巴黎近郊的玫瑰村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党（直到1929年9月该党召开第四次代表会时才公开党名），对外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留在国内的左舜生利用主持少年中国学会之便，在《少年中国》月刊大肆宣传国家主义。

1924年9月，曾琦、李璜回国，这样国家主义派的活动中心由法国移到国内。曾琦、李璜回国后，面对国共合作后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和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迅速增长的形势，深感时世艰难。为了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们伙同左舜生、陈启天于同年10月在上海创办《醒狮》周刊。因为他们标榜国家主义，所以人们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又因为他们以《醒狮》为喉舌，所以又指称他们为醒狮派。

国家主义派公开攻击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于国家有害，鼓吹国家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他们公开反共，诬蔑共产党卖国，把共产党说得象红眉毛绿眼睛的吃人妖精一样，认为共产党“这个根本的症结不除”，中国没有希望。

他们攻击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把社会主义的俄国与西方帝国主义等量齐观。国家主义派标榜他们的宗旨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的"内除国贼"，就是"内除赤党"，他们的"外抗强权"就是"外抗苏俄"。

当国家主义派刚出现时，中国共产党人就对它进行了批判。中国共产党旅欧党团组织以《赤光》为阵地对曾琦等人在法国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当国家主义派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国内，政治上更趋于反动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它的批判也变得愈加激烈。在1925年至1927年，出现了一个批判国家主义派的高潮。国家主义派的主要成员是青年，所以对它的批判主要是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中国青年》上进行的，恽代英、肖楚女是主要的批判者。陈独秀在《向导》上也发表过不少批判文章。

（二）批判国家主义派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

国家主义派极力鼓吹"阶级合作"、"全民革命"，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唯物主义说明。李璜说，马克思纯从经济方面着眼规定阶级，"这种看法未免太狭，阶级的意义中固然含有经济的原素应当重视，不过感情的原素与社会的原素也应同等重视"。他将阶层的差别混同于阶级的差别，认为"社会习惯与知识等差"足以助成阶级的歧视①。对此，肖楚女驳斥说：所谓"社会习惯"是由于人类之经济生活逐渐演变而成的，工人反抗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完全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引起的，而决非是知识差别的问题。阶级歧视之观念，决非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由于社会的生活环境之暗示与资本主义化的教育结果②。

① 李璜：《国家主义答客难》，《醒狮》第16、17期，1924年。

② 肖楚女：《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541页。

国家主义派借口中国经济落后，否认中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针对这种谬论，肖楚女在《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一书中专门写了“中国今日之劳资阶级”一节，援引资料以铁的事实说明中国存在着尖锐的劳资阶级的对立，京汉路“二七”惨案等绝大的流血惨剧——阶级斗争，已经明明白白写在历史上。他指出，醒狮派否认中国存在着劳资产阶级，是“昧良说谎，袒护资产阶级”。国家主义派攻击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鼓吹的结果。对此，肖楚女说：“阶级斗争是可以由人去鼓吹的么？我们若有这么大的本事，岂不成了瞒天过海的八洞神仙？唯心的先生太‘从心所欲’了吧！”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共产党人只是本着客观的规律，“促进阶级斗争”。

国家主义派还攻击说：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分裂了国民，减少了革命的势力，延长军阀之寿命。因此，阶级斗争对于中国算是“药不对症，于国事有损无益”。恽代英在驳斥这种攻击时论述了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他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无产阶级单独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而且各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参加这种运动；所以我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希望各阶级联系起来。但这点不意味着，为了国民革命，可以不要阶级斗争，更不能认为阶级斗争破坏国民革命。他指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的主力，若要无产阶级不进行阶级斗争，而希望他们热心于为那抽象的“国家”，这与唯心派的空想家一样荒唐。同时，无产阶级革命势力的强大，可以减少上层阶级怕革命危险的心理，使他们较易于参加国民革命。恽代英还揭穿了国家主义派鼓吹全民革命的反动性。他说：“一切国家主义者都是要拿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他们都是想用‘整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一方面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着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面又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怕，而不努力于谋

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①国家主义派反对阶级斗争，不但妨害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妨害中国眼前的国民革命。因此“为了国民革命而防止阶级斗争，是一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②。

（三）批判国家主义派超阶级的国家观

国家主义派抹杀国家的阶级实质，否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李璜说：“国家是甚么？一定的人民，占有一定的土地，保持一定的主权”，“国家者全国人的国家，不是几个人或一阶级的人所能利用的”③。陈启天也说：国家“不是任何阶级的一种专利品，他的来源是根于人类的社会本能”④。肖楚女在批判这种超阶级的国家观时指出：阶级是私有制的产物，国家起于阶级的分化，“阶级一日存在，阶级斗争便一日不会消灭；国家也便一日不得不被有力阶级——得胜阶级用为工具。有产阶级专政，是国家这个东西保持自己的地位，使他人——使阶级继续存在。”⑤现在的英、美、日、法意、德等国家都是在德谟克拉西的面目下实行资本主义的专政。他以五卅惨案的血的事实说明，“亘古今中外，只有各阶级互相杀伐，各争自己阶级利益的国家，决没有‘各阶级融和一致的国家’”⑥。国家主义者完全不顾历史的和眼前的事实，单凭自己脑中所幻成的抽象的空的理论方程式瞎说。陈独秀也指出：国家“本来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

①② 《恽代英文集》（下），第655—656、663页。

③ 李璜：《释国家主义》，《醒狮》第1—5期，1924年10月10日——11月8日。

④ 陈启天：《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歧点》，《醒狮》第44期，1925年8月8日。

⑤ 肖楚女：《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566页。

⑥ 肖楚女：《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中国青年》第87期，1925年8月1日。

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①

国家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们只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剥削阶级国家，并不反对一切国家，主张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之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家主义派诬蔑共产党人时时复发“反国家”的言论。对此，陈独秀说：“共产党对于国家的态度是：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用做控制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前代封建贵族用他控制奴隶及农民，现代资产阶级用他控制无产阶级，将来无产阶级也要用他控制资产阶级，必须一切阶级消灭，国家这个制度才能够消灭。现在，我们正要建设民主的国家，更进而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国家主义者骂共产党不要国家是无的放矢，是无知。②

共产党人反对国家主义，并不反对爱国精神，不过，对爱国精神要作具体分析。恽代英说：“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抵御国际资本的压迫而存在的；我们心目中的政府，是为保障无产阶级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为要使全民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阶级的解放，我们反对拿一国的历史文化的偏见，去提倡那种空洞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更反对想拿这种爱国的空话欺骗无产阶级，妨害无产阶级解放的争斗。”③他进一步揭露说：国家主义者总是想拿国家观念来压倒阶级观念，这与我们为中国人实际生活而奋斗，自然是凿枘不能相容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工人无祖国”，号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12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360页。

③ 《恽代英文集》（下），第684页。

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家主义派大肆加以歪曲、攻击，大骂共产党妄倡无祖国，不爱国。对此，陈独秀驳斥说：“马克思的‘工人无祖国’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是说没有一个国家是保护工人的祖国；二是说全世界工人阶级应该不分国界的联合起来，三是说各国工人不应该在‘爱祖国’的名义下为本国政府侵略别国，为本国资本家格外多做点牛马”。他指出：“实际上，五卅运动中，最为祖国牺牲的乃是无祖国的工人，而不是你们有祖国爱祖国的国家主义者。”① 国家主义派口头上高唱爱祖国，而一旦正要挺身为祖国奋斗时，反而缩进龟头，把祖国忘了，他们不曾为祖国流一滴血，捐一只躯。

（四）批判国家主义派反对国际主义的谬论

国家主义派在“国民依赖自力以图谋国家的独立与统一”的幌子下，大肆攻击孙中山的联俄政策，胡说联俄政策就是“不惜依赖外力”。中国共产党人在批驳国家主义派的上述谬论时阐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陈独秀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随之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成了整个的。全世界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工农阶级及弱小民族——对于统治者压迫者的反抗，也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解放运动也完全应该是整个的，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农解放运动，都是整个的世界解放运动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影响，决不是国家主义者所想象各国关起门来独立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② 他指出，国家主义者搞的“是闭关主义，他们不是独立运动而是孤立运动。照他们的方法，关起门来做中国一民族的独立运动，拒绝全世界的同情援助，使中国一民族完全站在孤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358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193页。

立无助的地位，此诚为我们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所喜，而陷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于更孤危更险阻的困境中。”①

中国革命是整个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陈独秀还正确地指出了争取外援与依靠自力的关系。他说：“中国民族运动绝对拒绝外力援助，是个错误；然而想靠外力直接出头替我们打仗，那更是个错误。因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究竟要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干，外人援助我们则可，外人代替我们来干则不可。”②

中国共产党人还揭露国家主义派虽然打着“外抗强权”的旗帜，实际上根本不反对帝国主义。曾琦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中说：不能提打倒帝国主义，“因为‘打倒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肖楚女驳斥道：帝国主义这样来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我们还不应当去“及汝皆亡”地向帝国主义进攻！醒狮派们的“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的政策，完全是卖国政策。国家主义派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不敢吭一声气，他们是一伙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反对苏俄的反动派。

（五）批判国家主义派的二元论与唯心论

国家主义派清楚地懂得，共产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他们为了从根本上反对共产主义，便极力攻击唯物史观，鼓吹二元论与唯心论。陈启天说：“国家主义主张心物并重，共产主义主张唯物史观，——国家主义者以为社会构成的要素有两大种：一是物质要素，二是心理要素，这两种要素在社会生活上是同时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14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49页。

并存，斤量相称的。”①李璜也攻击说，马克思从经济上着眼解释社会现象，以唯物观念来解释国性，过于简单，容易达到偏激的地步。肖楚女指出：马克思主张国家是从经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的这种唯物的说法，在唯心的李璜先生，当然是要痛恶的”。其实，因为资本生产制掠夺剩余价值之压迫，和文化交通及帝国主义争霸市场的发展，使阶级间产生了直接的阶级革命的必然事实——“都是一样一部无机的社会进化史之开展！”②恽代英也指出：“无论唯心派怎样嘴硬，两千年的历史，许多读书明理的‘士大夫’的实例，都证明经济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注意，我们并未说他是唯一的原因）。所以我们便以为国民革命，亦必须有经济斗争引导一般人到政治争斗上面，对于无产阶级尤须由阶级争斗以引导之到民族解放运动。”③国家主义派口头上虽说要救中国民族，但由于他们是唯心论者，他们“不从打倒中国的经济压迫着手，专门说些提倡教育、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这都是二三十年来经许多人鼓吹而没有功效的话。”因为他们偏于唯心，所以找不着合当而有效的途径。④

国家主义派宣扬国民有一种与物质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对此，恽代英说：人类的爱，“皆由于人类经济之需要，并没有甚么先天神秘的关系”，若说国民会有一种与物质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那是受了统治阶级历史欺骗的结果⑤。陈启天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史观，同时又攻击说：“共产党人过信唯物史观，只将人当物看，不将人当人看，所以完全缺乏‘人味’，这种缺乏

① 陈启天：《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歧点》，《醒狮》第44期，1925年8月8日。

② 肖楚女：《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550、542页。

③④ 《恽代英文集》（下），第656—657、665页。

⑤ 《恽代英文集》（上），第591页。

人味的说法与行动，是人所不堪的，也是不合理的。”对此，肖楚女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求阶级斗争，消灭一切阶级，……反对资本家驱使工人，把劳动当商品，把工人当器械用。醒狮派反对我们主张阶级斗争，承认经济上的不平等阶级应当存在。到底谁是以人当物？到底在谁的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是‘缺乏人味’？”“在你们‘尚贤政治’下，试问又有多少‘人’在你们心目中不当‘物’看”①。这种反驳是有力的，确实在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家眼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不过是当作劳动力的商品，是可以交换的物。

马克思主义者还指出：国家主义者是抹杀真理，睁眼不看事实的唯心论者。周恩来说：国家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击，“多部分是从脑子里任意为共产主义者造舆论，自立自破”，而“我们纵因说实话而引起你们反感”，“这就是唯物史观论者强似你们唯心论者之最大真实处啊”②。

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从政治上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本质，而对于它的哲学基础——二元论和唯心论则没有能深入批判，这是一种不足。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激烈批判下，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本质很快就暴露无遗。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他们是一个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甘心做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工具。国家主义派不仅为一般群众所唾弃，而且许多被蒙蔽的国家主义者后来也觉悟过来，纷纷脱离组织。国家主义派头目曾琦无可奈何地发出这样的悲哀：“赤焰薰天势莫当，纷纷余子竟投降”。喧嚣一时的国家主义派在大革命的高潮中走向破产，它的少数骨

① 肖楚女：《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557—558页。

② 周恩来：《实话的反感》，《赤光》第8期，1924年5月1日。

干分子则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附庸和帮凶，继续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

## 三、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极端的反革命派——国家主义派的同时，还同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斗争。

### （一）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不是某一阶级的政党，而是不同阶级的政治联盟。1924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民主联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1924年1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国民党内的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国民党。由于孙中山坚决主张国共合作，右派的阴谋没有得逞，冯自由、马素等人被开除出国民党。国共合作后，中国革命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高潮，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共产党力量日益壮大。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分化进一步加剧。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在这以后，留在国民党内的右派谢持、邹鲁等人公开进行反共活动，形成了西山会议派，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成为一个公开的反革命政治派别。面对汹涌澎湃的工农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右翼）也迅速向右转，他们在国民党内的代表人物和老右派串通一气，公开篡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进行反共活动。戴季陶主义正是适合国民党右派反共需要而产生的反革命理论。

戴季陶（1890——1949），名传贤，号天仇，原籍浙江省吴

兴县，生于四川省广汉县。1910年参加同盟会。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国民党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戴季陶是该刊五个主要撰稿人之一。同年，他又和沈玄庐主编《星期评论》，在这一时期，他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过劳动问题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在《建设》上译载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因此，戴季陶曾被当时的一些人看作是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他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在国民党改组时，他虽然不赞成国共合作，但由于孙中山态度坚决，他未敢公开反对。孙中山逝世后，尤其是1925年“五卅”运动后，他不能容忍共产党势力的迅猛发展，便公开起来修正孙中山的理论，进行反共活动。他的反共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国民党的理论家自居，在解释孙中山学说的幌子下发挥孙中山思想中消极的东西，完全阉割其革命精神，为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人民编造了一套理论；二是以国民党的中间派面貌出现，既反对右派，又反对左派，开展一个“自异于帝国主义者和官僚军阀的反赤运动”。他在192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接受总理遗嘱的宣言”，提出了建立以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接着在六月和七月接连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为资产阶级右派反共提供理论根据和制造舆论。

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新右派，虽然口头上也讲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要国民革命，而实际上“他们的专门工作只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争斗这三件大事，除此只有吃饭睡觉，至多只能闲暇无事时做几句孙文主义三民主义的颂圣文”①。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右派理论之最后完成，因此，当它一出笼，就立即遭到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批判。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125页。

《向导》和《中国青年》发表了大量文章，从政治、组织和思想等各个方面对它进行了批判，这里主要介绍对戴季陶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批判。

（二）批判戴季陶反对以唯物史观指导国民革命的谬论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指导地位。戴季陶从他们反动立场上也感到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具有丰富的革命性，“应用唯物史观，说明社会革命，很容易使劳动阶级的人，生出革命的觉悟来”，“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哲学的地位”①。这当然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攻击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②又说：“我们今天在国民革命进程中，为农民工人而奋斗，绝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一个国民革命，绝不是革命者所应取的途径。”他用民生哲学来对抗唯物史观，把民生哲学规定为“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他攻击共产党人，“放着可以解决我们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理论，去固执一个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理论”，“是害了空想病”③。戴季陶的这些言论，反映了民主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争夺革命指导思想上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一部分。

针对戴季陶的上述谬论，陈独秀指出：戴季陶“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④但陈独秀没有作出进

①②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608—609页。

③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584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86页。

一步的分析批判。恽代英则专门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他指出：戴季陶反对唯物史观的言论表明：一是他不了解唯物史观为何物；二是他不明白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三是他不了解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恽代英说：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方法，马克思运用这种方法"在以往的历史中，去觅出了一切社会变迁演化之根本的原则，乃是由于人类生活上物质的经济条件之无机而又有序的偶然变化之推移"；人类的历史是一卷阶级斗争的历史；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完全可以由唯物史观加以说明。他明确地说："国民革命托生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并不相反，而且实属必要"，"每个国民党员，都应以唯物史观为最高原则而训练工农阶级去革命"①。当然，恽代英对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关系的解释并不完全正确。如，他说："孙文主义便是完全由唯物史观出发的"。这表明当时的共产党人还不能正确地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区别，不能全面地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同异，不能将作为民主革命行动纲领的三民主义同作为研究问题、研究学问的科学世界观的共产主义加以区别。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才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作了全面的精辟的分析，彻底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收起共产主义"的反动叫嚣。

（三）批驳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

陈独秀和其他批判者都指出：共产党人同戴季陶派争论的中心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戴季陶在理论上的根本错误是反对阶级斗争。戴季陶认为，既然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因此，不应该提倡阶级斗争，而应该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他攻击共产

① 恽代英：《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中国青年》第95期，1925年9月14日。

党人制造阶级斗争，破坏革命。唯物史观主张用阶级斗争来改造社会，所以他认为共产党"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唯物史观不适用于指导国民革命。

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的武器是中国古代的抽象人性论。他鼓吹："仁爱"是中国固有道德的基础，"仁爱是人类的生活"。根据这种"仁爱"的理论，他对阶级的存在作了错误的解释。他说："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两阶级的对立不很清楚，因此不能取革命方式。在他看来，由于人们对"仁爱"这种人类本性的觉悟与否、才造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他说："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革命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而是"一方面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而革命"，"一方面是要被治者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①。

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时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并不是人们提倡起来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过正确地解释这一事实。他们还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实说明中国现代社会已经有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们集中批判戴季陶的所谓地主资本家能以"仁爱"之心为工农而革命的说教。陈独秀指出：戴季陶的这种说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斗争的政党，如何采用这种幻想的策略？'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

①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601、603页。

实际利害的冲突问题，那么……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斗争都用不着”①。瞿秋白也指出：戴季陶的谬论，“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教；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工农群众自己有革命的觉悟。”②他说明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进行阶级斗争，而且只有这样，国民革命才能成功。他还戳穿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虚伪性：戴季陶虽然在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

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的另一个理由是：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相冲突，阶级斗争破坏了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他攻击共产党只讲阶级斗争，不承认民族和国家的需要，是害了“空想病”。他自称：“我的心目中只有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③。针对这种谬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说明了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的关系。陈独秀说：“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可是若因为要实行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他进一步指出：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89页。

② 《瞿秋白选集》第182页。

③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590页。

“在形式逻辑上看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界上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①接着他分析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指出：中国革命的事实证明，工农阶级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的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能有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②。瞿秋白也指出：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所以，国民革命本身就是世界的阶级斗争，在这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也不能不包含着对内的阶级斗争。他说明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是相一致的，中国革命的事实证明，“工农的阶级斗争的力量愈高，国民革命运动也愈快。国民革命中有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工农阶级的斗争足以发展国民革命也是事实。”③恽代英也说：“被压迫者越能阶级斗争，越易养成国民革命的觉悟与力量，而且能防止上层阶级的妥协性，阶级斗争越厉害，国民革命的空气越浓厚”，“所以阶级斗争并不是破坏国民革命，实所以促成国民革命”。同时，恽代英还指出，国民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是有一定“限制”的，工农阶级不能完全得解放，还不好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④。

以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其目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86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87页。

③ 《瞿秋白选集》第190—191页。

④ 《恽代英文集》（下），第837—838页。

的是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当时的许多批判文章都指出，这纯粹是一种幻想。陈独秀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很难发展，因此“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①。毛泽东也指出：戴季陶派“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的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②

（四）批判戴季陶唯心论的道统说

戴季陶为了阉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精神，便极力把它说成“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是“二千多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他认为，三民主义要以中国固有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他把孙中山说成是“孔子以后第一个继往开来的大圣”。他大肆宣扬，中国民族要复兴，必须要复兴中国固有道德文化，他甚至说：“要求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设在这一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真正的平和，而文明的进化，也才有真实的意义”③。戴季陶的这些言论表明：中国资产阶级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除了搬运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之外，不得不求助于中国的封建旧文化旧道德。

瞿秋白在批判戴季陶主义时首先批判的是唯心论的道统说。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8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5页。

③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600页。

他指出："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特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是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作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①他又说："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②唯物史观完全可以根据中国的现状对三民主义作出明确的解释，而"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③。

戴季陶认为，不相信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便不能创造文化，便没有民族自信力，而民族自信力又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对此，恽代英驳斥说：为什么不象戴先生一样赞美中国文化，便是认中国"一切"是毫无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呢？为甚么那样便是一定会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不能创造文化？他指出，无论对于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都应加以分析，对反科学的文化均要加以排斥，中国文化和别的文化一样有价值，有存在的意义。他还说："我们不应拿一国的文化来决定他的命运，这样才不至于因赞美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国化的留学生），亦不至于因鄙夷人家的文化而公然自认有任意蹂躏宰割的权利（如一般人对蒙、藏、苗的观念），更用不着因不愿屈服于人家而虚骄恃气将自己的文化高举起来"④。他还指出，戴季陶所说的中国固有文化，不过是中国少数圣哲的伦理

①②③ 《瞿秋白选集》第181、186页。

④ 《恽代英文集》（下），第703页。

思想，并非是全中国人所共有的。他揭露说：戴季陶主义完全抛弃了孙中山的平等思想和革命思想，“使中山主义改良化、宗教化”，“戴先生怕革命，把孙先生比做孔子，所以亦便把孙先生等思想化为空想”。戴季陶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山主义完全被反动派利用”①。陈独秀也说：戴季陶“想用旧的道德文化救国”，“想把中山先生从被人轻侮的革命党方面抬到尊敬的圣贤方面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这与反动军阀企图用中国封建的旧道德旧文化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反对中国革命如同一辙②。

在1925——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掀起了一个批判戴季陶主义的高潮，宣传了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但是，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犯有右倾错误。因此，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着重于理论方面，而对国民党右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进攻，则采取退让的方针。此外，对戴季陶歪曲、篡改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也没有进行充分的揭露，对戴季陶主义的哲学——民生哲学也未能作出深刻的分析批判，这反映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还不成熟。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缺乏深刻的理解与把握，这是一个明显的不足，但亦有一个明显的优点，这就是他们将学得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切实用以指导中国革

① 《恽代英文集》（下），第756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114页。

命，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适合中国特点的理论和策略。这表明，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 一、中国国情的最初分析，民主革命纲领的制订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还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因此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基本上是照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照抄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纲领。“一大”党纲规定：“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那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认为，中国虽然经济落后，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实行社会主义。这种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时是十分自然的。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了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朝鲜等国后，这些国家内部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最主要敌人。这次大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列宁及第三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制订适合中国社会的革命纲领。

1922年6月，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首次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他指出：中国的经济状况可分为三种，内地乡村的家庭工业，城市的手工业，沿海沿江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军阀的扰乱，农业和手工业遭到破产，新的工商业不能发展。他将中国的政治也分为三种：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政治、财政、海关、铁路等权操诸外人之手，中国是个半殖民地，不能称为独立

的国家；国内军阀的扰乱，战祸遍于全国，工商业莫由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基于这种分析，他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①他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倾覆封建军阀是使中国成为真正统一的、独立的国家的唯一办法。陈独秀这一分析的主要缺点是：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深入分析；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不了解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

第一，宣言把中国放在当时整个世界形势中加以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宰割。宣言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事实上已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们的殖民地，"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既有"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的权利，"互竞侵略"的一面；又有互相合作，"协同侵略"的一面。这种又争夺又合作的情况，形成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宣言正确指出：现今世界政治正发生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合日趋密切，这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会把世界资本主义推入自己掘成的坟墓。中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一定要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这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唯一道路。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85页。

第二，宣言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与阶级关系，宣言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虽然宣言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不够全面，但它从总体上指出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宣言正确地说明了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直接造成或加剧中国军阀的混战，造成中国长期的不统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内乱的根源。因此，"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行统一的"。国家的真正统一和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

宣言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欧美商品不能顾及中国，日本商品又遭抵制之际，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但帝国主义和军阀总是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使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主义奋斗，1919年的排日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就是这种表现。

宣言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等，以致生活日趋穷困和痛苦。占农民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贫苦农民，为了除去自己的痛苦，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宣言认为"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宣言指出：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等小资产阶级，在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和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他们痛恨帝国主义，势必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

最后，宣言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伟大的势力，他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宣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十分简略的，也是不深刻、不全面的。宣言没有分析地主阶级，更没有指出它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这反映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能从社会经济结构上深刻认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如此，宣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必须肯定其价值。

第三，宣言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宣言说：“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极有意义的。”宣言提出的党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立统一的真正民主共和国等七项，这就是最低纲领。宣言还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即奋斗的最终目的：“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宣言未能正确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宣言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不是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最后，宣言号召工人和贫农快聚集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奋斗，全体被压迫的民众同工人和贫农一起共同奋斗，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作出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制订了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其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然而，大会没有能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认识到农村的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社会基础，因而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大会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大会只是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应成为这一革命的领导者。“二大”是在陈独秀主持下召开的。“二大”的宣言最初是由陈独秀起草的，“二大”的功绩与不足都是与陈独秀不可分的。

## 二、民主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运动的实践中，继续探索中国如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问题，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 （一）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过程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民主革命成败的关键。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较弱，中国共产党人数甚少，到1923年6月召开党的“三大”时，只有党员420人，到1925年1月召开党的“四大”时，也还只有党员994人；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历史较长，影响甚大，孙中山本人则是公认的革命领袖。这种情况使得列宁和共产国际更多注意孙中山和国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注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1922年1月，

列宁在会见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时，一开始谈的就是国共合作问题。1923年 1 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主张国共合作。这个决议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对促成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但决议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决议说："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显然，按照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估计，决不会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本来，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印象并不佳，当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遭到党内多数人的反对。1922年 4 月 6 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东方局吴廷康的信中，陈述了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理由，对国民党微词甚多。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同意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1923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这之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人对工人运动表示悲观、怀疑。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下，陈独秀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由重视工人阶级转变为重视资产阶级，由重视共产党转变为重视国民党。陈独秀的这种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 4 月25日）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 1 日）两篇文章里及在1923年 6 月召开的党的"三大"上的讲话中。

陈独秀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可分为三部分：（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势力，因此，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资产阶级。(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经

营的工商业规模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政治上的直接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在党的历史上，陈独秀首次将资产阶级区分官僚资产阶级与一般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把官僚资产阶级看作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这是十分正确的。他认为一般工商业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军阀，参加革命的一面，这也是对的。但他没有看到这部分赞成革命的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对革命动摇、妥协和不彻底的一面。他把小工商家看作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这也不对。其实，这部分人的革命性要强于工商业资产阶级。

陈独秀对中国无产阶级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他在党的"三大"上的讲话中简直把工人阶级咒骂得不成样子，什么"宗法思想啊！""不脱离神权帝王迷信啊！"没有国家觉悟啊！①他赞成"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他的这种极端错误的看法遭到不少代表的批评，但他并没有改正。他在"三大"以后的文章中继续说："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大多数工人"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族地方观念非常之重"，"不感政治需要"；只有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真有阶级觉悟的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所以，他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分子而不是独立革命势力"②。

基于上述分析，陈独秀得出了这样的公式："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

① 参见《蔡和森文集》第806—807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68页。

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①在陈独秀看来，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这个革命理所当然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的成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是获得若干自由及发展自己的机会，无产阶级只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论”。陈独秀在党的“二大”以后，大力宣传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宣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其积极意义必须加以肯定。但他从不讲无产阶级应去领导这一革命，正是理论上的这种错误导致他往后在政治上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陈独秀的上述错误言论受到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抵制和批评。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新青年〉之新宣言》（5月）、《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9月23日）等文章中，从正面论说了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正革命，乃有独立劳动阶级方能担负起此等伟大革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有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②与陈独秀的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幼稚的谬论相对立，他认为中国的劳动阶级固然因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特殊而尚弱，“然而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③。他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思想。他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59页。

②③ 《瞿秋白选编》第2、52页。

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①。当然，瞿秋白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论述，主要还是从一般性的理论上加以说明，他在某些方面还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如，他也说过，中国的“无产阶级很少很幼稚，大半不脱宗法社会思想的遗毒”②。他有时亦把“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归结为“参与并促国民革命”，把国民党看成是国民运动的中心③。

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公开地、旗帜鲜明地、并且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批评陈独秀的是邓中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邓中夏就研究劳动问题，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他是当时主要负责者之一，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他任书记部主任。他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他在《论工人运动》一文中明确地说：“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中国欲图革命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是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④又说：“不幸京汉路失败以后，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了信心与毅力了”⑤。他大声疾呼：“我们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的使命的社会运动家！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他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⑥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针对陈独秀说的，十分尖锐、中肯。

①②③ 《瞿秋白选编》第85、86、52页。

④⑤ 《邓中夏文集》第42、43页。

⑥ 《邓中夏文集》第44页。

针对陈独秀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幼稚的谬论，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产生、发展的过程。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是随着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之后，新式工业日益发达而成长壮大的，帝国主义虽不能容忍中国工业的发展，“然而为投货、投资，掠夺富源，又不得不使中国建立相当的工业”。随着三、四十年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组成一个雄厚而伟大的队伍，掉转头来便向帝国举行‘背叛’，举行反攻”①。接着他通过调查、考订，认为中国有产业工人一百八十余万，并详细列举了在各部门的分布。他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孳长的”，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在客观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②。陈独秀不懂得中国无产阶级形成发展的特点，因而得出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幼稚的错误结论。针对陈独秀的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数量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的谬论，邓中夏详细分析了铁路、海运、矿工等部门和湖南、武汉、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工人组织情形。他还以1922年 9 月至12月的四十一次罢工为例，说明“无产阶级的觉悟，是由它被压迫掠夺的地位反应出来的，它的觉悟程度是随它的反抗的争斗之经验而发展的，断乎不能因其有宗法社会心理而能阻止它的觉悟。”③所以，陈独秀以无产阶级还有宗法社会心理而断定它的质量幼稚是不对的。邓中夏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他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比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

①② 《邓中夏文集》第90、99页。

③ 《邓中夏文集》第100—101页。

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①又说：“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②邓中夏的上述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敢于公开起来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的错误言论，是值得称赞的，因为这需要有足够的勇气。邓中夏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一面估计不足。正因为如此，他没有看到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四大”，大会总结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四大”以后，特别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后，党内不少人宣传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其中瞿秋白尤为突出。他在《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导权》、《国民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文章中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和领导地位。他指出：随着革命运动之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日益尖锐，“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革命里的领袖地位之必要，是何等的明显呀”！③

### （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哲学思想

从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到“四大”，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虽然是在不断前进，但直到1925年第一次大革命爆发，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还未形成。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集中了党内正确意见，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

①② 《邓中夏文集》第101、102页。

③ 《瞿秋白选集》第234页。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以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的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1925年起从事农民运动。正因为他既从事过工人运动，又从事过农民运动，并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所以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要比起仅从事工人运动，或仅从事农民运动，或仅是在中央工作过的同志要全面而深刻。从客观上来讲，如果说在五卅运动之前，中国社会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表现得还不十分明显，那末在五卅运动中，在大革命的风暴时期，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及趋向则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更加尖锐化、明朗化，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客观条件业已成熟。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集中表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中。现在先介绍第一篇文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首次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机关刊《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之后又转载于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2期和1926年3月1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在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著者又作了修改和部分增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

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大概的分析。”①很明显，这是一篇为解决中国革命战略策略而作的政治文献，而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但是，这篇文章鲜明地体现了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篇文章的哲学意义在于：

第一，始终贯彻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原理。它指出：由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对现代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的种种不同态度。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②。因此，这些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尤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文章指出：这个阶级欲望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而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因此，他们对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时，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发展感觉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这是一个动摇的、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文章指出：这个阶级的右翼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有较多经济关系。因此当革命斗争加紧时，很快地向右跑入反革命派。这个阶级的左翼，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系较少，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页。

或没有联系。因此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对“赤化”时时怀着恐慌，故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文章认为，中产阶级“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这样，毛泽东从经济地位上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与妥协性的两重性。这种分析比起陈独秀将资产阶级简单地分为“反革命”、“非革命”、“倾向革命”三部分，要深刻得多，辩证得多。文章还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建立自己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的主张是完全行不通的，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个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革命的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①

关于无产阶级，文章指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五种产业，而大多数在外资奴役之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这是四年以来罢工运动所证明了的。“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的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②1951年，作者将工业无产阶级“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修改为“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更鲜明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毛泽东在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前后的其他文章有所表述。他在1925年11月填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如果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从字面上看，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还不大明显的话，那么他在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就说得很明确了，此文虽然主要是说明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但他并没有忽视无产阶级，文中明确说：“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表明：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对社会阶级的分析，不仅应分析其经济地位，而且还须分析由其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政治态度、意识形态。

第二，注重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分析，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分析上。

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和小知识阶层。文章首先指出自耕农和小工业主的总的特点，他们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经济。然后将小资产阶级分为三个不同部分，并具体加以分析。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总想爬上中产阶级的地位。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这种人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的。这部分人受帝国主义、军阀、封建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有反对他们的一面，但又怀疑革命能否成功，因此不肯贸然参加，取中立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种人为生活所迫，在精神上感觉痛苦很大，在革命运动中颇为要紧，是推进革命的力量，是属小资产阶级的左翼。

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的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文章指出：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然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但是优于贫农，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受地主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故其革命性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另一部分是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

对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作过，但象毛泽东这样细致地分析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内部的不同阶层，则是前人和同时代人所没有的，毛泽东的这种分析，不仅为制定党的正确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第三，注意从发展变化中分析阶级。一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是相对稳定的，但一个阶级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则是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而会发生变化的。因此，不能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毛泽东指出：中产阶级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他们或他们的一部分（右翼）一定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成为我们的敌人。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完全为1927年的事变所证实。他还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在平时与革命高潮时对革命的态度是变化的。在平时，小资产阶级的右翼对革命取怀疑的态度，小资产阶级的中派则取中立的态度，但到了革命高潮时，不但小资产阶级左翼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

只得附和着革命。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各地的农民运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在注意阶级性质的分析的同时，注意阶级数量的分析。要正确地估量阶级关系，正确地制定政策，除了必须正确地分析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外，还应注意分析阶级的人数，即是说不仅要对阶级作质的分析，而且还要作量的分析。文章原稿一开始就将各阶级的“大略人数”与“经济地位”、“阶级性”、“对于革命的态度”一起作为分析阶级的内容。文中对各阶级、阶层的人数作了大略的统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约占人口的四百分之一；中产阶级，四百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小资产阶级，右翼为一千五百万人，中间派为七千五百万人，左翼为六千五百万人，总数为一万万五千万人；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为五千万人，半益农为六千万人；贫农为六千万人，手工业工人为二千四百万人，店员为五百万人，小贩为一百万人，总共为二万万人；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为二百万人，都市苦力为三百万人，农业无产阶级（雇农）为二千万人，游民无产阶级为二千万人，总共四千五百万人。文章最后说：我们的真正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这种分析对处于同强大敌人斗争中的中国人民来讲无疑是一种鼓励。因为中国无精确的可靠的统计资料，所以文中列举的数字只能是大略的，其中无疑会有不准确的地方。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作者在将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删去了对各阶级的数量分析。

第五，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文章先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大略人数及其对革命的态度逐一进行分析。但分析并不是目的，分析并不能形成具体的完整的认识，因此，

文章最后加以科学的综合，显现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的总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文章在结尾部分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的范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同时期其他人的同类文章相比，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为完整、系统而正确，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它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公式出发，而完全是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因而丝毫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式化的痕迹。它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作。它虽然是一篇政治论文，但又渗透着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当然，在原稿中某些用语、提法并不确切，如将农村的大地主看成是大资产阶级，中小地主看成是中产阶级。但这些不足并不能掩盖住它的真理的光辉。

## 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 （一）农民问题的探索过程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正确把握有一个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成立时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工人运动。但中国是个农业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因此，在中

国共产党内也有一部分人较早地注意到农民问题。1921年7月1日出版的《共产党》第3号上发表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就是证明，该文的第一页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没收了，因此不知作者是谁。文章以事实说明，农村中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之间尖锐的阶级对立，揭露了地主对贫苦农民剥削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号召农民自己动手，夺回土地。文章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占重要位置的。”文章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到农民中去做革命工作的任务。

在1921年至1923年浙江的肖山、广东的海陆丰、江西的萍乡、山东的青岛、湖南的衡山等地均发生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斗争，其中以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最为著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1923年也注意农民问题的研究，他在1923年7月1日出版的《前锋》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农民问题》的长篇文章。他在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多数，其国民之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农民的力量。”又说：广大农民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可能的国民运动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① 他将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分为十等：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属不耕作之地主；自耕农民兼地主、自耕农民兼雇主，属中产阶级；自耕农民、自耕农兼佃农，属小有产阶级；佃农兼雇主、佃农，属半无产阶级；雇工，属农业的无产阶级。陈独秀对这十等人的经济状况作了简要的分析，详细地指出了一般农民、佃农及雇农之痛苦。文章最后说：为了解除农民的痛苦，应引导农民加入国民运动。这篇文章列举了许多数字以说明农民的各种状况。邓中夏虽然激烈地批评陈独秀对工人阶级的错误分析，但却十分赞扬他对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12页。

农民的分析，认为陈独秀的文章是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很正确”的一篇文章①。

1924年国共合作后，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到1925年4月底，广东全省已有二十二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入会农民达二十一万多人。同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大”，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五卅”运动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制定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纲领，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1926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进一步论证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主干”。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大大前进了。

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时期，李大钊、瞿秋白等也发表文章，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等文章中，以大量的统计资料和调查材料说明中国今日农民之破产趋势，论证“耕地农有”是广大贫农所急切的口号。他热情地肯定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农民自发武装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地主的斗争的正义性和革命性，同时他也指出了他们的弱点和幼稚性。他号召革命者应到农村中去开发、教育、引导农民，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等文章里较多地从理论上说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生存的经济基础。“所以国民革命必须是革地主买办的命，就是掘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命根——他们的经济基础”②，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获得农

① 《邓中夏文集》第53页。

② 《瞿秋白选集》第300页。

民的支持。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讲演，论说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性质、革命的军队问题、农民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等。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决议案》指出：土地问题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持坚决态度，并给予彻底回答的那个阶级，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针对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日益严重的错误，瞿秋白根据斯大林的讲演和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论述了“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他说：“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①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害怕农民运动的发展会破坏统一战线，从而压制农民运动。对此，瞿秋白指出：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天职。他提出，为了使革命获得更广的民众，应“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②。

###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基本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内，真正根据中国实际解决农民问题的是毛泽东。他从1925年起就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他领导和发动了湖南农民运动，1926年5月，他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年4月，又在武昌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最著名的农民运动的领袖。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全国出现了一个以湖南省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的高潮。到1927年3月底，农民协会的组织已遍及广

① 《瞿秋白选集》第350页。

② 《瞿秋白选集》第354页。

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河北等十七省，加入农会的农民达八百万。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农民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大为恐慌。他们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叫嚷农民运动“糟得很”。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但不起来积极地支持、领导农民运动，反而为反动派的攻击和咒骂所吓倒，跟着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左倾”，提出种种条件，限制农民斗争，采取错误的处置，打击和压制农民运动。

为了驳斥社会上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污蔑，批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纠正对农民运动各种错误处置，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的湘潭、湘乡、长沙等五个县，进行了实地的考察。他于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写了简要的考察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在指导农民运动方面所犯的错误。3月，公开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考察报告曾先后在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周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和《湖南民报》上刊登过。4月初，瞿秋白又在汉口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苏联出版的俄文《革命东方》杂志1927年第2期和英文的《共产国际》杂志（1927年6月25日）及时译登了考察报告的部分内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

第一，充分论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如前所述，在毛泽东之前和同时，党内曾有同志一

般地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他们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指农业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极大），很少是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上加以说明的。因此，他们还没有能真正理解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是解决土地问题，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根据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和对农村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则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的相互关系上来论证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他在1926年1月1日发表在《中国农民》第1期上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说："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发生的最后根源。"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他一开头就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革命党里的许多人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一道理，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接着分析说："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土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实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半殖民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打倒乡村封建阶级，岂非不知轻重本末。"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攻击，毛泽东在考察报告中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势力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页。

广大农民起来造反，打倒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势力，乃是起来完成他们自己的历史使命。农民起来革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完成了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农民的举动，决不是什么"糟得很"，而是"好得很"①。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其工作中心一直在城市，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因此，党内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不多。基于对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了解农民，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斗争；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这里毛泽东虽然还没有能提出党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但他已明确地提出了党在从事城市斗争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斗争。

第二，提出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在当时，虽然不少人对农民进行过分析，但大多是从租佃关系上区分农民，将农民区分为佃农、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半自耕农等。这种分析虽然能将地主与一般农民区别开来，却很难解决无产阶级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因为在佃农、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中有着贫农、中农、富农的阶级区别。陈独秀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更是反对对农村进行阶级分析。议决案认为："农村中阶级关系极复杂，故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抗军阀政府苛税勒捐'这一口号。"根据农村各阶级在实际斗争中的表现，毛泽东在考察报告里指出，并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

是全体农民都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他从阶级关系上将农民区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富农对革命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农会势力盛时，中农方加入农会，对中农应持争取的态度，“农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是贫农”。贫农中很多人“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七十。他们最听共产党的话，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他们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急先锋，成就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毛泽东强调指出：“这个贫民领导，是非常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① 这里，毛泽东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将农村中的“革命先锋”污蔑为“痞子”的反革命议论，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而且正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农村中必须实行依靠贫农、团结和争取中农、中立富农的阶级路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是正确解决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的第一个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自然是同他亲自领导农民运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密切相关的。

第三，正确地论述了农民斗争的特点和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政权问题已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如果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在农村（包括中小县城）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政权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陈独秀等人固执“二次革命论”，在政权问题上患幼稚病。他们不仅不去积极领导工农阶级夺取政权，反而反对建立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政权。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相反，毛泽东根据农民运动的实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21页。

从农民斗争特点的高度，指出了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必要性。他说："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斗争的运动。内中表现得特别的尤在政治斗争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得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实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特色。"①在考察报告里，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②。因此，农民组织起来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的权力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③他坚决主张农民应彻底打碎旧的政权机关，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实行农民的革命专政。他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④在革命时期，农民若不建立起绝对的权力，实行革命的专政，便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他说：一般人所谓农会"过分"的举动，完全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在革命时期是十分必要的。

考察报告专门论述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问

①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册，1926年9月1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20页。

题。根据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指出：可以从两方面建设农民武装，一是夺取地主手中的旧武装，将它置于农民政权机关之下，二是建立新的梭镖队。他认为，这种梭镖队，虽然武器落后，但数量可观，可以普及于青壮年农民，“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①。陈独秀等人虽然承认农民要求武装自己是必要的，但又作了种种限制：“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陈独秀等人害怕农民武装会引起各方面的冲突和纠纷。对此，毛泽东说：若被农民武装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看了害怕，决不应限制它的发展。

第四，宣传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的思想。考察报告一开头就尖锐地提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②在伟大的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幼稚的、过火的行动。农会中会混人少数不良分子，但这不是农民运动主流，而是支流。党内有些人却片面夸大农民运动中的某些不足和“左”的行动，指责农民运动，甚至反对农民运动，从而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与此相反，毛泽东则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高度，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功勋，歌颂了农民群众的伟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页。

创造力，愤怒地批驳了社会上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批评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错误态度。考察报告总结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有力地证明农民运动“好得很”。考察报告总结了运动的实际经验，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和政策。这里应说明的是：毛泽东在1927年 2 月16日写给中央的报告里已指出，农民问题实质是一个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实行的问题。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已有不同意立即解决土地问题的决定，为了不违背中央的决定，所以毛泽东在公开的考察报告中没有论及土地革命。

考察报告还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泽东指出，即使很革命的人，听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议论，也不作调查，“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就气馁起来，没法否认“糟”字。但你若是一个确定革命观点的人，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你就必定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毛泽东通过实地考察，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做农运工作的同志开调查会，得到的许多材料，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就能使革命党人的思想比较地符合实际，少犯错误。

如何对待群众，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这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试金石，也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重要对立之点。整个考察报告贯串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积极领导群众的伟大思想。考察报告并不否认农民运动中存在着缺点，认为应当积极地领导群众，让群众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自己起来整顿组织，去掉某些不良分子。由于整个考察报告是为了回击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污蔑，是为了回答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对农民运动的指责，因而报告在为

农民革命辩护的同时，没有能指出农民运动中确也存在着某些“左”的、“过火”的行动。

瞿秋白在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写的序中指出：真正能解放中国的是农民。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①。虽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阐述的理论和主张并未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采纳，但它为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作了理论准备。

## 四、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哲学根源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这是导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出现除了客观的原因（如：党的年幼，缺乏经验，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导）之外，还有着深刻哲学的根源。

第一，对社会发展一般秩序的机械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秩序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陈独秀对这社会发展的秩序，作了机械的理解。他反复说：社会历史的进化，“是由游牧酋长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这种“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②。他不了解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历史的新特点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点，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是资产阶级的胜利”③。只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无产阶级到足够强大的时候，才进行社会主

① 《瞿秋白选集》第346页。

②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54、258—259、362、367、371页。

义革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前后形成了“二次革命论”。这一理论成了他后来右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最主要的理论支柱。

诚然，在1923年以后，陈独秀的思想也有所变化。他在不少文章里也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出来”①，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决不能始终忠于国民革命，决没有由他们之手实现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可能”。他甚至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②这些话好象是对他原来的“二次革命论”的一种批判。但在实际上，由于他对社会发展秩序的机械理解，他并没有抛弃“二次革命论”。在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他反对共产党夺取政权。他的理由是：“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社会”③。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从未想过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应领导工农和其他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他在1926年9月20日所作的《中央局报告》中说：“我们应该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善良的忠告他们（国民党）”。在同年的12月5日的《中央局报告》中又说：“我们的党正是一个在野党，处处要立在民众方面工作，不可即有对于政权的尝试。我们同志不能加入政府组织。”确实，陈独秀始终只是以在野党领导人的身份向国民党提出种种劝说、忠告，而不去独立自主地武装工农，领导工农运动，建立革命政权，把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

---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87页。

②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409—410、263—264页。

第二，对群众极端错误的看法。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陈独秀的哲学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把群众看成消极的群氓。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民简直是愚昧无知，好利无耻，奴性十足，毫无抵抗力，其道德退化，堕落到一般国民的水平线下。“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①。他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建党前后，他比较重视工人阶级，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但他原有的群众落后论的错误思想并没有彻底抛弃，不时有所流露。他在有的文章中公然说：“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②。在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他的群众落后论表现得尤为明显。如蔡和森所说：“陈独秀经常乐于从缺点方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举许许多多的琐细事实来形容中国工人阶级之‘穷极丑陋’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③。他对农民也往往将“散漫”，“文化低下”，“保守”，“畏难苟安”等消极面看得过重，对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性估计不足。他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还说：工农群众“在思想上尚未脱离封建社会的束缚”。正因为如此，正当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时候，他不能区分运动的主流与支流，认为“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损失”。他不是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积极地领导农民运动，而是站在它的后面，指责它“过火”了，提出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瞿秋白在1927年2月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含有蔑视群众畏惧群众之心理，抑制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32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32页。

③ 《蔡和森文集》第806—807页。

实际斗争中之自动创造力，利用落后分子之盲从。”①

总之，不相信群众，看不到人民群众在革命时期所迸发出来的伟大历史创造力和首创精神，以贵族老爷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思想根源。

第三，思想上的公式化和主观主义。

陈独秀在批评无政府主义时，反对“一时无组织的暴动”。这无疑有合理性，但他对暴动的理解未免有书生气。他说：“要达到革命之目的，只有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科学的暴动。这种科学的暴动，决不是一时的冲动，乃建设在长时间无数的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运动上面，也只有这些前前后后大大小小无数的民众运动中，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得到无数的新教育新经验新人才，才能去掉许多恶因，才能产生许多有用的好人，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有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必须如此，才能使复杂的社会组织现出一度变更，这种暴动这种革命才是科学的”②。彭述之更将革命公式化，认为革命必须有三阶段：一是宣传，即宣传群众，二是组织与训练，三是暴动。只有按照这种“步骤”和“策略”去做，革命“才有胜利之可能”③。正是依照这种公式，他们反对北伐。瞿秋白指出：这是一种“书生式的革命观”。“‘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暴动’死公式，好象画着图样造房子似的，他们（彭述之主义派）认为不是如此纯粹‘特别改良’西洋式的革命，便不算革命，而只是‘畸形混沌’的中国货。……他们都以教师面孔对人，开会有一定公式……睡觉有一定姿势，上毛厕有一定步骤。如果人家不大懂得他们‘所教的

① 《瞿秋白选集》第339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36页。

③ 彭述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民党之军事行动》，《向导》第85期；《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170期。

书'，他们便说：你不懂科学的革命方法，你是反革命"①。瞿秋白的这一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公式主义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之一。

如前所述，陈独秀正确地宣传过马克思的两大精神，要求研究中国实际。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却一直浮在上面，没有深入到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去。他长期住在上海，远离当时革命的中心地区。这就使得他不能及时了解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认识客观实际的本质，从而往往主观主义地指导革命。如周恩来所说：北伐之前，陈独秀"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②。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错误态度，如毛泽东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的，其认识论根源在于不肯到农村作调查，屈服于"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压力。

陈独秀在思想方法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形而上学片面性。这突出表现在他不懂得统一战线内部联合和斗争的辩证关系。应当承认，陈独秀也清楚地看到作为统一战线形式的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左、中、右三派的矛盾和斗争。他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蒋介石在北伐中有军事野心。但为了拉住蒋介石，他不仅不去揭露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反而公开给蒋的脸上贴金，说什么"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一个柱石"③，"蒋君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④。他甚至恭维蒋介石说："事实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⑤。在陈独秀看来，只有妥

①　《瞿秋白选集》第333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第124页。

③④⑤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144、158、227页。

协、退让才能保持联合，斗争是会破坏联合的。他不懂得以斗争求联合，则联合存，以退让求联合，则联合亡的道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根本特点。其结果，正如他在1927年6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牵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蒋介石）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①

五四时期，陈独秀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专制和迷信。但他本人并没有同封建传统彻底决裂。中国封建社会家长制的余毒在他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在党的幼年时期，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和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再加上党内尚未建立起健全的民主集中制，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许多政策往往取决于他个人。久而久之，便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形成了他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从1923年6月党的"三大"以后，党内就有人以"家长"来称呼陈独秀。家长制的作风必然造成思想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导致政治策略上犯错误。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是党的幼年时期。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也不可避免地受着这种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在不少方面是比较肤浅的，不完整的。他的哲学思想中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严重的缺陷和不足。这是导致他在政治上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陈独秀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因为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犯有严重的错误，就否认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否认他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事实上，在党的幼年时期，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唯物史观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要超过当时的任何一个人。他的有些文章被青年誉为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最好入门书。他和李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418页。

大钊被当时的革命者称为“唯物史观派的巨子”，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①。1927年2月，瞿秋白尽管已激烈地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他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仍充分肯定陈独秀在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功绩，承认他自己从1923年回国之后，“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从事革命工作②。《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多次说到：“中国研究马克思及辩证唯物（论）的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其中“尤以陈氏的影响为大”③。这些评价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总之，我们固然可以指摘陈独秀的哲学思想中的种种幼稚、缺陷和不足。但他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最主要代表者，他的思想毕竟也有闪耀着光彩的地方。在1927年以后，陈独秀离开了中国革命，因而他对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思想的发展已无多大影响。

## 简短的结论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早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人热情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武器。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和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是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因为是早期，所以中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理论还是比较幼稚，他们有关唯物史观的文章和著作，多数带有明显的译介的性质。

①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月24日。

② 《瞿秋白选集》第310—311页。

③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版，第380、384、385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的传播遇到了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抵抗。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陈独秀、瞿秋白批判了张君劢的唯意志论、胡适的实验主义和丁文江的马赫主义，为科学地解决人生观问题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了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主义，马克思主义同这两个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在国民革命中要不要进行阶级斗争，其实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国民革命，还是用国家主义或戴季陶主义指导国民革命。通过批判，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开始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分析中国社会的情况，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然而这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终究是幼年的党，对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懂得不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缺乏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而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断送了革命。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理论和行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正确主张，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经验，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两篇文章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最大理论收获。它们虽然没有为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统治的中央所接受，但却为中国革命进人新的阶段作了理论准备。它们虽是政治文献，但又鲜明地贯串着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相信群众和向群众学习等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了准备。它们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

（1927年——1937年）

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称土地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时期。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充满着十分复杂、曲折的矛盾斗争和极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独立发动和领导了革命的武装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革命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但在30年代前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进行军事和文化“围剿”，特别是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革命又从发展转向挫折和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英勇斗争，前仆后继，付出了血的代价，经受了考验和锻炼，积累了异常丰富而沉痛的经验教训。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从此，中国革命又转危为安，走向新的胜利发展。

这个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

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了革命的需要，广泛深人地宣传、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与此同时，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在中国具体化，作为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逐步地形成、发展和系统化，成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研究和普及

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对进步文化运动实行文化“围剿”。他们颁布各种法令，封闭进步团体，查禁和焚毁进步书刊，迫害进步学者。广大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对着这种法西斯统治，不畏强暴，大量地翻译、研究、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唤起人民群众的觉悟，鼓励着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苏联等国哲学家著作的翻译出版

20年代末，一大批进步的理论工作者先后从国外和国内其他地方辗转集结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上海。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努力从事革命理论的介绍和宣传，呼唤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为其作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介绍宣传革命理论的活动，主要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苏联等国哲学家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采取各种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方面的）著作的翻译出版量达到了空前未有过的程度。

仅以1929年为例，时人称这一年是“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新兴社会科学类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书籍占绝大多数。”①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几年来坊间出版了不少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无论赞成或反对，而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总可以说是一个事实”②。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

192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中文全译本较少，大都是节译或摘译，通常刊登在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1927年以后，开始有较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

1928年3月，林超真（即郑超麟）编译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由上海沪滨书局出版。该书内容包括恩格斯的《原始基督教论》、《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年的出版介绍中这样写道：“这书是恩格斯阐明史的唯物论哲学之唯一巨著，共计十二万言。这样三部巨著的汇印本，现在简直找不出来。现在的译者，费了很大的气力，根据法国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理论家保罗·拉发格的直译本，转译为中文的。译文的流畅明白，是近年来翻译界所罕见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一巨著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读物。”③ 同年11月，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当时译名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一书，由陆一远译出，上海春潮书店出版

① 君素：《一九二九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新思潮》第2—3期合刊，1930年1月。

② 张东荪：《唯物辩证法论战》第135页，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10月。

③ 见《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的封底。

发行。

1929年6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李膺扬（即杨贤江）译，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这是中国自十年前开始译介这部著作以来首次出版的全译本。同年7月，上海中外研究会翻译出版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是该书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同年10月，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①（彭嘉生译，译名为《费尔巴哈论》），由上海南强书店出版。马克思的《哲学之贫困》②（杜竹君译），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1930年2月，李一氓译的《马克思论文选译》，由上海沪滨书局出版。这个选译本以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为代序，收入马克思的《黑格尔权利哲学批判》、《法兰西唯物论》等10篇论文，其中7篇是第一次译成中文。同年3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③（刘曼译，译名为《经济学批判》），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同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论的片断》（向省吾译）一书，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内容有：《费尔巴哈论》（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费尔巴哈论"的拾遗》（即《自然辩证法》的札记和片断）；《唯物史观论》（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译版导言）；《法国唯物论史》（即《神圣家族》第6章）；《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辩证法》

---

① 该书在三十年代还有4种译本出版：（1）1930年4月，向省吾译，译名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末》，上海江南书店出版。（2）1932年5月，杨东莼、宁敦五合译，译名为《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上海昆仑书店出版。（3）1932年11月，青骊汉译，刘易斯英译的英汉合璧本《费尔巴哈论》，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4）1938年，张仲实翻译《费尔巴哈论》，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② 1932年7月，许德珩再译《哲学的贫困》，由北平东亚书店出版发行。

③ 1931年12月，郭沫若再译此书，译名相同，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2年7月再版，1939年5月，郭的译本又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

（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摘译）。程始仁的《辩证法经典》，根据日本河上肇编辑的《马、恩、列三氏关于辩证法的名言》编译而成，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同年7月，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①笛秋、朱铁笙合译），由上海明日书店出版。同年10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②，由陈启修译，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是《资本论》的第一个中译本。同年11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③（吴黎平译），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这是《反杜林论》的第一个全译本。

1932年8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由上海神州国光社首次全文出版。

这样，到193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经典著作都有了较完整的中译本，这就为中国人民直接地较为深入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基本的必要条件。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苏联等国哲学家著作的翻译出版

苏联等国哲学家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在30年代，被大量地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中国人民学习掌握马克思

① 1932年，傅子东再译此书，译名相同，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5年9月再版。1936年6月，傅子东的译本，又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

② 1932年9月，王慎明（王思华）、侯外庐合译《资本论》第1卷的前3篇作为上册，由北平国际学社出版。1932年10月，潘东周译《资本论》第1卷第2篇（第2分册），北平东亚书局出版。1933年1月，潘东周译《资本论》第1卷第4篇（第3分册），北平东亚书局出版。1936年6月，王慎明、侯外庐译完《资本论》第1卷，由上海世界名著译社出版。1938年8—9月，郭大力、王亚南合译《资本论》（1、2、3卷），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资本论》至此出全。

③ 1930年12月，钱铁如再译此书，译名为《反杜林格论》，上海昆仑书店出版。

主义哲学的重要参考书籍。在这类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中，苏联哲学家的著作最多，日本、德国次之。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同时也由于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常常被认为是最正确、最有权威的。1930年前后，普列汉诺夫、德波林、布哈林等人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的较多，影响较大。例如普列汉诺夫著作的中译本有：《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战斗的唯物论》、《近代唯物论史》等。德波林的著作有六部中译本①。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一书，在1930年有4种译本②同时出版。

1932年以后，苏联哲学界理论斗争的新成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科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雷仲坚译）、《新哲学大纲》（米丁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等著，沈志远译）三本著名的哲学教科书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这三本书在当时被视为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为中国哲学界清除德波林等人的错误观点提供了依据和武器，另一方面，又为中国哲学界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

① 这六部中译本分别为：（1）《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林伯修译），1929年4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2）《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林伯修译），1930年3月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3）《伊里奇底辩证法》（任白戈译），1935年5月上海辛垦书店出版；（4）《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张斯伟译），1930年8月上海乐群书店出版；（5）《辩证的唯物论与乌里亚诺夫》（彭苇森译），1933年10月北平新光书店出版；（6）《近代哲学史》（杭一新译），1934年2月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

② 这四种译本分别为：（1）《唯物史观与社会学》（许楚生译），上海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2）《唯物史观大纲》（伊凡、梅根合译），上海经济学会出版；（3）《唯物史观》（陶伯译），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4）《历史的唯物论》（刘伯英译），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内容和模式，国民党统治区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这三本书中的理论观点、体系结构，几乎是全盘接受，照搬过来。这样，就把一些错误的东西，如把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否认形式逻辑的做法，也当作正确的东西接受过来了。这三本哲学教科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后，也流传到了延安，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参考和吸取了其中一些成果和表述方法。

3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十分活跃，著述较多。由于中日两国地理条件的便利和人员往来的频繁，许多著作被介绍到中国来。河上肇是较早在中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哲学家，他的著作《唯物史观研究》、《唯物论的纲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等都有中译本，传播较广。稍后一些的有大森义太郎的《唯物辩证法读本》，德永直、渡边顺的《新哲学纲要》（又名《新哲学讲话》），永田广志的《现代唯物论》等书的翻译出版。这些著作吸取了苏联哲学界理论斗争的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比较通俗简要的介绍，在中国有一定的影响。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地，是一个有着善于理论思维传统的国家。工人出身的哲学家狄慈根，独立地研究各种哲学问题，并且得出了和辩证唯物论极其相似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对他曾给予高度评价。狄慈根的主要哲学著作《辩证法的逻辑》、《辩证法的唯物论》、《新唯物论的认识论》等，都译成中文出版。在这些著作中，作者通俗地阐述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唯物辩证法的规律、范畴。在当时，这几本书被看作是青年自修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入门书。

在当时出版的各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中，阐述和介绍唯物辩证法的占绝大多数，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新特点。它表明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掌握，已由前一时期偏重于唯物史观，忽略唯物辩证法，而开始进入了比较完

整、系统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唯物辩证法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广泛的传播，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主要内容。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感到，进行中国革命，需要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来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才能找到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二是通过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是不全面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① 三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拼命歪曲攻击唯物辩证法，为了识别真假，就必须宣传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

唯物辩证法的广泛传播，使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提供了思想资料，使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推动了中国革命不断地走向胜利。

## 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中的历史作用

30年代初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团体，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一）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立及其纲领

1928年至1929年间，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已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6—347页。

为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势力，所以“一般从事运动的社会科学家，早就感觉到建立统一战线，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扩大运动，对假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施以无情的袭击之必要”①。这里所说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泛指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指的是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为了适应这种客观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统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便进一步领导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运动的深入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于1930年5月20日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组织机构设置和各种活动计划②。“社联”纲领指出：“在中国革命巨浪正在高涨之际，革命理论的研究与发挥，遂成为中国每个进步的社会思想家的切身的任务。‘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句名言，是我们应当牢记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1.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2.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3.严厉地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4.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③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以后，北平、广州、日本东京等地先后成立了分盟。这些分盟和在上海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之间，有的组织上有直接的领导关系，有的则由当地的左翼文化总

①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巴尔底山》旬刊第1卷第5号，1930年5月21日。

②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巴尔底山》旬刊第1卷第5号，1930年5月21日。

③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新地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1日。

同盟领导，但在行动纲领、组织原则、活动内容方面是基本一致的。

（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广泛地开展了各种活动，主要的有：

1.创办刊物。“社联”成员朱镜我、彭康、李铁声、李一氓等人，早在1928年初，就和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合作，先后创办了《文化批判》、《流沙》、《思想》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他们相继发表了许多关于唯物辩证法方面的文章，向中国人民展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才能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需求。因为唯物辩证法是现实世界和社会的本来的发展形态，所以是正确的而有实践性的”①。由此拉开了唯物辩证法空前广泛传播的序幕。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后，更以创办刊物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阵地。先后创办的刊物有《社会科学战线》、《研究》、《正路》、《新思潮》、《社会现象》、《时代论坛》、《读书生活》、《文化斗争》等。这些刊物大都是由“社联”成员担任主编，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大部分也都是“社联”成员。例如“社联”成员、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就刊登在《正路》杂志创刊号上。编者在介绍这篇文章时说：“作者以宏博精深的研究说明抽象作用以及抽象作用在辩证法的正确应用中的地位”②，并以丰富的哲学史料，阐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社联”创办的刊物经常遭到查禁，有的刊物只出版一、二期，就不得不改换刊名，转

① 彭康：《前奏曲》第2页，上海江南书店1929年6月。

② “编后的话”，《正路》创刊特大号，1933年6月。

移出版机构。从1933年下半年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社联”出版自己的刊物已很困难，于是盟员们便想方设法，利用公开合法的刊物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社联”成员柳湜和艾思奇，曾利用《申报》流通图书馆及副刊“读书问答”①来扩大革命理论的宣传。其他成员也都利用《中华月报》、《新中华》、《东方杂志》等合法刊物，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指导青年学习科学理论。

2.翻译和编著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出版《社会科学讲座》。“社联”成员中，有许多是当时较有名气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翻译家、著作家，如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吴黎平、杨贤江、李一氓、柯柏年等。在1927年以后出版的，由中国人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多数作者是“社联”成员，其中有写作《前奏曲》的彭康，写作《无产阶级的哲学》、《辩证法学说概论》、《苏俄哲学潮流概论》、《哲学概论》等书的张如心，写作《黑格尔与辩证法》、《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沈志远，写作《大众哲学》、《新哲学论集》、《哲学与生活》的艾思奇，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还针对当时新兴社会科学出版物中存在的错误和混乱现象，决定编辑出版一套《社会科学讲座》，每月出版一卷，每卷十五万字。内容由浅而深，由理论而实际，目的在使青年读者得一有系统而正确的社会科学读物。讲座内容包括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国家与法律、帝国主义论、经济学等14个方面。主要撰稿人都是“社联”成员。《社会科学讲座》第1卷，于1930年6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这一卷的内容有朱镜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吴黎平的《唯物史观》和《反杜林论》第三编的译文，林伯修的《国家与法律》，王学文的《经济学》，郭沫若译的《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

① 该副刊后来发展成为独立的《读书生活》杂志。

言》等。《社会科学讲座》只出版了1卷，就被查禁，以后各卷未能按计划出版。

3.建立基层群众组织，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社联”成员首先和一些大学中的进步学生组织、失业的进步青年建立联系，参加他们的活动，同他们一起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会或研究小组。在这个基础上，于1930年冬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

“社研”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团结带领广大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同时也参加一些实际的革命斗争。据“社研”成员回忆：“社研”成员每星期召开读书会。所用书籍有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普列汉诺夫的早期哲学著作，有德国人博哈德的《通俗资本论》，还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①。“社研”和“社联”相比，“社研”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社研”这个基层的群众组织，把一大批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使他们的理论水平迅速提高，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干部和理论骨干。

由于在实际工作中，“社联”与“社研”的工作有些重复，领导力量有些分散，再加上“社联”成员调出较多，“社研”成员中的部分人理论水平提高较快等多种原因，到1933年下半年，“社研”就与“社联”合并，“社研”的各基层支部就在“社联”统一领导下开展活动。

4.指导和帮助青年正确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大量翻译出版，为青年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但有些著作也是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同时，那么多的哲学书籍，学习研究如何入门？正确地学习顺序和方法是什么？这些问

① 孙克定：《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会》，《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2辑。

题都给青年们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许多困难。为了帮助青年们克服困难，“社联”于1931年1月创办《书报评论》杂志，柯柏年担任主编，杂志的撰稿人大多是“社联”成员。《书报评论》的主要任务是评论各种社会科学的著作、译著，向读者推荐好的社会科学书籍，介绍正确的学习研究方法。

在评论社会科学书籍方面，《书报评论》第1卷第1期介绍了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刘初鸣翻译的《经济决定论》（法国波尔·拉发格著）等新书的版本，译文和基本内容提要。在“书报批评”栏目中，有《评“资本论”的中译本》、《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底中译本》、《评“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等文章。《书报评论》第1卷第2、3期合刊登载了一篇新书评介，谈到布哈林哲学在中国的影响和《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苏联芬格尔特、萨尔文特合著，吴理屏编译）一书出版的意义。其中写道：“布氏的《唯物史观》一书在中国已有5种中译本，大约有一万人读过此书。它的影响，在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界是很大的不幸。这本书包含有不少的错误的见解，即机械论的见解。在国外，布氏的机械论见解被驳得体无完肤了。在文化落后的中国，只有几篇讨论得极不充分的杂志论文批评布氏的见解，而且没有另一部书可以代替它。现在这本《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出版，总算稍稍能满足这种需要了。”这篇新书评介还扼要地介绍了该书的基本内容，以及作为该书附录的两篇专门批判布哈林哲学的文章和一份哲学研究大纲。第2、3期合刊还登载了叔明写的《评“史的唯物论概说”》，这篇书评指出：波恰特的《史的唯物论》，已由汪馥泉先生译成中文，改称《史的唯物论概说》，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译者在“译后附记”中引用河上肇和水谷长三郎对这本书的赞扬和高度评价。但在实际上，此书并不象河上肇等人说的那样好。波恰特的思想之不正确，就在于他企图用人口或欲望来说明历史的发展。而这

种思想，迟早要滑到“精神史观”的道路上去。《书报评论》第1卷第5期登载的凯丽写的一篇书评，对在中国新兴社会科学界影响较大的《社会与哲学的研究》一书，进行分析比较，指出波尔·拉发格的这本书，已有三种不同的中译本，一是张达译的《社会与哲学的研究》，二是熊得山和张定夫合译的《宗教、正义及善的观念之起源》，三是刘初鸣译的《经济决定论》，这三种译本从内容正确译文流畅等方面比较而言，刘初鸣的译本较好，应向读者推荐。

介绍正确的学习研究方法，是《书报评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有吴明修写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达人写的《怎样研究哲学》，微明写的《哲学研究中的几个根本问题》，叔明编写的《哲学研究大纲》等。吴明修的文章指出：“我们欲正确地了解社会现象的实质，就不能不采取唯物论的观点，而唯物论又只有在采取辩证法的思维方法时，才能成为真正的美满的唯物论。辩证法有两条基本原则和三条主要法则，……。在研究社会科学时，一定要处处根据着严格的唯一科学的方法论——辩证法的唯物论。”①叔明在《哲学研究大纲》中认为：哲学研究第一步就是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最先自然要读辩证唯物论哲学的入门书，伏尔佛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和狄慈根的《辩证法逻辑》是两本最适合的书，然后就可精读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名著，如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第二步就应该研究构成辩证法唯物论之两种原素——辩证法与唯物论本身的历史；第三步进而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史的发展；第四步是研究现实各种非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②。

①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书报评论》第4期，1931年4月。

② 《哲学研究大纲》，《书报评论》第5期，1931年5月。

总之，《书报评论》所登载的各类文章，对当时广大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起着航标灯的作用。

5.利用讲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社联”盟员通过各种关系，亲临一些大专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受到了进步学生的欢迎，起到了传播革命火种的作用。同时，“社联”盟员还创办了学校和短训班，直接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社联”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组织盟员和进步的社会科学家批判各种错误理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从1930年成立，到1936年解散，通过各种活动，采取多种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使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当然，“社联”所开展的各种活动，不可避免地也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受到了一些“左”的影响，但始终坚定不移地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主流，是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

## 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哲学大众化运动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笔名有：思奇、李东明、李崇基等。1934年，艾思奇在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期间，经常收到读者提出的问题，于是就撰文在《申报》的“读者问答”栏上发表，回答读者的问题，因而比较了解大众对于文化理论的要求。同年11月，“读书问答”从《申报》分立出来，改名为《读书生活》半月刊杂志，李公朴为主编，柳湜、艾思奇、夏征农任编辑。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上连载《哲学讲话》，1936年1月，汇集成册出版，印行第四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1936年，先后出版了他的论文集《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译著《新哲学大纲》等。1937年4月，上海读书生活社出版了《哲学与生活》，毛泽东看了这本书后，1938年写了一封信连同他的《艾著〈哲学

与生活〉摘录》寄给了艾思奇，信中称赞该书是艾思奇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① 艾思奇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一生的勤奋研究和认真教学，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哲学大众化问题的提出

"哲学大众化"口号的提出，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是在"文艺大众化"、"社会科学大众化"、"科学大众化"口号之后提出来的。革命文化工作者，从大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一认识出发，对于文艺与群众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文艺"要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②，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的必然的要求"③。这样，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开始引起了比较多的文艺工作者的注意。1930年春，文艺界对大众化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后，决定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正式提出了革命文艺大众化的任务。193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其公布的纲领中提出："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④这也是强调社会科学要大众化。1932年公布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斗争纲领"中，更加具体地指出了社会科学大众化的任务和对象，要"加强社会科学大众化运动，深入工厂、农村、兵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一般大众。"⑤

在提出文艺大众化、社会科学大众化之后，1934年9月，柳湜在《论科学小品文》⑥中又提出了"科学大众化"的问题。他

① 《中国哲学》第1辑第4页，"三联书店"1979年8月版。

②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

③ 林柏修：《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海风周报》第12号，1929年8月。

④ 《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1930年9月。

⑤ 《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

⑥ 《太白》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9月。

说：“目前大众需要科学知识，科学要求大众化。而大众实践的生活不许可有长闲的时间去从事科学研究，去读大本头的科学书。”所以“大众化现状况下接受科学的赐与只能是一点一滴的，我们自然也只能适应这种需要”。科学大众化口号提出后，接着就有这方面的实践，有些科学家致力于这方面的创作，使自然科学家与大众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从苍蝇之微到宇宙之大”，给予科学解说，不断纠正常识性的错误。有些科学小品文，还同政治相联系，抨击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势利小人的奸诈。科学小品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艺的形式结合一体，沟通了人民大众与科学的桥梁。

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大众化，深奥的哲学是不是也可以大众化，艾思奇首先进行了尝试。由于艾思奇在《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和“读书问答”专栏工作期间，接触到了广大读者提出的哲学、社会、人生、学习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读了不少书，深入地具体地研究了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就为他创作通俗化、大众化哲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艾思奇的24篇“哲学讲话”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以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在李公朴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36年1月汇集成册出版。这部著作出版后，社会影响很大，被官方以种种罪名查禁。为了继续出版，1936年6月印行第四版时，改名为《大众哲学》。

### （二）《大众哲学》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大众哲学》全书分四章二十四节，10万余字，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包括唯物辩证法的三条定律及其诸范畴）等方面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但又不完全停留在一般的解释上，而是对某些原理阐述得比较具体并有一定程度的深化。

哲学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上的许多哲学家把哲学总是讲得深奥难解，使一般

人见而生畏，不敢同它接近，即使细心阅读了，也越发糊涂起来，于是哲学同大众的生活相隔得如同天地一般的远。面对着这种状况，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用具体生动的事例阐明了哲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哲学并不神密"①，哲学不是虚无飘渺的学问，不是谈命运说鬼神的神秘思想，"哲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从人类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没有人类社会，也决没有哲学。"②"哲学的踪迹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找到。"③这就把哲学从神秘玄妙的殿堂中引向实际生活，使哲学和人民群众接近起来，使人们知道生活中就有哲学，只要加强哲学思想修养，就能够得到哲学这个武器，得到识别复杂事物的能力，提高变革社会的自觉性。

对于哲学的含义，研究哲学的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问题，书中有通俗的论述。艾思奇指出："哲学思想是人们的根本思想，也可以说是人们对于世界一切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④哲学是世界观，又是思想方法，学习和研究哲学，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他还特别强调研究哲学必须经常联系工作和斗争中的问题，以解决实际问题和指导行动为目的。这些见解，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来讲，确实是站得比较高的。

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艾思奇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了分析，指出世界上的客观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同的事物又有不同的规律，在改造客观世界时，主观愿望和事物的规律必须相符合，违反了它，就要"碰钉子"，就要犯主观唯心论的错误。说人的主观心意不能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能随意

①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29页。

②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30页。

③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29页。

④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37页。

支配事物，这并不是听天由命的宿命论，不是说人的任何主观努力和奋斗，都是徒劳的，不能改造事物。按照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要从积极方面来看，认识了事物的规律，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工作，就容易成功，就可能避免碰钉子、走错路。这就暗示人们，中国与别国不同，有自己的国情，革命者只有按照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采取符合实际的方法，满怀信心地去奋斗，革命就一定能成功。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哲学，而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革命哲学。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对认识过程的阐述，突出了认识是一连串的矛盾过程。他指出："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更丰富，所以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循环，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它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滞在原来的圈子里。"①书中反复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说：所谓实践，就是"改变世界改变环境的活动。"②"实践就是改变事物"，也称做"变革的实践"或"批判的实践"③。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实践认识现实的真理，检验真理，矫正主观上的错误，"使主观的思想能与客观的事物更一致"，也就是说"使主观和客观统一"④。

《大众哲学》在阐述事物变动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时，强调了事物内部的矛盾的统一，是事物变动的原动力。但外部的力量，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它是帮助事物变动的重要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其变动就要受到影响。

---

①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86页。

②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85页。

③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88页。

④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85页。

艾思奇在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系统叙述上，有许多地方是很用了一番心力的，使理论的前后有了更自然的连贯。他把目的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几个辩证法的范畴放在全书的最后一节，这是很有着现实意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是和人类的活动、人类的目的实现有直接关系，这样连起来，不仅很自然，而且使全书所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直接转入变革世界的实践问题上去。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指引着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又指引着人们改造世界观。书中指出："可能性并不就是现实性，要使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必须要把阻碍的可能性打倒了或克服了才行。"①"旧社会必然要没落，新社会必然要产生"②，但这决不是坐着等待就可以实现的。革命的成功，要具备主客观条件，然而"没有主观的努力，客观的条件无论怎样好，还是不会成功的。"③这种主观条件，就是广大民众要有革命的要求，又有正确的领导，并积极行动起来朝着正确的道路走，那么革命的成功就有希望。

但是，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原理、原则的阐述也有不确切之处，他从第四版后陆续发现并不断修改了一些不确切的提法。例如：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问题。艾思奇认为"凡真理，都有绝对的内容，相对的形式。"④这样来表述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及其相互关系，也是不确切的。他在后来的修改本中，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作了新的表述，指出相对真理是在一定的客观情形下的真理，绝对真理是说的一切经过实践证明的符合客观实际情形的正确的事物规律的认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有密切的关系，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人们的每一次认识都有相对性，同时又更接近完全的绝对真

①②③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282页。

④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97页。

理，这就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又如：《大众哲学》在批判那种歪曲或否定唯物辩证法的错误思潮时，没有把“形式论理学”（即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开来。他认为“所谓形而上学，就是从形式论理学产生的”①，“在现在，真正的前进的思想里，决不能让形式论理学占据地盘。”②甚至提出形式论理学与动的逻辑（即辩证法）在价值上的比较，“我们早已宣布了形式论理学的死刑了”③。事实上，形式逻辑也是一门科学，它是从思维的外在关系方面来研究思维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它同辩证法这种从事物内部、从事物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来研究事物的规律的科学相比，当然是有着性质的不同。前者是初级的思维方法，后者是高级的思维方法。但它们都是一门科学，各有自己的性质、特征和研究对象，对于人们观察和研究事物都起着不同的作用。形式论理学同形而上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范畴，前者是一门科学，后者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表面的观察和研究问题的思维方法，这两者是不能等同的。《大众哲学》中的这种绝对否定形式论理学的观点，是片面的。后来，艾思奇已经改正了对形式论理学的不正确地批评。这些问题，表明了一个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科学理论的探讨中，人们总是不断发现错误的认识，不断修改错误的认识，才能达到比较全面地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或原则。艾思奇也是这样一个走过曲折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三）《大众哲学》的特点**

用大众常用的语言，结合大众熟悉的历史神话故事，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例，通俗化地阐明深刻的哲理，这是迅速地把马克

①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233页。

②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235页。

③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233页。

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人民大众中去的创造性的方式，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更快地掌握这一科学的认识武器，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正当一些通俗化的哲学论著发表和出版时，随即有一种"通俗会流于庸俗"的怀疑，而《大众哲学》却以通俗化成功的尝试，对这种怀疑起到了一个澄清的作用，证实了抽象的哲学也是完全可以做到和大众文艺、大众科学一样的通俗化的，并把通俗化和庸俗化区别开来，成为通俗化的典范。这正如李公朴1935年12月为《哲学讲话》写的"序"中所说的："把正确的理论通俗化，只要理论不歪曲、不错误，是决没有庸俗的危险的。'庸俗'两字的意思，本来是指流俗的、浅薄的、错误的见解，并不是说用语浅显，就会庸俗起来。"① 哲学的通俗化，不仅是用语浅显，而且内容是深入浅出，形式更接近于大众的生活。所以，李公朴又评价《哲学讲话》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②

譬如，艾思奇在阐述现象和本质这一对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关系时，为了使大众明白易懂，他用人们熟悉的"孙悟空七十二变"的神话故事，说明世界上的事物在表面上千变万化，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都是事物变化的现象。但是，一件事物的表面无论怎样变，从本质上说还是那件事物，孙悟空无论怎样变来变去，根底里还是那个孙悟空。所以现象和本质虽然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现象反映本质，本质借着种种现象表现自己。现象（或假象）是事物表面上变动不居的表现，本质是贯穿在这些现象根底里的比较固定的法则。科学研究，就是要从纷乱的现象世界里，找出各种事物的本质来。"科学上的各种法则，就反映

① 《哲学讲话》第2页，读书生活社1936年2月再版（下同）。

② 《哲学讲话》第1页。

着各种事物的本质。”①“人类靠着科学法则，能够看透事物的本质，能够进而征服世界”②。

（四）《大众哲学》的社会影响

专门从事哲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工作，这在中国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哲学大众化，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是人民大众所必需的。30年代的中国，国家贫弱，民不聊生，一般大众更是知识饥荒，人们迫切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艾思奇就是为了适应中国的这种需要，放下专门学术的研究，下定决心从事哲学大众化的活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大众哲学》出版后，在学生、店员、工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青年中影响更大，通俗明白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想，推动许多青年走上了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有的青年看到国家政治腐败，感到个人出路渺茫，精神上极度徬徨、苦闷、悲观，甚至想以自杀了此一生。读了《大众哲学》后，受到了启发，懂得了应该用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认识社会和人生，于是精神为之一振，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道曙光，奋力投身到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中去，变革社会，走向人生的新道路。解放前，《大众哲学》印行了三十二版，供不应求。1979年又印行了三十五万册，仍旧是一售而空。由此可见，《大众哲学》是通俗哲学书籍出版次数最多的一部著作。

哲学的大众化运动，是由哲学的通俗化开道的。没有哲学的通俗化，也就没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和大众化是紧密相连的，通俗化是指用语浅显，形式接近于大众的生活习惯，它是大众化的一个方面。而大众化则包含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哲

①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250—251页。

②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251页。

学大众化，也就是哲学的群众化，把高深的哲学理论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深入浅出，打破历史上哲学神秘的观点，让哲学走出哲学家的书斋，和人民大众生活接近，使人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以便掌握正确的思想武器。

30年代，许多哲学工作者为了使中国大众更快地接受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掀起了哲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艾思奇是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先驱，他的《大众哲学》是把高深的哲学论理通向人民群众的桥梁，推动了哲学大众化运动。陈唯实、沈志远、胡绳等许多理论工作者也为哲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唯实从踏上哲学研究的道路时起，就注重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他认为要使新哲学易于为大众理解、接受、应用，成为人们的思想和实际生活的真正导师，就必须把新哲学的形式通俗化，内容具体化、实践化、战斗化，实行“哲学到大众中去”。他继《大众哲学》之后，编写了《通俗辩证法讲话》和《通俗唯物论讲话》，这两部著作是1936年6月、9月出版的姊妹篇，其共同的特点，正如当时的图书发行介绍中所说：理论通俗化，容易看懂，内容具体化，容易理解，使一般人晓得应该如何应用。这两部著作，在当时也是影响比较大的通俗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畅销书。其中《通俗辩证法讲话》，在出版后几个月就印行了三版，售销六千册。1937年，陈唯实的《新哲学体系讲话》和《新哲学世界观》两部大众化的著作出版。他在《新哲学体系讲话》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玄学的哲学是抽象的、空洞的、神秘的，是少数人的哲学。新哲学恰恰相反，是具体的、科学的，是大众所需要的文化，使一般人都能听懂，看懂，理解它，接受它，这是大众哲学的真正意义。

沈志远的许多哲学论著也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点，著有《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和《通俗哲学讲话》。其中《现代哲学

的基本问题》一书，是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中的一辑。他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非常精彩地阐述了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意义，说：哲学在今日，已经不是少数大学教授，学术家和特殊知识分子的“专利品”了，一切靠做活吃饭的大众，也有自己的新哲学，也有跟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哲学理论，这种哲学理论不是死的、神秘奥妙的教条，它是活的大众生活的精确真实的指导。这种哲学，就是新唯物论的哲学。对此，沈志远指出了写这部著作的目的，就在于把指导大众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哲学理论，作一番简略的介绍，以便提供给终日埋头苦干、时间经济两穷的大众朋友们。这部著作1936年6月出版后，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到1949年连续重版十多次。

在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除了出版大部头的著作外，还有通信和讲座的形式。胡绳1937年在《新学识》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漫谈哲学”，用书信的形式通俗地阐述了哲学的对象、哲学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哲学和改造世界的关系、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自修大学》杂志，从1937年4月起还开办了“哲学知识讲座”，这种形式对传播哲学基础知识，推动哲学大众化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哲学大众化运动，从艾思奇开始，经过许多进步哲学家的积极努力，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很多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的及时的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交给了人民大众科学的精神武器，武装了他们的思想，鼓动着他们自觉地参加革命斗争，使哲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四、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30年代，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李达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研究和宣传，为在

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反动派的通缉，1927年冬，李达在许德珩帮助下从武昌潜往上海，秘密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928年7月，李达在《现代中国》杂志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了《中国所需要的革命》；同年9月，他在《双十月刊》第4期上发表了《革命过程中的民主革命》；同年冬，李达和熊得山、邓初民、张正夫、熊子民合作创办上海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1929年，李达翻译了塔尔海玛著的《现代世界》（又名《辩证唯物论入门》）。同时，李达撰写了《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指出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民族，半封建的社会，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要打倒帝国主义，也要铲除封建遗物。1930年，李达翻译了卢波尔著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并与王静、张栗原、钱铁如、熊得山、宁敦五合译了日本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其中李达翻译了此书的上篇《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30年夏，李达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接着，他经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介绍，到上海法政学院任教。第二年，又到暨南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1932年初，李达用“王啸欧”的名义，创办了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1932年5月，李达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委托，到泰山给冯玉祥将军及其研究室的人员讲授列宁主义和唯物史观。1932年8月至1937年6月，李达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兼课，讲授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社会学（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期间，李达与雷仲坚合译了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边教学边研究的基础上，李达撰写了《社会进化史》、《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重要理论著作，进一步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一）《社会学大纲》撰写的过程和体系

李达撰写《社会学大纲》，并非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三、四年漫长的过程。在这部著作出版前，1932年9月，李达和雷仲坚合作翻译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此书是苏联哲学界30年代批判德波林学派过程中最初产生的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其显著特点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坚持了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机械论。李达及时地把这本书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有其重要的意义。李达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译者例言"中指出："本书是集体研究的结晶，是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的说明。"① 李达在"译者例言"中还提出了对自己过去的哲学研究工作进行清算，他说："说句实话，我自己在最近正在实行把过去的研究清算，也曾写下一部分的东西，可是有许多地方无批判的采用了普列汉诺夫与德波林，因而我自己的清算，又必须根据本书的指示实行再清算。一切的东西都是运动着，在哲学与政治的统一被实现着的今日，在哲学上进步的速度反映新社会经济进步的速度的今日，我们的哲学的研究，不能不努力追随于新时代的新实践与新理论的统一的发展，依据马——伊的哲学而不断的被扬弃，不断的被清算。本书的研究，就是我们的模范。"② 李达的这种治学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种科学态度。

李达在教学、研究、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吸收了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经验，经过对自己以往哲学研究工作的清算，经过三、四年的研究，逐渐写成了《社会学大纲》，1935年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先作为讲义铅印，后又在教学的实践

① 转引自宋镜明著《李达传记》，第10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

② 转引自《中国哲学》第1辑，第363页，"三联书店"1979年8月版。

中经过不断修改补充，于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李达把这一部哲学著作命名为“社会学”，这不是现今学术界所指的单纯研究社会和社会问题的独立学科的社会学，正如他在1937年4月写的“第一版序”中所说：“本书前五篇，是研讨世界社会的一般及特殊发展法则的。”① 也就是指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一般的观点和方法的科学，即哲学。所以，《社会学大纲》的内容，实际上是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的专著。

《社会学大纲》，是由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构成的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全书四十余万字，分五篇十二章。唯物辩证法（包括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写了一篇，分为四章，分别阐述了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写了四篇（分为八章），分别阐述了作为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样安排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表明了李达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丰富了他在1926年著的《现代社会学》一书的基本思想。但是，贯彻全书的则是辩证唯物主义。

李达原计划《社会学大纲》写成六篇，已经写成的前五篇，“是研讨世界社会的一般及特殊发展法则的”②。第六篇，本来是要写关于中国社会，其研究大纲和材料等已有了准备，因研究工作的重心已移到经济学货币学方面，就没有时间继续编写下去。但这并非说有材料无任何结果，而是有一个研究结论的，李达说：“至于中国社会，却自有其特殊的形相和固有的特征，决不是一般原理之单纯的例证。我认为中国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

①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5页。

会，也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社会。现阶段的中国人，必先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中国从这种过程中解放出来。为要完成这种使命，必须实现民主的统一，发展国民经济，改良工农生活。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准备民族奋斗，以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这必须是现代中国人的第一目的。”①。

（二）《社会学大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见解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第一版序”中有一句自我短评，说：“本书内容，虽没有新的创见，但基于数年的研究，自信还有一些新的收获。”②通观全书，李达所说的“有一些新的收获”，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地具体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仅例举几个问题即可看出其见地之深刻。

对于唯物辩证法与以往哲学的关系问题，李达坚持的是批判继承的关系，反对虚无主义的观点。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其发展是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而成就的。唯物辩证法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联系着，同时，唯物辩证法又与一切先行的哲学有很深的关系，因而一切先行哲学的历史，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唯物辩证法是把人类的知识史——特别是哲学史——中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当作遗产继承下来并使其发展的东西。所以，唯物辩证法是人类全部知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③

李达很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在《社会学大纲》中，对列宁的哲学思想有许多专门的论述。李达指出，列宁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5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5—6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69页。

的哲学研究活动与他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着的，他从革命斗争的需要研究哲学，其研究的理论成果又为俄国的社会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列宁在哲学的研究中非常注意自然科学的发展，摄取了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充实了唯物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哲学上的列宁阶段。李达认为，在苏联真正理解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理解列宁主义的本质，还是在1930年才开始的。从此以后，列宁的“哲学遗言”所指示的方向才得以实现。这个“哲学遗言”，就是指列宁1922年写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著作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要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宣传无神论，批判唯心论，推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只有沿着列宁已进行的方向继续前进，才能有所成就。李达认为，列宁在哲学上的最伟大的功绩，是他所发挥的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指出了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并具体展开了辩证法的十六条要素，打破了物理学上的危机，扫除了自然科学上的形而上学的谬论，把唯物辩证法推向到新的阶段。

对于唯物辩证法诸法则的关系，李达坚持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处于核心地位，是理解整个辩证法的关键。从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上来说，不能认为这个法则重要，那个法则不重要，事实上对立统一法则和其它法则一样，都是人们的行动和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

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李达强调指出：“人类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的发展过程。”① 李达认为实践是历史的社会的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及社会斗争。实践同认识相比，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实践的动因。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209页。

在认识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上，实践都起着决定的作用，物质到感觉要依靠实践，由感觉向思维的推移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在思维阶段，实践起着决定的作用，决定着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

李达进一步考察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统一之基础问题。他指出，认识主体的人类决不单是人类学上的有机体，而是在特定发展阶段中从事劳动与斗争的人类。从前一切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把认识主体的人类当作人类学、生物学上的人类来考察，离开了认识过程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的联系，没有根据历史的辩证法去理解认识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因此，李达进一步指出："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统一，是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上实现的。所以，要理解人类的认识过程，必须在其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的统一上去考察。"① 对于认识过程运动的原因，李达认为是由于认识的内部矛盾与对立物的斗争推动的，认识的发展，反映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并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实践不但证明认识的真理性，并且依据认识的真理性，而积极的变革客观世界。"②

在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在论述辩证唯物论的同时，又系统地论述历史唯物论，《社会学大纲》算是第一部。李达在阐述历史唯物论时，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则，作为历史唯物论的根本纲领，他依据这个纲领来阐述历史唯物论的全部内容。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之间的关系，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李达对此非常明确地指出，把辩证唯物论具体应用于历史领域，就成为历史唯物论，这两者之间，没有一条鸿沟，而是密切关联的，"历史唯物论如没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211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266页。

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没有历史唯物论，也就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①。

只有把辩证唯物论扩张应用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关于发现历史唯物论的重要意义，李达认为这是科学思想的最大收获，它给予进步的阶级以正确的历史观、社会观，以理论斗争的武器，使他们积极担负起改造社会的使命。

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即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李达分层次地作了具体的论述。他把生产关系分为四大类，即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分配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交换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消费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这些生产关系，都是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也就是社会的基础。

李达把上层建筑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法律，一类是意识形态。这两类上层建筑，都受社会经济结构规定，但又不是被动的，而是对社会经济结构以一定的反作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之间，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但是，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这些反作用，只是在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时，才能持久。从相反的方面说，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虽也能推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其发展过程，而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虽然没有充分反映在19世纪末已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

经轰动于全世界的自然科学的一些重大成就，但是，他阐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了“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动因”①。坚持把科学技术称为“一般的生产力”②要使科学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有力的要素，就必须使科学参加生产过程而在技术上去应用它，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的水准，由技术的水准测定”③。技术上的进步，不但由技术本身的发展水准实现，也要由一定社会的生产诸关系实现，所以“必须注意技术发展的社会性”④。李达不仅注意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也注意到了社会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影响，科学技术的成果在实际上被利用于生产过程时，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结果。

《社会学大纲》，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在中国系统地全面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社会学大纲》中也有不足之处，例如，李达在批判那种用形式逻辑排斥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时，忽视了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的密切关系，没有把作为关于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形式逻辑这门科学同一种反对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的形而上学区别开来，因而否定了形式逻辑的作用。后来，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李达认为对形式逻辑的批判是不当的，并在教学和著作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这表明李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从不停留在一点上，而是不断地吸收新的正确的东西，以补充自己的不足。

### （三）《社会学大纲》的社会影响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369页。

② 《李达文集》第2卷，第371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369页。

④ 《李达文集》第2卷，第369页。

这部著作，是李达在30年代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对于人们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革命的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达编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服务，他在《社会学大纲》第一版的扉页上写着："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的题字。1939年4月，李达在第四版的序言中，更具体地表述了编写《社会学大纲》的目的和任务，他说："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①

《社会学大纲》1937年5月正式出版后，李达立即寄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读了后很高兴，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他在书上作了很多批注，合计约三千五百字②。1939年，毛泽东又写信给在重庆的李达，赞扬他的功绩，称他是"真正的人"③，毛泽东还希望李达将此书再多寄一些到延安，供给高级干部阅读。

《社会学大纲》初版后，曾连续再版。到1939年7月，已经出了第四版。1948年2月，《社会学大纲》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即第二篇至第五篇），以《新社会学大纲》的书名，在香港生

① 《李达文集》第2卷，第7页。

② 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46页，"三联书店"1986年9月（下同）。

③ 参见《李达传记》，第106页。

活书店作为单行本出版。沈志远为这部书作序，他在评价中说："一望而知的，这部社会学的内容，完全是历史唯物论的社会理论，也可以说是辩证唯物论的历史学说，所以书名加上了一个'新'字。在国内的同类著作物中，这部书确实可以算得体系既完整、叙述又周密的一部优良的教科书。"①

1939年，艾思奇根据延安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迫切需要，编了《哲学选辑》，选录了《社会学大纲》中的"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一章的内容，在延安出版。后来，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和解放区广大读者的需要，新华书店于1948年7月，全部翻印了《社会学大纲》，书内将一些术语改为通用译语，如"布尔乔亚"改为"资产阶级"，"普罗列达里亚"改为"无产阶级"，"意底沃罗基"改为"意识形态"，等等。其余仍按1939年4月第四版的原文印行。为了便于阅读，新华书店将《社会学大纲》分订五册，按照原来的分篇，每篇订成一个单行本出版。这五册的书名分别为：一、唯物辩证法；二、历史唯物论序言；三、社会的经济构造；四、社会的政治建筑；五、社会的意识形态。

李达的著作和译著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社会效果，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其因缘就是他在任何情况下坚信马列主义，坚持宣传马列主义，从不摇摆。并以科学的态度著书立说，理论阐述得系统、全面、透彻明白。因此，他的著作和译著一版再版，广泛地流传着，成为革命者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哲学的重要教科书，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增长知识和锻炼行为的方法，引导着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李达是用手中之笔这把锋利的板斧，杀向旧世界，鼓动人们去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他不愧是哲学理论战线上的一位巨匠！

① 《〈新社会学大纲〉沈序》，生活书店1948年2月版。

## 第二节　三十年代哲学、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论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空前传播，不仅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而且也受到了张东荪等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叶青等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诋毁和篡改。对此，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纷纷撰文著书，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捍卫和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

3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材料，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具体的研究，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有力地批判了一些错误观点，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指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仍是中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

#### （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争的由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曾一度转入低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否改变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是否结束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将往哪里走？面对着这些问题，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围绕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多方面的问题，开展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

社会的性质，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并由此决定革命的性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问题首先出现了分歧。托洛茨基1927年5月写了《中国革命与史大林大纲》，同年7月，他又和季诺维也夫等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托洛茨基不了解中国的全

部实际，在这些文章中，从局部和现象上分析问题，只看到中国经济基础里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企业和极少数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农场，于是就认为封建主义在中国已不占重要地位了，中国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认为主要是关税制度不好，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因此，中国革命主要是所谓反关税的革命。与托洛茨基同属一派的拉狄克，又片面地夸大了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已经蚕食了中国的封建势力，“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①所以，他断定中国早已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国家。托洛茨基和拉狄克都是从极左的方面曲解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反对由无产阶级领导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和拉狄克的观点，并多次进行了批判。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在《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指出，拉狄克不了解中国农村中封建地主的统治和商业资本存在的结合，没有看到中国某些军阀不仅拥有地产，同时又是工矿企业的所有者，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正是民主革命运动的基础。同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关于《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中又批判了托洛茨基。他指出，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不了解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压迫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和军事力量，乃是支持、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②

①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1页。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影响到了国内的争论。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国的实际，否定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肯定了大革命失败后，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没有废除，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仍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所以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进行土地革命，是当前革命的两大任务。

### （二）“新生命派”和“托陈取消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

1928年5月，陶希圣与周佛海等主编了《新生命》月刊，并以这个刊物为阵地，宣扬唯心史观，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时称他们为“新生命派”。1928年10月，陶希圣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提出了中国“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结构，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①陶希圣所标明的“士大夫阶级”，是指贵族中的进步者与庶人中的优秀者混成的一个阶级。他把“士大夫阶级”当作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阶级，并进而又把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社会变迁原因归为“士大夫阶级”的“内哄”。陶希圣本来是回避中国有严重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战争，并且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主张制造无产阶级以求适合于社会革命的实行”。可是他又大谈“士大夫阶级”，他不顾自己理论上的逻辑矛盾，只要是对他所代表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利，怎么说都是合理的。然而，他的真正用意是企图用逻辑上的混乱掩人耳目，歪曲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阶级关系，抹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工人阶

---

① 《新生命》第1卷第10期，1928年10月。

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是持反对态度的。表明他的这种基本观点的代表作，是1929年8月5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他在信中认为“中国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之革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们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①。陈独秀的这封信公布后，许多革命的理论工作者撰文批判他的错误，指出其信中的结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从经济到政治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国民议会”进行合法运动，等待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反对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是“托陈取消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观点。

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还有严灵峰和任曙等。

严灵峰1930年7月参加创办《动力》杂志，并以此为阵地发表宣扬托洛茨基派观点的文章，时称“动力派”，1931年，他把自己的文章合编成《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表述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观点。他极力掩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结合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推动了中国整个社会向着资本主义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

①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第372页。

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居支配地位，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统治者是资产阶级，故“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

任曙和严灵峰之间虽然有些矛盾，甚至互相进行攻击，但他们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任曙直言不讳地宣扬拉狄克的观点，1930年12月，他在《中国经济诸论》中说：“这里，假使我们仿照拉狄克的话，就可以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这对不对哩？我们觉得是可以的。”①他自命是“革命派”，攻击不同意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理论家，是“自命为唯物派的专家”，“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并且提出对这些人“要无顾惜地攻打！”等等。他还进而提出了极左的主张：“实行非资本主义运动”，“建设一非资本主义意识的理论”。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的观点以外，还有其他的种种不同提法。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②，“次殖民地下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③；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变质的封建社会”④、“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⑤，等等。

（三）对“新生命派”和“托陈取消派”的批判

陶希圣和陈独秀等曲解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观点

①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页。

② 胡秋原：《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读书杂志》第1卷第4、5合期，1931年8月。

③ 金如海：《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略评》，《综合》创刊号，1934年5月。

④ 罗敦伟：《中国统制经济先决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7期，1933年10月。

⑤ 方亦如：《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第1期，1932年4月。

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李立三、王学文、潘东周等的批驳。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革命的性质仍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李立三1929年12月撰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①，指出1925—1927年的大革命，虽然使封建军阀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在革命后又恢复起来，与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革命，镇压农民运动，一切封建剥削方式比以前都更加残酷。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关系是在政治经济上互相依靠统治着中国，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必须根本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要推翻封建的统治，也必须彻底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

王学文等1929年11月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许多革命理论工作者，以此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称“新思潮派”。1930年4月，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李一氓、向省吾等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从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的关系、民族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农村土地关系等多方面，论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批驳了陶希圣和陈独秀等的错误观点。王学文（署名王昂）在《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②一文中认为，弄清中国的经济性质，是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路线策略的一个中心问题。他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两大桎

① 《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2、3合期及4、5合期，1930年3月及5月出版。

② 《新思潮》月刊第5期，1930年4月。

梏。要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先打破二重束缚，幼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担负不起这种社会任务，唯独中国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打倒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解放旧经济关系下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潘东周在《中国经济的性质》①一文中驳斥了陈独秀等片面夸大商业资本的作用，指出商业资本是一种交换的媒介，它可以在各种生产方式之下存在，但它本身不能代表一定的生产方式，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制度，它的作用是随着生产方式而转移，生产方式可以支配商业资本，但商业资本不能支配生产方式，所以商业资本的长期发展，并不能推翻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只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肃清封建势力，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得到发展。

当严灵峰和任曙玩弄马克思主义词句进行新的挑战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组织力量，对这伙假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思想。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思云（即王学文）的《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评中国几位社会科学家的见解》②、刘梦云（即张闻天）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③、杜鲁人（即何干之）的《中国经济读本》④等。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揭露了严灵峰和任曙等所谓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能存在任何"居间"的统治形式的谬论，指出其理论的目的是反对中华苏维埃工农政权。

第二，历史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关系，指出中国虽然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实际上中国的政治经济权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

① 《新思潮》月刊第5期，1930年4月。

② 《读者月刊》第1期，1931年7月。

③ 《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期，1931年8月。

④ 上海现实出版部1934年4月出版。

的关系是：帝国主义出于本身的利益，要维持中国封建的关系，封建贵族出于本阶级的利益，要勾结帝国主义，两者互相依存，因而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

第三，批驳了割裂剥削关系、阶级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关系；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剥削的关系也就是阶级的关系，明了这种关系，才能了解社会的性质，才能自觉地组织工农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第四，批判了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机械论错误，指出严灵峰和任曙等只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兴办企业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其结果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严、任的见解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其方法也是机械的，所以也有人称他们为“机械派”。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不仅使“新生命派”和“托陈取消派”的理论破产，同时也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向人民群众宣传了观察判断社会经济现象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使人们认识到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没有变，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完成这两大任务，社会才能前进，才能真正发展中国经济。这次论战，也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和策略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根据。

现代中国社会，是由历史的中国演变而来，因而在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过程中，又开展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争。主要涉及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奴隶制社会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其实质是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还要不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论争的结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 二、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争

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以唯物辩证法为主要内容。因此，唯物辩证法就成为胡适、张东荪等人攻击的首要目标。

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公然否认唯物辩证法是科学方法，认为“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①。胡适的观点遭到了雷仲坚的驳斥，雷仲坚在《辩证法与进化论在历史上及理论上之比较的研究——评胡适博士论辩证法》这篇文章中，详细地分析论证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在历史上及理论上的联系和区别，有力地说明胡适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只是一种没有任何证据的主观武断，“唯物辩证法已成为人类认识及实践的唯一的有力的科学方法”②。

继胡适之后，对唯物辩证法攻击最多的是张东荪。1932年，张东荪发表《辩证法的各种问题》一文，对唯物辩证法提出五个问题，并在自问自答这些问题之后认为，辩证法根本不能成立，“辩证法的问题太多，以为辩证法已成定律而想到处应用，实在是不思之甚”③。

1933年初，秀侠在《张东荪的哲学——对所提出的“辩证法的各种问题”的驳复》④中，逐条驳斥了张东荪对唯物辩证法的非难。同年6月，姜琦在《辩证法的几个难题之解决》⑤中也提出，张东荪对唯物辩证法所提出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辩证

① 《胡适文选》，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版，第8页。

② 《新社会杂志》，第1卷第2期，1931年4月。

③ 《再生》，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

④ 《现代文化》，第1卷第2期，1933年。

⑤ 《安徽大学月刊》，第1卷第5期，1933年6月。

法已成定律是用不着怀疑的。

张东荪初遭反击后，并不甘心，又于1933年9月抛出《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①一文，仍然坚持其彻底否认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不过在手法上略有变化。他首先从黑格尔入手，用较大的篇幅来指责黑格尔的辩证法，以为否认了黑格尔，也就等于否认了马克思。接着又故技重演，对唯物辩证法提出了四个问题，企图从这四个方面来推翻唯物辩证法。他最后的结论是，辩证法自身确有种种不可解的难题与难关，辩证法在人类思想史上已成为过时的古董，只好陈列在博物馆中了。

张东荪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年轻的新哲学工作者邓云特（即邓拓）就撰文予以驳斥，文章首先说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回事，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又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杂起来，张东荪抓住黑格尔讥骂一顿，以间接推翻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只是一种企图蒙蔽问题中心的烟幕，是徒劳无益的。并且进一步指出：张东荪对于唯物辩证法基本问题错误理解的根源在于，一是用板滞的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理解辩证法，把“奥伏赫变”看作是逻辑的变，而不是时空上的变，事物的变；二是完全不懂得辩证法，不了解事物的依存关系和质量变化；三是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正、反、合”这样一个唯一的公式，并把一切事物都机械地分割在这个三段式的框子里，看不到矛盾和联系②。

张东荪再遭反击后，于是就纠集一批同人，搜罗相同观点的文章，围攻唯物辩证法。张东荪编著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就是这种围攻的代表作。书的卷首有张君劢的序及编者辩言各一篇，正文分上下两卷，上卷都是新作，下卷都是发表过的，总计有张东荪、傅统先、牟宗山、南庶熙、魏嗣銮、张抱横等11

① 《新中华》，第1卷第18期，1933年9月。

② 《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新中华》第1卷第23期，1933年10月。

人的14篇论文，另附杜威、罗素、柯亨的短文各一篇。该书名为《唯物辩证法论战》，实际上都是反对者一方面的文章。面对张东荪等人的进攻，新哲学工作者毫不留情地给予坚决反击。由于《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所攻击的不只是唯物辩证法，而且涉及到辩证唯物论的基本问题，这样就使论战的范围扩大了。论战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辩证唯物论只是一个哲学的幌子吗？傅统先等人认为辩证唯物论根本不是一个哲学体系。辩证唯物论乃是先有了一定的社会学上的主张（即唯物史观），然后削足适履的把一切能拉到那种主张里去的哲学理论，编成一个哲学的幌子，辩证唯物论便只是一个哲学的幌子。因此辩证唯物论不谈哲学则已，谈到哲学就离不了社会学说的支配。要从马克思身上得点哲学精义，那简直等于画饼充饥①。对此，弱缨著文指出，稍知马克思的人都该知道，马克思1845年写的《费尔巴哈论纲》（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已包含了辩证唯物论最基本的精义，1859年发表的《经济学批判序言》（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才提出著名的唯物史观公式。马克思把辩证唯物论运用于历史领域，产生了唯物史观，而不是编造一个哲学理论去配合一个社会学上的主张，更谈不到哲学受社会学主张的支配。傅统先等人显然是背离了历史事实②。

第二，辩证唯物论的物质定义毫无意义，与实在论、绝对观念论没有区别吗？傅统先等人借口物质概念随科学发展而发生的变化，认为物质是一个代数里的X，是一个未知数。物质一词徒有空壳而无实质，徒有一泛泛的说明而没有本身的特性。这样的物质定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和实在论所讲的“外界”，绝对观

① 参见《唯物辩证法论战》第50—52页。

② 参见《评张东荪的〈唯物辩证法论战〉》，《清华周刊》第44卷第2期。

念论所讲的"绝对"并无区别①。对此，许多新哲学工作者引用列宁《唯物论经验批判论》（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著名论断来驳斥傅统先等人，他们提出，概念乃是外在物质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这一反映要随着人类的不断实践而日益与物质接近。所以概念不是绝对不变的，我们不能因为物质概念是变化的而就否认了物质的存在。辩证唯物论的物质定义深刻地说明了物质所具有的那种离我们的感觉和意识而独立，能作用于我们感官，为我们感觉源泉的客观实在性。而绝对唯心论的"绝对观念"，新实在论的所谓"逻辑的结构"等，本身就只是一种意识，一种人为的主观臆造，也是某种现实社会关系虚幻的映象。这些东西和辩证唯物论所讲的物质，毫无相似之处②。

第三，关于认识和本体的关系，牟宗三说："离认识而独立的本体是乌有的。"③傅统先也认为，"本体论是根据于认识论的讨论。"④对于这种把本体和认识本末倒置，进而否认本体存在的观点，新哲学工作者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把哲学上最基本的本体论问题，即思维与存在之关系问题根本地取消了，这哲学还成为什么哲学？哲学上的认识论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离开本体论而独立的认识论才是乌有的。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是不容许任何哲学家回避的⑤。

第四，人类为什么会思维？在这个问题上，傅统先等反对意识是人脑的产物，而人则是自然的产物的唯物论观点，否认意识

① 参见《唯物辩证法论战》第33、63页。

② 参见《评张东荪的〈唯物辩证法论战〉》，《清华周刊》第44卷第2期。

③④ 参见《唯物辩证法论战》第61、289页。

⑤ 参见陈伯达：《腐败哲学的没落——为批判张东荪编的〈唯物辩证法论战〉而作》，《读书生活》第4卷第1、2期。

和人脑的结合，人脑是意识的机关，认为“脑筋是占有空间的，而意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着的。也许意识在空间的什么地方，但决不在空间之内。”①新哲学工作者对于人类为什么会思维的回答是明确的；不仅认为人类应该从实践中证明其思想的真实性，而且认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人类思维的根基，那成为人类思维机关的头脑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历史的产物②。

第五，什么是实践？傅统先认为，所谓实践，就是说外界的可感觉性或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能感觉它，或由感觉去推动它，也就是叶青的所谓“反映”。何由而有实践乃因耳闻目睹，及由耳闻目睹之推论③。新哲学工作者对实践的看法是：所谓实践，是社会生产的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实践，是和自然界的奴役奋斗的实践，是和社会界的奴役奋斗的实践。人们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把握了真理，运用了真理，再现了真理，证实了真理，同时也发展了真理，改变了真理。所以与实践分离了的思维之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争论，纯粹是一个烦琐学派的问题。实践乃是真理的标准④。

第六，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新哲学工作者认为，人类的知识不是绝对真理，而是逐渐接近绝对真理的相对真理。对此，傅统先好象抓住了攻击的把柄，于是他提出，辩证唯物论是绝对真理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辩证唯物论者何必坚持、宣传、并到处应用它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辩证唯

① 参见《唯物辩证法论战》第54页。

② 参见《腐败哲学的没落——为批判张东荪编的〈唯物辩证法论战〉而作》，《读书生活》第4卷第1、2期。

③ 参见《唯物辩证法论战》第60—61页。

④ 参见《腐败哲学的没落——为批判张东荪编的〈唯物辩证法论战〉而作》，《读书生活》第4卷第1、2期。

物论者只有自陷矛盾的陷阱之中①。新哲学工作者撰文指出，傅统先的质问显然表明了他不懂辩证法。在质问者的脑子里，绝对真理就是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就是相对真理，而不知道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间本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唯物辩证法是物质世界的运动法则，人们对于这个法则的认识是相对的，但这个法则的存在是绝对的，人们逐渐认识这个法则也是绝对的。把事情绝对化，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绝对的对立起来，正是唯物辩证法所力击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也是傅统先质问的错误所在②。

第七，关于黑格尔的三段法问题。从唯物辩证法问世的那天起，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就藉口黑格尔的"三段法"来反对唯物辩证法。张东荪等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后尘，老调重弹，也认为唯物辩证法者仍是按照黑格尔的"三段法"来排列一切事物的，是预立一个万古不变的"正、反、合"程式来套用任何事物的，把唯物辩证法看成是除了不变的僵死公式外别无他物。并且提出"辩证法本身是辩证的吗"?③以为提出这个问题就等于宣告了辩证法的死刑。针对种种肆意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和宣传者们多次申明：唯物辩证论者从来没有主张过预立什么万古不变的公式来把一切事物排列于这样的公式之中，而且从没有根据任何万古不变的公式来排列事实。真正的唯物辩证法家，只是在活生生的，经过自己的实践中，去接近客观的事物，把握事物，从事物的具体性和全面性解剖事物发展之内的联结及外的联结，解剖事物内部具体矛盾的各方面。唯物辩证法的先哲，正是从对事物的具体分析中，指出了事物发展的三条根本法则（即辩证法的法则）：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条法则仍是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反映，是从自然史和社会史中抽引

① 参见《唯物辩证法论战》第64页。

② 参见《评张东荪的〈唯物辩证法论战〉》，《清华周刊》第44卷第2期。

③ 参见《唯物辩证法论战》第305页。

出来的，而不是唯物辩证法家凭空设计，强加于自然和社会的。"三段法"只是构成辩证法的过程之外部的表面的一方面，离开事物发展的具体联结、事物内部本质各方面、各阶段之矛盾发展和转化的过程，而只从事"三段法"的排列，这就不是辩证法，而只是企图以僵死的公式来代替有活生生内容的辩证法。至于辩证法本身是否辩证的问题，新哲学家们认为，辩证法本身的发展确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古代原始的唯物辩证法——唯心辩证法——近代唯物辩证法。近代唯物辩证法克服了原始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的缺点和错误，而复将其所发展的最好成果，加以综合、扩大和改造。所以，近代唯物辩证法，不是陈旧的东西，而是辩证法自己内部辩证的发展、变化的崭新的事物[①]。

从上述七个方面的争论来看，张东荪等人对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进攻，实在是没有象样的武器，论据不足，经不得一驳。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多半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运来的，而且搬得非常拙劣，常常使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混乱之中。时人曾这样评价《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的作者们：反面主角张东荪只是一个不知辩证法为何物而竟然批判辩证法的人，傅统先的文章只能表示其哲学知识和思维力的浅薄，牟宗三也只是玄弄其冒充的数理逻辑之公式，并未触到辩证逻辑之要点。其余一些人，不仅对马克思、列宁生疏，对于柏拉图、黑格尔等似乎也不熟悉[②]。就这样一批人来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无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相反地，新哲学工作者通过对这些批评先生的批驳，大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使其为更多的人所

① 参见《腐败哲学的没落——为批判张东荪的〈唯物辩证法论战〉而作》，《读书生活》第4卷第1、2期。沈志远：《近代哲学中辩证法之史的发展》，《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2期。

② 参见沧白：《〈唯物辩证法论战〉读后感》，《清华周刊》第44卷第2期。

认识，所接受。

在当时的哲学斗争中，叶青也曾打着新哲学的旗号，批判张东荪哲学。早在1929年，叶青就写了《在科学前的唯物论与唯心论》①及《科学玄学的论战与唯物唯心的论战》②等文章，批判张东荪的唯心论和折衷主义。1931年，叶青主编《二十世纪》杂志，继续发表批判张东荪的文章。1932年，张东荪创办《再生》杂志，开始发表反驳叶青的文章。叶青和张东荪各以自己主编的杂志为主要阵地，展开了颇为热闹的"哲学论战"。例如1931年6月，叶青发表《张东荪哲学批判》③一文，张东荪的得力助手南庶熙就抛出《与〈二十世纪〉记者谈谈哲学——"张东荪哲学批判"之批判》④；1933年9月，张东荪的《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⑤一文发表后，叶青立即写了《动的逻辑是可能的！——答张东荪教授》⑥。

叶青和张东荪之间，既有一般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也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知。叶青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张东荪哲学的观念论、二元论、折衷主义的实质，但更主要的目的是借此机会抛出他的假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内容、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对此，沈志远曾指出：叶青所写的《张东荪哲学批判》等，是向那代表统治群之意识形态的唯心论、神秘主义进攻的。然而，可惜得很，他是歪曲了新唯物论来谈新唯物论，歪曲了辩证法来谈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是站在机械论唯心论的立场上对张东

① 《科学思想》第12期，1929年。

② 《科学思想》第17期，1929年。

③ 《二十世纪》第1卷第3期，1931年。

④ 《再生》第1卷第12期，1931年。

⑤ 《新中华》第1卷第18期，1933年。

⑥ 《新中华》第1卷第23期，1933年。

荪进行批判的。说得更确切些，叶青是穿着新唯物论的外套，混进新唯物论的队伍中来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种子和破坏新唯物论阵营的①。沧白对叶青和张东荪的关系也曾作形象而又切中要害的揭露，他说，张东荪等人批判叶青很象阿Q打小尼姑，是件很轻松容易胜利的事。打人者似乎打倒了一个最厉害的人，事实上却丝毫无损于辩证唯物论，因为辩证唯物论本不在这里。叶青批评张东荪好象武术家打桩。叶青为要练习他的哲学武艺似乎不能不找一个对象，然而活的太棒的东西不容易打，于是就抓住张东荪当木桩来练功夫，结果成就了“新哲学体系”。张东荪这边也编成哲学论文集，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双方都达到目的，双方都胜利，这就是他们论战的结果②。

沈志远和沧白当年的评论，很能帮助人们了解叶青和张东荪之间争论的真相及叶青哲学的实质。对于叶青这样一个蒙骗了不少青年的假马克思主义哲学骗子，新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撕下叶青的伪装，揭露其错误，以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

## 三、关于“哲学到何处去”等问题的论争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中，假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叶青为代表。尽管他多次声称自己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但在实质上，他的理论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心论、机械论、折衷主义的混合物。30年代中期，叶青在他的《哲学到何处去》、《关于哲学消灭论》等著述中，曲解辩

① 参见沈志远：《叶青哲学往何处去》，《读书生活》第4卷第5期。

② 参见《〈唯物辩证法论战〉读后感》，《清华周刊》第44卷第2期。

证法唯物论，提出了一系列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对此，许多哲学理论工作者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这是30年代中国哲学战线上又一次重大论争，它大约始于1935年，1936年达到高潮，时人称这一年是“中国哲学界最热闹的一年”，1937年仍有余音回绕。参加论争的主要有：叶青、艾思奇、沈志远、胡绳、何封、黄琪。当时不仅出版了许多论争性质的书籍，各种杂志也经常有论争文章发表。这场论争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

第一，哲学科学统一论。叶青提出，哲学与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客观事物。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哲学是在科学外思维得出的意识的浮词空谈，科学是在哲学外用实证的方法阐明的现实的知识；科学的方法偏于观察、感觉、经验的证明，哲学的方法偏于冥索、玄想、抽象的理论；科学实证精确，哲学含混模糊，因此需要用对立统一法则来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对立，把哲学和科学统一起来，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是哲学消解于科学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消灭了，被科学取代了①。沈志远等不同意叶青的观点，他们认为，哲学和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区别的，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发生、发展和变化诸总法则的一般方法论，科学是研究客观世界某一具体部门或领域的特殊运动法则的学问。叶青把哲学与科学在性质、方法及结果等方面逐一对立起来，完全抹杀了它们之间的辩证一致性（即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受哲学这个总方法的指导）。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应该是哲学给科学以研究的方法，科学给哲学以发展的资料，哲学与科学结合，使哲学科学化，产生高级的新哲学——辩证唯物论，这不是哲学的消灭，而是哲学的发展②。

第二，物心综合论。叶青认为，哲学问题就是物质论与观念

① 参见叶青：《哲学到何处去》，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11月版。

② 参见《叶青哲学往何处去》，《读书生活》第4卷第6期。

论（即唯物论和唯心论）对立的问题，几千年的哲学发展史就是物质论与观念论的斗争史，那么统一对立物，即把物质论和观念论统一或综合在一起，就可以消解这个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于是以矛盾发展为基础的哲学就归于消灭了。由统一观念论和物质论所形成的物心综合论，即新物质论，乃是科学的理论。叶青之所以要综合物质论和观念论的另一个理由是，观念论有正确的地方，物质论有缺陷，观念论正确的地方正好可以弥补物质论的缺陷，把二者综合起来，就完美无缺了①。驳斥叶青物心综合论的有何封、黄琪等，他们指出：观念论和物质论立足于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观，是决不能统一的。哲学问题是现实社会的反映，不单单是“讨论之学”，只要还存在社会问题，观念论和物质论便不能统一，哲学也不会消灭。叶青企图使观念论和物质论这两个在本质上极端相反的原理分工合作，其结果必然陷于折衷主义的二元论，成为观念论的俘虏。叶青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就是曲解了辩证法，把对立统一律中的统一看成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以为对立就必须统一，统一就是综合或吸收，就是简单的相加，这种用加减法去代替辩证法的做法，实在荒谬②。

第三，哲学消灭论。这个观点是和哲学科学统一论，物心综合论联系在一起的，是叶青哲学的核心。叶青认为自己的这一观点是有根据的，一是有所谓文献根据。二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

所谓有文献根据。叶青摘引了恩格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4段话来为他的观点作证，其中主要的一段是“近代物质论底本质是辩证法的。有了它，则那君临于旁的科学之上的哲学早已成了废

① 参见叶青：《哲学问题》，上海辛垦书店1936年版。

② 参见何封：《叶青的〈辩证的物质论〉》，《生活知识》第1卷第1期，1935年出版；黄琪：《叶青哲学的本质》，《思想月刊》第1卷第4期，1937年出版。

物。如果对于一切种种的科学成功了它们底一种要求，都明白了自己在事物中和对事物的认识之整个关系中的地位，则研究这种整个联系的特殊学问便无用了。从此还能从一切向来的哲学中独立地残留下来的学问，便只有思维及思维法则底学问——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其于一切旁的学问，都属于研究自然及历史的实证科学。”① 在引证恩格斯的话后，叶青得意地说，哲学消灭论自然是我的意见，然而却又是恩格斯思想底逻辑之展开②。

所谓以辩证法为基础。叶青多次申明，哲学消灭论的方法论基础是一切事物，包括哲学在内，都有发生、发展、消灭这一历史的辩证过程。哲学消灭论是以承认哲学有生长死灭的过程为前提的，因而是辩证法的，反对哲学消灭论，就是违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③。

叶青的哲学消灭论提出后，遭到了许多哲学家的反对和批判。艾思奇深刻地揭露了叶青把科学的发展对旧哲学的否定夸大为否定全部哲学的卑劣手法，指出其目的是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复活唯心论的哲学体系，并且说明哲学应保持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对象，这就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运动变化总法则。这总法则的研究必须以各门科学的研究为基础，同时它也可以反过来指导各科学部门的研究。哲学和具体科学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哲学必将随着具体科学的发展而存在和发展④。沈志远则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叶青的哲学消灭论是歪曲辩证法的结果。辩证法固然告诉我们天下之事无不处于发生、发展和变化、否定的过程中，死灭是变化或否定形式之一，但是否定或变化却不一定是死灭。把否定解作死灭，是曲解辩证法。照叶青的“辩证法观点”，宗教——哲学——科学是三种历史知识体裁，宗教死灭，哲学代之而兴，哲学死灭，科学独霸人类思想界。根据叶

① 吴黎平译《反杜林论》第39—40页，上海江南出版社1930年版。
② 参见叶青：《关于哲学消灭论》，《研究与批判》第2卷第7期。
③ 参见《哲学到何处去》第227页，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11月版。
④ 参见《几个哲学问题》，《读书生活》第2卷第12期，1935年。

青的“一切皆灭论”，科学也有一天要死灭，试问科学死灭之后，什么东西来代兴呢？可见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是叶青哲学的一大特色①。

第四，思维科学建立论。叶青认为，科学的发展，将取代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同时必然要走进思维领域，产生思维科学。思维科学产生后，哲学便失去了最后一块领地，完全消灭了。一切思维的现象和思维的产物都包括在思维科学内，用文字和数来思维的东西都是思维科学的对象。它包括言语学、数学、认识论、论理学、方法学、知识学、文学、文化学等。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平等地鼎足而立②。叶青建立这样一个包罗万象、凌架于一切科学之上的思维科学的真正目的，不外是“偷梁换柱”，是想把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消灭了，把他创立的心物综合论(即观念论)装在思维科学这一名目之下，再搬运到哲学所占据的位置上来。因此，叶青的思维科学建立论，也是为他的哲学消灭论服务的，尽管叶青对此百般狡赖、诡辩，但他的哲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昭然若揭的。

第五，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颠倒”问题。叶青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首先是把黑格尔哲学分成体系和方法两部分，然后是抛弃其体系（即剥去观念论的外衣），把黑格尔的方法（即辩证法）作为一个完整的东西无批判无改作地接受过来，再加上唯物论，就构成了唯物辩证法。所以说，马克思只是辩证法的应用者，创立者是黑格尔。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中，“其运动的逻辑公式无不相同，并且完全是一个。”③叶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和诬蔑，遭到了艾思

① 参见《叶青哲学往何处去？》，《读书生活》第4卷第5期，1935年6月出版。

② 参见叶青：《哲学到何处去》，1936年版。

③ 叶青：《黑格尔——其生平其哲学及其影响》，上海辛垦书店1935年版。

奇等人的严厉驳斥。艾思奇著文指出，哲学体系和方法不可截然分开，把体系和方法截然分开，是叶青发明的形而上学的机械分割法。叶青把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仅仅理解为去掉几个观念论的名词，把辩证法现成的拿过来应用，是十分错误的。黑格尔哲学内部包含着对立的要素，即在他的观念论体系中包含着唯物论的种子，这种自身对立的要素，对于黑格尔哲学只是一种否定的契机。然而当黑格尔哲学还是黑格尔哲学的时候，它自身的否定的契机只是一种胚胎的潜伏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把它夸大，以为否定的过程在这里早已实现了。如果以为黑格尔的方法论已经是完成了的公式，可以让唯物论现成的接受过来，那就是把胚胎当作了动物，把否定的可能性当作了否定的现实性。不管黑格尔哲学里有多少唯物论的种子，辩证唯物论决不能把它象割肉一样地整块整块地割来现成应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关键是对黑格尔哲学批判和改作，也就是说，不仅是取消了"理性"观念论等等的形容词，而且也是改正那些被压歪在黑格尔哲学里的辩证法的公式。辩证法被归纳为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就表现了唯物论的批判和改作①。

第六，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叶青在这个问题上，一是把实践说成是观念论的东西，认为实践本质上是理论的活动；二是认为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有作用的，是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可以分工合作；三是抛开实践的社会性、阶级性，仅从生理学的、个人的、自然主义方面理解、说明实践②。钧石在《叶青的理论与实践批判》一文中，对叶青的理论实践观作了详尽的分析批判，其

① 参见艾思奇：《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新中华》第3卷第21期，1935年11月。

② 参见叶青：《观念论不可以吸收吗？》，《研究与批判》第2卷第7期，1937年1月；《理论与实践》，《二十世纪》第2卷第8期，1934年3月。

中写道：叶青的观点和科学的、先进的理论实践观没有任何关系。叶青是在用一种庸俗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机械论来替换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藉以掩盖他的观念论本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不仅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客观辩证法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转化为主观的辩证法。由于实践，理论才不会成为教条，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不可动摇的。叶青不从现实的社会实践基础来考察人类认识的问题，不理解认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社会阶级性、党派性，因此走上了虚伪的"纯"客观主义的观念论的道路。这样，在历史领域，必然会否认历史发展的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规律性，歌颂现实的合理性，提倡远离社会和阶级意识的客观真理的统治。这种理论显然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叶青把理论实践问题放在生理学的、个人的、自然的基础上去解决，抹杀理论实践的阶级性、社会性，其结果是闹出了把人类行动和动物行为混为一谈的笑话，形而上学地割裂了人类行动中内部心理活动和外部生理活动的统一性①。胡绳也针对叶青的实践观指出：观念论主张心智的活动能不受物质条件限制，精神能产生物质。而唯物论的实践观却说人类只能在物质条件的限制下改变物质世界。我们可以在实践中把一块石头改造成一柄石斧，但不能无中变有，也不能把石头变成金子。在实践中改变世界的行为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决不是任意的、观念的活动。因此我们所说的实践仍旧是在唯物论意义上的，和观念论并没有关系②。

第七，内因和外因的关系问题。1935年5月，叶青公开发表了这样一段谈话：中国的历史，是不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科学、哲学、文学，堆满了书店或流行于学校的，都从外国来，

① 该文载于《文物》第1、2期，1936年6月。

② 参见胡绳：《宇宙和社会本体》，《新学识》第1卷第6期，1937年4月。

纯属采用性质。中国历史的发展显然是"外烁的"。我们所有的新东西，不是从旧东西中产生出来的。况且在追踪人家时，必须咬紧牙关，把恋旧的心性斩断，而自己缓慢的内在发展的线索，在这里也被我们一刀斩断了，那么中国的历史还能合规律的发展吗？①

这种历史观上的"外烁论"是和叶青哲学中的外因论联系在一起的。叶青在哲学上玩弄诡辩手法。一方面承认内因是本质的、外因乃是助力这个一般的最高原则，但马上又说某些国家的发展不能用内因说明，这就割裂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甚至以特殊否认一般，为他的外因决定论服务。

艾思奇对叶青的观点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外力有很大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外力的事实虽然要注重，但更要看到在这外力影响之下所进行着的内部的发展，不可轻视内因，仍然是要以内因做基础，仍然是要贯彻辩证法的以内因为基础的内外因统一论②。叶青指责艾思奇的观点是内因论，认为内因和外因是相互统一的，因而相互渗透、互相同一、互相转化、互相联系。把握其一而排斥其它，都不正确③。对叶青这种貌似公正、全面的论点，艾思奇再次针锋相对地指出，叶青说内因与外因必须是相互作用，然而他却不知道机械的相互作用与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区别。机械的相互作用是对等的，两方不分高下，这种相互作用只能形成叶青式的折衷主义。但在辩证法的相互作用里，两方面有第一义和第二义的分别。在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中，辩证法是要强调内因的第一义的决定作用

① 参见《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教育》杂志第1卷第5期。

② 参见艾思奇，《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读书生活》第4卷第4期，1936年5月。

③ 参见叶青，《内因论与外因论》，《研究与批判》第2卷第2期，1936年5月。

的①。

第八，对于生产力的不同理解。叶青认为，生产力实际上就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产生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产生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有什么生产工具或生产力，就有什么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政治制度和观念形态②。

沈志远等人认为，叶青把生产力等同于生产工具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依据唯物史观，阐明生产工具只有当它被人使用到生产对象（或劳动对象，即自然）上去，并且消费着一定的劳动力时，它才成为生产力的一个原素。生产工具、劳动力、劳动对象三者，只有当它们综合起来的时候，才成为一种生产力。假如各个单独地存在着，它们每一个都不配称为生产力，而且连生产力原素之一的作用都不会发生。叶青把生产工具看作唯一决定的因素，必然就会看不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看不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其结果必然滑向机械的"唯生产工具论"，导致"唯武器论"和否认社会革命的"宿命论"③。

上述八个方面问题的争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与张东荪等人唯心论、形而上学旧哲学之间的较量，成为30年代哲学大论战的重要内容。

中国发生的这场哲学论争，也可以说是苏联哲学界理论斗争的一种反映。中国的假马克思主义哲学骗子叶青所玩弄的一些花招，宣扬所谓"哲学消灭论"等，都可以从苏联机械论、唯心论哲学家那里找到它的原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论争中所坚

① 参见艾思奇，《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读书生活》第4卷第2期，1936年6月。

② 参见《哲学到何处去》第136—137页，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11月版。

③ 参见《叶青哲学往何处去》，《读书生活》第4卷第5期，1939年6月版。

持和宣传的理论观点，也参考和吸收了苏联哲学界论战的主要成果。肯定这一点，丝毫不排除这场论争发生的深刻的国内根源。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对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革命理论的广泛传播，而且要求理论与实际结合，使理论成为革命者的行动指南和革命政党制定政策、策略的依据，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对此，一切敌视和反对中国革命发展的人，必然会站出来，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抹杀其鲜明的战斗性和科学性，使其变成对统治阶级无害的理论清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只有不断的揭露那些假马克思主义哲学骗子的种种诡辩手法，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论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由此可见，30年代对叶青的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揭露和批判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对于中国人民掌握正确的革命理论和方法，对于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结合，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 四、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论争

中国30年代，发生了一场辩证法（又称为“动的逻辑”）和形式逻辑（又称为“形式论理学”）的争论，这是当时哲学论争的组成部分。这场争论，并不是国内的一种孤立现象，而是有其国际和历史原因的。

1930年，苏联哲学界开展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出版的一系列哲学教科书，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等，都设有专门章节批评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当作形而上学、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彻底否定，主张用辩证法来取代形式逻辑。这种做法当时在苏联哲学界是占统治地位的，它对中国的新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争论，大致发生在1930年至1940年间。参加的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拥护者，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对者，拥护者和反对者的意见固然不一，就是在拥护者或反对者的内部，观点也不尽一致，因而使争论更加复杂化。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和主张：

（一）坚持唯物辩证法，否认形式逻辑

以艾思奇、王特夫、李达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大众哲学》、《论理学体系》和《社会学大纲》等论著中，以恩格斯关于辩证法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①的论述，以及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是同一的观点为理论根据，从捍卫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出发，肯定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规律，较之于形式逻辑，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完善性。认为形式逻辑是一种孤立的、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是和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形式逻辑已经完全过时，失去作用，应该彻底抛弃它，用辩证法取代它。艾思奇等人的观点，和苏联哲学界的情况一样，是得到新哲学界多数人拥护的，影响较大。在延安的毛泽东，读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及艾思奇、李达等人的著作后，也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他在写作《矛盾论》时，专门写了“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其中也混淆了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区别，对形式逻辑作了类似于苏联哲学教科书那样的批评，这一节后来在《矛盾论》正式公开发表时删去了②。

艾思奇等人十分强调唯物辩证法的地位和作用，这在当时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否认唯物辩证法的错误，是很有必要的。但他们把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对形式逻辑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则是错误的。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② 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0页。

学问题》后，把形式逻辑当作形而上学加以否定的错误做法开始得到了纠正。当年持有错误观点的哲学家们也作了自我批评。

（二）夸大形式逻辑的作用，反对唯物辩证法

张东荪等人认为，形式逻辑是思想上的规律而不是事实的规律。所谓思想，完全是人类用符号（即言语）所表示的东西。这些符号是人造的，不是事实的映象，与事实无关、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内在规律就是所谓逻辑。形式逻辑是说话的法则，辩证法不是说话的法则，所以不能用辩证法来代替形式逻辑①。形式逻辑对付动的事物是有办法的，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够用，不必再重新发明一种动的方法学（即辩证法）。而这种动的方法学并不能对付动的事实，因为它自身充满矛盾，根本不能成立②。张东荪等人，虽然区别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但又把形式逻辑说得完美无缺，把形式逻辑的作用从一定的范围扩大到一切领域，用它来代替所有的思维规律，最终走到了完全否定辩证法的极端，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张东荪等人紧紧抓住形式逻辑不放，固然是为了证明形式逻辑是一门科学，但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和当时广泛流传的唯物辩证法相对抗，企图以形式逻辑来否认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是他们的错误的根本要害所在。

（三）主张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分疆而治”

叶青、李石岑、王昭公、李季、范寿康等，在基本肯定辩证法是比形式逻辑更为高级的思维方法的前提下，认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可以“分疆而治”，各有各的领域。从前是形式逻辑支配一切研究领域，现在则把它限制在相对的静态中。因为客观物质世界具有运动和静止两种状态，辩证法适用于运动状态，形式逻辑适用于静止状态。然而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所以辩证法占居

① 参见《唯物辩证法论战》第135页。

② 参见《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新中华》第1卷第18期，1933年9月。

主导地位、形式逻辑附属于它，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任何一方主张简单地否定它一方，都是片面的[①]。

（四）主张把形式逻辑溶合于辩证法之中

在争论中，还有的人既反对简单地抛弃形式逻辑，也不同意“分疆而治”的观点。卢心远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是辩证法否定形式逻辑，这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是抛弃形式逻辑的糟粕，取得它的精华，再加以辩证法的锤炼，使其溶解于辩证法之中，成为辩证法的整个构造之一部分。辩证法是个充足的方法，它能够处理事物的动态，也能够处理静态，客观世界没有绝对的静止，即使有人想复活形式逻辑这具僵尸来与辩证法平分地盘，也是徒劳无益[②]。谭辅之也主张，形式逻辑可以有条件地被限制地融合于辩证法之中，从而构成活生生的一个矛盾运动。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决不能并存、相安、分疆而治[③]。

（五）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看成是方法论和技术论两个部分

潘梓年1937年在《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中，试图解决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他把逻辑学分为方法和技术两个部分，认为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形式逻辑只是一种逻辑技术，它只配充当思维技术的角色，不够充当思维方法的资格，不属于思维方法。这样的区分，虽然使形式逻辑有了存在的地位和价值，但也没有能够纠正当时那种把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错误。潘梓年在肯定形式逻辑只是思维形式，不涉及思维内容的同时，又指责形式逻辑把自然的一切都当作静止的东西来观

① 参见叶青：《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研究与批判》第2卷第2期，1936年4月；李石岑：《辩证法与形式逻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5期，1932年5月；李季：《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② 参见卢心远：《艾思奇如何处理形式逻辑》，《思想月刊》第1卷第2期，1937年2月。

③ 参见谭辅之：《哲学批判集》第37页，上海思想出版社1937年5月版。

察，把事物看作各自独立的东西，看作一成不变的固定形态。这样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又滑入了混淆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之中。尽管如此，《逻辑与逻辑学》一书试图用方法和技术这两个名义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让它们各负其职，共同为思维服务，为思维所用。这种观点，在中国现代逻辑史上有着一定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以上五种主要观点，除第二种观点外，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即没有分清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的研究对象，及其任务和作用，也是有着根本区别的，简单地把形式逻辑学等同于辩证法和认识论，把形式逻辑误解为否定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形而上学，把存在于人们主观思想中的逻辑矛盾和反映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辩证矛盾混为一谈。其结果，必然是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勉强扯在一起，导致否认形式逻辑。

产生错误的根源，固然有种种外部原因，但也与形式逻辑本身存在的某些缺陷有关。亚里士多德在创立形式逻辑这门科学时，曾不自觉地混进了对思维内容的探讨，他预立了主词的存在，因而在叙述中往往把主词和它所指代的事物混淆在一起。经过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歪曲利用，越来越多地把思维内容的研究扯了进来。这种形式逻辑与黑格尔开始的赋于思维方式含义的“形而上学”，确是不容易区分得很清楚①。这正是30年代中国哲学界批判、否认形式逻辑的原因之一。

发生在30年代中国的这场把形式逻辑混同于形而上学，进而否认形式逻辑的错误思潮，是带有国际性的。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新兴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和掌握，不是一下子就达到完整准确的。当年对形式逻辑持否定态度的，绝大多

① 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1页。

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者、捍卫者，他们认为对形式逻辑的否定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据的，是辩证法的，却不知道产生错误正是由于没有掌握好辩证法，陷入了形而上学。同时，对苏联一些哲学著作的盲从和教条式的搬运，也是中国哲学家犯错误的原因。

批判、否认形式逻辑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妨碍了人们对形式逻辑这门科学的研究和掌握，造成了语言逻辑上的混乱，影响了理论工作者逻辑思维水平的提高。但是，也正是这一辩论，引导和推动了人们去深入地探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及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为后来人们正确地认识形式逻辑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日益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经验教训，冲破了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中国的实际，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创立了关于这条新道路的理论和方法。在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斗争，从哲学上总结了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经验，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在斗争中创立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 一、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提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已有成功的先例。然而，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地方武装割

据，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则是没有先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这一条特殊的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杰出贡献。科学地阐明这一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作，是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

（一）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实践依据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法国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通过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而夺取政权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中心工作，也都是集中在城市。因而，在城市组织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初期，由于还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还缺乏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因此也就根据国际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传统思想和经验，以大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起义，以此想夺取大城市。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许多省市发动了数次武装起义，虽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反动派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自己又没有广大的革命根据地，结果都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1927年9月，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原计划也是以进攻大城市长沙为目标，但起义部队在战斗中受到了各种挫折。对此，毛泽东及时分析了主客观条件，吸取了其他部队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攻打长沙是不利的，于是决定率领起义部队向反动派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他许多地方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也都由于敌强我弱而受挫，后来大都放弃了进攻城市的计划，转到反动派统治力量薄弱的偏僻乡村，进

行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其中，最著名的有彭湃开辟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洪湖和湘鄂革命根据地等。反动派曾千方百计地妄图消灭这些革命势力，结果，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愈战愈强，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和扩大。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其他许多地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打破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的传统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一条特殊的新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和中国的国情相符合的，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

（二）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基本观点。恩格斯说："工人要取得胜利，除了暴力革命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①。可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马列主义这一重要思想，不了解发展人民武装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因而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不允许武装人民，在农村解除了农民自卫军武装，在城市解散了工人纠察队，把所有的枪弹交存政府，要求工农武装队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甚至对童子团，也命令停止活动，收缴其棍棒，等等。这样的妥协退让，就更加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于是，当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反动派就以手中的反革命武装，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革命者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残酷地镇压。

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和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之后，注重建立和发展人民军队。特别是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集中了党内的正确主张，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②的思想，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

运用唯物辩证法，具体阐述了工农割据和武装斗争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①武装斗争，是工农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②离开了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是流寇主义，军队本身也得不到补充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离开了武装斗争，就失去了捍卫者，也同样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

由于反动派不断向红色区域发动军事进攻，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为了保卫红色区域，都把消灭敌人的军事斗争放在首位，毛泽东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③正式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这两支武装力量，是革命根据地的根本支柱。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整体，其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也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必然结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从理论上认识到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只有建立一支自己直接领导的军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既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革命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与缩小、巩固与丧失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农村革命根据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2页。

开展武装割据的初期，刚刚建立起来的弱小红军如何战胜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有优良装备的、人数众多的国民党政府军的“围剿”，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极端严峻的问题。毛泽东、朱德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出发，总结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的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红军的作战原则，为毛泽东军事学说的形成和系统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三）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

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毛泽东称这是世界上的一种“怪事”①。这种现象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在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过，在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也是未曾有过的。毛泽东分析了工农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并指出：“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②从政治上来说，在许多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中国各派新旧军阀之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力量，因而长期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权，这就为工农红色政权的局部割据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分裂和战争，在他们统治力量薄弱而偏僻的乡村，建立和发展工农红色政权。从经济上来说，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资本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主义经济，而是分散的地方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其独立性较大，对城市的依赖性较少，这对于无产阶级到农村去组织和发展革命力量，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物质条件。工农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地方，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是受过革命的影响、有过群众革命运动高潮的地方。因此，工农红色政权在这些地方发生和发展，便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由于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于是在红军和地方党内部有些人就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到事物的实质，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思想，如林彪就曾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①的疑问。特别是在"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②的时候，有些人会不自觉地把一时的特殊小环境，扩大起来当成全局，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都不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得很。这是一种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实质的观察方法，对此，毛泽东给人们指出了正确地分析现象和本质的科学方法，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③掌握了这种辩证的分析方法以后，要进一步抓住中国革命的实质，还必须对直接影响中国革命发展的各种矛盾加以科学的分析。所以，毛泽东又说："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④接着，毛泽东分析了统治者内部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回答了上述问题。这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页。

盾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于是，又造成了中国境内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地混战。伴随这些矛盾而来的是国内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统治者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烈。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可以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①，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以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发展形势。这就表明了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是中国现代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规律。

由城市武装起义，到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这一战略上的大转移，表明在不同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对外国的成功经验不能照搬，而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经验，找出符合本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样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才是真正的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二、《反对本本主义》发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时，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写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学著作。1930年8月，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曾有油印本、石印本流传。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对于制定正确的路线、策略，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要联系中国实际，反对教条主义。这一重要思想原则，在1929年12月，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里已有了雏形。"决议"对纠正主观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主义提出了两条办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①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把这两条统一起来，初步地表述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所以，这篇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经验的哲学总结，它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针对红军内和党内存在的一种不作调查、不了解实际情况而空发议论、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主观主义作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②。由此，他精辟地阐述了调查研究和人们的认识的关系，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③的著名论断。1931年4月，毛泽东在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④补充和发展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使其更加完善了。这表明人们要认识客观事物，首先要通过直接参加变革它的实践，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事事都亲身直接去实践，那就必须要靠调查，也就是间接的实践，因而调查研究就是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途径。对于一个事物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没有参加变革它的实践活动，又没有对它进行调查研究，完全不知道其中的详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0页。

②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下同），第1页。

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页。

情，只凭主观想当然发表议论，必定是瞎说。这种脱离实际的没有任何根据的主观主义瞎说，既不能认识事物，更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混淆是非，造成思想混乱。因此，取消这种瞎说者的发言权，是理所当然的，是公道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扭转主观主义的作风。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中央苏区地方政府和红军内的某些干部中，存在着碰到困难问题时，不知如何采取正确的办法去解决，他们或者不作调查，只是独自冥思苦索想办法；或者看到一点表面、枝节现象就想解决问题；或者只是叹气，埋怨自己“才力小”，等等。毛泽东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提出了解决这些思想认识问题的理论和具体办法。他把调查研究同解决问题联系起来，阐述了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解决问题是调查研究的目的。事实上解决问题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难。所以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① 因此，毛泽东特别号召广大干部多到群众中去，“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②，事事向人们请教，作好调查研究，把困难的来源找到手，把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弄明白，头脑中有了这些材料，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有了，这办法就在调查研究之中。毛泽东还用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调查与解决问题的因果关系，这就是“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③ 他最后得出结论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④

坚持调查研究，才能洗刷唯心精神。对于调查研究同原则、策略的关系，毛泽东首先坚持了恩格斯曾经说过的“原则不是研

①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页。

③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页。

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他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②要制定革命斗争的正确策略，必须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现状及其历史，弄清各阶级的互相关系，以便作出正确的阶级估量，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哪些阶级是同盟者，哪些阶级是敌人，是要打倒的对象。然而，离开了调查研究，凭主观想象行事，就要走向相反的方面去，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所以，只有“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③也就是克服主观主义，避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的出现。因此，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从实际出发，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要不要进行调查研究，也是直接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 （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27年下半年到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内逐步出现了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由此，引起在党内讨论问题时，常常有人张口闭口“拿本本来”④，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⑤，以为照着“本本”去做，总是不会错。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观点和做法，并且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本本”上的东西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之所以正确，并不因为只是从“本本”、“上级”的意义上来说的，而是因为它的内容符合客观实际，是革命斗争所需要。相反的，不根据实际情况，“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页。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页。

④⑤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页。

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①由于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作怪，就使得党的策略路线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只有把上级的指示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上级指示，才是正确地对待上级指示。

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本本主义的研究法，脱离群众的革命实际，以主观的想象代替客观实际。把这种方法用于指导革命工作，会对革命带来危害，遭致革命的失败；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同样是最危险的。他不同意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

毛泽东对本本主义者的批评，并不是完全否定“本本”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对“本本”所持的错误观念。他在批评本本主义的同时，又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本本”的重要性，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②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如何纠正这种本本主义，毛泽东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这就是“向实际情况作调查。”③

（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这就必须要靠自己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然而，这种正确的斗争策略，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想象所能够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8页。

②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页。

产生的，它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够产生，在实践中才能产生。毛泽东批评了持保守思想路线的人，指出这种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形式的空洞乐观头脑的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饱食终日，把“本本”看成是“既定办法”①，以为只要固守这些办法，一字不差的按这些办法去作，就可以保障永远的胜利。

毛泽东在批评这种保守思想路线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②，也就是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调查，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强调这条思想路线时，大声疾呼，号召各级干部到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去作实际调查，迅速改变保守思想路线。对此，他具体提出：凡担负各级领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支书记，都要实行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亲身从事社会实际调查。同时，又详细地指出了调查研究的方法，要作好调查，必须开好调查会，要吸收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参加，调查者事先要准备好调查纲目，自己口问手记，并与被调查者一起讨论，开成一个讨论式的调查会，这样才能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等等。在认真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正确地指导各项革命工作，各级干部，只有按照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去工作，才能不断地开创新局面，推动革命胜利前进，并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创造和发展革命理论。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中，从理论和政治的高度多方面地论述了调查工作的重要性，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杰出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也具有首创意义。然而，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

①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8页。

没有被当时一些犯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领导人所接受，反而受到指责，被他们讥笑为“狭隘经验论”。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证明，真正应当受到讥笑和谴责的不是毛泽东，而是不作实际调查，不懂得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只知背诵和照搬“本本”，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 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活动及其特点

毛泽东在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社会调查，他不仅要求全党坚持调查研究，而且本人经常深入群众，亲自作了一系列的调查，掌握了研究中国国情的第一手材料。他除了写出《反对本本主义》的理论专著外，还写了大量材料丰富、生动的调查报告，记录了中国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实际。在这些调查报告中，他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调查研究是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是制定正确政策指导群众实际斗争的基础。

### （一）从工矿企业到农村的调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多次深入工矿企业，作过工人调查。1921年9月至1922年冬，他先后四次到江西安源煤矿调查，1922年夏到湖南省水口山铅锌矿调查，1922年又调查了湖南省长沙泥木工人的状况。在调查中，毛泽东了解到这些工矿企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发现其管理混乱，经营腐败，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资本家为了榨取高额利润，对工人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工人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条件下劳动，他们住着破草棚，吃着霉米烂菜，如此贫穷不堪的生活条件，加深了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从而不断激起了工人自发的反抗斗争，但都由于没有一个坚强的组织统一领导而失败。毛泽东针对工人的经济、政治要求，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介绍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新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

业绩，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启发工人的革命觉悟，使他们懂得，资本家和反动官僚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是工人贫困的根本原因。只有结成团体，成立自己的组织，向资本家、反动官府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才能解除贫困，获得解放。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农民运动的兴起，毛泽东又深入农村调查农民运动。特别是大革命正在胜利前进的关键时刻，为了回答党内外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的不同看法，1927年春，毛泽东亲临湖南省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实地考察了农民运动，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重要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大量的是集中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当时为了制定和完善土地政策、商业政策，学会管理城镇，发展经济，保证供给，他深入农民、商人、手工业工人和基层干部中，进行了广泛的农村调查。1927年11月，毛泽东率领部队进入井冈山初期，对永新县和宁冈县做了调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调查，但由于反动派1929年会攻井冈山，其调查材料全部遗失了。1930年5月，毛泽东对江西省寻乌城的商业、手工业和土地分配的历史变化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写了《寻乌调查》报告。毛泽东称这是他当时作的一次“最大规模”① 的调查。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了解到寻乌城及其商业、手工业兴衰的历史，了解到城镇内部的各种复杂关系，了解到商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的品种及特点。寻乌城曾经是生活日用品、副食品生产和交易的一个重要地方，制定正确的政策，发展城镇手工业和商业，对于繁荣革命根据地城乡经济，支援红军，巩固红色政权，粉碎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30年10月，毛泽东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1页。

对兴国县永丰区八户农民作了典型调查，写了《兴国调查》报告，反映了土地斗争后，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正确的土地政策，不只是雇农、贫农得到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就是中农也得到了利益。特别是对富农和地主都留给一定数量的土地，给了生活出路，使他们能够活下去，这就大大减少了革命的阻力。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对八户农民家庭所做的深入细致调查，对于深刻地认识农民具有重要意义；他说："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①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一个家庭的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反映了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关系。因此，具体地解剖单个农民家庭，是获得农村基础知识的重要环节。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多次发动围攻，同时又加紧经济封锁，给根据地军民造成了极大困难。要战胜这些困难，必须要依靠群众，动员组织群众。然而，在一些乡、市人民政权机关中，却存在着脱离群众、工作敷衍塞责或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大大妨碍了革命任务的完成。为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1933年11月在江西省兴国县的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的才溪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在调查中，毛泽东发现了这两个乡的先进经验，指出："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②，正确解决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支援革命战争的关系。毛泽东总结和宣传这两个乡的先进经验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供给那些落后单位以具体的活生生的榜样，特别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③ 教育那些官僚主义者，迅速改变作风，改变工作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8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6页。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87页。

方法。1934年1月，在江西省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根据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先进工作经验，概括出了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阐述了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完成任务的关系。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是瞎说一顿。"① "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② 所以领导机关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把一般号召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使领导机关的号召付诸于实践，变成群众的行动。

（二）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特点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贯穿于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但大量的是集中在土地革命前期，从调查的内容和方法看，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1.调查的次数频繁，持续的时间长。从1927年10月至1933年11月的六年里，进行了十多次调查，其中大多集中在1930年。调查的范围比较广，从山区到平原，从一个家庭到一个村、乡、区、县、从农村到城镇。调查的内容系统、深入，涉及到土地斗争前、后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许多方面的状况及其变化，特别是土地变化的状况，还有生活日用商品的生产过程、品种、价格，以及同周围各县的交易等。

2.调查研究的经常化和制度化。由于毛泽东的提倡，特别是在他的调查研究实践的带动下，在红四军中产生了很大的影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126页。

响。1929年8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把红四军的调查工作列入了汇报的重要内容，叙述了红军游击队每到一地，首先有组织有领导地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了解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土地分配情形，以及地形观察、交通河流测量等。中央军委听了汇报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给红四军前委作了指示，肯定了红四军调查工作的成绩，并指出："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过去有许多调查成绩，因没人统计以致放弃，甚属可惜。前委应指定专人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①1930年6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中，对军、纵队、支队和大队各级政治部的调查工作，作了详细的规定，有调查表格，有调查要求，调查的材料有汇总机构，并要求各级政治部指定专人负责。这就标志着红四军把调查研究作为经常化的制度规定下来了。这一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掌握社会实际，并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和策略，是少犯错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这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重要表现。

3.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不是进行个人学术探讨，而是适应和服务于中国革命的需要，认识中国的国情，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制定和不断完善民族民主革命的路线、政策和策略。

4.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主要不是搜集历史文献资料，因为这些资料都集中在城市，而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则在农村，所以他主要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亲自深入实际，直接向社会调查，向参加实践活动的群众作调查。调查的对象比较广泛，有贫农、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5页。

中农、手工业工人、红军战士、有乡、区、县干部，有商人、农村秀才、小学教师等。毛泽东对于自己直接在群众中调查到的第一手材料，一向很重视，非常珍惜，他曾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①

5.在调查地域的选择上，毛泽东不仅善于把握其特殊性，而且善于把握这一地区同其他地区经济、政治和民众文化生活习惯的共同性。他选择寻乌城作为调查的典型，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寻乌城，位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相差不远，明了一个县的情况，就可以大略的了解周围各县的情况。兴国调查点的选择，毛泽东也是采取了上述方法，主要是选择了兴国县永丰区，它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个县的交界处，三个县的土地斗争情况相差不多，明了这个区的情况，就可以明了这三个县，甚至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

### （三）调查研究对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重要性

要正确地改造中国，首先必须要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只有熟知中国的国情，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首先是通过深入群众，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调查研究得到的。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很薄弱，大城市和主要的经济命脉都是掌握在帝国主义、封建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手里，这就使中国革命遇到了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毛泽东通过广泛的农村调查，了解到中国农村经济和政治的详细情况，并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正确地解决了革命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需要有怎样的政策和策略，才能发展革命力量等许多重要问题，把握了中国革命的逻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1页。

辑。

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十分残酷，不仅农民中的雇农、贫农有反封建的积极性，而且中农也有这种积极性。所以，毛泽东主张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大多数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对于富农，实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限制政策，对地主阶级，实行阶级消灭政策，没收其剥削而来的土地财产，但对地主本人仍留一部分土地，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得到改造，自食其力。同时，把豪绅地主、反动派同他们的家属严格地区分开来，实行这样一些区别对待的不同政策，就大大减少了革命的阻力。这些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不是一蹴而成的，是经过毛泽东反复调查研究，不断地发现问题，纠正错误的部分，从而得到完善的。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路线，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斗争路线。这条路线，及其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在马列主义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在外国的经验中也是没有的。但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正确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的农村政策和策略，虽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然而，却没有立即被全党所理解。当时，有些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产生了一些“左”的政策，企图一下子消灭一切剥削，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富农（即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即地主不分田），不给地主生活出路，烧毁商人帐目，取消税收，主张所谓“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搞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在政治上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等等。这些“左”的作法，必然把许多本来可以团结的人推到了敌人方面去，给革命增加了障碍，使贫雇农陷入了孤立。这表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虽然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原则，但如何结合得好，却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这一结合原则，一开始就遭到了教条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自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但实际上，他们不愿意下工夫研究中国的国情，不愿意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而是简单地把马列主义的著作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认为只要背熟了这些著作，就可以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现成答案。然而，客观实际总不是他们头脑里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把握客观实际，不从实际出发，关起门来制定政策和策略，即使自认为想得很周到，但还是要在客观实际面前碰鼻而失败。在《兴国调查》的“整理后记”中，毛泽东强调“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①

毛泽东所作的大量实际调查研究表明，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总是同勤于坚持调查研究联系在一起，而错误的政策和策略，总是同不调查、脱离实际的工作方法联系在一起。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使毛泽东比较早的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具体的认识了中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基础，在他的领导下制定的农村政策，就比较符合农村的实际。这就大大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军，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82—183页。

##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由初步形成到系统化的过渡

从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到1937年《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由初步形成到系统化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宣传，开展了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哲学论战；另一方面，战斗在革命根据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紧战争空隙，特别是利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国内时局转换这一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努力学习、钻研马列主义著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积极从事理论创造活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本土，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为着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政治形势，迎接全民族抗战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迫切需要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系统地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为此，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入阐明了党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政治学说和军事学说中的辩证法。

###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精神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

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国内局势的发展，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这次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党在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做了完整的分析和系统的说明。

**（一）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新变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毛泽东指出，将近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1935年发生的"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进一步显示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占领全中国，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是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1937年5月，他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做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成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主要的矛盾，从而把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一般的或其他某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互相联系、交织在一起的。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并且变动了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地历史地剖析了在中日矛盾面前国内各阶

级和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和动向。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坚决的力量，是抗日的主力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也是要求抗日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则历来是革命的对象，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是一群卖国贼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但从另一方面说，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这就必然会损害其它帝国主义的利益，扩大它们之间的矛盾，因而"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① 因此，"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②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应当这样。这是毛泽东在对敌斗争方面坚持、运用辩证法，对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策略原则，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又一次着重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一方面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总的特点是动摇。他以九一八事变以来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云一时的抗日人物，从国民党营垒中分裂出来的大量历史事实为根据，说明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时刻，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是有可能抗日的，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这种僵死的形而上学观点。

毛泽东通过对当时极端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及其变化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的科学分析，而得出的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的正确结论，不仅充分论证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实行政治策略上的转变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也为毛泽东后来从哲学上系统地论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特别是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提供了生动的实际材料。他在《矛盾论》等有关著作中曾多次利用这个材料来说明和论证问题。

**（二）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毛泽东就曾指出并具体分析过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他又针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再一次提出和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国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新的民族革命高潮正在到来，但是国内外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力量，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依然存在着。要使革命的阵势和力量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转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化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对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人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懂得在新形势下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只有通过长期艰苦耐心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页。

的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才能逐步发展和壮大革命阵线的力量。毛泽东在这里作出的革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由此而规定的革命的长期性、持久性的科学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以及对革命势力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强弱对比进行了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同时也有其哲学的根据。就是说，按照辩证法的一般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事物、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经常的、绝对的。革命的发展也必然是这样。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里，无论是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间的消长、变化，还是革命力量自身的聚集和发展壮大，都有一个由不平衡到大体平衡，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全局性质变的逐渐发展过程。这是革命发展的辩证法。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教训表明，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对革命犯急性病，搞"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错误的，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巨大挫折和失败。而"左"倾关门主义者不去积极地发展、扩大革命队伍，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同样是错误的，也是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反革命的。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同关门主义者的策略是根本对立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前者从当前形势发展的两个基本事实，即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出发，把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看作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是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需要。后者则不是从客观现实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臆想或"左"的思想框框出发，从"本本"出发，以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①他们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0页。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在“左”倾关门主义者看来，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笔直又笔直，而不懂得“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① 他们也不了解当着革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革命的策略和领导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关门主义者的这种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正是他们犯错误的重要思想认识根源。毛泽东在这里揭示了党内两条策略路线对立的思想实质，把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加以揭露和批判，这是非常深刻、透彻的。

除以上所述，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还阐述了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自力更生和争取国际援助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重要问题。其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些基本思想和范畴，如事物相互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内因和外因，根据和条件，等等。

##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哲学思想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了讲演，系统阐明和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和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原则分歧，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和哲学原理，同时也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了前人特别是中国古代兵家的军事哲学思想成果。全书结构严谨，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处处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1页，

鲜明地反映出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对立实质上是两条思想路线、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立，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是一篇杰出的军事哲学著作，它标志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在全书开篇即第一章概论部分首先提出了“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原则。随后在其他章节中，就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根本规律，中国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按照该书的主要内容和叙述的基本逻辑顺序，大体上可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一）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必须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和人类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实践活动，较之别的社会现象或社会实践活动有更大的流动性、不确实性和偶然性，但它仍有其自身发展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谓战争的客观规律，也就是战争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诸因素内部的本质的联系，它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决定着战争发展的总趋势。研究战争就要研究战争的规律。不懂得战争的规律，就不懂得如何指导战争，也就不能打胜仗。战争有其一般规律，又有其特殊规律。前者反映的是一切战争的共同本质，后者反映的是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个别战争的特殊的本质。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从哲学上说就是一般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一般不能完全包括特殊，代替特殊；而特殊中却包括着一般。研究问题要以一般作指导，但不能从一般出发，而只能从个别、特殊出发。毛泽东针对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

命战争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①要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就要从战争的具体情况出发，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区分不同战争在时间、地域和性质上的差别，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这是因为，战争总是具体的，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发生的。从时间上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不仅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特点，同一时期的各个阶段也各有其特点；从地域上说，各个国家、民族有自己的特点；从性质上说，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均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只有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出发，研究其特点和发展变化，才能找出它的特殊规律。抽象地、机械地谈论和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是不可取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从“本本”出发，只知道背诵现成的军事条令，而不懂得一般战争和特殊战争的关系，不懂得战争和战争规律是发展的，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去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战略战术。他们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的经验和苏联内战的经验，把红军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作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拒绝了解变化了的特殊情况，拒绝中国红军血战史的经验。他们用这种“削足适履”的办法来指挥战争是非打败仗不可的。实践证明：由于他们战略指挥上的错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其结果是，红军主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最后由30万人，剩下不到3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由30万降到了4万，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白区的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这个血的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途径。”① 王明等人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什么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而他们恰恰忘记了这一点，从根本上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毛泽东关于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论述，关于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必须着眼其特点和发展的论述，以及对战争问题上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批判，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具体运用和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它不但适用于研究和指导战争实践，而且也适用于认识和研究其他各种事物，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二）研究战争规律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论述，精辟地阐明了战争的起源与实质，战争的不同性质和类型，革命战争的历史作用，消灭战争的途径和方法，以及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根本立场和态度等问题。他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②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归根到底是为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这是战争的本质和根源。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可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类，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反革命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这是由它们所代表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阶级利益和所实行的政治目的不同决定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会消灭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办法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只有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之时，才能结束一切战争，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历来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目的就是为了最终实现这个崇高理想和历史使命。“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这些论述，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渗透着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深刻地教育全党同志要充分估计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注重学习军事，努力研究和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用革命战争去反对反革命战争，从而达到最后消灭战争的目的。

(三) 战争中全局和局部的相互关系

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关系战争的全局问题。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所谓战争的全局，从空间上说，包括组成某一战争整体的各个部分和方面；从时间上说，包括整个战争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一句话，“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②战争的局部则是指组成整个战争的一个部分或一个阶段。全局和局部的区别和界限是相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全局性的东西，在另一条件下则可能是局部性的东西，反之亦然。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战术学的任务。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1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毛泽东针对王明等人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役、战术的关系，揭示了战争全局和局部关系的辩证法。他首先着重指出，全局高于局部、统帅局部，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必须树立全局观点，研究和解决好战略指导问题。这是因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即使是对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来说，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也是很必要的，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所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都应当有战略头脑，胸怀全局，把自己注意力的重心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掌握带全局性的战略指导规律，既要从横的方面考虑到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又要从纵的方面考虑到这一阶段和下一阶段，这一仗和下一仗，初战和再战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主动地驾驭整个战争并夺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又指出："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① 要指导全局，就要了解局部，关心局部，注意解决好各个局部的问题。由于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各个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影响作用是不一样的。有时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对全局来说不起重大的影响，但若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譬如下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一着"就是对全局胜负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因此，战争指挥员要善于抓住那些对于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这是战略指导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哲学上所说的抓主要矛盾的问题。至于怎样抓，哪些是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或者重要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节，则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具体分析，而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

（四）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必须通过战争实践

毛泽东根据人类战争史，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强调指出战争指挥员要做到智勇双全、多打胜仗，必须使战争的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否则就会犯错误，就要打败仗。他告诉人们说："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①因此，"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②要做到这一点虽然不容易，但这是指导战争所必须遵循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是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那么，怎样才能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使二者好好地符合起来呢？

毛泽东指出，要善于学习，主要是在战争实践中学习，知彼知己，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③这是因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只有亲身参加实践才能获得真知。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脱离战争实践只是在纸上谈兵或者初出茅庐缺乏战争经验的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战争的，更谈不上把握战争规律，成为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也是革命战争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学习，干就是学习。”① 毛泽东强调从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同时也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② 他还说：“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③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这里并不是主张在战争实践中盲目地乱碰乱撞，以干代学，可以不办或者不进学校，不学习军事理论，不接受别人经验。问题是在学习军事理论和别人的经验时，要以自己的实践作基础，把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很好地结合起来，善于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有鲜明针对性的。如前所述，党内教条主义者从不向实践学习，一味迷信书本，盲目地照抄照搬外国的军事理论和作战经验，并且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他们完全不尊重中国红军自己流血的经验，否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原则，认为这些都是山沟里产生的东西，而山沟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在他们眼里，毛泽东并不懂得打仗。只不过从《三国演义》一类书中学来一些战法。对此，毛泽东曾回答说：“是的，我不懂他们那种蠢猪式的打仗方法；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也看过不少关于外国战争的书，但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④ 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而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对战争和指挥打仗才真正是外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7页。

④ 转引自《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行，一窍不通，或者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完全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在这种情况下硬要指导战争就只能是主观主义的，使革命战争遭受挫折和失败。

（五）揭示战争规律的辩证认识过程

要真正认识战争，把握战争的规律，还必须通过战争实践使自己的认识不断深化。这是因为主观符合客观有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毛泽东把对战争的认识过程区分为制定军事计划和实行军事计划这样两个阶段。他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① 毛泽东的这段话，层次分明，逻辑严密，既唯物又辩证，讲得非常精彩、透彻。在这里，他指出战争认识的对象或调查研究的对象包括敌我两个方面，既要搜集敌方的各种材料，同时又要了解自己方面的材料，并要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分析，这是认识的客观性和全面性的要求。他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诀，要求运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思维方法对所得的材料进行加工制作，使感性的东西上升到理性认识，作出判断和结论，从而为制订军事计划提供依据。同时，他把侦察、判断、决心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164页。

部署四个环节有机地统一起来，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了军事指挥员在制定军事计划之前对战争的认识过程的完整性和周密性，其中最关键最基本的环节则是必要的侦察和对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舍此而下决心，部署军事行动，必然是盲目的、鲁莽的。有些军事家所以在战争实践中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或不愿意懂得这个道理。

认识战争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实行军事计划。这是前一认识过程的继续。正如毛泽东所说："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① 这一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说也就是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过程，比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意义更加重大，它是检验和深化人们的认识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一般地说，人们制定的计划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有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证明。原有计划通过实践检验如果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实际，就要根据新的情况和认识加以修订和补充。特殊地说，由于战争或战斗过程中各种因素和情况较之其它事物和过程更为复杂、隐秘和曲折多变，因而军事计划更有必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地加以检查和修订。事实上，军事上的计划、部署同客观实际情况统统相符合的情况是很少有的，而部分地改变原定计划则是常有的事，全部地改变也是间或有的，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人的认识总会有某种局限性，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军事鲁莽家不懂得这个道理，对已定的计划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非碰壁不可。毛泽东通过对战争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具体运用和发挥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坚持和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六）在尊重战争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

人们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战争规律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以争取战争的胜利。而要认识和利用战争规律又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战争这一社会现象，既是作战双方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各种条件和力量的竞赛，同时也是作战双方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前者决定了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后者是变可能性为现实性的决定因素。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的条件，军事家不能超越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这是战争的唯物论观点。他又指出，战争的胜负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也就是军事指挥员认识和利用战争规律，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这是战争的辩证法观点。毛泽东用演员和舞台的关系作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客观物质条件、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中国革命战争的成功经验表明，在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提高主观指导的能力，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是能够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的。毛泽东要求每个红军指挥员都要努力学会战争的游泳术，掌握指导战争的规律，成为既勇敢而又明智的英雄。他自己也正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实践的。他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为红军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在以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的战争舞台上，充分发挥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威力，统率全军，导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举世闻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家。

（七）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毛泽东根据长期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以在革命斗争中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教育了全民族几万万人，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使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走向胜利和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而党的领导主要地要依靠自己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1924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党内曾先后出现过陈独秀、王明等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致使中国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 毛泽东的这个带规律性的结论，是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反映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辩证法。它对于中国共产党内开展反倾向斗争和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原则分歧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具体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即：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和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第一个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0页。

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他在分析了这四个特点和两个“规定”之后，进一步加以综合，从总体上得出结论说：在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顺利的条件和困难的条件这两个方面。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土地革命战争和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从这里联系到毛泽东的其它一系列政治、军事著作，可以看出他在研究和认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问题时，一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中国的历史特点、社会性质、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形势和敌我友诸方面力量对比及其发展变化，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错综复杂的矛盾状况，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从而制定出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

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之后，又根据十年内战史的经验指出，中国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是敌人“围剿”和红军反“围剿”的长期反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必然表现。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之前，这种“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形式是不会变化的。这里所说的反复，只是就战争和战斗的形式而言，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的反复，而是每次不同的。从历次“围剿”和反“围剿”斗争的实际经过来看，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毛泽东指出的这种形式上的反复和内容上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国内战争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根本特征，即事物发展的螺旋式上升，或者说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否认敌强我弱这一客观事实，不了解中国内战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因而看不出也不相信“围剿”和反“围剿”斗争的长期反复是中国内战的特点和主要形式。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

量，低估了敌人的力量，硬要当时还很弱小的红军去攻打守敌强大的武汉、南昌等中心城市，命令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妄图在短时期内结束战争，一举而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这种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完全是主观主义的，违背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其结果只能使红军在敌人的"围剿"面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导致革命战争的失败。

### （八）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毛泽东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全面总结了红军的作战经验，详细地论证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实现这一方针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方法。这些都是毛泽东军事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它们同"左"倾军事路线的战略战术针锋相对，形成了尖锐的鲜明的对比。

在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这个总形势下，实行战略防御，无疑是红军作战中的一个首要问题。"左"倾冒险主义者否认红军采取战略防御的必要性，他们只知道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而不知道在进攻中也有防御和后退。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① 这是非常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生动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曲折前进规律。

在战略防御问题上，两条军事路线的对立进一步表现为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种方针的对立。毛泽东指出，积极防御，即攻势防御、决战防御。也就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我们在战略上是防御的，但在战役、战斗上我们是进攻的，目的是求得弱小红军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0页。

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削弱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积战役、战斗的胜利，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另一方面，在条件具备时，应当坚决、及时地将战略退却转变为战略反攻，进而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最后通过战略决战，彻底地打败敌人。积极防御是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核心。进攻和防御是一切战争的两种基本的作战形式，攻和防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又互相转化。没有进攻的一方，就没有防御的一方；攻中有防，防中有攻，防是为了攻，防要转入攻，攻防结合，二者既对立又统一。这是军事辩证法的基本道理。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这个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提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战略上防御和战役、战斗上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战略上的退却、防御、反攻、进攻和决战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丰富了进攻和防御、战略和战役、战斗之间的辩证统一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有力地证实了积极防御这个战略思想的生命力和正确性。王明等人坚持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采取军事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当战争遭到挫折和失败时，又只知一味退却，实行逃跑主义。他们是消极防御论者，根本不懂得也不去准备和实行有利条件下的战役、战斗上的进攻。这种消极防御实质上是假防御，它只能使自己处处陷于被动局面以至节节败退。造成这种错误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就在于他们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进攻和防御，把它们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认为防御就是防御，防御中不可能有任何进攻，否认进攻和防御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统一性。

诱敌深入，这是实行积极防御的重要作战原则，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毛泽东在1930年10月江西罗坊召开的红一

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上，最早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并且在他所指挥的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应用成功了。但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却提出所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等貌似革命的"左"的口号，反对这一方针。究竟谁是谁非，历史已作出了回答。其实，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无论中国的或外国的，无不承认"诱敌深入"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许多实际战例都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毛泽东在驳斥主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人们提出的种种"理由"时指出：诱敌深入难免要暂时让敌人占去一些地方，但是，"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① "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② 这些话讲得非常通俗易懂，生动而有风趣，同时又富有深刻的哲理。它阐明了在战争中以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得与失、相反而又相成的辩证法思想，揭露了"左"倾冒险主义者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性，即："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结合，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③ 为了克服这种小生产者的近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5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6页。

毛泽东在这里强调指出："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① 这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认识工具的重要作用是非常重视的。

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用专门一节研究了集中兵力的问题，阐述了在革命战争中兵力的集中与分散的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和朱德一起就总结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印发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的第五条写道："我们兵力是集中的，敌人兵力是分散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断无不胜之理。"朱德在1933年写的《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中也指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如有人想处处顾全，平分兵力，结果到处没有力量，将演出东不成西不就甚或失败的结果。"②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正是这种人。他们从1932年开始，先后提出所谓"全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等口号，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是错误的，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不对。毛泽东批判了这种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的作战原则，论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他指出：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通过集中兵力可以改变敌我进退的形势、攻守的形势和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防御中的弱小的红军要从战略退却转变为战略反攻，从战略上的弱者和被动地位转变为战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6页。

② 《朱德选集》第14、15页。

上或战斗上的强者和主动地位，首先和主要的条件就是集中兵力。他说："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①他指出，"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少胜多，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但对战役和战术而言，则是"以十当一"，以多胜少。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只有通过战役、战术上以多胜少，各个击破，才能积小胜为大胜，实现战略上以少胜多，最终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在中国红军的战例中，依靠集中兵力，以多胜少，挫败强敌的战例是很多的，当然也有不少是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而打了败仗的。在这里，毛泽东还进一步说明，我们主张集中兵力，反对军事平均主义，但决不是一切都要集中，甚至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至于兵力究竟集中到什么程度，这要从实际出发，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根据敌人强弱、战斗的紧要程度、战场的地形和道路、部队的给养和驻处等具体情况来定。总之，不能把集中兵力的原则绝对化，而应机动灵活地加以运用。

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还详细地论述了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作战形式，认为正确地运用这些作战形式，同集中兵力的原则一样，也是在积极防御的战略中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达到战略反攻目的必要条件。红军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作战形式和方法，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行之有效的。在这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8页。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战争中的“打”与“走”、流动与稳定、包围与反包围、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之间相反相成、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反对形而上学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生动地显示出他在战争实践中对唯物辩证法的杰出运用。

## 三、刘少奇论白区工作中党的政策策略辩证法的运用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人民，坚持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同时在白色区域（即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着广泛的群众运动，开展对敌斗争。白区的工作和斗争作为全党工作和斗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有其特殊的内容和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党在白区的工作同在革命根据地一样，也表现出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刘少奇作为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同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春，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在天津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期间，贯彻了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使白区党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了彻底克服和肃清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他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等著作；1937年3月4日写了《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同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长篇报告。在这些著作、信件和报告中，刘少奇结合总结1927年以来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提出和阐发了白区职工运动所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工作方法，详细地论述了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思想，揭露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党中央、毛泽东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也对党在白区工作的中心任务、斗争的策略、两条路线的斗争等问题专门作了阐发。这些都是中国

共产党指导白区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是反对党内“左”倾路线及其思想根源——主观主义的檄文。它们不仅具体地贯彻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而且在许多方面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充实、丰富毛泽东哲学思想，使其系统化和多方面展开作出了重要贡献。概括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观察和估计形势的方法论原则

历史经验表明，党内两条路线的一系列原则分歧，特别是策略指导上的分歧，总是同对形势的观察和估计正确与否直接相关的，并且往往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这在革命转折的时期，如大革命失败后和九一八事变后，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

正确地观察和估计革命形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作指导，客观地、全面地、发展地、本质地去看问题。也就是说，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具体地分析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从而作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刘少奇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运用这个科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整个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重民族危机下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地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与此相反，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看不见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和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仍然坚持“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否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们所以在政治策略上犯错误，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不对头。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左”倾路线的错误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

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①

“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看问题、想问题，不是从实际出发，调查了解周围的现实情况，对阶级关系和敌我力量对比作客观的全面的分析、估计，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或共产国际决议的条文出发，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和主观想象出发，进行抽象的推论，作出主观主义的判断。例如，在他们看来，只要是纪念节就同敌人作战，这是革命的原则，有了这个原则就够了，用不着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和估计当时的具体形势。因而每逢纪念节，他们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示威、游行，而不顾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不管自己的力量和群众的情绪，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这种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盲目地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的结果，必然给党在白区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有时他们也对形势作出这样那样的估计，但“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②因此，他们实际上仍然不能正确地观察和估计形势。

刘少奇对“左”倾冒险主义者关于形势的种种主观主义的估计及其危害性进行了尖锐批评。他说：“上海、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反革命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有时竟可以估计这些地方似乎明天就要成为苏维埃区域。所以他们敢于

①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载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冒险，认为不必要做长期艰苦工作，不必要聚集最雄厚的革命力量就可以和敌人决斗。对于一个工厂的罢工，他们可以从世界革命如何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分析起，要这个工厂和敌人立即进行决斗，似乎世界革命在当天就可以与这个工厂的罢工直接配合，推翻一切的敌人，不必根据这个工厂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当着他们在上海举行一次没有成功的示威，甚至是受到很大损失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估计这次示威如何'成功'，有如何深远的意义，如何影响了多少人，如何推动了革命，加速了反动统治的死亡，如何成为什么什么的信号，以及如何要反对对这次示威意义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等。但对示威中被捕的大批干部以及在组织上的许多损失，他们是看不见，也是不愿意看见的。”① 他强调指出，对于形势的这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常常成为冒险主义的基础。1936年7月，他在《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一文中再次指出，党内一些空谈家天天在那里夸夸其谈，泛论全世界、全中国各方面的形势，但却很少有人真正来研究一次形势。他要求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要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具体地分析各地方、各工厂、各学校、各农村、各兵营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总之，必须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上来一个根本的转变，“从机械的转到活泼的，主观的转到客观的，空谈转变到实际，形而上学转到辩证法。”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提出的这些要求，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和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领导作风完全一致。他把问题提到了哲学的高度，深刻地揭示出两条思想路线、两种方法论的对立，不但表现在对形势的观察和估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32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6页。

计上，也表现在党的一般工作的指导上。这些对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

(二) 白区工作中党的策略的辩证法思想

如前所述，在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总的策略任务。为了实现这个总任务，争取与组织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刘少奇系统地回顾了党在白区工作的斗争策略，揭露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策略错误及其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正确地阐明了在白区工作中党和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以及在各种环境下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策略的辩证法思想。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①

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群众的领袖，群众是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刘少奇指出，要正确地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党确实能够代表群众的利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在斗争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同时还要有一个长期艰苦和正确地争取群众的工作过程，有一个正确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方法。我们不是在组织上直接要求群众服从党的指挥，要求群众团体接受党的命令，而是要使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我们要求群众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同时我们要尊重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意见。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1页。

信任我们。有的同志不服从群众，不尊重群众，甚至强迫群众，命令群众，包办一切，这种错误会大大地妨害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在我们党的周围。有的同志在群众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时，就悲观失望，表示没有办法，而不去耐心地做说服和解释工作，启发群众的觉悟，反而接受群众的错误思想，作群众的尾巴，这当然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总之，只有善于把党的主张和办法同群众的利益、意愿、觉悟统一起来，把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才能建立起党和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刘少奇的上述这些重要思想，是对白区党与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在后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发挥。他同毛泽东及党的其他许多卓越领导人一样，把群众路线作为正确处理党和群众关系的根本原则和方法，使党的群众路线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党的建设学说。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也是辩证的统一。刘少奇指出，在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组织和合法手段，以便广泛地争取和团结群众，加强群众的力量，而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缩小，仅仅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地进行，使党的秘密组织保持隐蔽、精干。至于哪些团体和机关，哪些工作，在当时当地可能公开地合法地去进行，哪些只能半公开地或者只能秘密地进行，这要根据革命的形势以及具体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来确定，总的原则要使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正确地恰当地联系起来，互相配合。但这种联系只是就内容上和政治上来说的。在组织上和工作方式方法上则应使二者严格区别开来。比如，受党派遣到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他的一切行动和工作方式应当群众化，应当公开，不要在形式上表示自己的特别，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也不能同时兼任党的秘密机关的工作，

党的秘密文件不能拿到群众机关中去，在党的文件刊物上也不要登载公开群众团体的情况。总之，“党内工作和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应当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派遣不同的干部去进行，在组织上不能混淆，在方法上不能重复。”[①]“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者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在形式和方法上把二者混淆起来。他们一方面忽视甚至拒绝利用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错误地认为“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就是改良主义或合法主义，因而把许多本来应当和可能公开进行的工作硬要拿到党的秘密机关来做；另一方面又把应当秘密进行的工作去冒险公开，结果使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都遭到了破坏。

为了保存、聚积和加强群众的力量，白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但要善于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要学会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刘少奇指出，领导党和领导群众在方式方法上是不同的。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敌我力量的对比，恰当地提出群众所能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或更大范围的战斗。这就是说，领导群众的斗争，不但要事先做好斗争的各种准备，选择好发动斗争的时机，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善于引导和逐步提高群众的斗争，积极争取斗争的胜利，避免无谓的损失和牺牲，并且要适时地结束斗争，以利再战。从方法论来说，也就是要善于“审时度势”，一切依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此外，在斗争策略的运用方面，应当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把当前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63页。

作的成份争取过来，建立暂时的同盟，以反对主要的敌人，这不仅是当时党的总策略，即建立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的需要，也是党在各个时期中对敌斗争的一条重要策略原则。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对此也都反复论述和强调过，毛泽东在1940年写的《论政策》一文中，就曾用简明的语言把这个策略原则概括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四句话。

“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者则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领导党和领导群众的不同，不懂得党的基本口号、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的区别与联系，也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他们常常犯急性病，不顾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和力量对比，也不顾胜败，不顾事后结果和影响如何，总是盲目、莽撞、一味要求“斗争”、“进攻”；不了解群众斗争也象世界上一切其他事物一样是曲线式前进的；他们常常要群众去背诵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口号，或者提出今天群众还不了解、还不能为群众所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强迫群众接受；他们轻视经济斗争的重要意义，不了解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因而不是忠实地为达到群众的经济要求而积极斗争；他们还有一套机械的观念，即所谓“小斗争发展成大斗争，大斗争发展成为暴动”，无条件地机械地要求任何一次群众斗争都应“坚持到底”，即使是形势极不利的情况下也要坚持，而把“在相当条件下结束斗争、复工、暂时退守、保存力量”的正确提议当作“机会主义”来反对；他们总是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要打倒一切敌人以至黄色工会，而不去区分当前谁是主要的敌人谁是次要的敌人，不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妥协、让步，以便联合他们，进而去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扩大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如此等等。其结果只能使党脱离群众，使党陷于孤立，使白区的工作和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而他们所以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所以在群众斗争的策略

指导上和方式方法上犯“左”的错误，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不懂得在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

（三）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方针和方法

如同在政治策略问题上一样，在党的建设、党内斗争的问题上，也长期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方法的原则分歧。刘少奇系统地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了“左”的错误，阐述了党的建设、党内斗争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和方法。他针对党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家长式统治和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恶劣作风，强调地提出要扩大党内民主，提倡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党的领导机关或领导人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虚心接受下面的意见，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他认为集中制原则和纪律在党内也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在民主基础上，广泛地吸收大家的经验、智慧和好的意见，才能有正确的集中，才算是真正的集体领导。加强纪律是要求每个同志，包括党的领导人，都应服从多数，服从组织，而不是否定每个同志的民主权利，也不是要求领导机关经常用纪律去制裁和惩罚同志。破坏集中原则固然是违犯纪律的行为，而破坏民主原则同样也是违反纪律。他还指出，党的组织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同时，应实行个人负责制。重大问题应该民主决定，但工作的具体执行应由个人负责。领导机关应当鼓励和支持党内同志敢说敢做，勇于负责，不怕犯错误的精神，努力造成一种民主的活泼的气氛，调动广大同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至于党内有不同的意见和主张，甚至在原则上、政治上有分歧，这是客观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去处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刘少奇认为，党内大多数的分歧意见是可以而且应当用说服、教育和讨论的方法加以解决的，关键是要发扬民主，使大家能够充分发表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真正

消除分歧意见，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

与此相反，"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待党内问题，一贯坚持错误的态度和方针。他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毫无民主精神。党内一有不同的意见提出，就恐慌，就召集会议来斗争。他们自认为有支配别人的特权，可以随便批评、打击、辱骂别人，却不容许别人对他们的批评；他们对待别人的错误，不是采用同志式的诚恳的态度进行说服教育，而是任意夸大，无限上纲。有的同志在工作中偶然犯了错误，也会被他们毫无根据地戴上"系统的机会主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把打击下层组织、打击干部的错误斗争方式，当作是"推动工作"的唯一办法，往往简单地使用纪律和组织手段去惩罚同志。总之，"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党内斗争上采取的许多做法都是过火的、机械的、主观主义的，而且在斗争中带着浓厚的宗派主义成份和成见。其结果是，伤害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害怕犯错误，害怕犯右倾，不敢说话，不敢负责地放手工作，遇事故意表示左些的不正常现象，从而妨碍了党在政治上、原则上、思想上真正的团结一致。

综上所述，刘少奇围绕着党内矛盾和斗争问题所阐明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如党内的民主和集中，民主和纪律，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说服教育和组织处理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及其对"左"倾错误的批判，是全面、深刻、有的放矢的，贯穿着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条思想路线、两种思想方法的根本对立。所有这些，在他后来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重要著作中，进行了更系统、更详尽的论述和发挥，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路线、思想作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 第五节 《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并提时简称“两论”)是毛泽东最著名的哲学代表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和精华所在。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充分的理论准备。“两论”从哲学上概括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经验，清算了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同时利用和吸收了3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用中国的语言和思维形式系统地、通俗而又深刻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并在许多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系统化的主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 一、“两论”的写作和流传

(一) 写作的历史背景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革命逐步地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已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曲折发展过程，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同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人为代表的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进行了长期、尖锐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和实质就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关系革命事业成败的根本原则。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指

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和具体答案。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东方大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极不平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特殊性，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无论在其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方面都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显然，要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专靠背诵共产主义书本中的一般结论或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是不行的，而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结合自己的具体实践经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致力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是，实现这种结合不是一帆风顺、轻而易举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就全党来说，由于实践经验和理论准备都不足，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缺乏自觉的明确的认识，因而在党内曾经盛行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验，生吞活剥马列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结果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同时，党内也存在过危害革命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它和教条主义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实质上都是主观和客观相脱离、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的主观主义的东西，都否认和违背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一切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此。因此，如何从理论上特别是从哲学上概括总结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批判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错误，论证这种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实现这种

结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而这个任务主要是通过毛泽东在3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理论创造活动，特别是撰写“两论”来完成的。

如前所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国革命正处于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国内外各种矛盾纷繁复杂，变化多端，斗争非常尖锐、曲折。面对着新的革命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新领导，花费了极大的精力进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首先是通过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但是，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总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作为基础的，“左”倾路线的思想流毒和影响在党内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因此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彻底清算和克服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从哲学理论的高度进一步概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用以提高全党同志和广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帮助他们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学会观察、分析和解决各种矛盾的科学方法，从而正确地指导今后的中国革命，特别是正在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战争。这就是毛泽东在1937年撰写“两论”的历史背景和主旨。可见“两论”的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中国革命实践发展迫切需要的历史产物，是当时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了的必然结果。正如毛泽东自已所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①

（二）写作的理论准备

① 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6页。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并特别重视学习和研究哲学。在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更是废寝忘食，发愤读书，努力钻研哲学。对此，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10月间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时曾作过真实、生动的记载，他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①]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材料看，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矛盾论》和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时，除了反复地攻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原著，以此作为主要依据外，还阅读和研究了许多中外哲学书籍，并且写了大量的批注和读书笔记，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中，同毛泽东写作"两论"和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关系较密切的，主要是当时已经翻译过来的30年代苏联的几本哲学教科书。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曾详细地读过苏联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②]，并写了近一万二千字的批注，其中尤以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一千二百字左右。毛泽东在这本书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批评了"中国的主观主义者"、"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者"，揭露了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本质特征，为尔后在"两论"中进行系统的哲学批判作了准备。

---

① 《西行漫记》，第67—68页。

②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雷仲坚合译，上海笔耕堂1935年6月版。

在阅读了这本书关于外的矛盾和内的矛盾相互关系的原理后，毛泽东结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的发生影响。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对于这本书中所论及的“矛盾的主导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批注中作了重要的补充，阐述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思想，他写道：矛盾的主导方面“凭谁决定？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① “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② 这些思想在《矛盾论》中，又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和发挥。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③，是毛泽东1937年8月以前读过和批注过的另一本苏联哲学书。在这本书的批注中，有不少是对原文观点扼要而精辟的概述，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一样，在内容和文字上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有着直接的联系。

应当肯定，30年代苏联哲学家写的教科书，作为他们批判德波林学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较好地说明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思想、突出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①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哲苑的奇葩》，《哲学研究》1987年第10期，第7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0页。

③ 米丁等著，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初版。

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等重要思想，贯彻了哲学和政治、理论和实践密切联系的原则，它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研究、传播和发展曾作过重要的历史贡献，对30年代中国哲学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些教科书的成果。参考和吸收了其中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材料，包括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命题、原理，以及对一些问题的例证和提法等等，因此可以说，它们为"两论"的写作作了大量的直接的理论准备，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些教科书作为"中介"、"桥梁"而实现的。

但是，"两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同苏联哲学教科书相比较，又有它自己的许多特色和独到之处，它以长期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基础，在理论上进行了独立的创造和发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首先从体系结构上说，"两论"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它没有象苏联教科书那样广泛地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方面的问题，或者简单地重述众所周知的一般哲学原理，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实践需要，有目的、有选择、有重点地来安排、构造自己的体系内容。《实践论》所以要突出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这个中心，侧重于论述和解决认识论问题，《矛盾论》所以要突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侧重于论述和解决方法论问题，不仅因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中的根本问题，更因为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者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因此，"两论"所阐明的哲学原理和基本思想，都是为着克服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论证和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

根本问题而展开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观点看，《实践论》突出了认识论中的辩证法，《矛盾论》突出了矛盾问题上的认识论，二者作为“姐妹”篇、上下篇，有机地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另外，“两论”也不象苏联教科书那样结构比较松散，章节之间、问题与问题之间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以《矛盾论》为例，它的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又着重阐明了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和普遍性的关系，并以此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全书，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严密的分析现实复杂矛盾的逻辑体系。尽管还不能说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完美无缺的体系结构，但至少可以反映出在这方面有它自己的特点和优点。

其次，从内容上说，“两论”克服和弥补了苏联教科书的某些不足之处，如对某些哲学概念、范畴、原理等，有的无明确的定义，或者论述得不全面、不系统、不准确，或者未作详细的阐述，更主要的是“两论”在阐述和论证问题时，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以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作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独立的创造和发挥，作出了新的重大的贡献。例如，《实践论》中对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的辩证过程、特别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认识过程的复杂性、反复性，以及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总过程、总规律所作的系统、完整、精辟的论述和新概括；《矛盾论》中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内容、特别是关于矛盾特殊性理论所作的详细论证、解释和发挥，以及关于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等新论断、新命题的提出；这些都是苏联教科书所不及的，或者根本没有提出过。

第三，从论证、表达问题的方式和用语上说，“两论”具有明显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它们继承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和风格，论著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思想鲜明，写

法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善于运用中国民间谚语、格言、典故以及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经验，具体、生动地、形象地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深刻哲理。因而“两论”作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较之苏联哲学教科书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更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更便于他们理解和掌握。

第四，就“两论”和苏联教科书的作者在阅历、斗争经验、思想素质和境界等主观方面的因素来说，两者的差别也是存在的。作为同时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革命领袖和哲学家与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哲学家相比，即便是对同一概念、论点、命题的理解和阐述，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前者较之后者显然有其优越条件和过人之处。因此，仅仅具有一般的哲学知识素养，或者只是利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和哲学成果，而没有或缺少象毛泽东这样长期参加革命实践和党内斗争而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是不可能写出“两论”这样思想深邃、具有鲜明针对性、战斗性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的。

总之，“两论”既充分利用和吸收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积极成果，又在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些成果，它们不但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苏联教科书的水平。

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是“两论”写作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准备。毛泽东早年就曾广泛地涉猎和研究过中国古代和近代哲学家的著作。他不仅非常珍视中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哲学遗产，特别是其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优秀成果，而且善于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对之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改造，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用以充实、论证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在中国具体化，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深深扎根于中国

的土壤之中。这在“两论”和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实践论》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副标题，不仅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同时对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历代哲学家们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知行关系这个认识论上的重大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批判地吸取了《道德经》、《孙子兵法》中的合理思想，引用了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富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警句、名言和有关文化书籍中的一些成语、典故、寓言故事，具体、生动地说明和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学说。总之，“两论”主要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同时也继承、改造、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

“两论”的写作同30年代中国哲学战线上的论战和研究成果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本章第二节所详述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30年代进一步的传播和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中国哲学界曾展开过关于唯物辩证法等一系列论战。通过这些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旧哲学以及真假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界限，锻炼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纯洁、巩固和扩大了新哲学阵线。论战中提出和探讨的许多重大哲学问题，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和理论上日趋成熟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当时论战虽然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但引起了整个哲学界、包括革命根据地的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普遍关注，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论战。从“七七”事变前后毛泽东在延安所写的读书笔记、哲学批注和有关书信以及“两论”的内容来看，虽没有具体涉及

到论战中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无法证明毛泽东直接参与了当时的论战；但由于30年代哲学论战同毛泽东写作“两论”等哲学活动都处于同一时代，有着共同的时代要求，因而必然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两论”所阐述和论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原理，实质上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概括总结和回答了论战中提出和探讨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如实践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识发展过程、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及其关系、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内因论和外因论、差异和矛盾、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围绕着这些问题，“两论”既把主要批判锋芒对准党内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也间接地驳斥了张东荪、叶青等人在论战中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另一方面，“两论”肯定和吸收了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论战中阐发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思想，并加以补充使之更加精确化和系统化，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同时也纠正和克服了他们某些不正确、不恰当的提法。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当时哲学界普遍存在着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情况下，“两论”的写作本身实际上起了扭转这种不良倾向的作用，为在哲学研究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特别是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提供了范例和指导。由上所述，“两论”直接间接地利用和吸收了中国30年代哲学论战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又以自己在理论上的独创性贡献，巩固、加深和发展了这些成果，集中地反映了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

“两论”也是毛泽东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在此之前所写的一系列科学著作的直接继续和哲学升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自身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前面说过，毛泽东自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以来，一贯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分析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反对右

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在"两论"之前，他写的有关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著作，都蕴藏和渗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表现出毛泽东同志一贯善于从哲学上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无论是总结历史经验，阐明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军事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还是批判各种错误倾向，他都力求把问题提到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提到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高度。"两论"本身正是毛泽东对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作的系统概括，是他的哲学思想经过长期酝酿，形成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的"两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独立创造，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哲学结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积累和总结的丰富经验，以及他们创造的许多理论成果，都为"两论"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和材料。

综上所述，"两论"在理论上的准备是多方面的，非常充分的。它们主要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同时又综合、吸收了古今中外、党内党外许多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的优秀思想成果。毛泽东的"两论"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和整个人类思想理论宝库中的杰作，不但因为它们在丰富的独特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造，也因为它们产生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因而有其广泛、深厚的理论根基。

（三）"两论"版本的流传和发表

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时曾用过一份《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包括辩证法唯物论的许多基本原理和范畴。首先讲的是第一章绪论部分，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唯物论与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等问题；第二章接着讲物质论、运动论（发展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和实践论；在第三章"唯物辩证法"部分，除重点讲"矛盾统一法则"这一节外，还列举了质量互变法则、否

定之否定法则，以及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链与环等对立统一的范畴。后来正式公开发表的《实践论》即该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的原本则是该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原题名为“矛盾统一法则”。和其他一些章节相比，这两部分实际上已不完全是提纲性质的东西，讲得都相当详细、充实，具有较完整的逻辑结构，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对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体系内容，已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某些深刻独创的见解。据一些回忆文章说，从1937年4月到7、8月，毛泽东的哲学课共讲了约一百多个学时，后来主要因为“七七”事变的爆发讲课中断了。辩证法部分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其他法则和范畴都没来得及讲。当时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曾派人做过讲课记录，记录稿连同整个讲授提纲经过整理后印发给大家学习，从此便非正式地在一些地区或单位印行和流传开来。

从现在所搜集到的材料看，最早印行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一种油印本，封面注明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印”，未署作者姓名，这个油印本的最后有一括号：（论矛盾统一律完，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此后这个讲授提纲又有许多翻印本。如1938年4月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抗战大学》（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和以后的几期新哲学讲座专栏上，就曾连载过这个提纲，并署“毛泽东主讲”；1940年3月上海出版的《民主》杂志从第1卷第1期起也署名连载过；此外，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0年）、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社出版社（1941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2年）、上海中国出版社（1946年）、张垣印刷局、大连《大众书店》等单位都先后出版发行过这个提纲。1942年12月，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供党内高级干部学习的《六大以来》，也收录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总的看，全国解放前的各种版本均源于1937年9月的那个

油印本，除翻印过程中发生的错漏外，内容完全一样，未作过任何修改。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提纲中的"实践论"和"矛盾统一法则"两个部分，经过毛泽东亲自校阅，并根据新的经验和认识，分别作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删节和修改，① 首先在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正式公开地发表了《实践论》，一年多以后，《矛盾论》也正式公诸于世，刊载于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上。这两篇著作均被收入中共中央主持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分别作了题解和若干注释。为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这两篇著作，人民出版社发行了大量单行本，有关部门还将其翻译成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字和俄、英、法、日等各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广为发行，受到中国各族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革命人民的普遍欢迎和重视。

从上述"两论"的写作、流传和发表的实际经过来看，"两论"最初写于1937年7月和8月是确定无疑的，无可辩驳的。毛泽东自己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提问时也说"两论"是写于1937年夏②。

## 二、《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实践论》是毛泽东著名的认识论专著。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为基础，以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为中心，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全面系统地论述和发挥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原理，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论根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入展开

① 详见本书第7卷第1章有关部分。本章对"两论"基本内容的评介，均以正式公开发表的版本为准。

② 参见斯诺：《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1版。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曾经针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不可知论，着重地论述过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思想，并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同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社会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并作为它的基础，实现了认识论领域中的一个伟大的革命变革。他们把自己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①就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这个本质特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列宁也曾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③

毛泽东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同，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论敌和要解决的任务也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者不是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批判的俄国马赫主义者那样用系统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学说公开地反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而是在实际斗争中暴露出来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和倾向。他们的主要错误在于迷信书本知识，轻视革命实践，从而导致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和失败。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没有也无必要用专门的篇幅重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认识论上已经解决了的某些理论问题，例如关于物质与意识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等问题，而是自始至终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认识论上的错误，在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前提下，突出实践的观点，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着重地论证和解决为什么和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个重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的认识论问题，这里也说明了毛泽东把自己的这篇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题名为《实践论》，是有深刻道理的。《实践论》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从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讲起，抓住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害和教条主义在认识上的致命弱点，系统地阐明、发挥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1.对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作了完整的概括

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除生产活动以外，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人们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实际活动，也都是实践活动。这说明社会实践活动的范围形式是很广泛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而毛泽东着重强调的是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种主要的基本的实践活动，这样便揭示了社会实践最重要的实质内容，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同某些旧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所谓实践的界限。例如费尔巴哈理解的实践就仅仅局限在人的日常生活领域，而把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排除在外。

关于实践的内容和形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分别从不同侧面和角度作过论述。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 恩格斯认为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② 列宁阐述过物质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是人类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并指出“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③ 本世纪3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较好的说明和发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0页。

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把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完整地明确地加以论述和概括，突出了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活动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使社会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的内涵，较之以往有关论述更加丰富、深刻和具体。这对于人们正确地理解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批判割裂认识和实践关系的教条主义以及否认社会实践推动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观点，都有重要的意义。

应当指出，毛泽东对于科学实验的实践在认识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尽管是在他后来的有关著作和讲话中才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但在《实践论》中把科学实验作为和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相联系的社会实践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和过程提出来，这和当时的一些哲学论著相比，显然有其独到之处。现代科学实验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显示出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证明了毛泽东早在30年代就提出的这个见解是正确的，有远见的。

2.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别在有关著作中阐述过实践对认识的作用。他们主要是针对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侧重说明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①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对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②列宁也多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③"必须把人的全部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践——作为真理的标准。”①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还是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都没有象毛泽东那样集中地就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展开全面系统的充分的论述。

《实践论》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针对党内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依赖于实践、否认直接经验对于人们获得真知的意义，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着重强调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这个基本观点，这是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他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②“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③当然，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就一个人的知识来说，包括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个部分。毛泽东在这里并未否认学习和接受间接经验的必要性，问题在于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知识的源和流的关系。他强调指出："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④

① 《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8版（下同），第2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5页。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发展的推动力量。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客观物质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人类社会实践也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因此人们的认识，包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也随之不断发展，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人类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眼界的扩大、认识水平的提高等等，归根到底都取决于实践的发展，依靠实践来推动。否认认识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使自己的认识停滞不前，或者落后于实践，就不是彻底的辩证的唯物论者。关于实践是认识发展动力的思想，《实践论》虽然没有作更多的直接的阐述，但却贯穿和体现在整个认识过程的论述之中。

实践不但是认识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毛泽东多次提出和论述过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①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② 后来他还明确地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实践检验认识是在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是一个历史的复杂的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把认识过程的第二个能动飞跃既看作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看作是实践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他说："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①就认识运动的总过程来说，人们通过实践不断地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不断地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说明了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无限性和绝对性。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反复强调了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而且通过认识的具体过程和总过程，从动态上进一步阐明和发挥了这个思想，使之贯彻到底，这和前人以及同时代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相比，前进了一大步。

《实践论》还明确指出，认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③可见毛泽东是重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的，他所反对的是那种为理论而理论的、脱离革命实践的教条主义倾向。理论指导实践、发挥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也包括对实践着的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④这段话，阐明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容，从认识论上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的目的全在于改造世界的思想。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二）认识发展辩证过程的深刻揭示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实践为基础，同时强调要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没有专门从认识论的理论上作更多的论述，但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例如《资本论》中都充分体现了这个思想。

列宁在这方面曾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他指出，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应当辩证地思考；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他还说过："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① "真理是过程。"②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③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④等等。列宁的这些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但他没有进一步展开具体、详尽的论述。毛泽东的《实践论》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的基础上，对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作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认识过程的学说。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回到革命实践，是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两个能动的飞跃。

首先，《实践论》以较多的篇幅说明了什么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感性认识，是对于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属于感觉和印象的阶段。理性认识，是对于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

①② 《哲学笔记》，第208、215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识。毛泽东把认识区分为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是对认识过程的如实反映，从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的连续性来考察，这两个阶段是不能混淆，也不能任意颠倒的。当然，在实际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实践和认识又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着的。毛泽东认为，感性和理性不但有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性质上的不同，前者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后者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但二者又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理性认识必须依赖于感性认识，只有通过实践，首先获得丰富的可靠的感性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抽象思维，才能产生出理性认识；另一方面，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①，而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认识是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更重要的阶段。总之，认识开始于感觉经验，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具体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实践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复地说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与此同时，揭露和批判了哲学史上唯物论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特别是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指出它们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和辩证性，片面地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各执一端，因而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经验，否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他们闭目塞听，从不虚心体察实际情况，反而把亲身参加革命实践而有丰富直接经验的同志诬为“狭隘的经验论”者。经验主义者在党内也确实存在，他们满足于自己局部的、片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面的经验，不了解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两种人都是主观主义者，都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

其次，《实践论》指出了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一要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二要经过思考作用，将这些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整理和改造制作工夫。这两个条件是相互联系的，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缺少其中任何一条都不可能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实践论》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再一次提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个抽象思维方法，言简意赅，不但在表述形式上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而且在内容实质上包含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逻辑思维范畴和科学抽象的一系列复杂过程。毛泽东在这里虽未就此展开详细的说明，也没有专门系统地论述科学思维方法的所有方面、它的多层次性及其综合运用，但这十六字诀作为最基本的逻辑思维方法无疑是科学的，是对马克思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它在总体上给人们指出了如何进行科学的思考和分析。人类认识史表明，一切真正的科学抽象都离不开这十六字诀。当然，随着人们实践和认识的不断发展，通过概括总结现代科学思维的新方法，补充、丰富和发展十六字诀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思维方法，这是非常必要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再次，《实践论》着重阐明了理性认识回到革命实践即认识过程第二个能动飞跃的伟大意义。前面说过，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但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

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① “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② 这是因为，认识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同时也因为理性认识、理论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能否正确地指导革命实践，在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的，而必须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实理论或者纠正它的不完全性和错误。因此，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既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比起第一个飞跃更重要，意义更加伟大。

《实践论》如此强调认识过程的第二个能动飞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有重大意义和鲜明的针对性的。对于这个问题，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特别是列宁是很重视的，并作过不少论述，但没有象毛泽东这样着重地系统地加以说明和发挥；3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专著在讲到认识的发展过程时，更多地是着重于阐述从物质到意识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问题，对于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及其意义却未予重视而作出应有的论述，有的甚至错误地把到达理性认识看作是认识过程的完结或认识的终极目的。《实践论》既肯定了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又反复强调了理性认识必须回到实践。这样，就不仅完整地概括了认识运动的全过程，而且体现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思想，突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和以科学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革命本质。这里，联系到1938年初即《实践论》问世半年后，毛泽东在研读李达《社会学大纲》时所写的有关批语中强调：不仅要分析从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的发展过程，而且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可以看出，关于认识过程的第二个能动飞跃的思想确实是对苏联哲学教科书和李达观点的重要补充，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贡献。当然《实践论》的这个论述，更主要的是针对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中国革命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但如果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或者简单地背诵它的某些条文和词句，而不和中国的实际、中国人民的需要相结合，不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它；那末，马列主义理论再好再正确，也不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由此可见，毛泽东重视认识过程的第二个能动的飞跃，一贯提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强调要在实践中运用、检验和发展理论，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同教条主义作斗争而得出的重要理论结论。

（三）认识发展总规律的科学概括

如前所述，认识的发展过程，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即两个能动的飞跃过程。这时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那末，对于某一具体事物或过程的认识运动来说算是完成了。但这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达到。对于复杂的事物或过程的认识尤其是这样。“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

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① 《实践论》的这段话，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认识经验的深刻理论总结，它说明了认识过程的复杂性和曲折前进性，指出了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难免产生错误和失败，而错误和失败常常是正确和成功的先导；只有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经过错误和正确、失败与成功的多次比较，才能更充分的深刻的认识客观规律。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又多次论述和发挥了这个认识论的辩证法思想。

《实践论》在详细地阐述了人们对于某一具体事物或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之后，进而指出了人类认识运动是无限发展的，永无止境的。它说：“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②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③ 但是，党的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上述这个道理，他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因而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左”倾空谈主义者的思想则超过了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脱离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因而同样不能担任革命的向导工作。毛泽东在这里深刻地揭露了党内这两种错误倾向的认识论根源，强调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0—2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①“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②这一结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说明和解决这个问题。众所周知，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解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和其他一切哲学问题都不能离开它；但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不可能彻底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列宁曾强调指出：“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③“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④斯大林也说过，“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⑤毛泽东继承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思想，一贯坚持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党内路线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上述这个极其重要的认识论结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尽管《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具体内容及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可以看出贯串于这两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是共同的，即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结论不但强调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且强调了这种统一是辩证的统一，即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种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在动态中实现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僵死不变的。这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③ 《哲学笔记》，第233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238页。
⑤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0页。

样，就把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充分表明，什么时候坚持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发展；反之，离开了这种统一，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就会使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

毛泽东在《实践论》最后所作的结论中用十分简洁明晰的语言，科学地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规律，他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 这个概括包含了极丰富和深刻的内容。首先，它揭示了实践和认识的矛盾是贯穿整个人类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认识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这对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从实践出发又复归于实践、能动地指导实践，实践和认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其次，它完整地表述了认识过程两次能动的飞跃，体现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再次，它说明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是一个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的螺旋式上升、曲折前进的过程，形式上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内容上则不断地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总之，这个概括坚持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的统一，深刻揭示了认识全过程（包括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认识过程和人类认识的总过程）的本质和规律，反映了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飞跃）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认识过程中的特殊表现，从而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它的科学性和普遍意义已为整个人类认识发展史和个体的认识发展史所证实。遵循《实践论》所揭示的认识发展过程和辩证规律，人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

综上所述，《实践论》的杰出贡献，主要地就在于它紧紧抓住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以此为中心，全面系统地论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特别是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和决定作用，具体阐明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特别是两个能动飞跃的理论，深刻地概括和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规律，从而深化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三、《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矛盾论》是毛泽东另一篇重要的哲学代表作，是他的辩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它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吸收了列宁逝世以后辩证法研究的积极成果和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发挥，深刻揭露和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的学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一）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思想的深刻发挥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论述过辩证法诸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把辩证法具体应用于对自然界特别是社会历史的研究。对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和其它规律范畴之间

的关系，他们也作过一定的考察，提出了一些宝贵思想，但总的说来，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详细的研究，没有从理论上作出明确的概括和论证。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①。

列宁所处的时代和马克思、恩格斯不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观念已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而怎样理解事物的发展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或动力是什么，这些涉及辩证法的实质性问题便逐渐突出起来了，出现了庸俗进化论同唯物辩证法的对立，也就是列宁所指出的两种发展观的对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为了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超帝国主义”等谬论，在哲学上把庸俗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竭力歪曲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阉割它的革命精神。针对上述这种情况，列宁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了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思想。他继承和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成果，并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专门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对其中关于辩证法本质的合理思想加以提炼、清洗、改造和发挥。从列宁所写的《哲学笔记》中可以看出，他不但广泛地探讨和研究了辩证法的特点、要素、规律、范畴等各个方面，而且详细考察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著名论断。他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②。“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页。

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1]列宁自己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就此做过一些初步的说明和发挥。这是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作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列宁还没来得及详尽地说明和发挥作为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就过早地与世长辞了。

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哲学界结合批判德波林学派的错误，对列宁的哲学遗产进行了广泛的认真的研究，力图正确地说明和发挥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如两种发展观、发展的内在源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等，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它们并未完成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而只是为完成这一任务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准备。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遵循列宁的哲学遗训，对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作了系统的说明和发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矛盾学说的科学体系；并且一开始便着重地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一重要思想。

第一，根据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的论述和哲学发展的历史，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看作是两种宇宙观的对立。指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它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和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它要求人们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即对立统一的观点，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

去观察世界和一切事物。在这里，毛泽东结合实际事例论证说明了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根据和条件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一位的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明确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①这样，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揭示了两种宇宙观对立的实质和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规律。

第二，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弄清了这一法则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就是说，对立统一规律是贯彻于整个辩证法的一个总纲。掌握了它，就能更好地理解和提挈辩证法的其它规律和范畴。

第三，发挥了列宁关于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强调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认识规律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曾多次从理论上阐明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一致性。他在《矛盾论》中写道："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②从《矛盾论》来看，他是把对立统一规律既当作客观世界的规律，也作为认识的规律来加以论述和发挥的，鲜明地体现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毛泽东历来非常重视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的一般原理广泛地应用于革命斗争的各个领域，把它们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具有独创性内容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更能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真正成为他们手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这是毛泽东长期以来从事哲学研究活动的一个重要特色和创造性的贡献。

### （二）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阐发

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既存在于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也存在于主观思维的矛盾运动中。因此，认识和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我们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1.矛盾普遍性的科学涵义

毛泽东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以往对矛盾普遍性原理的论述，更多地是说明每一事物或现象都包含有矛盾，无论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也无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和复杂的运动形式，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方面，他们虽也提到过，但没有着重强调。毛泽东引用了列宁论述马克思《资本论》时讲过的一句话："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①，强调指出，分析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是研究任何事物所必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

须应用的方法，不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而且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①。这说明了坚持矛盾普遍性原理的重要方法论意义。

在谈到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这个问题时，《矛盾论》批判了苏联德波林学派认为事物的发展在开始并无矛盾而只有差异的观点，指出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否认这一点，必然要陷入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差异就是矛盾”的提法，原是苏联哲学界在批判德波林学派时提出的。从辩证法的发展史上说，黑格尔曾认为事物矛盾的发展有一个由潜在到显在，即由孕育、萌芽到形成和激化的过程，同一、差别、对立、矛盾（根据）就是事物矛盾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或表现形态，这些不同阶段也可以用矛盾这一概念来表达。黑格尔在这里并没有把矛盾同一、差别、对立绝对地对立起来，在他看来，事物发展最初阶段的同一也不是抽象的单纯的同一，而是包含着差别的同一。而德波林学派所说的事物发展最初阶段的同一则是“单纯的等同”，无差别的抽象的绝对的同一，这不仅不符合黑格尔的原意，恰恰是黑格尔所反对的形而上学的同一。《矛盾论》并不否认事物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阶段或表现形态，但认为这只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而不是矛盾有无的问题。从它所举的例证来看，“差异就是矛盾”的差异指的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差异。当然，外在的差异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阅读和摘录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曾作过进一步的说明，指出：“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① 总之，无论是苏联哲学界提出的还是毛泽东阐发的“差异就是矛盾”的论断，都有其针对性，其基本意思无疑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对此，不应简单地作字面的解释和机械的绝对化的理解。至于如何表述得更好更精确那是有待进一步推敲的问题。

毛泽东把矛盾普遍性原理明确地概括为上述两方面的含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有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才能把辩证法贯彻到底，彻底地反对形而上学；在实践中自觉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2.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发挥

毛泽东详尽地阐明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基本情形，以及怎样科学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深刻论述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矛盾论》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每一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每一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每一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均有其特殊性。这五种情形概括起来说，就是要用发展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多方面多层次地具体分析和把握矛盾的各种特性。既要分析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和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又要分析不同事物的矛盾和矛盾诸方面的特殊性。毛泽东强调指出，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殊性。教条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各种事物，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这种主观主义的方法是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因此也不可能做好革命工作，相反必然会犯错误，出乱子，把事情弄得一无是处。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3页。

鉴于党内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不但详尽地阐明了应当怎样具体地研究和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而且从理论上反复说明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由于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自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因此，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能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根据，从而才能辨别事物，区分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①这段话虽然是毛泽东在1952年《矛盾论》公开发表时增写的，但联系到1941年他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4版）时所写的重要批注，如：“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他们“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哲苑的奇葩》，《哲学研究》1987年第10期，第5页。

等等。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普遍与个别、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作了一定的理论发挥。《矛盾论》中的这段话和上述批注在思路上是一脉相承的、一致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辩证法和认识论统一起来，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上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性，即“特殊——一般——特殊”；同时也进一步论证和阐明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还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①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而要找到具体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就必须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否则，象教条主义者那样不了解矛盾的特性，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是不可能正确地解决矛盾的。总之，现实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矛盾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特殊的，千差万别的，不但每一事物的矛盾有其特点，而且在事物发展的不同过程和阶段上矛盾及其各个侧面也有其特点，因而必须着重地分析和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正确地解决矛盾的关键和前提。

毛泽东所以要特别着重地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上，详尽地论述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及其方法论意义，决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同别的国家如苏联或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而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又长期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这种特殊性，而只会盲目地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外国的经验，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中国社会的极其复杂而又曲折的矛盾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但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对矛盾特殊性问题的研究，而且也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而生动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材料。可以说，《矛盾论》正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矛盾运动的理论表现。同时，这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自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提出的必然要求。关于矛盾特殊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思想原则，例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① “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② 等等；并且把这些思想原则具体运用和贯彻体现于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分析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指导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各种具体矛盾所作的具体分析，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至于怎样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怎样进行具体的分析，他们却没有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概括和详细说明。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也曾经论述过矛盾特殊性问题，并且强调了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例如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中写道：“唯物辩证法不仅教我们抓住一切事物和它们的发展阶段上所共同的一般特点，而且还教我们把握某一事物及某一发展阶段所特有的矛盾发展的特殊点。”然而，苏联教科书并未象《矛盾论》这样把矛盾特殊性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专门加以考察，因此也没有对矛盾特殊性的各种情形以及如何分析矛盾特殊性展开详细的论述；有的问题，如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甚至还没有涉及到。从上述可见，象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这样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上，如此全面、系统、详尽地论述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从而建立了一个如何分析现实复杂矛盾的逻辑系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可以说是具有独创意义的贡献，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857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290页。

它不但是《矛盾论》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的光辉篇章。

（三）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原理的深入论述

研究矛盾特殊性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分析矛盾和矛盾诸方面在其相互联结上，在总体上各占何等地位。也就是说要区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认识矛盾特殊性的这两种情形对于革命事业的成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在《矛盾论》中是作为专门一节展开论述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研究问题，指导实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法。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强调"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①列宁指出，"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②"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③马克思在分析无产阶级和富有这两个对立面的时候说"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④这些话就其精神实质来说，都反映了要注意研究矛盾和矛盾双方地位的特殊性，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但是他们都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明确地提出来加以论述。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70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4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

之主导方面”的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阐述过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问题，为《矛盾论》的写作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它们的不足在于没有对这些概念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规定和解释，也缺乏全面系统的论证，特别是忽略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个重要思想。

毛泽东研究了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结合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不但明确规定了作为哲学范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定义，而且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意义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证和说明。它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抓住了主要的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或者说，其他次要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①。这里应当指出，强调抓主要矛盾，并不是说可以忽略非主要矛盾的作用，或者等到主要矛盾解决了以后才去解决其他的矛盾。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虽然地位不同，但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实践经验也表明，适时地恰当地解决非主要矛盾是必要的，这不但不妨碍抓住主要矛盾，反倒有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毛泽东还指出，矛盾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一种情况是，原来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或基本上解决了，出现了新的主要矛盾；另一种情况是，原来的主要矛盾虽未解决，但由于条件的变化而下降为次要矛盾的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位，其他某个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的矛盾。这两种情况都使得事物发展过程显现出阶段性来。因此，从方法论上说，就要求革命党人必须随着过程和阶段的推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地转移自己的工作重点或斗争的主攻方向。

如上所述，对于复杂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力抓住主要的矛盾。但是，不论是主要矛盾或次要矛盾，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也都有主要和次要之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相同的。所谓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他方面则是次要的，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也是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转化如《矛盾论》所说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②当这种力量的增减尚未改变双方主次地位的时候，事物处于量变阶段；而当力量的增减达到一定程度时，矛盾双方就互易位置，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起变化。毛泽东在这里用了中外革命史上的大量事例论证和说明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的不同及其互相转化的情形，进而具体地揭示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他指出：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新或推陈出新的。”①

为了进一步说明矛盾双方互相转化原理的普遍性，毛泽东还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和实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矛盾双方地位和作用的转化。他指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②这样说，并没有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③毛泽东在这里对于事物整体发展中因果关系的辩证法思想讲得十分清楚明白的。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决定”一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一是在“根源性”即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意义上，如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等；二是在“反作用”的意义上，如政治对经济的“决定性反作用”等。毛泽东所说的“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就是在“反作用”的意义上使用“决定”这个词的，也即是“决定性反作用”的意思。它丝毫没有否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这个总的前提。另外，毛泽东在讲到矛盾双方地位和作用相互转化时总是强调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而不是无条件地随便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转化。他说得很清楚，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是在一定条件之下才反转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因此，离开《矛盾论》的原意，把毛泽东关于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等等在一定条件下反转来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一论断，说成是唯心主义、唯意志论或二元论，是不恰当的，不正确的。

毛泽东在详细地具体地论述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之间的区别、联系和转化之后，深刻阐明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客观根据和它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因而矛盾和矛盾双方也必有主次之分。如果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毛泽东强调说："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①

综上所述，《矛盾论》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矛盾特殊性的两种情形提出来专门加以论述，指明了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和方法；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矛盾特殊性原理；它把矛盾和矛盾双方的主次之分同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联系起来，既指出了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客观基础及其普遍性，又具体阐明了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的均衡论；它把矛盾的主次方面同矛盾的新旧方面统一起来，说明矛盾主次方面的转化表现了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具体地揭示了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它还把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原理同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有机地联系起来，既唯物又辩证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践和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所有这些，都表明《矛盾论》中关于矛盾不平衡性，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原理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新的贡献，在许多方面可以说独具一格，超过了前人和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论述。

（四）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具体发挥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一切矛盾都具有的两个基本属性，是反映矛盾诸方面相互关系的两个基本的哲学范畴。研究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就是要了解矛盾诸方面各以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研究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它对于人们认识矛盾的实质，具体了解矛盾是怎样推动事物的发展，从而自觉地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30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也作了不少的发挥。《矛盾论》直接间接地引用了他们的一些论点和论据，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具体阐明和发挥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

首先，它明确地提出了矛盾同一性的含义，着重发挥了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思想。所谓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互相合作这些不同

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或两种意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面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①在这里，毛泽东引证了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的一段话，并举了大量的事例，例如《矛盾论》指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战争与和平等等现象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它们不但互相依存、互相联系，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否认这种同一性就不是辩证法。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驳斥了一些人对此所持的形而上学观点②。毛泽东特别强调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即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思想，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革命实质所在。他教导共产党人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把一切事物看作是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否认事物发展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毛泽东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任何矛盾的同一性都是有条件的、具体的，没有一定的条件，就不能构成矛盾，矛盾着的双方既不能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也不能互相转化。这对于人们正确理解矛盾的同一性，把现实的同一性和幻想的同一性区别开来，划清辩证法和相对主义，诡辩论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矛盾论》着重从运动的相对静止（量变）状态和显著变动（质变）状态的关系上发挥了列宁提出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观点，进一步展开论证了矛盾双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302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348页。

既对立又同一的相互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双方不但有同一性，还有斗争性。所谓斗争性就是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否定这样一种性质和趋势。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自始至终存在的、绝对的。毛泽东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和列宁所说的“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①意思是一样的，都强调了同一性的条件性。正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这时，事物处于相对静止或量变的状态。而当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事物的量变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时，就会引起统一物的分解，事物发生了质的变化，旧的同一就被新的同一代替。所以说，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而矛盾的斗争则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也就是说，事物无论是处于量变或相对静止状态，还是处于显著的质变状态中，矛盾双方的斗争都存在着，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斗争才引起事物由量变发展到质变而达到矛盾的解决，使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没有矛盾的斗争也就不会有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既有区别，一个相对，一个绝对；二者又互相联系着，“相对中有绝对”。②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③“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④这是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

① 《哲学笔记》，第111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07页。

关系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所作的深刻概括。它告诉人们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活动中，都要把同一和斗争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善于在同一中把握斗争，在斗争中把握同一。离开斗争谈同一，或者离开同一谈斗争，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当然，针对某种特定的情况，有时强调斗争的一面，有时强调同一的一面，这在实际斗争中是必要的，但应防止片面性，避免走向极端。例如，人们在强调斗争性时常常容易忽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把斗争性和同一性割裂开来或者绝对地对立起来，以为矛盾斗争的具体内容、形式和方法，可以不受具体的矛盾同一性的情况、性质所制约。

关于矛盾同一的相对性和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毛泽东后来在1939年研读《哲学选辑》时作了重要的补充。他对艾思奇选辑的《研究提纲》所作的批注中指出："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绝对性的含义。又说："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① 这说明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在一定条件下是能互相转化的，在不同的状态下，矛盾的同一性或斗争性都能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毛泽东所阐发的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如同整个《矛盾论》一样，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同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的产物。众所周知，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与同盟者，特别是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①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哲苑的奇葩》，《哲学研究》1987年第10期，第8页。

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曾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即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或者一切斗斗、否认联合。在党的历史上，前者表现为右倾投降主义，后者表现为“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它们的共同思想根源，从辩证法方面说就在于片面地割裂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同这两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方针。它要求共产党人在联合时不要忘记斗争，必须懂得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而在斗争的时候又不要忘了联合，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实践证明，又联合又斗争是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唯一正确的方针，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特别是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关系的原理指导革命斗争实践的具体体现。反过来也可以说，《矛盾论》关于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的理论正是这种又联合又斗争方针的哲学表现。由此可见，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同一和斗争的辩证法，是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的。

《矛盾论》的第六节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从斗争性问题中突出出来作了专门论述。和1937年的原稿相对照，这一部分的改动较大，增加了不少新思想、新提法。关于“对抗”这一概念，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使用过，并且强调了对抗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后来，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马克思所说的对抗和对抗形式，显然是指阶级社会中的对抗性矛盾而言的，在这里，他并没有把对抗从矛盾概念中分化出来，明确回答对抗是什么，也没有把矛盾的对抗性质和对抗的斗争形式区分开来。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要研究和解决的主要是阶级对抗性质的

矛盾和对抗的斗争形式或方法。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到对抗和矛盾、对抗形式和矛盾斗争的形式时常常是合而为一的。这种情况便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以为对抗和矛盾就是一回事，从而把矛盾的性质和斗争形式不论在什么条件下统统都归结为阶级对抗这一种性质、一种形式。例如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曾写道："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但是，把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的阶级对抗，则是到处都有它的表现"。列宁指出："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①。这样，就把对抗从矛盾范畴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概念，从而澄清了那种把对抗和矛盾等同起来的错误认识。这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史上又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矛盾论》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了进一步发挥。它强调指出，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是相对的，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情况，而不应当把阶级的对抗当作公式到处套用。它还指出："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②。这说明了对抗和非对抗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诚然，《矛盾论》也还没有确切地表述什么是对抗和非对抗的含义，但是为着从思想上纠正片面强调斗争而不讲究斗争方法和策略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而着重指出的上述两个基本点，从方法论上说无疑是正确的，有重要意义的。中国革命的正反两

① 参见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的评注。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方面经验都已证明了这一点。

（五）“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新论断

《矛盾论》论述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的逻辑顺序，正如作者申明的，是先讲矛盾的普遍性，接着用足够的篇幅详细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最后再回到矛盾的普遍性，即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上总起来加以论述和概括。这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为了着重地批判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实际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毛泽东在阐述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时指出：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定场合则为普遍性。这说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是相对的，二者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然而，普遍和特殊总是联结在一起的，每一个事物的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研究一定的事物，就应当去发现该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两个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

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这段话，深刻说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及其重要意义，具体发挥了列宁关于一般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法思想；从《矛盾论》的体系结构来看，也可以说是对整个矛盾学说的基本思想实质所作的非常精辟的概括。

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之所以说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就在于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说，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是贯穿《矛盾论》的一条主线或者说一个总纲，是理解和把握整个对立统一规律的一把钥匙。对此，毛泽东在《矛盾论》的结论中作过透彻的说明。他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②可见，只有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统一关系，即矛盾问题的精髓，才能深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2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0—311页。

刻把握矛盾规律的全部丰富内容，真正懂得辩证法并融会贯通。反之，如果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忽视或否认另一个方面，就会陷入形而上学，从而也就抛弃了辩证法。另外，从辩证法和认识论相统一的观点来说，也只有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才能完整地掌握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

其次，从实践活动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互相联结。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真理，概括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因而对各个国家的革命斗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果借口时代发展的某些新特点，或者片面地强调本国、本民族的特殊性，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及其指导作用，就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概括和反映各国革命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因而没有也不可能给各国革命提供现成的具体的答案；如果片面地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否认特殊性，拒绝研究本国革命的具体历史特点和特殊经验，生搬硬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不能违背的，但又不能把它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或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必须把它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才能制定出适合本国情况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而要自觉地做到这一

点，就要从哲学上真正懂得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联结的道理。

掌握矛盾精髓问题对于实践活动的重要指导意义还表现在它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概括总结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抓典型、“解剖麻雀”等等，就是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

总之，《矛盾论》提出的矛盾问题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新概括、新命题，它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各个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化了矛盾学说，具体化了并突出了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和解决实践中的各种矛盾，提供了根本的思想指导原则和科学方法论。这是毛泽东继列宁之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新的重大贡献。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的两篇主要的哲学代表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作斗争的历史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发展所取得的伟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系统化的主要标志，代表着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就“两论”对中国革命经验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所作的深刻的哲学总结而言，就“两论”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在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造成过巨大危害的错误倾向所作的透彻的哲学批判而言，就“两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根本原理的阐述的完整性、明晰性和创造性而

言，就“两论”的那种为哲学著作所难以达到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形式而言，就它们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就它们后来随着中国革命的影响而在世界思想文化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言，“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应该属于最重要著作的行列①。“两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相比，也称得上是珍品和上乘之作，许多地方明显地超出了同时代人的水平。

“两论”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彻底地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解决全党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们不但为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和解决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了伟大的指导作用。

“两论”基本思想的科学价值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已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斗争实践所证实。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长期体验，十分珍视和喜爱毛泽东的这两篇不朽的杰作，把它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以至整个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两颗璀灿夺目的明珠，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自觉性的基本教材。

“两论”和其他一切科学论著一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而也难免有某些局限性，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这就需要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地加以补充和修改，使之逐步完善和精确化。作者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这种情况是合乎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五十年前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已明确说过：

① 参见龚育之：《从历史决议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载《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①时代在前进，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理论也必须发展，必须创新。毛泽东的“两论”就是在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典范。

“两论”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留下的极为宝贵的哲学遗产，它们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仍然有其现实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以“两论”的基本思想作指导，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概括当代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为丰富和发展“两论”，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断地推向前进，作出新的贡献。

## 简短的结论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传播，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在共产党内和党外，政治、军事和哲学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具体化，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系统化，创造了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前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理论上特别是哲学上一系列积极成果。主要表现在：

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李达、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在研究、宣传和普及唯物辩证法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哲学活动及其研究成果，如《大众哲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践和理论上提出并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问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进一步紧密地结合。

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到群众斗争的实际中去调查研究，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等等。这篇著作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形，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中、后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工作，撰写了军事、政治、哲学等方面一系列科学著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光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最重要、最根本的思想保证。

#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

（1937年——1945年）

1937年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从挫折和失败重新走向发展、壮大的时期，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活跃、最生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了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时期的阶级关系异常复杂，一方面有激烈的民族斗争，另一方面又有尖锐的阶级冲突。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迫切需要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科学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原则。为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长征到达延安以后，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其他哲学著作，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分析和党的建设

等方面，批判了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及其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社会革命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从而捍卫、传播和丰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系统阐发

为了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批判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了战争问题，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军事著作，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分析了抗日战争中的各种矛盾，深刻地批判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 一、《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的发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发表于1938年5月至11月，即抗日战争初期。这些著作的发表是革命形势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国际上，政治形势十分复杂。德、意法西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一贯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相反，社会主义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爱好和平的人民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站在中国抗战方面，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英、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既不同于德、意，也不同于苏联。在"中立"和"不干涉"的幌子下，他们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中国对日本的抗战；另一方面，又企图借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消灭中国和东方的革命力量，并把战争引向苏联，或者使日本与中国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在国内，当时的战争形势，从日本侵略军方面看，敌军以优势的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领导和发动全国军民奋起，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在1938年武汉失守后，却采取了反人民的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这两条抗战路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形势极其复杂，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都关注这场战争的前途和命运。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发展？如何进行抗战？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依照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不同的回答。在国民党内部存在着两种错误论调：一种是“亡国论”。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片面夸大敌强我弱，在抗战爆发前就大肆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等等。抗战爆发后又叫嚣“再战必亡”，为他们公开降日制造舆论。这种论调在某些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中也发生了影响，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另一种是“速胜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在被迫抗战之后，时刻幻想早日结束对日战争，早在“八一三”事变时，他们就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这种“速胜论”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反映，由于1937年9月平型关首战告捷、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人，便产生了轻敌情绪，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认为国民党有很大力量，国民党抗日了，可以配合共产党有效地打击日本，日本不值一打。这是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主张“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批评我党的“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观点是“机械的”；幻想在一个早上把“鬼子”赶出中国，中国可以很快取胜。

为了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主张，阐明共产党

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以便统一思想，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坚持抗战，夺取战争的胜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作了积极探讨。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解放周刊》(第十二期)发表了《实行对日抗战》一文，指出："抗战是唯一的出路"，"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同年10月16日，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对在华北能够继续持久地抗战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作了较深入的分析。11月，周恩来作了《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演讲，接着又写了《怎样进行持久战》的文章，总结了抗战初期的经验，明确提出坚持持久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正是这样的集体探讨，为毛泽东全面系统阐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必要的准备。

经过十个月的抗战实践，毛泽东深入研究了战争问题和战略战术问题，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最初发表于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辑的《抗日战争丛书》第一册《抗日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中），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11月6日又写了《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揭示了这场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了这场战争的进程，正确地提出了指导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为中国人民赢得这场战争指明了方向。这些军事著作是对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战争问题，批判战争问题上唯心论和机械论，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典范。因此，这些著作同样是重要的哲学著作。如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奏，那么也可以说，《论持久战》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续篇。

## 二、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应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和战争的发展来考察战争和战争规律，着重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周恩来的《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具体体现了这一思想，科学地阐发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

### （一）深刻揭示中日战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中，全面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后指出，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只有坚持抗战，才能最后战胜敌人，初步预见了经过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从而把握了中日战争的本质，揭示了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基本过程，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正确结论。

毛泽东指出：“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① 所谓“客观的、全面的观点”，也就是唯物辩证的观点。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特别是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具体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② 具体地说，日本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强国，有强大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然而日本帝国主义是处于垂死没落的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5页。

时代，由于内外矛盾，它一方面对内镇压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决定了它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它又是一个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国民中灌输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就产生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特殊野蛮性。日本是一个小国，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战争是在其先天不足的条件下进行的，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在国际上，它失道寡助。日本进攻中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它虽然得到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但却遭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又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还遭到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革命人民的反对。这样，日本就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支持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种反对力量，在战争中将逐渐增强。中国方面：我们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然而中国如日方升，处于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它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中国本身具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进步的因素，有了已经觉醒的广大人民，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了数十年的革命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它又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在国际上，它得道多助。这是运用矛盾辩证法分析具体问题的光辉范例。

毛泽东在对中日双方的特点进行分析和综合之后指出：互相矛盾着的中日双方的特点，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必须承认，敌强我弱，我不能速胜；又必须看到，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也为其他有利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造成了敌强我弱的相对形势。毛泽东还指出："这些特点，规定

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①，因此，结论是：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只有经过持久战，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是抗日战争发展的最根本规律。

（二）“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

在对中日双方矛盾的分析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并深刻揭露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他说，中日双方的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②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一切东西都是从这里发生出来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犯错误，他指出，亡国论者，看重了敌强我弱一个矛盾，并且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根据，把它看成是绝对的，不可变动的东西，而没有看到其他矛盾之间的联系和变化；也没有看到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条件。20世纪30年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特征给予中日双方以不同的影响。亡国论者片面强调亡国这种可能性，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胜利的可能性的根据视而不见，在行动上，只能把战争引向失败。速胜论者或则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一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夸大中国的长处，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看问题的方法都是片面的、主观的。正象《矛盾论》中指出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亡国论”和“速胜论”表现为两个极端，从认识问题的方法来说，它们的错误又有着共同的根源，都是主观的、片面的，因而在实践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

上同样会遭到失败的结果。主观地看问题，表现了唯心主义倾向；片面地看问题，表现了机械论即形而上学倾向。正象毛泽东指出的，“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

（三）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发展的趋势和中国最后胜利的必然性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以辩证法的变化发展的观点分析中日战争，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即：（1）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2）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即战略的相持阶段)；（3）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在每一阶段发生的变化时，不仅区分向下的变化和向上的变化，而且还区分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区分新的量和质的变化与旧的量和质的变化。

毛泽东指出：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但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中国方面：向下的变化，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这是旧的量和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量上；由于这种量的减少是暂时的、局部的，所以，还不足以引起质变。向上的变化，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这是新的量和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质上。这就是部分质变。这些因素虽然弱小，但却代表了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两个相反的变化，反映了中国自身的矛盾运动，进步势力和积极因素逐步克服落后势力和消极因素，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随之而来的是新质的量不断扩张。这也是我们能够坚持持久战和最后战胜敌人的根据。日本方面：向下的变化，表现为人员的伤亡、武器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这是必然的不断扩大的变化，随着这些变化在数量上的增加，将必

然引起质变。向上的变化，主要是占领区、人口和资源的扩大。这种变化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主要表现在量上。不会引起质变。这两种变化，反映了日本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它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现象，而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也必将限制其占领区的扩大，这是日本不能灭亡中国的主要依据。

第二阶段，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诸因素将继续发生变化。即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中国开始脱出劣势，日本开始脱出优势，先达到平衡，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这一阶段，中日双方的各种矛盾因素虽有明显变化，但从矛盾总体上看，还没有发生根本质变，仍属于局部质变，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

第三阶段，中国方面经过第二阶段长期的艰苦斗争和准备，自己的力量不断壮大，国际援助等有利因素即向上的因素更加增多，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即变为我强敌弱，我开始举行战略反攻、收复失地，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总的来看，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即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则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即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和必然趋势。这种趋势是由战争双方矛盾运动引起的。它充分体现了辩证法关于量变质变学说。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也是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因素质量互变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战争的根本性质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在每阶段中，不但有量的积聚和削减，而且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在部分质变中又有量的扩张，最后，由部分质变到达于根本质变，以中国的胜利和日本的失败而告终。

毛泽东还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阐明了军事战略必须随着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而转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军在党的全

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正确地实行了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具体规定了抗日战争三个不同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第二阶段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阵地战为辅；第三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游击战为辅。表面看来，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似乎是一样的，即都是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游击战为辅。但正象毛泽东指出的，“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①可见，第三阶段和第一阶段相比，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重复中体现出新的发展和包含了新的内容。

上述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的发展，充分表现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作用，即不仅在于它与正规战的配合，而且在于游击战发展为正规战，游击军提高为正规军。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军由国内的正规战转变为抗日的游击战，在抗日战争后期，我军又由抗日游击战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的正规战。与此相适应，我军存在着由正规军转化为游击军、游击队，再由游击队、游击军转化为正规军的过程。正规战——游击战——正规战，正规军——游击队、游击军——正规军，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军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军，是在更高阶段上的重复。这充分揭示了中日战争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波浪式前进，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毛泽东还指出，没有游击战争，就不能战胜日本，并明确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刘伯承指示部队，要深入理解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7页。

的战略指导思想，尽快完成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他说："游击战争是在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采取的战略方针"，并制定了"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战术原则和"麻雀战术"、"黄蜂战术"等①。刘少奇1937年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明确指出："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坚持游击战争，对于"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有"伟大的意义和光明的前途"②。

但是，党内外有许多人仍然轻视游击战的重大战略作用，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正规作战上面。针对这一错误思想，毛泽东从中日战争的特点出发，反复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运用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根据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制定了以下六项具体方针：（1）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2）和正规战争相配合；（3）建立根据地；（4）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5）向运动战发展；（6）正确的指挥关系。从而深刻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揭示了游击战争的一般规律。朱德也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认为抗日游击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③，并根据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的对比制定了具体的战略战术，丰富、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① 杨国宇、陈斐琴：《刘伯承用兵录》1982年版（下同），第103、115、117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80—81页。

③ 《朱德选集》第39页。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科学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矛盾运动，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必然过程和趋势，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批判了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向全国人民指明了经过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的正确道路，这是对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 三、战争中的主观和客观

在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中，毛泽东既反对唯心论，又反对机械论。要求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

### （一）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和自觉能动性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的。在《论持久战》中，他进一步阐明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可知性。指出，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带有更大的流动性和“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①，是有规律的。战争规律是战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各方面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虽然战争的特殊性使人们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认识敌我双方，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但是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总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②，通过各种侦察手段，通过正确的分析、判断和推理，还是可以知其大略、知其要点的。战争具有流动性，战争的计划很难完全固定，它随着战争的运动而变化。否认战争的流动性，否认战争计划或方针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加以变化、修改，就是战争的机械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不确实性，从根本上否认战争的相对确实性，战争规律的可认识性和战争计划或方针的固定性，就会陷入战争问题上的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

唯心主义者用战争这种社会现象的特殊性来否认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既肯定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反对了唯心论，又着重阐明了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问题。他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 这里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人类自觉能动性的含义：自觉能动性是人们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它包含着思想和行动两方面。人们的活动总是首先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引出思想、道理、意见，这是要求主观正确反映客观；然后提出方针、计划、政策、战略等，这是根据正确的反映，正确确定目的和制定实现目的的行动路线、方法；最后要付诸实践即主观见之于客观。这是通过实践，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此，它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既区别于主观唯心论，又不同于机械唯物论，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原理。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称之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人类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胜负具有决定作用。他说，战争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竞赛，“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①。他在论述战争力量的变化时，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这就是说，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人们发挥自觉能动性，能够改变一些条件，创造一些条件，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发展，在具备了客观可能性的时候，自觉能动性在变可能性为现实性中具有决定作用。因此，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正确地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

（二）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

发挥自觉能动性，必须以客观规律和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只有从战争实际出发，建立在符合战争客观规律基础上的思想、计划、方案，才是正确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44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455页。

来。”①这里毛泽东把客观条件比做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舞台”，把自觉能动性的正确发挥称做威武雄壮的“戏剧”，用舞台与戏剧的关系生动地阐明了自觉能动性和客观物质条件的辩证关系。只有在掌握客观规律和认识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去夺取胜利。刘伯承常常赞赏孙武子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名言。他认为，所谓兵无常势，是说战争形势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但又不是说战争捉摸不定，不可知的，而是有它固有的客观发展规律可寻的。人们“必须在战争中认识和掌握其规律”，“才能无往而不胜。所谓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就是说要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改变自己的战法。以符合战争发展的规律，便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地步。”②

为了在战争中取得主动权，我们必须反对那种离开客观条件的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任何脱离客观物质条件、脱离实践、违背战争规律的主观能动性，决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性，而是唯心主义的能动性，其结果，只能把战争引向失败。

在战争中发挥人的自觉能动作用，不只是发挥少数指挥员的自觉能动作用，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广大军民的政治觉悟，充分发挥全军全国人民的自觉能动性。这是争取抗战胜利诸条件中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③他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扬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以劣抵优、夺取主动，以弱胜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② 《刘伯承用兵录》，第10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要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就要正确认识战争中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和唯心论。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是机械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不重视战争中人的能动因素。毛泽东指出，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①。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都迷信武器的优势，而一切革命的军队的武器在开头总不如敌军的武器，但在历史上，却总是武器差的革命军队战胜武器好的反动军队。毛泽东对唯武器论这样一种机械论的批判，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用差的武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毛泽东批判唯武器论，并不否认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武器的质量和数量，不仅影响到军队战斗力的强弱，而且影响到军队的编制和战略战术。他认为游击队发展到正规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装备上提高武器的质量和种类，增加必要的通讯器材。他还指出：“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②否认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样也是一种主观的、片面的形而上学，是落后的、愚蠢的思想，是战争问题上唯心论的表现。

毛泽东关于人类自觉能动性的科学定义，关于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关于如何才能正确发挥自觉能动性以及对战争中机械论和唯心论的批判，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能动革命的反映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8页。

## 四、战争和政治、战争和革命

毛泽东和朱德在其军事著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战争和政治、战争和革命的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指出，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夺取战争和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一）战争和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为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曾认真研读了德国战争哲学和战争史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名言作了新的解释。他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策的另一种（即暴力）方式的继续’。”①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运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阐明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他指出：“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②战争过程始终贯穿着政治，一定阶段的政治总是渗透、贯穿、表现在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表现它处于帝国主义没落时期的法西斯政治。无产阶级军队中的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等政策则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政治。“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③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说：“一切战争，都具备着政治的要素，也可以说，没有政治要素的战争是没有的。”④任何战争，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决定战争，战争从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④ 《朱德选集》第40页。

属于政治。因此，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从事战争的时候，必须十分注意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战和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等政治因素。“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①。那种把战争和政治割裂开来，把战争孤立起来的战争绝对主义是错误的。

但必须看到，战争和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②是解决那些用其他手段无法解决的对抗性政治矛盾的一种最严酷、最激烈的暴力手段。毛泽东指出，战争有它自己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否认战争的特殊性，把战争完全等同于一般政治也是错误的。因此，毛泽东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③这是毛泽东关于战争和政治辩证关系的精辟概括。

毛泽东在阐述政治决定战争的同时，还分析了坚持抗战和政治改进的关系，指明了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他说：“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④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时说：“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4页。

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①，“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②。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根据战争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根据战争的阶级实质和它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毛泽东明确地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类。他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③这是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本质上分析战争历史的发展过程所得出的正确结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时候曾经说过：“决定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看谁先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是看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那一种政策的继续。”④只有那些为了争取人民解放，争取民族独立，反抗侵略的战争才是进步的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⑤。凡是为了维护反动统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益而进行的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侵略、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正义战争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非正义战争则会阻碍社会发展。

“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⑥对于一切非正义战争，共产党人反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8页。
⑤ 《列宁全集》第8卷，第8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3页。

对的方法是："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①毛泽东歌颂正义战争说："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②他赞誉我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③。

（二）战争和革命

首先，毛泽东发挥了列宁关于战争引起革命，战争是革命的导演的思想，认为战争固然可以导演出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更可以导演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民族民主革命。他在分析中国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曾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视为中国革命的导演和加速器。在《国共合作成立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④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必将促成国共第二次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将会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正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准备了物质的和精神条件，即既提供了工厂、铁路、子弹，又唤起他们的觉悟并促使他们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为胜利地进行全国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9页。

其次，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中提出了“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的论断，这是对列宁关于革命制止战争思想的继承和说明。在驳斥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时，他说：“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①。只有经过战争才能消灭战争，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毛泽东不仅肯定了战争与革命之间的相互转化，肯定了暴力革命是一条普遍规律，而且运用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的原理，分析了在不同的国家，实行暴力革命的具体途径。他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②但是如何执行这个原则，则由于条件不同而不一致。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要经过一个议会的合法斗争阶段，一旦革命爆发，是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但是另一类国家，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又由于他们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页。

城市，因此，中国革命是长期的和残酷的，是走先占领乡村，后取城市的道路。

## 五、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毛泽东不仅确定了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且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抗日战争敌我双方各种矛盾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斗争、互相转化的错综复杂关系，制定了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战略战术原则，论述了抗日战争三个阶段中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主动和被动的辩证关系，进一步丰富了对立统一规律。

### （一）进攻和防御

毛泽东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本质，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进攻和防御，直接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相联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①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同进攻、防御这两种基本的作战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毛泽东从战争的目的出发，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详尽地考察了进攻和防御的辩证关系。他说，就战争的总体看，进攻是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手段，还说：“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②可是，从辩证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页。

法的观点看，进攻又是有条件的，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任意发动的。就我国的抗日战争来说，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因而决定了我们在抗日战争的第一、二阶段是战略上的防御战。然而这种防御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防御，是在防御的形式里包含了进攻的内容。即不但在战役战斗中包含了进攻，而且是尔后总的进攻的前奏。同时，也只有在战役战斗的进攻中打很多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的目的。到抗日战争的第三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是战略反攻，在现象上，表现为战略进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描述中日战争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的表现时，论述了大块与小块、包围与反包围、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贯穿着进攻与防御的辩证统一。这就是攻中有防、防中有攻。进攻与防御互相结合、互相渗透、互相转化。

（二）持久和速决

战争中的持久和速决是直接受战争目的支配的。为了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战争双方无不要求速决，都愿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然而，持久和速决并不是人们随意规定的，而是由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具体情况决定的，是有其客观规律性的。从抗日战争看，日军虽强，但数量不多，我军虽弱，但数量较多，再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只占领一部分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补给线长，不利于长期作战。战争时间过长，不仅容易被打败，甚至会被拖垮。而我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无论在天时、地利与人和方面，都有利于坚持长期作战。因此，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日本方面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则采取战略的持久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到战场作战时，就要利用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集中兵力，采取速决战的方针。这样，我之战略上的持久战，则转化为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

"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①。而"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②。可以看出，毛泽东从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出发，引出了战略的持久战，又把战略持久战化为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同时又以战役战斗速决战的每一胜利作为实现战略持久战的有效手段；最后又以我之战略的持久战，粉碎敌之战略上的速决战。这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同时也说明，在战争中持久与速决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三）内线和外线

内线和外线同进攻与防御直接相联系。内线是双方交兵在自己的占领地内进行，外线是双方交兵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一般说来防御者处于内线，进攻者处于外线。因此，在抗日战争第一和第二阶段中的敌我双方之间，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则造成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但是，毛泽东认为，敌我双方的外线与内线的地位，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由于我有"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我则可以"采取灵活的运动战"，集中兵力，"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③。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8—3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2—453页。

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①。

由此可见，我们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经过主观努力，依靠主观指导的正确，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坚持战略上的持久战，采取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这样就可以改变敌战略上的外线地位为战役战斗上的内线地位，变我战略上的内线地位为战役战斗上的外线地位，从而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内线与外线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辩证法。

**（四）主动和被动**

在战争中，为要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就要“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深刻地阐述了争取主动权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说，主动权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因为“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②。为此，战争的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掌握主动权。然而，主动权不是凭空来的。战争中的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和主观指导的正确和错误分不开。毛泽东指出：“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③这就是主动和被动对优势和劣势的依赖关系。否认这一点，就是唯心论。

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战役战斗过程中，居于劣势和较弱的一方，可以依靠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6页。

争主观指导的正确，扭转被动与劣势的地位。在战略上，以多次战役战斗的被动与主动、劣势与优势的转化为基础，经过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则可以达到主动与被动、劣势与优势在战略上、全局上的转化。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是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造成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的地位，把他们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造成了我方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造成了敌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还说："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①他指出，必须依靠优越的民众条件，封锁消息，采取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以便有效地使敌陷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此，在战争中，主观指导上的正确，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及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否认这一点，就是机械论。

毛泽东还详尽地阐述了战争中灵活性和计划性。认为它们都是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毛泽东说，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还说：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②。然而，这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因为"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1页。

胜”①。所以，他说：“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②。只要有这种“运用之妙”在符合客观情况的基础上，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对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和击破敌人，夺取最后胜利。

计划性，是夺取胜利的基本保证，是战争主动性的具体实施。毛泽东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③因此，战争的指挥者，应根据战争的特点，制定尽可能严密的计划，预先做好准备工作，如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没有这个准备，什么主动、灵活等等，都是不能实现的。刘伯承把战前准备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谓之“五行”；他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形象地告诫我们要重视战前准备工作，只有“五行”做好了，对敌我才能明察秋毫，了如指掌，进而才能定下决心，制定作战计划。他还说：“作事要有计划”，“计，就是计算时间；划，就是划路线图。”④这种说法恰当地抓住了作计划的本质。任何一个计划的实施，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作战行军总是要从一定的时间、地点开始，沿着一定的路线、方向运动，在某个时候到达某个路线上的经纬交叉点或某一地点。因此，要依照战略、战役和战术的范围和情况制定计划，并随着战争情况的发展及时地补充、修改和改变计划。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1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④ 《刘伯承用兵录》，第112、132—133页。

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①。取得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

## 六、兵民是胜利之本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而战争则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因此，人民群众是进行革命战争的主体，对革命战争的胜负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列宁指出的，“解放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当广大群众参加了这些战争的时候，解放事业就会很快地实现。”②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总结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③“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实行群众战争，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这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因此，毛泽东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指出政治动员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凡是战争都有一个政治动员问题，都要按照本阶级的利益、政治主张去教育军队，动员广大群众。毛泽东历来重视政治动员工作，在抗日战争中，把政治动员提到战争胜负的高度来认识：“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④只有用进步的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第94—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8页。

治精神动员群众，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抗日战争的目的和意义，明白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起进行和支援抗日战争的政治热情，造成抗日的热潮。在政治动员这个总前提下，我党还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方针、政策、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这对于发动农民起来抗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指出："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① 同时，毛泽东还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正如毛泽东所说："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②，"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③。

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列宁说："只有武装的人民才是人民自由的真正支柱。"④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对于战争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阐明了人民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479页。

④ 《列宁军事文集》第19页。

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①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他针对我们党领导的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这一实际情况，及时地提出必须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和武装他们，彻底肃清一切旧式军队和小生产者落后思想的影响，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并规定了“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②的原则，以保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毛泽东为我军提出和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宗旨。他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③只要坚持这个宗旨，他们就可能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就能打垮任何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征服。

在军队的内外关系上，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创立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他说，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军民一致的原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和民众打成一片，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他还说，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因此，他主张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并号召大力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这样，就广泛地调动了全体军民的积极性，使他们同仇敌忾，患难与共，团结一致，充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8页。

地发挥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威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提出实行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这是人民战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还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① 归根到底，"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战争所需要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朱德把抗日游击战争生动地比喻为抗日的"大众战"和"民兵战"，并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它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②。正是由于我党坚持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到1939年9月就使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即敌之战略进攻和我之战略退却已经基本停止。1940年8月间，在华北地区，我八路军在人民群众和游击队密切配合下取得的"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寇，使人民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到抗日战争的后期，各地民兵实行人自为战、村自为战，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到处开展游击战争，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这充分显示了抗日"群众战争"的伟大力量。

总之，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中心是要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9页。

② 《朱德选集》第31页。

争力量的源泉，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和群众路线在战争问题上的生动体现，也是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具体表现。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战胜的。

## 七、朱德《论解放区战场》及其哲学意义

《论解放区战场》，是朱德（1886—1976）于1945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第三阶段即我之反攻阶段的前夜。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和两种地区，向着相反的方向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一方面国民党战场在日军进攻面前节节溃退，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剧；另一方面解放区战场开始局部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人民抗日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迅速发展，成为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主力。

为了回顾解放区战场创建和发展的历程，总结解放区抗战的经验，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朱德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根据党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总结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路线，对人民军队建军的原则以及怎样养兵、带兵、练兵、用兵等，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解放区抗战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实行了一条由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构成的中国人民抗日的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关键，也是贯穿报告全文的中心问题。《论解放区战场》是一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军事的重要著作。

### （一）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用兵新法

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指出："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

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① 这个用兵新法，是朱德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军事指挥的科学概括；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客观规律；是研究、制定战略、战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句话“有什么枪打什么仗”，说的是打仗要根据部队武器装备。武器装备是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是产生技术、决定战术直至战略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朱德研究和制定战略、战术，总是从我军的武器装备出发。他明确指出：“当早年我们军队仅是步枪加梭镖大刀时，我们即研究如何根据这个现有条件去下决心，去决定战法，那时我们对着这样的军队不去高谈机械化兵团的战术。”② 抗战初期，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朱德又指示全军，“要尽可能地避开敌人的新式武器”，“利用夜间作战、打埋伏、突然袭击、断绝敌人交通等战法”去消灭敌人③。当然，打仗从武器装备出发，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能动的。武器装备是进行战争的工具，只有和人结合，才会变为现实的战斗力。朱德是人和武器的辩证统一论者，他研究武器装备从来都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他再三强调，要把政治战争这一武器提到最高地位，发扬人的旺盛的攻击精神，要创造新战法，用智谋去战胜敌人。这样就克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第二句话“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这是讲打仗要根据敌情。古兵法说：“善医者因症立方，善兵者因敌立法。”朱德正是这样的“善兵者”。在战略上，朱德十分重视对敌人政治、经济、人员、装备、交通等基本要素进行全面、综合地考察和研究，从而确定战略方针。在技术上，朱德十分重视对战区敌方武

① 《朱德选集》第168页。

② 《朱德选集》第168页。

③ 《朱德选集》第52页。

器装备、兵员素质、战场情况、后方补给以及指挥官的性格特点等情况作具体的了解和分析，从而决定自己的战法。

第三句话“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是指打仗要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战争和其他事物一样都在一定时间、空间中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区的转换，一切条件都在不断变化，照搬“本本”或墨守陈规，都要受到惩罚。朱德学习外国经验，总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他说：“我们需要吸收各国的军事理论与经验，我们应向他们学习，不学习是不行的。但我们不机械搬用它，不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看待。”①朱德创立的战略战术原则，总是立足当时当地的实际，因时因地制宜。

总之，朱德把这个用兵新法牢固地建立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不拘一格的唯物主义军事原则。

### （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辩证思想的运用和发挥

变化性、灵活性是军事辩证法的精髓。朱德明确指出：“人民军队的用兵方法，则是随机应变，变化无穷。”②他告诫我们，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用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他在《论解放区战场》中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③他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情况，分析了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主动与被动等等之间的互相对立互相转化的关

① 《朱德选集》第169页。

② 《朱德选集》第167页。

③ 《朱德选集》第168页。

系，创造了解放区战场抗日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提出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反复穿插打破敌之‘反转电击’，以分散隐蔽、灵活转移、寻求敌之弱点，打破敌之纵深包围”；“以军民大破坏打破敌之封锁分割，以民兵和分散之小部队相结合之地雷战，打破敌之梳篦搜索”，“以数个地区之配合出击，援助友邻区，打破敌之合围、‘扫荡’”等等①，《论持久战》中的所谓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在解放区战场上集中地表现了出来。

总之，朱德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改变战略战术，使指挥艺术不断创新，这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指挥经验，是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和发挥。

（三）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

朱德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贯彻于全部战争的指导和军事著作中。1938年朱德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交相辉映，对于坚定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心，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论解放区战场》中，他指出：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关于‘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部分所提出和所解决的建军问题。”②解放区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它具有“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它的建军原则“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军队，才是真正“人民的军队”，“具有最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③。

人民军队进行的是人民战争。要进行人民战争，必须实行民

① 《朱德选集》第152—153页。

② 《朱德选集》第156—157页。

③ 《朱德选集》第158—159页。

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才能实现全民抗战总动员，造成人民战争的真实基础。朱德说："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①"。这种群众战的辩证结合方法，比如：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作战上的结合；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结合等，是朱德军事思想的一大特色。在抗日战争中，朱德率领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朱德领导下，八路军把发展民兵视为坚持敌后抗战的重大军事任务，派出大批干部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抽出大量武器装备民兵，帮助民兵进行军政训练；广大民兵创造了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和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巧妙的游击战法，神出鬼没地袭扰敌人，破坏敌军的交通线、通信联络、后方仓库，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成为"支持敌后长期浩大战争的最雄厚的后备军"。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短短三年时间内，开创了大片解放区，八路军由几万人发展为四十万人的大军，取得了人民战争的辉煌战绩。正如朱德指出的："解放区人民的长期英勇战斗及其各种建设，是真正替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造成了可能的基础，是给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做了最大的准备。"②

朱德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军事斗争实践中，为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思想增添了重要内容。正是这种卓有成效的人民军队所进行的人民战争实践，才为实现毛泽东提出的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迎接抗日大反功，争取最后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① 《朱德选集》第152页。

② 《朱德选集》第141页。

## 第二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同盟军问题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整理论和策略原则。并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写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以及《论统一战线》等著作，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了深刻的阐述，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增添了新的内容。

### 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中国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又有主次之分。在北伐战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北洋军阀的矛盾。在土地革命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矛盾。由于主要矛盾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分析了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及其变化，充分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论述，给我们指明了正确区分和对待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的方法，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一切抗日力量提供了哲学基础。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了分析之后，强调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必须牢牢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否则就容易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以致不能正确观察形势，不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政策。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至1940年春）和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初）之后，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是“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的重演，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破裂。毛泽东指出，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中日民族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矛盾。他说：“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①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

只有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前途。毛泽东指出，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成立，“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②”。为此，我党中央发出了“抗战到底，团结到底”的号召，指出“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③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有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并号召对于非坚决投降和非坚决反共的人，则必须采取团结政策。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7页。

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以期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 二、运用辩证法两点论，制定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原理，在具体地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复杂矛盾的统一和斗争方面的情况之后，根据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正确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推动了抗日民族运动的发展。

"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实行的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实行的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方针。这两种极端的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① 他在1940年12月发表的《论政策》一文中又把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提了出来，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②"，"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1页。

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①”。毛泽东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党不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抗战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同资产阶级联合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抗战就会失败。

实践表明，在统一战线中，只有联合而没有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没有联合的政策都是错误的。

（一）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毛泽东与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分歧之一。这在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王明从内战时期的“左”倾关门主义一变而为右倾投降主义。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反对洛川会议决议，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在1937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在《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投降主义的主张，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完全放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王明的阶级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反复阐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初期，毛泽东、刘少奇就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担负起领导者的责任。刘少奇在1936年11月20日发表了《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在1937年11月发表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8年10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作了《论新阶段》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问题》等报告，在这些文章和报告中，着重阐明了党的领导问题，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提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1页。

在全国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同时，要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明确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因为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壮大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力量。所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①

为了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刘少奇阐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坚持统一和独立的辩证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是一致的。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可能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利益，但也不能否认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存在，正如他们指出的，“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绝不停止与忽略阶级斗争，统一战线也需要这种斗争来充实自己”②。“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③。在统一战线内部实行有限度的、必要的阶级斗争，是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还指出，在抗日战争中“要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坚持统一性就是一切要服从共同的抗日战争的利益，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坚持独立性，就是“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④，保持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这样才有利于合作，有利于统一战线。刘少奇具体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关系，他说：“无产阶级必须自己确实地、不动摇地独立起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491页。

来，然后才能与别人进行平等的联合。若是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能独立或取消自己的独立，那就不能联合别人，只能供别人利用。”①

总之，“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②，要“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③。如果只讲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只讲合作，否认照顾各阶级的利益，合作就变成了混合，必然要牺牲统一战线；如果只讲独立性，不讲统一性，把独立性看成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就是说，“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④毛泽东、刘少奇运用唯物辩证法，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关系，清除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从而使全党进一步认识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

### （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

毛泽东在唯物辩证地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对待抗日的不同态度及作用之后，把这些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党派划分为“左翼集团”、“中间集团”和“右翼集团”⑤这样三个不同的集团。并指出：要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扩大和巩固，“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9—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5页。

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①。

所谓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尽可能地发展各种民众运动以及争取知识分子等等。进步势力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为抗战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斗争，还要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这种斗争必须收到确实的成效，否则进步势力就无法发展。

所谓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既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也不是革命对象，而是联合、争取的力量。中等资产阶级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工人阶级有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是他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赞成团结抗日，并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开明绅士是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其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阶级有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也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其领导成分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损人利己政策也有矛盾，因此，他们也想利用我们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毛泽东在做了上述分析后指出：“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①，充分利用他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扩大自己的势力。然而，争取中间势力是有条件的，毛泽东说：“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②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甚至变为顽固派的同盟军，使我们陷于孤立。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③

所谓反对顽固势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又分为抗日派和降日派。大资产阶级抗日派虽然同降日派有区别，但是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毛泽东指出，对于这种反革命的两面政策，必须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对其尚能抗日和不愿意从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加以联合。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对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面进行坚决斗争。只有坚决斗争，限制其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才能保护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才能延长顽固派留在统一战线中的时间，避免发生内战。正如毛泽东所说：“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④。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⑤”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根据上述，显而易见，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巩固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争取中间势力，才能更好地发展进步势力、扩大和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也只有反对顽固势力，才能更好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总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这三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充分表现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 （三）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为了同顽固派进行坚决有效的斗争，毛泽东指出：在和顽固派斗争时，必须采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①的策略原则。因为，任何斗争必须依靠力量。如果不善于争取力量，建立斗争的优势，使敌人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就没有斗争的胜利。

为了在同顽固派斗争中争取更多的同盟者，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对国民党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②他还在《论政策》中，对顽固派中的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对汉奸亲日派中间的两面分子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等加以区别；对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对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等等。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这就充分利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用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利用了顽固势力中抗日派和降日派的矛盾，利用了顽固派和中间派以及敌人的一切矛盾。只有善于利用矛盾，才能争取多数，只有争取了多数，才能做到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少数，也只有真正做到了反对少数最主要的敌人，才能有效地争取多数，促进敌人内部发生分化，最后达到各个击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的目的。

在和顽固派斗争时，毛泽东还指出："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保持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利用顽固派的矛盾，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保持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实行休战，而不可无止境地斗争下去，保持斗争的暂时性。"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①那种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都是把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其结果必然是或者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错误，或者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错误。

### 三、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右两种倾向

为了正确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共产党内必须同时反对"左"右两种倾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在芦沟桥事变之前，国民党还未抗日，统一战线还未形成，党内的主要危险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关门主义。他们机械地搬用外国革命的经验，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根据情况决定政策。他们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企图"一切打倒"，"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因此，他们在革命策略上，不会利用敌人的矛盾寻找同盟者。

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于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实行政治策略上的转变提供了客观依据，扭转了"左"倾关门主义给党造成的长期孤立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当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迅速发展的时候，以王明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逐步发展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他们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抗战营垒，抹煞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此，只讲联合，否认斗争，错误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王明的错误观点，指出：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只能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是当政的党，它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不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条件下，提出所谓"一切经过"，"一切服从"，就只能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这是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以内，企图以消极的让步来维持与国民党的联合，这是完全不应该的，也是十分错误的。

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都是没有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而犯了错误。"左"倾关门主义者，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的一面，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致使无产阶级陷于孤立，使革命遭到严重挫败。右倾投降主义者则忽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原则差别，抹煞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独立性，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使革命遭到损失和失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十八年来的经验，系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的规律，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反对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又"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作一样的东西，忽视他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①。

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时，毛泽东总是在反对某一主要倾向的同时，提出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即反"左"时要防右，反右时要防"左"，从而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总之，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对国内国际矛盾的具体分析，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以及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对不同对象实行不同的联合和不同的斗争的策略原则等等，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运用。

## 四、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及其哲学意义

《论统一战线》，是周恩来（1898—1976）1945年4月30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0—571页。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发言中，他首先回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同时还深入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指出："这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又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就是要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①，并运用唯物辩证法对这三个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一）变化发展地分析和认识敌人，准确地把握打击对象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敌人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这是不变的。但由于"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②。周恩来指出，有时敌人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如"宁汉合作"时期，帝国主义站在他们后面一致地压迫革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成为中国抗战的同盟军。汪精卫投敌，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站在抗战方面反对日本，但又和日本勾结。所以，敌人是有分有合的，"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原来是帝国主义，现在是同盟国，原来蒋介石国民党是敌人，这时是暂时的同盟者。同时，周恩来还指出，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有两面性。既有可以同他们联合的一面，又有反动性的一面。这样，认清敌人就成了复杂问题。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随时全面地认识敌人，提出战胜敌人的正确方针，准确地把握打击对象。而"左"右倾机会主义却不认识敌人的这种变化，右的错误常常把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7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8页。

敌人当成朋友；“左”的错误常常把朋友当成敌人，结果都损害了革命。只有认清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的特点，才能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二）唯物辩证地分析阶级矛盾，争取广泛的同盟军

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所以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错误。”①

他首先分析了这个队伍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指出：“无产阶级是这个队伍中的骨干。无产阶级的觉悟高，本事大，可是人数少，力量小”。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中国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有了农民我们就能进能退；没有农民，进是少数孤军前进，退则没有地方可退”②。其次，分析了城市小资产阶级。他说，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队伍中的基本力量，但必须跟农民结合，革命才能取胜。还指出，右的观点以为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就可以取胜；“左”的观点是连城市小资产阶级都不要，排斥知识分子，这都是不对的。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有力量”③。其三，分析了自由资产阶级。他认为，自由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争取他，联合他，至少可以使他中立，但是不能依靠他”④。右倾机会主义忘了工农群众而要依靠自由资产阶级，“左”倾机会主义否定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都是错误的。最后，周恩来

①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1页。

③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2页。

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队伍里来，但是他们带着很明显的两面性，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

周恩来在科学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具体情况后，遵照毛泽东思想，把这个队伍分成左中右，并由此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的方针。同时指出：队伍光分左中右还不够，还要有严格的区别。即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有了区别，就有斗争。即又联合，又斗争。这样，才能够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坚强的统一战线，并批评了那种不主张区别，主张“求同而非异”的右倾观点和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的“左”倾观点，指出二者都违背了统一性和区别性的辩证法，结果不是混同于人，就是自陷于孤立。

### （三）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

周恩来说，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应当领导别的阶级。但领导权是要用力量去争的，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们总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但是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力量，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他们双方争取的对象就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谁拥有大多数，拥有力量，谁就能获得领导权。

他在分析了无产阶级对其他阶级进行争取和领导的情况后，指出：“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

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①我们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能正确地争取领导权。"左"右倾机会主义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②，结果都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所以，关于统一战线的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总之，周恩来《论统一战线》，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重要文献。它发挥和完善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丰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思想。

## 第三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

1941年至1943年，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写了《论党内斗争》，党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这些文献中，系统地阐明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认识论。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8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0页。

## 一、整风运动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运动，是反对唯心论宣传唯物论，反对形而上学宣传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运动，也是清算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思想解放运动。

自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逐步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了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形成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党在组织上已经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方面，在国际教条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在党内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产生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残余还严重存在，还在经常作怪，继续阻碍党的路线的进一步贯彻。另一方面，抗战以后，新党员大量增加，其中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有革命的积极性和抗日热情，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但其中一些人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改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也为党内滋长不良思想作风提供了土壤。党内存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些问题如不彻底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继续前进，就不能克服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因此，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领导革命前进中必须抓住的一个中心环节。毛泽东说：“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

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①

这次整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妨碍党贯彻正确路线和政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加强党的战斗力。其具体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而反对主观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是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这是因为主观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正派的学风，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党曾经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给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几乎断送中国革命。因此，要彻底清算“左”右倾错误，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必须端正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②

整风运动始终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个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后来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全党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通过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了党的建设，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5页。

团结和统一，保证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顺利贯彻，从而为战胜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整风运动也是党的建设史上的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在整风运动中，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阐述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点

毛泽东在从事和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历来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明确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还说："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学理。① 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错误，他主张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就必须反对本本主义。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总结我党同主观主义斗争的经验时，多次反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②。明确指出："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③ 张闻天也说："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既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那我们就必须好好的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地位，

① 《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1919年7月21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页。

向它毕恭毕敬，老老实实，而决不能目空一切，自高自大，调皮捣蛋。真正做一个唯物论者，对客观的实际只能有这样的态度，不能有别的态度。”① 这样，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对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这个成语，最早见于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据记载，汉景帝的三儿子刘德被封为河间王，谥号献，他博览群书，勤学好问，经常阅读并搜集很多先秦时代的古书。刘德探讨学问，注重学术研究和历史的考证工作，在阅读和搜集书籍时，认真地考证其真伪。因此，班固称赞刘德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汉书》时，把“实事求是”批注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②。意思是说，做学问务必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找出真实的结论。现代人按字面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理解为根据实证，求索真相。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哲学含义，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③ 后来，艾思奇于1942年4月17日在《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中发挥了毛泽东的思想。

① 《张闻天选集》第319、320页。

② 《汉书》（传）第8册，第2410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他说："真正的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注意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只看片面"；"真正的'实事求是'，必须从实质上来理解事实，而不应该只就表面现象来看事实，或为形式的假象所迷惑"，"真正的'实事求是'，由于以上的理由，就必须把事实看做一定具体条件之下的事实，必须依据每一事实所处的条件来确定它的正确意义"；"真正的'实事求是'不仅仅在于理解事实和认识事实，而且要从这理解和认识中求得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的方法。"即"在揭发事实理解事实的时候，同时要伴随着一套解决事实问题的方法，才叫做'实事求是'"①。这就把"实事求是"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来加以阐发。为我们指明了在实际工作中，在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反对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路线。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首先，实事求是唯物辩证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毛泽东所说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所作的唯物主义回答，是在物质与精神、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上，肯定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毛泽东关于"'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即关于客观事物总是遵循着它所固有的内部规律性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不仅承认了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而且进一步承认了世界的运动性、矛盾性。这就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统一起来了。"'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就是从"实事"出发，即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出发"，研究出"是"来，即研究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来。就是说，人们通过实践，取得对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性的认识，再用这种认识去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使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辩证地统一起来。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求'就是

①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624—626页。

我们去研究”的观点，既唯物又辩证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肯定了客观事物的可知性。其次，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一致的。坚持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要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是不可能的。

总之，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看作共产党手里“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并公开申明共产党人就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①]。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事业就胜利，就前进；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事业就遭受挫折或失败。为了在全党形成“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1942年6月，毛泽东为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5年又为“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作为共产党的根本作风，这就把党的思想路线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基础之上。

**（二）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

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全面的、发展着的实际出发，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达到主客观统一的基础。从实际出发，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来说，就要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即中国的国情出发，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就是因为他们认清了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从这个基本国情、基本实际出发，找到

① 《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2—793页。

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教条主义者之所以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从书本上的定义、外国的经验出发，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的基本国情。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有的放矢，它是实现理论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在领导我国人民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把理论联系实际培育成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① 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又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指出，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是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针对党内某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而不注重它的应用的情况，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② 因此，那种停留在现成书本上的甚至个别词句上的教条主义必须坚决抛弃。

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为例，对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说明。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8—4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页。

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①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②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不仅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而且揭示了做到实事求是的途径。

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两个侧面。它们同时贯穿于实事求是的整个过程，紧密结合，互相渗透，一方面，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下，才能真正从实际出发，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确指导，就不能正确看待实际，确定可靠的出发点。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根好“箭”，选“靶子”的事就无从谈起。经验主义者虽然接触了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然而他们不过是盲目地乱碰乱撞，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看不到实际的全局，得不出对客观实际的规律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是为了认识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及其发展的规律性，才提出学习和掌握理论的。我们是为了射“的”而去掌握“矢”的。我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一定要对准中国革命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就在于它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当“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7页。

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①。可见，离开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会失去真实的基础，结果只能是无的放矢。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根箭拿来乱放一通，这种无的放矢的做法，不但不能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革命实践的伟大指导作用，而且必然会把革命事业引向失败。还有一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因此，如果只是口头上讲理论联系实际，“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②。

总之，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从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现象中找出其本身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指导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三、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

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和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将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两种相对立的态度进行了详细阐述。他反复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态度。他说：“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①

与此相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②做研究工作的，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做实际工作的，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毛泽东认为“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事物的存在”③，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的行动的向导。这是一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正派的学风，是与马列主义不相容的。

党内的主观主义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表现形式。这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教条主义者看重理论，轻视实际。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只知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7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

生搬硬套马克思的个别词句，对群众的创造熟视无睹，对外国谈得津津有味，对本国茫然无知。经验主义者看重实际，轻视理论。把局部经验当成是普遍真理，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教条主义，都是思想上的死硬派。都是只看到片面，看不到全面。依据他们的观点，似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一切革命，都是千篇一律不变动的东西，只要一个简单的公式，一个简单的药方，就可以包医百病。由于他们在根本态度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所以长期不能正确地了解中国国情，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斗争中一再使革命受到挫折。当然，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中，教条主义当时对党的危害更大。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①因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着重地反对了教条主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指出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经验，以自己的局部经验为满足，那也是危险的。

总之，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它的实质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毛泽东把主观性、片面性以及这种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东西，概括为主观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挥。

要做到实事求是，保持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因此，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写了"关于主观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7页。

主义”一部分，讲了主观主义的危害。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指出：“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① 主观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是同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根本不相容的。“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②

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③ 总之，只有反对主观主义，才能端正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只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的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道路，才是唯一科学的正确道路。

## 四、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

要做到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重视和提倡调查研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6—777页。

究。毛泽东号召全党要眼睛向下，要面向群众，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① 为此，于1941年3月整理出版了他的《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序言和跋。同年8月1日，在他倡导下，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同年9月13日，他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

这一时期，毛泽东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目的、意义、态度和方法，从而使调查研究理论更加完备和成熟。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把倡导调查研究同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1941年3月，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② 还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③ 这就是说，一个好的领导，指导工作，必须做到了解实际，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如果不了解实际，就难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甚至染上夸夸其谈，凭主观愿望办事的主观主义作风。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就必须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而要"了解情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9页。

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1943年 3 月27日，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中说：“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① 还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个工作当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他的整顿三风才算有了实际的成效。”② 就是说，只有坚持通过调查研究来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确定工作方法，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才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要通过调查研究，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否则，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调查研究是为了从客观实际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因此，调查研究必须采取科学态度。在调查研究中，不仅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了解；而且要尊重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因此调查的内容主要是群众的实践，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毛泽东告诫全党，一定要注意“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还指出，要调查研究而“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③。只有和群众做朋友，虚心向群众学习，让群众了解你，“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④。张闻天回忆说，毛泽东在延安时常讲，“他有时对于一件事情，感觉到毫无主意，感觉到沉闷，但

① 《张闻天选集》第322页。

② 《张闻天选集》第32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747、748页。

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页。

一同实际接触，一同群众与下层干部接触之后，主意就出来了，人也感觉得松动了”①。毛泽东还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②这是毛泽东切身经验的总结，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思想。

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等著作中，总结了调查研究的经验，论述了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阶级分析方法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③在《关于农村调查》中，他回忆过去如何搞调查研究时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④阶级分析方法之所以是认识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就在于离开阶级分析，便无法得到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起码知识。当时，关于中国社会问题最基本的知识，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动力、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认识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否则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就会迷失方向，列宁说得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

① 《张闻天选集》第327—32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①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过程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用调查研究所取得的事实材料，有力地批驳了污蔑农民运动过火的种种谬论。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说，1927年“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等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象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②为了制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正确的土地政策，毛泽东进行了寻邬、兴国调查，找到了正确的阶级关系，制定合理的土地政策。他说：“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邬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③至于“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④。在作农村调查时，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对农村阶级状况作出精确的数量分析，以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他说：“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②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页。

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①

正因为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指导，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各个阶级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而才取得了对农村乃至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从而为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分析与综合是调查研究的主要方法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通过调查，掌握材料，是形成正确认识的重要一环。但是，如果只掌握材料，不整理，不认真研究，就难以从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调查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因此，毛泽东认为，还必须进行深人的研究。调查研究的过程，既是一个搜集材料的过程，又是一个分析和综合整理材料的过程。

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②，这时他对延安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这就是说，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须贯彻观察、分析与综合的认识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页。

事物的三个步骤，才能够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毛泽东指出："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①。即分析中有综合 综合中又有分析。毛泽东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认识事物的方法，称之为"四面受敌法"。他说："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②

毛泽东还认为，调查研究是提出问题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他谈到分析与综合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作用时指出："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是问题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③由此可见，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提出问题"，还是"解决问题"，始终贯穿调查和研究；离开了调查和研究，离开了分析和综合，问题不可能提出，也不可能解决。

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中明确指出："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与综合。"同时他还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说："从感性方面得来的关于调查对象的统一的、笼统的印象，必须首先加以分析，加以解剖"。"这是我们的思想从全体的认识到部分的认识的过程"。他还指出："如果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

①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

那我们得到的关于一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了解，就会变成孤立的、静止的、死板的。它们不是整个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变成为脱离整体的独立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的分析方法必须要以综合方法来补充。”① “分析只是思想上的一种抽象，为研究便利暂时把部分从整体中分解出来的。这些部分必须还原到它们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这就是综合。所以综合是从部分到全体，从抽象回到具体的思想的运动过程。”②

总之，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在调查研究中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是一个对立统一体。综合而没有分析做基础，综合是空洞的，表面的；分析而无综合统一起来，分析是死板的、虚假的。

（三）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重点

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指出，在调查研究中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③，抓住最能表现事物特点的典型材料。如果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但都是次要的，把主要的东西丢了，那仍然没有发言权。这就是说，调查研究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他以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为例，说明主要矛盾是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④。所以，在调查研究中，既要掌握事物的全貌，又要用力抓住反映事物本质的重点材料，这样，才能为作出正确的结论奠定可靠的基础。

（四）开调查会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形式

①② 《张闻天选集》第334、335页。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5页。

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页。

要认识中国社会问题，不能不了解下层情况，开调查会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毛泽东总结他多年来调查研究的经验时说："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①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还指出，开好调查会，一定要选好到会人员，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把问题引向深入，集中大家正确的意见，作出正确的结论。那种开调查会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总之，毛泽东把调查研究提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并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论证了调查研究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充分肯定了调查研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中的重大作用。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立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为了批判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上的反动谬论和错误倾向，为了将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深入地研究了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8页。

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完整、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

## 一、《新民主主义论》论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如果说《新民主主义论》是着重从理论上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话，那么，《论联合政府》则着重从路线和纲领以及具体政策上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 （一）《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

毛泽东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表于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即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英、美帝国主义"远东慕尼黑"政策的纵容和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倾向日益明显。他们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向我进攻的同时，在政治思想上也进行了猖狂的攻击。他们网罗了一批反动政客、御用文人以及汉奸托派分子，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谬论。1938年12月，国社党头目张君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狂妄提出要共产党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抗日民主根据地，"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共产党的叛徒叶青却宣扬所谓"一次革命论"，胡说什么"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一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就不必要了"等

等，企图从根本上取消共产党，巩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妥协活动极为不满，但又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日益强大，于是企图走“中间路线”，幻想在抗战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不同思想的斗争。虽然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已被克服，但他们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错误观点尚未被彻底清除，其思想影响还继续危害着革命事业。同时党内又发生了“左”的偏向，一些人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显然，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上，党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于是，中国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为了回答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使中国革命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不致迷失方向，必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批驳其种种反共谬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便彻底剥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一切追随者的精神武装，而给予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革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投入了这一斗争，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宣传工作。1939年7月，张闻天发表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的文章，号召“共产党人要同国民党同志们一起，同全国各抗日党派在一起，同全国人民在一起，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同年9月，王稼祥发表了《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科学地阐明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一致和区别。毛泽东于1939年10月为中共中央出版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写了发刊词，12月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2月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这些文章和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谬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毛泽东

指出："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①。

《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总结了中国近百年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全面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道路和前途，正确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纲领，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新民主主义论》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民主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篇章。

（二）《论联合政府》的发表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又一篇系统地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著作。

当时，国际国内局势正面临着巨大转折的重要历史关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已胜利在望。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是继续维持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包括几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政权形式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呢？还是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前，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根本问题。对这个问题，当时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叫嚷："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大计，违抗政府法令"。在1945年元旦文告中，蒋介石假惺惺地表示要"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可是又说："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联合政府。"于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下，和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积极准备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妄图夺取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就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当时对中国之命运的回答。

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说："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① 这就是说，《论联合政府》一书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所作的科学回答。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根据新形势进一步把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一般纲领具体化，从而制定了一条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路线，为全党全民夺取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论联合政府》不仅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而且是一部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哲学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动教材。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4页。

## 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揭示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开头，毛泽东强调指出，研究问题，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是说，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只有依靠客观的实践，才能发现真理。“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①这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正是依据这一原则，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特点，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

### （一）中国社会的性质与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

正确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的基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②在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的论战。其中一派观点认为，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国家；另一派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正在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的基本国情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6页。

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①

这种社会性质说明，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1944年3月，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工农民主专政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以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②。1945年5月，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一切能够参加这个革命的阶级、阶层、民族和个人，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③这一主要矛盾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即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刘少奇说，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④。

**（二）世界革命的新特点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因此，我们不但要从事物的内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0页。

③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8页。

部；而且要从一事物同他事物的联系中来研究事物。中国革命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整个世界革命密切联系着。这样，它的特点就不仅为中国社会性质所决定，同时，也受世界革命的时代特点所制约；它的前途，不仅由中国国内的情况所决定，而且也必然受到世界革命形势的制约。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① 这就是说，以十月革命为标志，在这以前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在这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由于世界历史时代特点的变化，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②。

正是根据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科学论断，我们党才得出了中国民主革命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论。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处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它已经不是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它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已转变到社会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8页。

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是'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①"这个阶段是很长的"，"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自'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六大'作了原则的决定。至于怎样转变，要看我们将来力量是否占优势和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不能犯急性病"②。刘少奇在《论党》中也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最新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③。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改变了革命的面貌，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由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变成为革命的主体。同时，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出现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因此，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定义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④。

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世界革命时代特点的分析，来说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鲜明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它既研究了事物本身的特殊矛盾，又充分估计到周围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是我们研究一切具体问题的科学方法。

（三）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性和历史使命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0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1、162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他在着重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之后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是由它们的经济地位、政治状况决定的。

毛泽东首先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并指出，前者历来是革命的对象，决不是革命的动力；后者即民族资产阶级却是一个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由于它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因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异常软弱，又具有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即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这一革命的领导者，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备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其特殊的优点。首先，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经济地位极端低下，因此，他们特别能战斗，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其次，“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①。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②这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7页。

责任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之后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①。刘少奇在《论党》中也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人民大众。”②

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特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对正确认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具体地分析矛盾特殊性的光辉思想。

（四）中国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的制定

毛泽东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且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关于政治纲领。这一纲领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③，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具体说，国体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民主集中制。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

关于经济纲领。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即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4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5页。

国所有，使它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并发展合作经济；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发展。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形态。

关于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①，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但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象它所反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一样，也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具体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既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最终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②因此，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不仅重申了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反复阐明的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而且结合当时的形势，把一般纲领具体化，提出了具体纲领：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人民的自由和统一；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铲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取缔官僚资本，发展中国自己的强大民族工业；发展中国自己的民族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1—1012页。

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各民族的一律平等；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友好邦交，并指出：要做到上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①。

毛泽东不但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我党具体行动的纲领，而且对于如何实行这些具体行动纲领，根据当时存在着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三种地方的不同情况，分别作了具体规定。比如，在国统区和沦陷区还没有成立地方民主联合政府，而在解放区这个任务早已实现了，“不同情形，产生不同的任务”，在实行具体纲领时，必须分别对待，有所区别。

总之，一般纲领反映了解决民主革命的矛盾普遍性的要求；具体纲领则反映解决矛盾特殊性的要求。毛泽东关于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具体纲领和具体任务相互关系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

## 三、革命发展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

为了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批驳国民党顽固派及其代言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种种谬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革命发展论和革命阶段论的辩证法。

（一）中国革命发展两个阶段是互相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4页。

资产阶级专政阶段

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① 他在批判国民党顽固派所主张的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时说，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②。因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妄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它反对中国的独立，也决不允许中国资产阶级的专政。"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③。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④，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三，国内情况也说明，国民党反共的结果，建立的不过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⑤即封建法西斯专政。所谓在中国搞"基马尔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资产阶级专政之路在中国之所以走不通，这是中国革命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象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必须是互相衔接的，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是互为条件的。毛泽东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⑥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时，定不能忘掉将来的社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0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2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主义革命的任务，定不能忘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要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为革命转变准备条件，并在条件具备时不失时机的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到达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充分体现了革命发展论的思想。然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否认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结果建立的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企图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论"，按照这种理论，只能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

**（二）中国革命发展要有阶段之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不完成，社会主义是无从谈起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① 他还说，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有社会主义因素，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就其整个社会性质来讲，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对象只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个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宣传"一次革命论"，故意混淆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其目的是妄图消灭任何革命，为投降日寇作舆论准备。还有一些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说，这是"纯主观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页。

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①。这种观点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它混淆了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降低了人们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是极为有害的。同时，它把将来社会主义的任务，硬合并到民主革命阶段来完成。实际上取消了民主革命阶段，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取消民主革命当然也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一次革命论”，实际上是不要革命论。

（三）民主革命的行动纲领与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

国民党顽固派所谓的“一个主义”，其实质是要以他们的伪三民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为其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制造舆论。同时，也说明了这些顽固派根本不懂得新旧三民主义之间的区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从而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动纲领的实践与共产主义指导思想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国民党顽固派就在“一个主义”标题下“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为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②接着，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他说：“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①]即都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目标。但是，作为不同阶级的思想体系，二者又有本质的区别：比如，在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宇宙观的不同；革命彻底性的不同。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三民主义在实现其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之后，就不能继续起作用了。共产主义则不同，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两个革命阶段，都要以它作为指导思想。

总之，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既有相同部分又有原则区别。国民党顽固派只看统一方面而不看区别方面，就要求“收起”共产主义，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只能是共产主义，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决不能收起。

毛泽东还进一步论述了民主革命行动纲领的实践与共产主义指导思想之间的关系，他说，在民主革命阶段，毫无疑义，要积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否则，就不能指导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也不能引导这个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上去。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②]。这即是说，要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定地执行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这就把革命阶段论和革命发展论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

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① 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主张革命是分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不同，不容混淆，反对超越阶段的“一次革命论”；我们又是革命发展论者，不容许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反对“二次革命论”。这就是毛泽东关于革命阶段论和革命发展论相统一的基本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和社会革命论。

## 四、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法

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为了建设一个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的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为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论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②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属于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反映经济和政治面貌的、属于文化范畴的政治思想在内；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关系、集团、国家等实体的上层建筑；所说的经济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即政治和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根据毛泽东的论述，政治和经济都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因此，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文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化、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以及上层建筑内部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关系，同时，又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这一基本观点不仅坚持了辩证唯物论，而且坚持了历史唯物论。

（一）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① 又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② 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就会产生什么样观念形态的文化。在当时的中国，有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于是就产生了帝国主义文化。"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当时的中国，又有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于是就产生了半封建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③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两兄弟结成文化上的反动联盟，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

相反，在当时的中国，有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于是就产生了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它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由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开始登上中国革命的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

治舞台，成为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总之，是由当时中国的新经济和新政治决定的。

（二）一定形态的文化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由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文化并不是政治经济的消极产物，它一经产生之后，就会对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①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五四运动的巨大历史作用，是它"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② 同时，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实践又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他又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③

既然革命的文化运动如此重要，因此，必须坚持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

首先，要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因为只有这种文化思想，才能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用新的武器建设一支文化新军，才能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结成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英勇的斗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①只有加强这种“思想教育”，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普遍真理”武装党员教育群众，才能使全党全民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坚持真理，完成任务而英勇献身。否则，“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②。其次，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它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第三，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是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③。第四，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是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⑤他还指出，文化运动和革命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⑥就是说，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总之，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体。毛泽东对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特别是历史唯物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页。

③ 《张闻天选集》第252页。

④ 《张闻天选集》第253页。

⑤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 五、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文化工作，围绕着新文化的建设问题阐明了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的关系，制定了新文化建设的方针。

毛泽东认为，任何时代的新文化，首先是该时代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反映，这是它的根本来源。但是它们却不能脱离过去时代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而凭空创造出来。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① 尊重历史，不割断历史，就是要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就是要对历史上的文化遗产采取批判和继承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服务于新文化建设。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它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文化，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但是，我们决不排斥一切外国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民族的新文化，并不是孤立发展的，"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②。所以，"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不但是指"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③。对外国文化如此，对中国文化也应如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中国古代灿烂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

文化遗产，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总之，我们要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的文化遗产，反对虚无主义。

在尊重历史、不要割断历史的问题上，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是对古代和外国的文化成果，必须采取辩证的分析态度。毛泽东指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① 我们反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外国优秀的东西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使之"洋为中用"，反对崇洋媚外的奴化思想。同样地，在清理我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时，要十分注意"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②。"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要反对"复古主义""颂古非今"，提倡"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 第五节 美学、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实践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推动延安和全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针对当时文艺界的思想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成功地指导了革命文艺运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

20世纪40年代，当时正是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国际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法西斯战争处在最艰难的时期。这时，在延安文艺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严重地存在着。在1940年以后，由于局势紧张和生活艰苦，一些人的思想弱点和问题，就很集中、迅速、尖锐地暴露出来，一度造成了延安文艺界的思想混乱状态。在文艺思想上，出现了不少错误论点。有的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说什么“最近整个脑子都装满了革命理论，一首短诗也写不出来了”①；有的公开强调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力；艺术第一、资产阶级人性论，在不少人思想中存在着；有的人对待革命现实和革命群众的态度也存在一些问题，未能正确解决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问题；等等。在文艺创作上的教条主义、脱离实际、关门提高的倾向，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倾向，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边区的文艺活动，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圈子里，宗派主义情绪在延安文艺界中也存在。

党和毛泽东鉴于当时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因此，认为文艺界必须要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于是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1942年5月2日开始，到5月23日结束的。座谈会的全体会议一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是在5月2日，毛泽东首先作了“引言”讲话，说明了开会的目的和要求，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启发大家畅所欲言。第二次是在5月18日，大会进行

①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上海教育出版社版（下同），第547页。

讨论，毛泽东出席参加。第三次是在5月23日，先是大会发言，再是朱德讲话，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引言”和“结论”构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尖锐地指出了文艺界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严肃地批评了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和倾向，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①这是文艺问题的中心。这在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史上引起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揭开了中国文艺运动史上的新篇章。这个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它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

## 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

在文学艺术的历史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学原则，要求文学事业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艺术家首先要成为人民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要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列宁指出：“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②又说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最厚的根基。”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也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

③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12页。

毛泽东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就要解决许多问题，但"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①对于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②革命的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就彻底地划清了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的最根本的界限，也彻底地解决了我国"五四"以来、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文艺运动中一系列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各个时期都坚持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党中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的美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决不可以跟为工农兵服务对立起来。虽然工农兵不能代替全体人民，但是他们究竟是人民的最大多数。

为此，毛泽东还强调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他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③在《讲话》中，他严肃地批评了一些不同程度地违反这一原则的现象，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5、8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5页。

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① 因此党和毛泽东号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思想和行动上要认真解决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同时，毛泽东还阐述了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也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决。

## 二、生活实践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文学艺术中的具体贯彻，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方面毛泽东有极为精辟深刻的论述，《讲话》中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在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经常否认文学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同他们生活实践之间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例如康德把艺术创作看成是艺术家的天才的产物，黑格尔认为艺术是“理念”通过艺术家的心灵的产物，新黑格尔主义者鼓吹艺术创作不外是“使情成体”等等，这样，唯心主义哲学就把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看成是他的自我意识的表现，同艺术家的生活实践毫无关系。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者虽然看到了生活实践是艺术的源泉，但由于他们不了解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因而也就不了解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的依赖关系，所以他们不能科学地说明生活实践对艺术实践的创造活动的最终的决定作用。

在毛泽东的《讲话》以前，一些革命文艺先驱对此已经有过不少探索。邓中夏在1923年指出：“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816页。

动。”①秋士则号召“到民间去”，“应该吃一切人吃了的苦”②。北伐战争时期，郭沫若呼吁作家“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③，1930年以后，号召作家“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上，到被压迫群众中去”④。抗战初期有人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⑤。但因主客观条件均未能深入贯彻，深入生活也没有入全面地解决，毛泽东的《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透辟地说明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原理，对文艺的本源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他在《讲话》中深刻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⑥这段论述，明确地说明了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论断，无论从文艺的起源和发展来看，从文艺史上各类作品来看，从文艺创作的实际过程来看，都能得到充分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联系。毛泽东深刻指出：“人类的社会生

---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上册），第181页。
②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第392页。
③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第446页。
④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206页。
⑤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第187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①这段论述，既同一切唯心主义的美学理论划清了界限，又同一切旧的机械的唯物主义的美学理论划清了界限，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在文艺的源泉问题上，还有一个源与流的关系问题，亦即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此，《讲话》中也有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②这就说明，文学艺术家的生活经验包括直接生活经验和间接生活经验。前者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条件，但它又是有局限的，因而要有间接经验来作补充。这里，直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接生活经验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仅靠间接经验，也不可能创造出好的作品。

由于文学艺术家的生活经验是进行艺术创造的根本条件，文学艺术家生活经验的深度和广度，对其作品的成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深入生活实践就成为文学艺术家头等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① 这一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不仅解决文艺创作素材和原料的获得，同时也解决作家思想感情的改造和表现生活能力的提高。在毛泽东指出的深入生活的思想指引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各种题材、各种形式的优秀文艺作品，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前进，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 三、普及与提高、政治与艺术的辩证法

为了解决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对于当时文艺领域中的普及和提高诸矛盾的关系，提出了极为精辟的见解。

为了解决如何更好地为群众服务的问题，《讲话》极其透辟地阐释了普及与提高的正确关系。这个问题在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曾经接触过，但未能彻底解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过去有些同志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或是忽视了普及，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怎样正确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呢？毛泽东从当时的情况出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818页。

需要出发，指出："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① 当然，普及和提高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普及也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的："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② 普及不但不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普及和提高是同为什么人的问题密切联系着的。正确的作法应当是：所谓普及，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就是从工农兵提高。不然就迷失了普及和提高的方向。毛泽东还指出，除了必须注意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必须注意干部的提高。因为干部的提高，也就是间接为群众的提高服务的，同时还要求用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恰当处理专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

在文艺批评中，毛泽东阐述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辩证关系。政治和艺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表现在一个作品中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二者是统一的。毛泽东强调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文艺批评只有既注意政治标准又注意艺术标准，把政治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从政治和艺术统一的观点去评价作品，才能得出科学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

## 四、哲学方法论和文艺创作的关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就有人说："提倡学习马克思主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

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① 座谈会上也还有人提出这种观点。1941年有的同志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对此论点提出批评，但对生活、斗争实践强调不够。不久，又有文章批评了这种论调，但是过分强调了生活、却没有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讲话》全面地解决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而在当时，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他们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要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就要虚心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也要学习社会。这样，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批驳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观点。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是苏联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拉普”② 提出的一种创作理论。当时我国也有一些人介绍和提倡过这一理论。这种理论否认事物本身的辩证法，否认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作家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就算“获得了无产阶级意识”，文艺创作就应该按照抽象的哲学概念和公式来进行，创作中主要应该考虑的是这些既定的概念和公式如何贯彻，贯彻得好就符合“唯物辩证法”、符合“无产阶级意识”。这样就抹煞了文艺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基本特点，用哲学（世界观）来代替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种理论受到了苏共中央的批判。我们现在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决不是重复这种错误。毛泽东解释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

①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页。

② “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简称（РАПП）的音译。

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①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是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在这里所作的阐述既是对“拉普”的批判，同时也是对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的批判，并且将文学艺术和哲学作了严格的区别。

毛泽东进一步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以及其他科学的关系。他说：“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②这就是说，哲学作为一般世界观，包含着文艺等各门具体科学成果中共同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普遍地适用于一切领域，适用于文艺等一切科学部门。这种包括指的是一般包含着个别。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所要研究的特殊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所特有的具体的方法论。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还要有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出来。在这一问题上，既不能有“代替论”，也不能有“取消论”，只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促进文学艺术在内的各种学科的发展。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必须反对教条主义。他说：“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③至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页。

于破坏创作情绪问题，毛泽东也指出："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① 破坏这些情绪，同时建设起新东西来。毛泽东强调作家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对文学艺术运动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 五、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着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等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毛泽东在《讲话》中评论的人性论，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它是把所谓永久不变的人性作为核心理论的一种思想体系。在《引言》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有些同志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他们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种人性论和"爱"的呓语，在当时延安一个时期内是相当流行的东西。有的人认为文艺创作应当去追求"一切时代所共同具有的"一种抽象的精神。有的人认为，人类争取的不外乎是和其他动物相通的"生存、传种、发展和自由"，并且认为我们进行革命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文艺座谈会上，也有人大谈"人类的立场"。一些文艺爱好者也相信"没有爱就没有诗"，把"爱"看作永恒不变的主题，认为文艺作品都应当是这种人性的"真确的镜子"。

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人的本质是社会的，在阶级社会里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页。

由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实践决定的。毛泽东深刻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①这一论点，完全符合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存在决定、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基本原理。鲁迅也讲过这一思想。他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②可见，在阶级社会里，抽象地讲人性，其理论基础正是历史唯心主义。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③这里，当然不是说，在有了阶级性之后，就和其他阶级的人之间毫无共同性，这也是形而上学。周恩来在1961年曾经指出："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④"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⑤我们要具体地来分析人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感情（包括爱）属于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毛泽东指出："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⑥"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⑦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感情和整个人性一样，最后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第21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6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9页。
⑥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是要受阶级利益的支配。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抽象地讲人类之爱，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和文艺思想的主流，十九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者们也贩卖这类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延安文艺界某些同志主张这种观点，理所应当地受到党和毛泽东的批评。

当时延安的文艺界在这一方面存在着许多的糊涂观念："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这是鲁迅笔法"；"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①。毛泽东对上述看法作了深刻的评述。他指出，在文学史上，从来不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文艺的任务也不单是暴露；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只能是："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②至于人民大众的缺点，则应该加以批评，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在批评人民的缺点时，也可以用讽刺的手段，但必须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这最根本的还是一个立场问题。毛泽东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③由于抗战时期，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十分尖锐，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强调指出，那种主张暴露延安的观点是错误的。

当然，《讲话》中也有一些缺点。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中有过

①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8、8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9页。

火之处，文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以及实际上否定了人性的共同性等，虽然其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不是十分确切的，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 第六节　伦理道德修养与无产阶级世界观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鉴于民族斗争事业的需要，深刻地概括和总结了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可歌可泣的高贵的道德品质，形成了丰富的伦理思想。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伦理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哲学。他在其他一些政论文章中，结合抗日战争的需要，也论述了许多道德问题，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宝库，成为向广大人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教材。

###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伦理思想的重要部分是全面阐述了个人同群众、个人同集体的辩证关系，阐明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和集体主义的最高原则。

毛泽东一贯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无论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变革时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0页。

期，人民群众是一种决定力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认为共产党人应该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只有这样，个人的价值、个人的作用才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毛泽东伦理思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核心，这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

毛泽东伦理思想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为此，人民的军队要为解放人民，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这样军队才有力量。国家机关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群众打成一片。对工作要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要极端热忱。为了人民的利益，要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这样才算对人民负责。

毛泽东伦理思想还要求革命者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死观，因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所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一切共产党人都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做一个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有道德的人。毛泽东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一再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总之，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

护为最高标准。

集体主义原则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它是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紧密联系的。毛泽东伦理思想深刻地阐明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认为如果遇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当然，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也要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对此，毛泽东均做了极为详尽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1] 他对于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的思想行为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批评有些人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自己第一，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对同志对人民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些都是不符合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的，必须加以克服。

同时，毛泽东又指出，集体利益要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在抗日时期，他说："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2]。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此有更多的论述。毛泽东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7页。

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说："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①。"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②。总之，共产党人只有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切为了富民强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才能团结全国人民，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 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

热爱祖国，坚持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重要规范。这也是集体主义原则的贯彻，因为集体主义要求人们把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的和社会的利益，而祖国的利益，则是最重要的社会利益。爱国主义要求保卫祖国的领土、安全和主权完整，维护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坚决打击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爱国主义。在抗日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

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①。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在抗日斗争中，英勇奋战，流血牺牲，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热忱，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者。

毛泽东还深刻地论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一致性。他说："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②国际主义原则是共产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在世界革命范围内的贯彻，它同爱国主义是一致的。它是由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和奋斗目标的一致性所决定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势力，为推翻资本的统治而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也是国际性的。它们的相互支援是各国无产阶级高度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伦理思想把中国的革命事业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6—487页。

看作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坚持不渝地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不倦地反对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不但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 三、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道德评价理论

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同对人民有益的效果相结合，提出了无产阶级进行道德评价的科学根据，从而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评价理论。

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关于道德行为的评价，究竟是以什么为根据？是动机还是效果？形成了唯动机论和唯效果论两大派别。毛泽东指出："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①。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唯心论者认为道德评价的唯一依据就是动机。中国汉代的董仲舒主张评价一种行为的道德价值，主要看其是否出于道义的目的，讲求功利效果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在道德评价中，除了"善良意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可以称得上道德了。机械唯物论者相反，他们走向另一极端，认为道德评价的唯一依据是行为的效果。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持这种观点。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者穆勒和边沁发挥了这种观点，认为道德行为的善和恶是由效果决定的。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各有其片面性，都不能对道德行为作出科学的评价。

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②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页。

道德评价之所以必须以动机和效果统一作依据，是由道德评价的本性和使命决定的。因为任何道德评价都是以道德行为为对象的，而道德行为又是在一定的道德动机支配下自觉地作出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同时，道德行为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动机和效果的本质的统一，是道德评价的依据。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一个人做事不能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真正好的动机，必须顾及效果，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的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必须看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是对立的统一，矛盾的统一，不是任何时候人们的行为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都是一致的。动机和效果的不一致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在道德生活上的表现。实践是使动机和效果辩证统一的根本保证。

当然，动机和效果真正达到统一，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尤其在比较复杂的活动中，常常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才能实现这种统一。总之，在动机与效果的统一问题上，既要坚持唯物论，又要坚持辩证法，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决二者的关系。

## 四、道德遗产的批判与继承

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毛泽东伦理思想深刻地阐述了道德的批判和继承关系。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批判封建道德，便是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在旧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同时，还有半封建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

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结成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否则新文化就建立不起来。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必须要批判封建的道德观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注意道德的继承性，正确对待历史上的道德遗产。因此，在对待历史上的道德继承问题上总的原则是："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① 一定要避免全盘肯定；但同时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对于历史上的道德遗产，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具有科学性民主性的道德精华，以及一定时期的剥削阶级的进步道德意识和剥削阶级中某些优秀人物的高风亮节，则应该加以批判的继承。毛泽东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② 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③。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文化，包括道德观念在内，因此，这里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的方针，同样适用于对待古代的道德遗产。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2页。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道德问题的批判的继承，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有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界限。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后者要批判，前者要继承。同时，也不能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上述原则在这一批判中也是适用的。

## 五、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

毛泽东伦理思想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论，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道德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道德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服务的"。"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①。为此目的，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教育，尤其重视道德典范的教育作用。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人们施加系统的共产主义道德影响的活动。它是共产主义道德的职能和社会作用得以发挥的重要途径。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培养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造就一代共产主义的新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伟大的任务。

毛泽东伦理思想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教育。他指出，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号召党员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1、355页。

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是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共产党员应富于牺牲精神。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员要顾全大局，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在党和毛泽东的教育下，成为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大党员身先士卒，英勇牺牲的精神，赢得了亿万人民的敬意和仰慕，对人民群众起了难以估量的教育作用。

毛泽东伦理思想还十分注意道德典范的作用。张思德、白求恩就是这样的典范人物，毛泽东高度赞扬了他们。他指出："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并提倡对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人开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①。他号召人们向白求恩学习，他说："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②被毛泽东赞扬的张思德、白求恩这样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典范，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人，并且将继续教育着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4、9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

大的革命者和青少年。

毛泽东伦理思想还注意正确处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包括道德教育同执行党的现行政策的关系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深刻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实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① 正确地把握这种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对于我们目前新的历史时期内正确处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同执行现行经济政策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六、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1898—1969）1939年7月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讲演，曾连续发表于《解放》周刊。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其中部分章节被列为整风文献，1962年经作者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写作这部光辉著作的目的，是为了发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树立正确的建党思想，妥善地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健全党的组织，搞好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以便使党更好地把广大人民动员起来，开展对敌斗争，完成伟大的民族民主任务。经过讲演，马克思列宁学院的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澄清了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糊涂观念，帮助他们懂得了作一个共产党员，对于党组织和广大人民所应负的责任和自己所应作的努力。几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

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政治觉悟的重要文件。

这里，我们从伦理思想的角度，扼要地阐述其中的共产主义道德方面的重要观点。

### （一）共产主义道德修养的实质和目的

道德修养主要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方面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泽东等党的领导同志一向很重视广大党员的道德修养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①，其中包括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②，为党内党外作出了道德修养的光辉榜样。刘少奇也十分注意道德修养问题。

道德修养的实质是什么呢？刘少奇指出："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的修养。"③"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④这就是说，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要自觉地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克服和肃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就揭示了共产主义道德修养的实质，即积极地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不断地克服和肃清剥削阶级的旧道德、旧习惯的影响。

共产党人是有必要和可能进行道德修养的，刘少奇指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5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1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1页。

“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① 这里也深刻地揭示了进行共产主义道德修养的目的。

（二）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

刘少奇深刻指出：“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决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②

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有密切的关系，后者是进行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

我们一定要在革命的实践中进行修养和锻炼，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必须结合这种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因为我们进行道德修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错误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道德品质。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这种方法与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有根本的不同。唯心主义的修养方法，是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我们决不能这样去进行道德修养。我们的道德修养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只有社会实践，才是产生优秀道德品质的源泉，是道德修养的目的，也是检验道德修养客观效果的标志和推动人们的道德修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8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9页。

养不断发展的动力。总之，只有社会实践，才是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

刘少奇指出，共产党人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进行道德修养，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

刘少奇号召共产党人要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要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且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要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要联系实际，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的品质，才能使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家。这是不容易的，但只要我们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在伟大群众革命斗争中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善于总结经验，进行锻炼和修养，终身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可以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

### （三）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

刘少奇指出："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①当然这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原则。

刘少奇深刻地全面地阐明了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之间的正确关系。

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也就是服从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利益。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否使个人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9页。

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要坚决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刘少奇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的最高尚的一切美德。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解放全人类、建设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这是最伟大最崇高的道德。

党员的个人利益必须而且能够和党的利益完全取得一致。党要求党员的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党内，不承认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抹煞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消灭党员的个性。党员总还有一部分私人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处理，并且也还要根据他的个性和特长来发展他自己。党也要使党员能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不断地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只有这样，只有这两方面的注意和努力配合起来，才能对党有更大的利益。

**（四）必须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同共产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根本对立的，要坚持和发扬集体主义，真正做到党员的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就必须抵制和克服个人主义。

刘少奇指出，在某些党员中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

这种个人主义的表现有：在解决某种具体问题的时候，常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摆在后面；对于个人总是患得

患失，计较个人的利益；假公营私，或者打击报复他人；在待遇等生活问题上，总企图超过别人，而工作则是从不同他人比较。一切好的事情他都企图霸占，一切“倒霉”的事总想没有他。在这种人的思想中，浸透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这种个人主义，也常常表现在党内的无原则纠纷、派别斗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中；表现在对于党的纪律的不尊重和随意破坏的行动中。

我们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目的之一就是要自觉地以集体主义思想意识，去克服和肃清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为此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只有经过党内斗争，才能解决这种矛盾。在这里，我们要有全面看问题的观点。一方面要看到党内的光明面是主要的，是主流；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个人主义等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通过斗争，推动我们党和革命事业前进。在斗争中，不能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也不要搞过火的斗争。只有这样，共产党员才能在实践中，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不断克服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

## 第七节 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相一致的原则，把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所取得的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领导经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制订了一系列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一、宇宙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注意方法论的运用。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

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而且强调指出：“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②在1937年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毛泽东从理论上指明辩证法唯物论是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强调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抗日战争时期，方法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已经有了专门讲方法论著作，主要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均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其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曾列人整风文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它从世界观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方法上的历史经验，几十年来，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好各项工作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为毛泽东所创导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在以后又有了新的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126页。

展。解放战争时期的《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都是抗日时期领导方法的直接继续，也为建国以后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关于领导方法的论述，在他的全部领导方法论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①这说明党的群众路线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群众观点，二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系统的运用，是我们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反复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在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指导下，毛泽东指出，在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这一方法，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有全面系统的说明和概括。

毛泽东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②并且把这一基本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统一起来了。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毛泽东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论断，充分体现了人们认识运动的规律性，同人们的认识秩序是完全一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一定意义上说，从实践中来，就是从群众中来，到实践中去，就是到群众中去。同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过程。因为“从群众中来”，就是要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把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这正是认识论中所说的将十分丰富和正确的感性材料，经过人们的逻辑加工，改造制作，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毛泽东后来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然后又把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这就是从理性认识再回到革命实践中去，也就是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说的：“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送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从人类的认识秩序来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这充分地表现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之中。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提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出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理论基础，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并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党的领导方法中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

## 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这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 （一）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实行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充分发挥领导和群众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毛泽东指出，整风经验证明，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必须要有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两个积极性。"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②毛泽东分析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所以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并且指出，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斗争过程中，领导骨干也是有变化的。但不论怎样，领导骨干的作用是必须肯定的。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因此，一切工作"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①。

第二，一定要认真实行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这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根本的办法。毛泽东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至于人民群众，更应实行民主，倾听他们的意见，一定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只有实行民主，才能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要学会同别人商量问题，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说："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②。关于这个问题，建国以后讲得更为明白："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③这里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关系问题。

第三，实行一元化的方法，加强集体领导原则。《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指出："对于任何工作任务……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6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820页。

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个别部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①。

这种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是要在领导层中实行群众路线，这一方法后来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中又有发展。健全党委制，保证集体领导，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领导方法上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主要问题的解决，应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不能由个人包办，同时也要注意，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二者不可偏废。重要问题党委做出决定之后，然后分别执行。这就要处理好“班长”和“一班人”之间的关系。

第四，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毛泽东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克服后者。”②这种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作了具体的深入的分析和批评。他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③毛泽东分析说，为什么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呢？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为什么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是错误的呢？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因此，毛泽东强调，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8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4页。

第五，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党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应，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群众的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共产党人在每一个工作环节上都不要脱离群众。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和群众打成一片，启发提高群众的觉悟，组织群众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要坚决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率领群众前进，完成党所规定的各项历史任务。

（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这一方法也是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组成部分，实行起来有如下几个要点：

第一，要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是，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个别指导的重要性。他说：“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落空的危险。”① 所以要取得工作成绩，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二者不可偏废。毛泽东在这里讲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是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的。这就是毛泽东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矛盾论》中所讲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的道理。世界上的特殊的事物总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每一个事物的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相互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相互联结。矛盾的普遍性是从许多同类的矛盾的特殊性中概括出来的，所以它对同类的矛盾的特殊事物具有指导意义。但是，矛盾的普遍性又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当用普遍性的道理去指导各个特殊性的问题时，又要使二者结合起来，针对不同问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取得成功。正是这样，在进行任何工作时，如果脱离了一般号召，失掉了普遍原理的指导，在实际工作中就是脱离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轨道，就有失去正确方向的危险；但是，仅有一般号召，没有个别指导，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不能把方针、政策同各个具体单位、部门、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因此，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毛泽东说："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① 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这符合人类认识运动的正常秩序。毛泽东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的深化。”①在这里，认识论的公式："特殊——一般——特殊"和群众路线的公式："群众——领导——群众"是完全一致的。这进一步地说明了党的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第三，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必须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同志，常常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可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去掉官僚主义，学会使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使工作取得好的成绩。陈云在抗日时期也指出，"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②

第四，注意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具体方法。例如"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把从个别中概括一般的方法形象性地比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② 《陈云选集》（1926年—1949年），第154页。

喻为“解剖麻雀”，他说，要了解麻雀的机体构造，解剖一只或几只麻雀便可以了，用不着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又如，典型试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一切经过试验，典型调查，等等，都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的具体运用。大而言之，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也渗透着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方法的精神。这一方法是科学的领导方法的精髓。

## 四、抓中心工作，辅以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

毛泽东指出，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抓中心工作兼顾一般工作的领导方法问题。他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很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① 这一方法是《矛盾论》中分析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的创造性的运用。

在抗日时期，毛泽东对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举行侵略战争，中国内部的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时中国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个任务。

这个方法后来又有发挥，这就是著名的“弹钢琴”的工作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6页。

法。毛泽东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① 这里既强调抓中心工作，又要兼顾其他方面的工作，论述是很全面的。这是各级领导需要掌握的一项领导艺术。领导人员必须学会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使之得到胜利的结果。

在贯彻这一领导方法时，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偏差：

其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一个地区内，同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以致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陈云在抗日时期也指出过，"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要分清。不忘记经常工作，但必须抓住中心，防止事务主义，乱无头绪。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平均使用力量，瞎抓一气，必无成效。"② 在领导工作中这种不分主次、轻重、缓急、先后，平均地使用力量的工作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否认矛盾不平衡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

其二，注意了抓中心工作，但没有兼顾好其他一般性的工作。这也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领导方法。中心工作固然可以带动其他工作，其他工作反过来又可以促进中心工作，因此，决不能放弃其他工作。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② 《陈云选集》（1926年—1949年），第154页。

动。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于抓住非重点工作的重要性，讲得更为精辟。在抓重点的同时，抓好非重点，对于促进重点有很积极的意义。

中心工作和非中心工作，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失时机地把握住这一点，这也是各级领导者的一项领导艺术。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问题，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有所发展。《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便是《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直接继续和发挥。这时毛泽东提出的方法是更加具体化，比较重要的有：健全党委制，保证集体领导，在领导者之间，强调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互通情报，指出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对于工作强调要抓紧，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还提出了"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要求"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要有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例如，我们在土地改革时，就要特别注意掌握划分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剥削收入的数量界限。否则，划错了成份，就混淆了阶级阵线。毛泽东特别反对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如果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在领导方法上，毛泽东还强调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并提出了领导者的一个原则问题，就是力戒骄傲。即使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贯彻。同时，毛泽东还在领导方法上，提出要有分析研究的态度，要划清两种界限。一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二是在革命的队伍中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

点的界限。这样才不致于混淆问题的性质，不致犯大错误。因此，我们的领导者，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多方面展开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们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和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点。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很注意方法论的运用，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点的最好的实际的贯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指示的精神实质。方法论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 第八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对各种唯心主义流派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由于民族战争的影响和推动，努力宣传并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且对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展开了深入的批判斗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进一步传播。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及其中国化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

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经典著作比较系统地完整地继续出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中央成立了较大的出版机构解放出版社。延安时期它除定期出版《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以外，还陆续出版了多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丛书》，以及各种单行本的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同时也出版了许多介绍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解放》周刊也陆续发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和译著。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经典著作陆续问世。

1937年12月，张仲实译的恩格斯名著《费尔巴哈论》（包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序言》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又有几种版本问世。

1938年6月《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由明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8、9月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2、3卷，相继出版（郭大力、王亚南译）。同年9月至11月《解放》周刊陆续刊登了艾思奇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11月郭沫若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部分内容）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同年5月5日，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后改组成马克思列宁研究院，以后又改为中央研究院），它下属的编译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同年8月，《解放》周刊发表了列宁的《纪念恩格斯》一文。同年9月，博古译的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联共（布）党史教程》第4章第2节）分别由中国出版社、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出版。

1939年1月《解放》周刊发表了柯柏年译的列宁《论战斗的唯物论底意义》，同时还发表了艾思奇译的《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

1942年4月解放社出版了由毛泽东倡议组织编辑的《思想方法论》一书，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摘编，它是党中央确定的十二本“干部必读”书之一。

1943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毛泽东的倡议下，作出了《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提出：“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并成立了翻译

校阅委员会，强调委员会要把这一工作当作对党最负责并必须按时完成的业务之一部分。抗日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传播最为迅速的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比较系统地深入地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和文章也大量出版发行。1937年春、夏，为了帮助广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毛泽东编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并在延安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为师生讲课。同年9月，延安有了提纲的油印本，此后又有许多翻印本。

1938年8月，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由生活书店出版，这是一本比较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专著。同年8月，杜明等集体编著的《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由桂林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它是一部以唯物史观贯穿始终的社会科学教科书。同时，胡绳著《辩证法唯物论》一书出版，次年3月，又以《辩证唯物论入门》的书名，由桂林新知书店等地印行，介绍解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基本规律和范畴。1938年9月，平心著的《思想的方法与训练》一书，由上海前进书局出版。书中详述了思想与物质、形式逻辑学与思想方法、辩证法逻辑与思想训练等问题，同时也介绍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及其具体运用。同年9月，杜民等集体编著的《社会科学概论》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书后附有“特载——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著）”。

1939年5月，上海新社会科学会出版了刘学鸥著的《实践与理论》一书，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此书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着重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实践性、真理性决定了它是指导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年7月，嵩名中著《科学的哲学》一书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此书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唯物辩证法，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特

别丰富。同年8月，辽东建国出版社出版了艾思奇、黎平合著的《唯物史观》（又名《科学历史观教程》）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延安解放社再版此书。同年9月，向林冰著的《中国哲学史纲要》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0月，李仲融编辑的《辩证法唯物论》一书由桂林石火出版社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系统介绍。11月，平心著的《新哲学读本》，以通俗形式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由上海珠林书店出版。

1940年1月，黄特著的《新哲学谈话》一书，由上海新人出版社出版，它以问答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较详细的论述。6月，《中国文化》开设《哲学讲座》，由艾思奇撰稿，它为延安广大干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份很好的教材。12月，艾思奇的《辩证法的法则及其运用》一书，由重庆中国图书公司再版。

1941年1月，黄特著《批判的武器》一书由上海新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本论文集，较集中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

1944年5月，周扬编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发行。该书主要摘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历史唯物论和文艺问题的论述。在抗日战争时期，哲学界还翻译了苏联等国的哲学家写的哲学专著，并撰写了一大批论文。这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传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写成的各类社会科学著作陆续问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深入到各门具体科学领域。中国新史学的开拓者、在海外十年中对我国秦以前古代社会的研究成就卓著的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写了许多有大益于中国人民的史论，其主要论著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和《历史人物》等。在他这一

时期的史论中，政治影响较大的是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此文以历史为镜子，提醒党和人民不要重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时因骄傲而走向失败的错误，被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文献。

1937年8月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论文集）一书，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作者强调研究中国社会史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1939年11月，严北溟著《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问世，该书以唯物辩证法为主线，在战争起源、历史和决定因素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1940年9月，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学术报告，毛泽东亲自听讲并作了肯定，指出：用马列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报告提纲在《中国文化》杂志上公开发表。11月，邓初民著的《社会史简明教程》问世，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这是一本在历史唯物论思想方法的指导下研究社会发展史的书籍。

1942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这是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观点系统地整理和叙述中国历史的重要著作。在史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问世，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史的几次论战中所涉及的问题，作了具体阐述。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新哲学会等学术团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起了重要的作用。新哲学会是在毛泽东倡导下成立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除了自己认真研究哲学以外，还组织干部学习哲学。他为了进一步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亲自提议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并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1938年9月30日，艾思奇、何思敬等十八人，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53期上，联名向

社会公布了《新哲学会缘起》，说明了学会的宗旨。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团体，其任务是组织研究、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帮助干部学习研究，并引导他们理论联系实际，使新哲学更加广泛地传播和普及，以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迅速地解决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状况。为了检阅学会的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讨论各种专门的哲学问题。延安新哲学会于1940年6月21日在延安举行了第一届年会。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朱德、茅盾、艾思奇等五十余人到会。年会由何思敬主持，并致开幕词。艾思奇报告了会务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肯定了新哲学会两年来的工作成绩。他强调指出："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① 洛甫对新哲学会的今后工作提出了意见，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朱德在讲话中希望延安的哲学家多到前线去，多编一些哲学通俗小丛书，供给前方需要。

新哲学会年会规定，每周开会一次，由会员演讲研究论文，会期拟定三个月。这些论文的作者和题目有：艾思奇《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陈唯实《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黑格尔的逻辑》、郭化若《军事辩证法》、和培元《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等。

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以后，许多机关和学校成立了哲学研究小组，采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提高了各级干部的理论修养；在个人研究方面，也有一定成绩，不时有论文发表。延安以外地区的一些学术研究团体，也与新哲学会取得了联系，交换书

---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6页。

报。新哲学会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与传播。

(二)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在中国传播，教条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合乎逻辑地提了出来。

在中国哲学界较早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是哲学家艾思奇。他在1938年4月1日武汉出版的《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明确提出了“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①。文章批评了一部分人不重视哲学，一部分人把哲学变成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他充分估计了哲学的作用，指出正确的哲学运动如果做得好，可以从思想方面的基础上帮助我们的团结，防止自己的分裂，使我们抗敌的力量迅速地坚强起来。哲学是推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之一。他还批评了哲学界的公式主义，当时存在着一种空洞的以及滥用公式的哲学。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艾思奇提出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的一个号召，只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才能更加充分地通俗化。他还深入分析了中国化现实化的哲学运动的中心是什么的问题，这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并提出希望大家合作共同对这运动的方法、内容等作具体的规定。这篇文章对于当时进步的哲学界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以后他还写过一篇《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划清了关闭自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强调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上的原则界限，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具体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民族化，作出系统而深刻阐述的是毛泽东。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党

①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387页。

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① 因此，毛泽东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但是在这种学习和研究的同时，必须要很好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他当时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同时他还号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也是一项重要的学习任务。学习得好，对于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刘少奇在《论党》中也作过深入的分析。他说："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500页。

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①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② 他还深入分析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③ “毛泽东思想，从它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④ 在这一时期，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宣传并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才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更为迅速地得到了普及和传播，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如心、和培元等还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初步的研究和评述。1941年4月，张如心在《解放》杂志127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评述了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指出：“从毛泽东同志手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按：该提纲只编了一部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地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他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的综合起来，他在该提纲中，不仅通俗地简明生动地叙述了马、恩、列、斯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善于把辩证法主要的法则与次要的区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336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334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

分清楚，善于把辩证法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过去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最密切的结合起来，这与过去中国出版界关于辩证法许多'枯燥无味'，抽象的公式主义的叙述，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区别。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在辩证法唯物论上是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应用上面，他的许多创作，特别是军事理论与实践，及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唯物辩证法最精彩最生动的运用的结晶体。"①和培元在《中国文化》第3卷第二、三期合刊上发表的《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一文，也评述了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说："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一切著作里也可以看出他怎样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他对辩证法原则的阐述之所以那么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畅易读，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的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②

### （三）党和毛泽东的哲学活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指导抗日斗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坚持发愤读书，特别是继续认真研究哲学。他在致何干之的信中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③。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中，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情况。书中编入了

① 《解放》第127期，第20页。

② 《中国文化》第3卷第二、三期合刊，第95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页。

批注过的书籍10件，其中8件是延安时期的。包括西洛科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编《哲学逻辑》、斯大林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等。1937年9月，毛泽东读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一书时，写了17页的摘录。并在致艾思奇的信中说："我读了得益很多"①。现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1938年2月1日——4月1日的《读书日记》，它记载了读李达《社会学大纲》、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3本书的读书进度。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认真研究哲学的刻苦精神，是他发愤读书的生动的历史见证。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毛泽东曾多方设法搜集哲学书籍。曾在1936年10月22日给当时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去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②。1943年12月20日毛泽东给胡乔木一封信："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③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学习研究哲学，还倡议成立新哲学会，推动哲学活动的深入开展，已如上述。同时，他特别重视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学习、哲学学习。1940年1月中共中央曾指示把"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列为高级课程课目。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④1941年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2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0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7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8、9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成立中央学习组和高级学习组的决定，由中央同志组织思想方法的学习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成员以中央委员为范围。高级学习组成员则为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干部，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计划首先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以达到克服主观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还以中央研究组负责人名义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写了一封信，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信中还推荐了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论"。[①] 以后，毛泽东还不断开列学习书目，组织翻译马列原著，为提高全党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作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全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而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得以多方面展开。

## 二、对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批判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斗争，便是对蒋介石集团的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批判。

对于蒋介石集团统治的政治实质，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中有详尽的分析。他指出："蒋介石国民党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②]。这种统治有它的历史根源、纲领策略和组织活动，并且还有它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2页。

体系。由蒋介石、陈立夫等出而炮制的唯生论和力行哲学，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这种错误的哲学理论，有一个演变、发展过程。早在1933年2月，陈立夫便在《进展月刊》上发表了《唯生论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原系在南京演讲稿），1933年9月他又以《唯生论》为题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发表演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反动哲学理论。但在当时影响不大。1943年的抗日战争后期，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兜售其“力行哲学”，陈立夫于1944年又发表了《生之原理》等，继续贩卖其唯生论理论。由于蒋介石集团以唯生论与力行哲学作为他坚持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治纲领的哲学基础，因而造成了极为广泛的有害影响。当时在党和毛泽东的指导下，周恩来以及艾思奇、胡绳等同志为代表的党内外理论工作者撰写了大量文章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们深刻地揭露了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反动内容和实质。

### （一）在本体论上的唯心论

陈立夫鼓吹的唯生论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其表现形式是二元论，但实质是唯心论。唯生论认为，宇宙的一切事物都由“元子”所构成，而“元子”也是“生元”即物质和精神的配合体。它认为宇宙间一切的东西，都是由精神物质二者配合而来。有物质必有物质的能力、精神，有精神必有精神的本体、物质。所以宇宙没有一个绝不附丽物质的精神，也没有一个绝无精神的物质，宇宙是定量的不可分的精神和物质之和谐的一切配合。这里，很明显，唯生论主张宇宙的本体是心与物的综合，是二元论的表现。然而，进一步剖析，唯生论在本体论上仍然是唯心论。因为，陈立夫在解释什么是“生元”时明白说过，它具有神妙的智慧与伟大的能力，是宇宙间有生无息大智万能的主宰，西洋人所谓“上帝”，我们之所谓“造物者”。这就是直言不讳地反映出他们的哲学是唯心主义谬论。唯生论在对“元子”的具体说明

时，则陷于了“物活论”。唯生论从中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借来了一种精神的原理“诚”作为世界的创造者，这就进一步表明了它的唯心主义实质。唯生论哲学，表面上是既反唯物论，又反唯心论，但目的是反对唯物论。陈立夫在《唯生论》的导言里说，近几年来，唯物论之论调日见嚣张，他要反对这种偏见。这里，陈立夫要反对的唯物论，在实际上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陈立夫反对的方法是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曲解，然后加以攻击。事实表明，唯生论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哲学。

对于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艾思奇有过深刻的批判。他说：“唯生论主张宇宙的本体是心与物的综合，就这一点来说，是二元论的表现。”“唯生论只是在表现上是二元论的，在本质上却是完全唯心论的，世界的最后的创造者既是精神的原理，所以是精神决定物质，是精神产生物质了。”并且指出：“力行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和唯生论一样的，它的表现是二元论的，并且是常要曲解唯物论来反对唯物论的。”指出：“‘力行哲学’和唯生论一样，在本质上仍是唯心论的，仍是以精神的原理，‘诚’作为创造一切的动力。”①

艾思奇还指出，唯心论和宗教是相通的。唯生论不但在理论上对“神的境地”作了论证，而且承认事实上的超人类的鬼神的存在。陈立夫认为，比人类更有精神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也一定是有的——如假传的鬼怪神仙之类。这里反映出唯生论宣传的是宗教蒙昧主义。他们的“不诚无物”中的“诚”字，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常被当做是一个迷信的符号。

（二）在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在认识论上，蒋介石以唯生论的本体论为基础，发展成为“力行哲学”。它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在《中国之命运》一书

① 参见《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65—569页。

中有集中的反映。

“力行哲学”着重在知和行的关系上做文章。它宣传反理性的唯心论观点，提高信仰和迷信，反对科学的客观知识。在知识来源问题上，蒋介石宣称：“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上说，我们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经验和教训，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然而就实质上说，知识如果‘无得于己’，便不能算是真知。惟有‘有得于己’的知，才是真知，不但真知，而且易行。”①这就是说，知识不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而是来自人类生来的本性。

什么是“行”？蒋介石也有许多解释。他认为，“行”，只是天地间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也就是我们说的“实行良知”。有时蒋介石为了欺骗世人，说什么“力行”就是革命。蒋介石的“力行”，和真正的革命的实践，是根本不同的。通过分析“行”和“诚”的关系，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蒋介石说，行的原动力是“诚”，又说：“至于整个的‘诚’字的意义，则是‘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意思。因为惟有诚乃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惟有诚乃为物之始终，乃能一往无前，贯彻到底；惟有诚乃能创造能奋斗，能牺牲。”②他还进一步指出：“惟有至诚，……始可以不瞻顾，不迟疑，永往直前。笃实践履。中庸说：‘不诚无物’”③。蒋介石要求人们凭着唯心主义的“诚”，勇往直前。他说：“这一个诚字，就是力行之精髓，可以克服一切，战胜一切。”④

① 《中国之命运》，文信印书局版（下同），第161页。

② 《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同），第332页。

③ 《中国之命运》，第102页。

④ 《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337页。

对蒋介石的这种唯心主义谬论的政治实质，周恩来作了极为深刻的揭露，他说："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他最喜欢引这几句古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同时，又强调'心'的作用"，"于是他想消灭共产党，便装着'不诚无物'的样子，很沉痛地说'不解决中共问题，死了也不瞑目，'其实这正是他'无物不诚'之处。于是他要取消边区，虽经过他在庐山谈话会承认，经过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他也可一手取消，这又是他'有物不诚'之处，""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① 这就深刻地揭示了蒋介石的行及其力行哲学的实质。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宣扬的力行哲学，诚如艾思奇所指出的，是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的愚民哲学。

（三）在历史观上的历史唯心论

唯生论和力行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贯彻，便形成了唯心史观，即所谓民生史观。蒋介石集团否认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宣扬人类求生存的意志和努力是社会进化的动力。蒋介石说："持唯物史观的意见，恰好相反，以为一部历史的变迁演进，完全依经济的生产方式而转移；某一时代的经济制度变更，或生产方式变更，历史亦随之而变"，这"可说是一偏之见"。"因为人类全部历史即是人类为生存而活动的记载，不仅仅是物质，也不仅仅是精神，所以惟有以民生哲学为基础的民生史观，……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②。对于这种貌似"全面"的议论，只要我们进一步追问历史发展的最后根源时，他们的唯心主义本质便会完全暴露出来。对此，蒋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5—146页。

② 《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328页。

介石说："人类求生存的意志和努力足以推动社会的进化，而中外古今所有革命的事业唯有依于人类求生存的天性而出发，才能解决当前问题，增进人群幸福，促进世界大同。"① 这里他明确地供认，"人类求生存的意志"，成了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蒋介石的民生史观还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调和论。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中国全体的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崇高的伦理观念"②，具有"行'已立立人，已达达人'的忠恕之道"③。陈立夫也离开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宣扬抽象的共同的人性，强调仁爱心同情心，良知等是人性，是世界大同的动力。蒋介石集团就是这样要求革命人民赞成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在实际上却大搞反革命的阶级斗争。

蒋介石等还大力提倡封建的道德观念，用以维护他们的统治。蒋介石说："我们今天的一切教育，要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要实施军国民教育，养成军国民的风尚。什么是军国民教育呢？就是中国固有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文武合一智德兼备的六艺教育，而同时应该注重的是智、信、仁、勇、严五种武德的培养。"④ 在《中国之命运》中，他也把发扬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即封建道德作为其建国工作之重点。中国的封建道德，加上蒋介石等法西斯主义的解释，便成为他们用以巩固其反动统治，防止和阻挠人民革命的工具。对于这一方面，周恩来亦

① 《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327页。

② 《中国之命运》，第2页。

③ 《中国之命运》，第6页。

④ 《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334—335页。

有深刻的揭露，他说："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道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所以他这套唯心主义的道德观，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以此欺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① "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②。

（四）唯生论和力行哲学是对孙中山学说的反动

蒋介石、陈立夫等在宣扬唯生论和力行哲学以及民生史观时总是提及孙中山先生，仿佛他们的唯心论哲学是孙中山学说的继承。当时的批判者揭穿了这一骗局。艾思奇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

艾思奇指出，唯生论与孙中山先生的宇宙观，是有许多不同之处的。就阶级属性说，孙中山的思想里包含着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而陈立夫等宣扬的唯生论则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就哲学观点说，在民生主义中，是一种心物二元论，有唯物论的倾向，孙中山承认经济生活的改变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发展，也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之一。而在唯生论者的"民生史观"中，人类的意志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动力。在本体论上，唯生论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可以说，唯生论是对孙中山民生史观唯心主义因素的夸大发展。孙中山先生从来没有把任何精神的原理作为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基本上承认物质世界的自然存在和自然进化过程，这就是唯物论的倾向。唯生论关于"诚"的原理是附加在孙中山先生身上的。

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对于知行关系的解释，其情况也是如此。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6—147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7页。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有着启蒙主义的性质，重视科学知识，“知难行易”说的积极方面就在此，同时它又反对迷信鬼神，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同基督教上帝造物思想相对立。而唯生论则相反，对“神的境地”作了论证。力行哲学是反革命的反理性的愚民哲学，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则包含有合乎科学和理性的方面。“知难”表明他认识到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知识之艰难，这是合乎科学和理性，合乎中国的客观实际的。他的行动合乎世界之潮流。当然，也有消极的因素。这就是过分夸大知的困难，认为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正确认识。在知行关系上，孙中山不了解二者的辩证关系。蒋介石利用了这一点，以“行易”哲学的名义，制造了一套愚民哲学。

对于中国传统的旧道德，孙中山是常常把民主的、民族的新内容充实进去，如他在《军人精神教育》中讲的智、仁、勇，便同《大学》《中庸》上讲的封建内容的智、仁、勇不同，其基本精神是近代的、科学的。而唯生论则在科学的名词之下注入了许多非科学的封建内容。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实际上是把《大学》《中庸》奉为经典。一个是走向进步，一个是走向反动，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炮制者们确实是总理不肖之徒。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深刻地批判了唯生论和力行哲学，揭露了他们的唯心论的反人民反科学的反动本质，深入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克服和抵制了唯心主义哲学对广大人民的侵蚀和影响，扩大了新哲学的阵地，这对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民主和进步，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 三、对战国策派哲学的批判

1940年至1942年，是国内外法西斯活动甚为猖獗的年代。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取得了暂时优势；在国内蒋介石国民党

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加强了法西斯独裁统治。战国策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一个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团体，1940年左右，集中在昆明的一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教授文人”们，如陈铨、林同济等人，在昆明创办了《战国策》半月刊。稍后，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了一个《战国》副刊。当时称他们为“战国策派”或“战国派”。这一派的有组织的活动是在办刊物期间，但在此以前和以后也有活动。1942年7月《战国》副刊停刊，“战国策派”不存在了。但在此以后直到解放前夕，该派的主要成员林同济、雷海宗等，仍出版文集，主编刊物，继续兜售其反动理论，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

战国策派在其创办刊物的活跃期间，宣扬的是一股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思潮、文艺思潮和哲学思潮。他们宣扬的政治观点，主要是：鼓吹“战国时代重演”论。林同济在《战国策》创刊号上写了《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提出了这一观点。他们不顾时代的差异，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争，说成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战争的重演。他们鼓吹“战争为中心”，战争决定一切。把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争取生存，不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主张实行法西斯侵略战争，实行法西斯的“武力统治”。胡说纳粹党人能建立庞大帝国，世界最后必由一个帝国主义来统一。在国内则提出了“国力政治”，为蒋介石法西斯主义辩护。他们胡说蒋介石提出的“国家至上”、“意志集中”和崇拜领袖，要求为此而牺牲个人，取消民主等等法西斯主张，符合战国时代的“国力潮流”，是战国策。他们也有相应的文艺主张。章汉夫、胡绳、潘梓年、李心清等对战国策派的反动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 （一）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

唯意志论是战国策派法西斯主义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战国

策派主要是宣扬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他们写了一系列的书籍和文章，如《从叔本华到尼采》、《叔本华的贡献》、《尼采的思想》、《尼采的政治思想》、《论英雄崇拜》、《再论英雄崇拜》等，兜售这种反动理论，为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张目。

胡绳在《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是圣人还是骗子？》以及潘梓年等在论反法西斯战争的文章中，对这种唯意志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指出，唯心论哄骗我们远离实际，为反动的主观愿望辩护，哄骗我们成为盲目无知的人，唯心论一方面努力抹煞客观现实的存在，一方面更把主观意志的力量极度夸大，把人的主观意志说成是决定一切的东西。这些批判文章还划清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意志决定一切的界限，说明了唯物论者主张正确发挥人的主动作用并且指出战国策派用道德的名义来掩盖最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行动，还指出他们凭借迷信和权力来杀害理性，成为法西斯的帮凶。有些文章还深入分析了希特勒法西斯战争的反动本质，指出只有通过正义战争消灭法西斯，人类才有希望。这一些批判切中了唯意志论的要害，有力地打击了战国策派为法西斯的侵略和统治进行辩护的反动哲学舆论。

（二）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

战国策派把主观愿望和意志力量看做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因素。当唯意志论者鼓吹历史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而进行的时候，他们所说的人往往只是某些剥削阶级的个别领袖人物。他们认为："人类意志是历史演化的中心，英雄是人类意志的中心"①他们宣传说，没有英雄，宇宙间万事万物也许就停止了。"英雄崇拜"，不仅是一个人格修养的道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最迫切的政治问题。那么，什么人是战国策派眼中的英雄呢？拿破仑，

① 陈铨：《论英雄崇拜》，《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478页。

俾士麦，还有希特勒，他们把希特勒美化为代表千百万德国人的思想家，代表千百万德国青年战士的人物。这就可以看出他们崇拜英雄的政治实质。

战国策派公然反对唯物史观。他们把唯物史观歪曲为仅仅重视"物"的作用，不重视或反对"人"（即意志）的作用，然后加以反对。必须指出，唯物史观不仅重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也重视人的意志的反作用。但是，如果认为人类的历史仅仅是人的意志决定的，那就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了。这种观点，恩格斯有过深刻的批判，他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① 人们只要在承认精神的动力之后，进一步追问这动力的动力又是什么，就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正确，唯心史观的谬误了。战国策派宣传的观点正是早年恩格斯批评的那种观点，它只看到社会领域中意志、精神的作用，而否认决定意志和精神的物质力量的作用。

战国策派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在当时便受到胡绳等的深刻批判。胡绳指出："唯物史观并不否认在历史上人为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认清：第一，历史上的真正主义和创造者并不是少数居于统治地位的英雄，而是广大的人民。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第二，广大人民的愿望及其在实际行动中的力量固然在历史上有着重大作用，然而历史的进程也并不能单纯由这种主观的愿望和力量来说明。"② 胡绳还进一步指出，人民群众是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② 沈友谷：《是圣人还是骗子？》，《群众》周刊第9卷第12期，第196页。

地，英雄好比高山，只有在大地的基础上才显出高山。这就正确地形象地摆正了英雄和群众的关系。他还指出，英雄人物只有在他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时才能大有作为，否则，群众要唾弃他。英雄只是杰出的个人，而不是人中的神，这对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全面的辩证的说明，有力地批驳了战国策派的英雄史观的谬论。

（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形态历史观

战国策派为了更方便地在政治上、文艺上和哲学上推销他们的反动理论，便在文化形态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形态历史观。战国策派炮制的《文化形态史观》、《形态历史观》、《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战国时代的重演》、《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历史警觉性的时限》等文，较集中的反映了他们的观点。依据这种形态历史观，他们提出了一个"模式"，这就是：在过去历史上，凡是自成体系的文化，只须有机会充分发展而不受外力中途摧残的，都经过了三个大阶段：（1）封建阶段，（2）列国阶段，（3）大一统帝国阶段。并且提出历史可以重演。《战国时代的重演》便是他们的"杰作"。他们认为，当时正处在列国阶段，以后经过战争，便会出现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从而为法西斯集团张目。

这种反动的唯心的历史观、方法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汉夫的《"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战国"派对战争的看法帮助了谁？》和胡绳的《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等文章，批判了战国策派的谬论。汉夫指出："国内有一部分教授，力倡历史重演之说，而且今之世界为战国时代。其实，不论在国内抑是国际范围内，都是和战国时代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是向着进步的，较前更高的阶段发展，当然在发展中有某些地方某个时期，是黑暗的，倒退的，类似的历史上早期阶段的某些现象，然而，这也决不是历史的重

演。”“比如：他们认为当今的世界，同国际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便下了结论说这不就是战国时代吗？他们知道战国时代后，便是大一统的帝国，于是乎依样画葫芦的说，经过这次全体战歼灭战，便‘是一强吞诸国，而创出一个大一统帝国’。这些话有什么根据呢？应该说是完全无根据的”①。战国策派的历史形态说，是反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性的，是杜撰的，是反理性主义的，是为蒋介石法西斯主义作论证的。这是思想界的一股逆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人民群众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终于埋葬了法西斯主义的喉舌——战国策派。

## 四、对新理学的评述

在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发表了大量著作。从1939年到1946年，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音》等六本书，复活程朱理学，宣传客观唯心主义。新理学是中国的程朱理学和西方的新实在论相渗透的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它出现后，遭到了陈家康、杜国庠、胡绳等人的批评。这主要集中在本体论和历史观上。

### （一）关于新理学的本体论

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早年曾经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论述的反对者。他反对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在新理学中则认为自己的哲学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现了哲学的“新”路线。

冯友兰的新理学，实际是程朱理学的再版，是客观唯心主义。这一点，在《新理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冯友兰说：“就事说，每种事，亦皆有其所以为此种事者；此即其理，为其类之

① 《“战国”策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群众》周刊第7卷，第1期，第18页。

事，所必依照者。依照某理之事，即其理之实际底例，亦即其事之类之实际底份子也。”“就关系说，每种关系，亦必有其所以为此种关系者。例如此物在彼物之上，在上乃一种关系。在上之关系，必有其所以为在上者，其所以为在上，即在上之所以然之理也。”①又说过，总所有底理，新理学中，名字曰太极，亦曰理世界。理世界在逻辑上先于实际底世界。从上述论断中，可以看出：（1）理在事先，事依照理；（2）世界分为理世界与实际的世界，而在逻辑上说，理世界在逻辑上先于实际的世界；由此得出结论：理是第一性的，客观事物是第二性的；现实物质世界是理世界的体现，是理所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客观唯心主义，是程朱理学的新版。

然而，冯友兰的新理学亦有其独到之处，这就是他在《新理学》中强调的真际和实际关系的说明。这一点冯友兰称之为“最哲学底哲学”。冯友兰说：“真际与实际不同，真际是指凡可称为有者，亦可名为本然；实际是指有事实底存在者，亦可名为自然。真者，言其无妄；实者，言其不虚；本然者，本来即然；自然者，自己而然。实际又与实际的事物不同。实际底事物是指有事实底存在底事事物物，例如这个桌子，那个椅子等。实际是指所有底有事实底存在者。……属于实际中者亦属于真际中；但属于真际中者不必属于实际中。我们可以说：有实者必有真，但有真者不必有实；是实者必是无妄，但是真者未必不虚。其只属于真际中而不属于实际中者，即只是无妄而不是不虚者，我们说他是属于纯真际中，或是纯真际底。”②这一段议论，可以看出，在冯友兰的哲学中有两重宇宙，一种是实际的宇宙，一种是观念

① 《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35页。

② 《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11页。

的宇宙（或者说是真际的宇宙）。在这里，冯友兰认为真际是第一性的，实际是第二性的；把真际看成是永恒的，不变的。这种新的说教仍然改变不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冯友兰在理与事、真际和实际的关系上，玩的也是马克思在揭露"思辨哲学的秘密"中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的把戏，即把水果的概念说成是可以离开具体水果而存在的，并且是先于具体水果并产生具体水果的东西。一般先于个别并产生个别，这也是冯友兰哲学的秘密。陈家康批评冯友兰时说得很深刻，他说："冯先生哲学系统的中心点，就是把实际与真际分开，或者说：把实际与真际分家。……我说明冯先生所谓真际完全不是真的，以及完全不合乎客观真理。"① 经过分析之后他得出结论说："我们认为真际与实际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我们说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并非说没有任何区别。实际是客观的存在。真际则是人类用脑力劳动由实际中提炼出来的主观存在。实际是客观的真际；真际是主观的实际。主客不二，以故真实不二。所以我们在本质上说，真际与实际之间并无区别。……实际不外于真际，真际不外实际。实理不外于真理，真理不外实理。越实越真，越真越实。不实者不真，不真者不实。冯先生所谓真际脱离了实际，所以不是真理，最哲学底哲学脱离了实际，所以不是实理，同时也不是真理。"② 这是对冯友兰新理学的唯物而又辩证的批判。对于"理世界"的唯心主义，陈家康也深刻地指出："我们认为物不依照任何物外之理以成其物。若谓物外之理，则天下并无此理。夫理者，物之理。"③ 这对客观唯心主义也是很好的批判。

冯友兰新理学把"理"看成是超时空的绝对，对此，陈家康

① 《真际与实际》，《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888页。

② 《真际与实际》，《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893页。

③ 《物与理》，《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907页。

等也进行了批判，并论证了时空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离开时空而谈物是十分错误的理论。

（二）关于新理学的历史观

新理学宣扬抽象的道德论，主张儒家的道德规范。它说："大部分底道德是因社会之有而有底。只要有社会，就需有这些道德，无论其社会，是那一种底社会。这种道德中国人名之曰'常'，常者，不变也。照中国传统底说法，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此五者的意义及其所以为常，我们于《新理学》中已说过。此五常是无论什么种底社会都需要底。这是不变底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① 这是一种永恒不变、适用于一切国家和社会的唯心主义道德观。对此，胡绳指出，在前一时代纵然它可以说是合乎理性的，但在这一时代却已因其不能适合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所以被认为是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了。因此，人们要根据现实的社会生活来判断某种道德规律之是否合于理性，那就只能靠理智的审查。放弃了理智对于道德的审查力量，甚至使理智服从于道德规律，其结果只将足以让非理性的道德规律猖獗！同时，胡绳还进一步指出了冯友兰唯心主义道德观的论证方法。胡绳指出，冯先生对"民初人"的批评，中心是说：他们"以为人可以随所意欲，愿行什么制度即行什么社会制度"而不知道旧的思想意识道德也是在某种社会物质基础上的产物。既然如此，我们今天更清楚地了解礼教的本质，那就应该更深入地推进反礼教运动。然而冯先生不然，相反的他似乎以为找到一物存在的原因即是证明其为合理的存在，于是就不应该反对他。胡绳还在揭露冯友兰关于不要反对旧道德、只要改变生产方法就可以了的谬论时指出，固然，冯先生并未明白表示，应该维护旧思想、意识、道德的存在。他只是说，我们不必

① 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359页。

去反对它们，因为只要在“生产方法”发生改变时（就是在机器大量使用，工厂充分发展时），这一切自然会随之更变。在这里，冯先生也是拿对于社会发展的总方向的图式来代替具体的社会改造的实践。事实上，社会的意识与思想的发展不是那么完全被动地受支配于物质生活的发展的。常常在新的物质生活尚未充分实现之前，新的思想意识已经开始和旧的思想意识搏斗而促起旧的物质生活与旧的思想意识的崩溃；也常常在新的物质生活已经实现的时候，旧的思想意识依旧顽固地残存着，成为新的物质生活与新的思想意识向前发展的障碍。因此，在整个社会改造事业中，思想意识的斗争必然要配合着物质生活的改造而成为一个独立的阵线，放弃这一方面的战斗，实际上就无异于维护旧的思想意识道德的存在。

冯友兰在社会历史观上，还宣传了许多唯心主义的观点，反映出他宣传的是英雄史观，如说：“有些特别才高底人，我们称为天才。无论在任何方面都有天才。……而且照遗传学讲起来，天才往往是遗传底。……一个民族内的天才或才高底人比较多，此民族即是优秀民族。一民族内天才或才高底人比较少，此民族即是劣等民族。”①在《新事论》中，冯友兰还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说：“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或上所说的民治主义，在一个社会内真正实行，都是一个社会已行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以后底事。如一个社会尚未行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则在这个社会里谈这些主义，都真正是不合国情，都是空谈无补。”“中国现在最大底需要，这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②在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的上述哲学思想，不仅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也是在政

① 《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323、324页。

② 《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334、335页。

治上起了不好的作用的。为此新理学直至解放后还受到人们的批评，冯友兰也作了自我批评。

## 五、对新心学的评述

新心学和新理学一样，都是兴起于三四十年代。不过，新心学宣传的是主观唯心主义。贺麟在他所写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等著作中，集中论述了他的新心学。这是中国的陆王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的混合物。当它出现之后，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在本体论上，新心学认为哲学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是"心"。贺麟认为，"所谓物质，一定是经过思考的物质"，"不可离心而言物"。① 他还说："离开主观，没有客观"。② 这就是说，新心学只是在"心外无物"的基础上不否认物质的存在。这正是陆王心学的再版。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较集中地宣扬了他的唯心主义的知行合一论，即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首先，《知行合一新论》肯定和赞扬了王阳明的唯心主义的知行合一论。它说："知行合一说与王阳明的名字可以说是分不开的。王阳明之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在为道德修养或致良知的工夫，建立理论的基础。""知行合一说虽因表面上与常识抵触，而易招误解，但若加正当理解，实为有事实根据，有理论基础，且亦与学术上求知，道德上履践，均可应用有效的学说。"③ 贺麟说，因为要超出常识的浅薄与矛盾，所以我们要重新提出表面好似与常识违反的知行合一说。这些开宗明义的话，说明新论仍是旧论，是用现代唯心主义的道理论证知行合一论的"科学性"。

①② 《当代中国哲学》，第74页。

③ 《知行合一新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625—626页。

新心学直接把它的矛头对着唯物史观。贺麟说，唯物史观是一种“外观法”。外观法是研究一个问题所以发生的外表现象，如地方背景，时代背景等。唯物史观就是注重社会背景的一种历史观，他们以为一人的思想行为，受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所支配，所以要研究某个思想之所以发生，不要从思想的本身里去找其原因，要从思想外面去找其原因。这是一种客观或外观的研究。而唯心史观，他认为是一种“内观法”，所谓内观法便是从思想本身去看思想。内观法是比较深刻的看法。内观注重本质，比较接近“全观”或“观全”。这里，新心学歪曲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注意背景，不注意思想本身的研究。事实上，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不仅分析经济，而且也分析思想，它是全面的社会历史观。相反，唯心史观只注重思想、意识，否定物质的作用，正是有所偏的谬论。

新心学也否认在阶级社会中一部人类史是阶级斗争史。他说，唯物史观的另一意思，以为一部人类史是阶级斗争史这种看法只是政治斗争中一个口号，比如即以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来说，就很难以阶级斗争四字来解释清楚。事实很清楚，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殖民地，转移国内阶级斗争而发动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否认这一点，不承认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阶级社会中的重大现象，这正好暴露出新心学的唯心史观歪曲历史的真面目。

胡绳在《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等文章中，对于新心学等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新心学散布的是公开的唯心论，而且成为一个系统。文章着重批评了贺麟的文化观。指出它是一种超历史的范畴，认为文化的本质是精神。新心学认为道德是天意在人事上的反映，它受宗教的支配。新心学还把人与人的支配关系，解释成为天对人的支配关系。经过这种解释，人与

人的支配关系就被合理化、神圣化起来了。新心学宣扬的文化观仍然是属于旧礼教的复古营垒。

## 简短的结论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多方面展开，具体地表现在：

在一系列军事著作中，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论述了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客观物质条件的辩证关系，阐述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以及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论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从而形成了军事辩证法的科学体系。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策略原则，正确地解决各种矛盾，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深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强调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做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

阐明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强调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

论述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核心和原则，阐明了道德评价问题上的动机和效果以及道德的批判和继承的辩证关系，为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增加了新内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坚持

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进一步结合，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上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的经验，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

#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色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1945年—1949年）

解放战争时期，又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革命进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历史大决战时期，是中国民主革命从局部胜利走向全国胜利的时期。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是贯串这个时期的基本内容。在这一时期里，我们党和毛泽东始终坚持彻底的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并把它应用于对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分析，制定了无产阶级的战略策略，把敢于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善于斗争、善于夺取胜利的斗争艺术出色地结合起来，批判了“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及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军事思想、政治学说、国家和革命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第一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也改变了中国的政

治形势。由于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解决，紧接着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就上升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矛盾焦点集中在国家政权问题上，即是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呢，还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统治集团却倒行逆施，妄图篡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在全国实行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因而，内战危险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因此，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就成为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在新的革命斗争中，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回答的新问题。比如，战争与和平问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质问题，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问题，等等。只有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正确制定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战略策略的原则和方针。在这些问题上，党内外、国内外都存在着不同的以至根本对立的立场、观点，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为了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等报告、谈话和文章，在这些论著中，毛泽东杰出地应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地回答了这些复杂而尖锐的问题，坚决回击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攻，驳斥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一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丢在脑后。”①他说，那种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80页。

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这些东西，都必须象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毛泽东准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形势，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本质，制定和阐明了我们党进行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原则和方针，在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

## 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与革命的两手策略

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关头，要求共产党人能够从变化发展了的客观实际出发，对新时期的阶级关系作出新的科学分析，并以此作为党制定战略策略的基本出发点。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他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地分析了新时期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和策略方针。他深刻地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们篡夺的斗争。"①这表明，由于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中日民族矛盾转化为国内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建立什么国家的问题上。这将是一场复杂而尖锐的斗争，这将是中国面临的两种形势、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历史大决战。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地把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战略任务，提到了全党斗争的日程上来，这就在理论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6页。

上正确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形态，阐明了决定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根据，指明了这一矛盾的当前斗争的具体表现，从而在思想上武装了全党，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提供了理论武器。

（一）战争与和平的复杂性，革命两手策略的制定

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对这一主要矛盾的双方，特别是作为矛盾双方代表的国共两党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具体分析，分析双方的历史、现状及其当前基本方针，阐明这矛盾双方又斗争又统一的情况，以及如何造成这一时期中国战争与和平的错综复杂的具体形势及其发展。

首先，毛泽东对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历史的阶级分析，揭示了产生内战危险的主要原因。根据国民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抗日时期它又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等事实，毛泽东明确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①。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中，靠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上台，上了台立即就把中国人民投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在八年抗日战争中，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他就躲在峨嵋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②抗战一胜利，他就赶紧下山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③毛泽东告诫全党"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④他号召全党提高警惕，做好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精神准备。这就为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0页。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0、1078—1079、1080页。

党和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革命本性，认识抗战胜利后时局紧张的根源，明了全国内战的严重危险性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现状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特别是到了抗日胜利以后，情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毛泽东认为，我党目前的情况和1927年时候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候党是幼年的党，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中国革命这时也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坚持这一革命，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也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对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坚持革命。这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毛泽东应用矛盾分析法指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告诫人们一方面要深刻地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本性，另方面要敏锐地观察反动派策略手段的变化，为我党制定了用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① 这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切反动派对付人民的反革命两手。这两手相互补充、相辅为用，有时交替使用，有时同时并用，有时以军事镇压为主，有时以政治欺骗为主，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为了维护反动统治，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0页。

一方面极力抢夺抗日胜利果实，发动军事进攻，准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又大搞政治欺骗，叫喊改组一党政府为多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重开和平谈判。总之，大耍反革命两手策略，空谈和平，实打内战，空喊民主，实搞独裁。面对这样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必须作出正确的果断的回答。

毛泽东总结了长期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策略，提出了我党的革命策略。毛泽东说："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①我们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即一方面要以主要精力准备用革命战争来消灭反革命战争，另一方面也要揭露敌人的一切和平欺骗，戳穿其"和平"阴谋。毛泽东强调在坚持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斗争中，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上。他说："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②他还说："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③总之，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们的办法办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④为此，毛泽东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中，提醒全国人民要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2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3页。

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由于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也遭到了各民主党派的反对。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出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也由于美帝国主义当时顾忌世界民主舆论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蒋介石不得不摆出和平姿态，以“共商国是”的名义，被迫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党和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认为在日本投降前后的一个时期内，苏、美、英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广大世界人民亦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此外，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困难很大，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而我党又于8月25日，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因而出现了和平、民主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尽一切可能制止内战，最后挽救和平，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陪同下，毅然决定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商量团结建国大计。毛泽东指出：“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①因此，中共中央认为，在不放松武装自己准备的前提下，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尽可能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社会，成立联合政府，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或者通过谈判延缓爆发全面内战的时间。如果和平不能实现，经过谈判斗争，也可以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真面目，教育全国人民，团结争取中间派，并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

重庆谈判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其焦点集中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上。我方要求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蒋方却借口“统一军令”、“统一政令”，妄图要我方交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99页。

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为使谈判顺利进行，我党作了必要的让步。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我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分别在协定上签字。在这个纪要中，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但这只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还不是现实的东西。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果然，“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就向各战区发出“剿共”密令，指示国民党军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此后，内战规模日趋扩大，和平建国的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关于重庆谈判》等文中，深刻地论述了战争与和平（即打和谈）的辩证法，批评了党内外种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阐明了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谈判斗争与群众斗争、坚持原则与必要妥协的辩证关系。

在和平谈判问题上，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右的倾向，迷信和平谈判，看不到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的严重危险，对反动派抱有幻想，只看到形势发展的好的可能性，不为应付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另一种是“左”的倾向，反对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看不到通过谈判斗争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必要性，不了解世界上事情是复杂的，不认识形势发展既有坏的可能性，也有好的可能性。看到形势发展的坏的可能性，并且为应付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看不到好的可能性，不利用各种可能的斗争方式力争最好的可能性，在应当谈判时不去谈判，不通过谈判去揭露敌人的“和平”欺骗，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这种右的和“左”的倾向，都是各执一端的片面性，都离开了辩证法，陷入了形而上学，实质上都是以革命的一手去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而不是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反革命两

手。毛泽东既充分估计到坏的可能性，也分析了好的可能性，他把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统一起来，为我们树立了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去观察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形势的光辉典范。

1946年7月11日，毛泽东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所作的修改稿中指出，要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他还说，和平是必须取得与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赖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的取得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在这里，毛泽东深刻阐明了战争与和平、自力与外力的辩证法。

毛泽东还预见到，在这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党内可能出现陈独秀那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及时告诫全党："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①他还指出："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②他严正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③从而正确地制定了革命的两手策略。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这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深刻的概括和总结，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党内矛盾斗争的透彻分析。

（二）关于新的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04、1076、1107页。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整个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变成了世界侵略势力的中心，发出新的世界战争的叫嚣。另一方面，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大牺牲和经过了战争严酷锻炼的世界人民，觉悟极大提高，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浪潮日益高涨。

在战后不久，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就竭力散布战争恐怖，一时间，"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鼓噪声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然而，情况究竟怎样呢？新的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呢？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制止呢？总之，对这些牵动着每个人心弦的问题必须作出回答，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回答。

对于国际国内形势，历来就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形而上学的看法，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静止状态，不看发展变化；只看一点一面，不看全面联系，等等。另一种是唯物辩证的观点，既把握现象，又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既分析静止状态，又揭示运动发展；既看到矛盾双方，又指出其内在联系，等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以指导人们的实践。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国际政治形势。首先，他揭露了反苏战争宣传的政治目的。1946年8月，他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于掩盖当

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① 又说：“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② 1947年1月20日，周恩来致章汉夫等人的信中也说：“对苏战争危机目前已不存在，反苏战争的叫嚣只是企图独霸世界（苏联除外）的烟幕。故实质上苏美矛盾在世界制度上虽是基本的，但不是实际政治的主要矛盾。”③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论断都指明了反苏战争宣传的政治目的，戳穿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所散布的“美苏必战”的谎言。

1960年，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她提出了关于发生美苏战争的危险问题，毛泽东主席回答说，反动派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主要是用以掩盖当前美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的烟幕。美国垄断资本确实梦想消灭苏联，但是这还不是他们的最直接的目的。他们必须首先削弱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然后他们还得控制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和苏联打仗，必须通过其他国家的领土，通过英国、法国和中国。所以美国反动派利用这种反苏战争宣传来进攻美国人民的公民权利和生活水平，并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控制之下。美国在这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并且已经控制了很大的地区。④ 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他科学地分析了新的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阐明了它们的根据与条件。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他清醒地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的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7页。

③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78页。

④ 参见《世界知识》，1960年第22期。

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① 这就一方面指出了反动派确实在准备战争，确实存在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另方面指出了由于世界民主力量的强大，存在着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他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② 实践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论断的无比正确性。

第三，他通过分析还指出了要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必须具备的条件。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会发善心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达成的某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同帝国主义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而“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③ 总之，“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④ 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正确地指出了当时斗争的客观形势，为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第四，他揭示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所面临的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困难。他说：“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⑤ 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美国反动派要发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从政治上、经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9。

④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8页、1137页。

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这必将引起美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而“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①这就指明了当时美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美国人民同美国反动派之间、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美国和苏联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不解决，是很难谈到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这就进一步指出了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困难条件。

毛泽东还深刻地阐明了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开辟了更加现实的道路。他指出：“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么，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意义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②历史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是应用历史辩证法分析形势发展的范例。

## 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怎样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问题，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正确认识反动派，是制定革命的路线、方针、战略和策略的一个重要前提。对反动派缺乏正确的认识，就会犯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会导致革命的挫折和失败，这是中外无数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7—1298页。

次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毛泽东经常告诉我们，观察问题要抓住它的本质，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几十年来，在国际国内革命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对于政治形势作出深刻的判断，向人们指出一切反动派必将灭亡，革命事业必将胜利的历史必然性。1946年6月，在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面前，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不要应战？能不能打败蒋介石？这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重问题。那时，在人民中间，在革命队伍中间，在国际友人中间，有的人被敌人的表面强大现象所迷惑，对战争前途表示怀疑和忧虑；有的人由于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甚至认为中国爆发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和发展趋势，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为革命人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一科学论断有一个形成发展过程，并含有深刻的哲理。

（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形成发展

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对阶级斗争史的科学概括，而且一再为历史发展所证实。列宁曾把帝国主义者称做“空架子”，把当时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者看作“泥塑巨人”。早在1919年，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毛泽东就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蔡和森在1922年写的《革命中的希腊》、1924年写的《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两文中，对希腊的统治者和英帝国主义者提出了“戳穿了的纸老虎”、“反革命的纸老虎”的论断。但这些重要思想

都未从理论上作出论证和发挥。后来，在1926年—1930年这一段时期里，毛泽东先后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才透彻地分析了腐朽力量和新生力量的不同发展前途，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见。从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也给世界革命人民以极大的希望。

1938年5月，针对日本反动派总是吹嘘自己貌似强大的武力，在人民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对于日本反动派的军事力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畏惧心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这是“唯武器论”的观点，并对这种观点作了深刻的批评。他说，这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并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重要著作中指出，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发表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中指出，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1942年10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社论里，分析了反动势力外强中干的实质，提醒革命的人们不要为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他说，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用召开"国民大会"来进行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时，提出警告并预言，这是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是把自己推上绝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引用"愚公移山"这个中国古代的寓言，说明只要革命的人们有了信心，不畏惧反动派，有了决心，坚持奋斗到底，革命没有不胜利的。他还说，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具体论点将在下文展开）。

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与国

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暂时的现象，暴风雨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对党内的指示中说，在全体上，在战略上，要轻视敌人，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上，又要重视敌人，要讲究斗争艺术，等等。

1948年11月，毛泽东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杂志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指出，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和对于革命力量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深刻地揭示了反动力量和人民力量极端不同的两种发展逻辑；并指出先进的人们必须组织力量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必须教育、团结和争取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着的人们，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一切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

虎。在历史发展的一段时间里，它们是真老虎，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会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面，化为纸老虎，终究会被人民所推翻。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在不同时期里武装了我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我国人民的信心。可见，"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史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早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证明，它还将得到全世界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继续证明。它是"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

**（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哲学意义**

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关于目前党和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1958年12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剖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外强中干的本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制定了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的战略战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第一，从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上，揭露了中外反动派外强中干的实质。

毛泽东用"纸老虎"来刻画貌似强大而实际是外强中干的一切反动派，形象地说明了本质和现象、暂时状态和必然趋势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①这深刻地说明了新生力量必将战胜腐朽力量，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他指出了历史上曾经猖獗一时的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日本东条英机等，都不过是一只纸老虎，都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9页。

是纸老虎。”①为什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呢？“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②。反动，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违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就是脱离人民群众，与人民为敌。社会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具有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力量，人民群众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反动派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强大，实际上本质是虚弱的，没有前途的，必然走向灭亡的，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毛泽东一再告诫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③说它是真老虎，指的是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就是成了反动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决死斗争的时候，还要吃人，成百万成千万人地吃，所以说它是真老虎。说它是纸老虎，指的是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渐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终究或终将被人民所推翻。这是毛泽东所揭示的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

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曾说，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变即转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6页。

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这就生动地阐明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深化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各自向自己的反面转化的理论。一切反动派自以为强大得很，自以为捣鬼有术，可以消灭革命力量，但同它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它们这样做的后果，反而促进了人民的团结，加深了自己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自己由强转化为弱，由胜利转化为失败，为自己的灭亡挖掘了坟墓，而人民的力量，开始可能显得很小，但每经过一次战斗，就加强了一次团结，取得了一次经验，增强了一次战斗力，于是就一次一次的向强大的方面转化，向胜利的方面转化，由弱转化为强，由挫折转化为胜利。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转化，都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从人和物的关系上，进一步批判了在战争中“唯武器论”的错误观点。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深刻地批判了“唯武器论”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错误思想，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反动派又挥舞手中的原子弹来吓唬世界人民，人们对原子弹怀有恐惧心理。对此，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提问时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①

当时，还有一个加拿大人马克·盖恩也到了延安，他来华前在日本待过15个月。他向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和工作人员描述了广岛的可怕情景，在一刻之间数以千计的人死于一个炸弹。这在一些人中产生了对原子弹的恐惧心理，害怕美国反动派用一两个原子弹来毁灭延安革命根据地。马克·盖恩回忆说，数天后，毛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1139页。

东会见了党的高级干部，问他们：原子弹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的同志为什么把原子弹看得那么神奇呢？是资产阶级影响。武器决定一切的想法，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的影响。毛泽东接见我时，指出了我的错误。他说，帝国主义者发明这个武器来吓唬意志薄弱的人，但是共产党人的意志是坚强的。他说，原子弹只不过是纸老虎，美国可以在中国投下一万颗原子弹，但我们还会剩下足够的人民作战到底，获得最后胜利的。①

在这里，毛泽东具体通过人与原子弹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人与武器、人与物的关系。他历来认为，武器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他说，一切反动派都迷信武器的优势，而一切革命军队的武器在开始总不如敌人的武器好，但历史事实一再证明，武器差的革命军队最终必将战胜武器好的反动军队。毛泽东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②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再一次生动地证实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从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上，确立了革命人民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的根本方针。

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这一根本战略思想，不论用来指导对敌斗争，还是用来从事生产建设和其它工作，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从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意义上讲，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从向自然界作斗争意义上讲，战略上要藐视困难，战术上要重视困难。

① 马克·盖恩，《在延安会见毛主席》，参见（美）韩素音主编《怀念毛泽东》第66页，香港出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9页。

党和毛泽东一贯应用这一根本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到每个事物发展的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点出发，一方面从本质上、从长期上、从战略上，都必须如实地把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此来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在具体问题上、在战术上，都必须认真对待，看到它真老虎的一面，不是轻而易举，不可掉以轻心，以此来建立我们的战术思想。总之，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个个的敌人。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深刻指出："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① 这就从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上具体而生动地阐明了对敌斗争的辩证法。

对敌斗争如此，同任何困难作斗争也应当如此。毛泽东指出，我们是做转化工作的。我们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革命的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0—1211页。

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化，如此等等。我们在做转化工作中，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个个的困难，必须把握可能性和现实性，区分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可能性和现实性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事物发展的前途如何，将要转化到哪里去，在没有完成这种转化之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只有转化完成之后，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性，这就是两者的区别。但是，可能性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建立在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就是要具有最终能变成现实性的充分根据，才能是现实的可能性，否则就只能是虚假的可能性。然而，可能性和现实性是紧密联系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是由局部到全局的过程，就是说可能性一部分一部分变成现实性，最后在整体上变成了现实性。我们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将走向灭亡，在基本灭亡之前，只能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但是，这个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这是历史的客观逻辑。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新发展

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军民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歼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及时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①在党和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指引下，我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于海的广大地区，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4页。

攻，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①

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1947年10月10日，我党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及时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对政治、经济、军事、土改、党和军队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为了分析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新形势，总结人民解放战争的主要经验，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政策，批判党内错误倾向。1947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分析了有利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阐明了党在人民解放时期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军事辩证法。

## 一、十大军事原则

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这就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4、1188页。

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灭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①

（一）十大军事原则的形成过程

1958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②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就为我军制定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1192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63页。

在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还提出了“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红军以集中为原则”、“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等等。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后，就形成了一整套作战原则。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精辟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根本观点和研究、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诸如：“拣弱的打”、“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占领之”、“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集中大力打敌一部”、“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等等重要原则。这些论述都为后来形成十大军事原则奠定了基础。

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军队先后向我各个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这样，作战规模大了，涉及面广了，集中性也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以及各战略区指挥员，为了适应新的战争的需要，都在探索和总结战争的新鲜经验，并提出了许多符合客观实际的作战指导原则。例如，周恩来提出：“现在是运动战，将来还要打阵地战”。① 朱德提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力量突然消灭一部分敌人”②、“寻求敌之弱点”、“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③。等等。毛泽东及时总结我军作战经验，先后为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2页。

②③ 《朱德选集》，第68、153页。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6年9月16日）、《三个月总结》（1946年10月1日）、《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947年9月1日）等党内指示。在这些文件中提出的作战原则，可说是十大军事原则的先行篇，为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做了直接准备。可见，十大军事原则，是我军多年战争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行动纲领。

十大军事原则，也是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长期斗争的产物。在十年内战时期，王明推行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受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到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等又推行了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又受到毛泽东的批判并予以纠正；解放战争初期，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表现，也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可见，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同党内错误的军事路线长期斗争的产物。它既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特点，也反映了一般人民战争的普遍规律，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新贡献、新发展。

### （二）十大军事原则中的辩证法

十大军事原则，文字精练，内容丰富，它系统阐明了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战法、作战形式、战斗作风，以及战斗保障的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它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它充满着辩证法思想，各条之间和各条内部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它是指导战争由劣势转为优势，夺取全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一，它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矛盾辩证法。诸如，“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① 这就是要求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页。

具体分析敌军的分散与集中、弱小与强大的具体情况，区分先打与后打，以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做到有把握地打歼灭战；“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①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在军事上的具体体现，在战法上是避强击弱，做到确有把握夺取胜利和发展胜利；在攻城问题上，根据敌守备的据点和城市的强固和薄弱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坚决夺取”、“相机夺取”和“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的方针。总之，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先弱后强，确有胜利把握而后夺取之，这些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范例。

第二，它体现了量变和质变辩证法的杰出应用。毛泽东指出，我军在战役部署和战术部署方面，都必须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他说：“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②他强调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③实践表明，“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是实现歼灭战的根本方法。这种作战方法，是实现战略上敌我双方优劣形势转变的根本途径。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它抛入劣势和被动。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的正确指导。这个正确指导，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在十大军事原则中，毛泽东谈到这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页。

种方法时说："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①在解放战争中，由于我军应用了这种作战方法，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敌我形势迅速变化，随着战争的发展，不断积小胜为大胜，经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军由局部优势转变为全局优势，打倒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这是对量变质变规律生动的应用和发展。

第三，它揭示了战争中的根据与条件、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要实现歼灭战，每战就必须有准备。毛泽东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②因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这就是说，要做到有胜利的把握，必须具备充分的根据和条件，全面了解主观与客观的情况。作战准备有多方面的内容，胜利的把握是由多方面的条件构成的。一般地说，有准备是指：察明了敌情、地形，拟订了作战计划，明确了任务，部署了兵力火力，组织了协同动作和各项保障，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做好了地方武装、民兵配合主力作战和人民群众支前工作的组织部署，等等。有把握是指具备了战胜敌人的条件，诸如作战对象是好打之敌，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有利，造成了敌人的错觉和过失，我军集中了优势兵力，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等等。毛泽东指出，要实现歼灭战，还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③这就是要在全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1192页。

面掌握战争的客观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军的主观能动性。实践表明，我军有了这样的优良战斗作风，就能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压倒一切敌人，敢于进行近战、夜战，穿插迂回包围，就能充分发挥技术战术威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就能连续作战，扩大战果，夺取更大的胜利。

第四，它贯穿了辩证法的发展变化观点。毛泽东指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① 这一原则指明，我军的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同时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加强对阵地攻击战术的研究和应用，加速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相当长的阶段里，我军曾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则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战争开始时，敌军在各个战场依仗优势兵力和装备，全面向我进攻，力图迫使我军进行正面的阵地防御，与我军主力决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根据毛泽东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针，没有采取正面的阵地防御，而是主动地避开敌军进攻锋芒，向敌军展开大规模的运动战，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样，一方面，分散了敌军的兵力，削弱了敌人进攻力量，陷敌军于被动挨打的困境；另一方面，使我军能够集结优势兵力，在每一个局部上化劣势为优势，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地位，获得了主动权、自由权。经过一年作战，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此后，由于敌我力量变化，夺取城市的阵地攻坚战就逐步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结果，在战争的第二年里，我军不仅歼灭了敌人一百五十二万多人，并且收复和解放了一百六十四座城市，这反映着作战形式的发展变化所赢得的辉煌战果。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2页。

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是中国革命战争基本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但其基本精神，对于今天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十大军事原则，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我们必须结合具体的现实情况，研究其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应用。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对未来战争的作战行动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改变人民战争的基本规律，反映人民战争指导规律的十大军事原则，仍然是我军必须遵循的作战指导原则，我军的基本作战方针仍然是歼灭战，基本战法还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十大军事原则，还充分体现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未来战争中，一方面既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加速我军的军事技术现代化，切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总之，在未来战争中军事辩证法仍然是我军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但战争的实践是发展的，我们的军事学说也应当是发展的。毛泽东指出："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①

## 二、战略决战中的战略战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决战，发生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之后，也就是我军实行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之时。其目的是歼灭敌军的重兵集团，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解放战争发展到1948年下半年，敌我力量对比和全国战局呈现了有利于我军的根本变化的时候，毛泽东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63页。

海、平津三大战役。这是大规模的阵地攻坚战和歼灭战。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共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至此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上归于消灭，从而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三大战役的胜利，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又是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一）关照战略全局与狠抓作战重点有机结合

毛泽东在三大战役期间，发出电报二百余份，对战役进行了精心的部署和指挥。他认为，首要问题就在于审慎而正确地选定决战方向，和选准战役的突击方向，把战略全局和作战重点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历来十分重视统筹战争全局，抓住关键，在全局战略利益的前提下，组成各战区密切配合。例如，1948年，当毛泽东酝酿辽沈战役时，一方面要求在东北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另一方面要求华东我军避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每次歼敌不超过一两个整编师，以便抑留东北敌人加以歼灭。又如，淮海战役还在进行，平津战役即将发起时，为了抑留敌人，便于聚歼，毛泽东电告太原前线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固守阵地，就地休整。同时，电告淮海前线，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暂不消灭，等等。这充分体现了在全局利益下，为保证重点而组织各战略与战役方面的密切配合。

毛泽东指出，要把注意力放在全局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部分上，强调抓住战略和战役的关节点。比如，在战略决战阶段，他对战略利益、决战时机、作战方向、攻击重点，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明确的指示。对辽沈战役，他强调“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①，他要求我军要“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②。尤其是锦州一点，造成我军在东北

①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472、473页。

战场上"关门打狗"的有利局面。在淮海战役初期，他强调作战重心是箝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以便使山东和苏北两个解放区联成一片。在平津战役初期，他强调切断平津，完成战略包围后，先吃两头，后取中间，即先歼灭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天津守敌，然后迫使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战争实践证明，党和毛泽东的这些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正是由于抓住了全局的主要方面，从而使战役的胜利发展成为战略的胜利。

（二）大规模运动战与大规模阵地战密切结合

三大战役中，我军既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也极为重视阵地战（包括城市攻坚战、野战阵地攻坚战和阵地防御战等形式）。在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毛泽东要求我军"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①，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指示东北我军，对长春之敌采取长围久困的方法；对防御薄弱的沈阳之敌，采取行进间突破的方法；而对设防坚固的锦州守敌，则采取城市攻坚战的战法；对援锦州之敌，则采取运动战和阵地防御战相结合的战法。他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②

毛泽东告诉我们，在战略防御阶段，没有战略主动权的情况下，必须夺取战役的主动权；在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以后，已经取得战略主动权的情况下，仍然要把夺取战役主动权作为重要任务。不论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还是大规模的阵地战都应如此。1948年，东北战场我军转入全面反攻和进攻之后，由于林彪指挥上的失当，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始终没有掌握战役主动权。对此，毛泽东指出："你们是否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456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457—458页。

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①，“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②“只要打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③“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④我军对这个设防坚固的城市发起攻坚战，全歼守敌10万人；同时，我军以坚固的阵地防御战，击退了援敌的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20多个师的兵力。在攻克锦州后，毛泽东即电告：“准备全歼廖耀湘兵团，攻取沈阳。”⑤采取“以各个击破为方法，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望即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⑥于是，我军以八个纵队的兵力一举合围了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并采取多路、多方面突击，猛然穿插、各个击破的战法，经两昼夜激战，在运动中全歼该兵团10万余人。以后，我军旋即北上，再歼沈阳、营口守敌14万多人，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

（三）夺取大中城市与歼敌重兵集团相结合

以1947年冬攻取石家庄为起点，我军开始夺取敌人守备强固的大中城市，蒋介石集团在战场上的连续失利，遂收缩兵力，扼守战略要点和交通干线，以主要兵力据守大、中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因此，我军能不能攻克在敌手中的大中城市，已经成为能不能继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把革命战争推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总结了攻取城市和据点的新鲜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战法。例如，辽沈战役的“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⑦。淮海战役的“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

①②③④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475、477、481页。

⑤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489页。

⑥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489页。

⑦　《毛泽东选集》（内部本）第463页。

乱其部署”的战法，“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采取急袭方法或强攻方法。平津战役的“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①；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②，等等。毛泽东十分重视攻城与打援的兵力运用艺术，他说：“采取围城打援办法”，“围城之目的不在得城，而在打援”，“每次事前均应有充分准备，不浪打，打则必胜。打时须用包围迂回，以期尽歼。”③还说：“必须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和作战方法上保障取得阻止援敌及歼灭援敌的胜利”④。根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可以酌定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有时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有时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这就在歼灭敌人的前提下，把攻城和打援两项任务辩证地统一起来。

毛泽东用兵作战从不拘泥于一套程式，在指导思想上，历来以便利歼敌为准则。而在实际运用时，又十分注意从实际出发，活用歼灭战的原则。例如，解放战争时期，他在《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并重》和《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之作战方针》两篇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指出：“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⑤而处于内线作战时，“可以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之作战方针。”⑥这是毛泽东对历来强调的“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原则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①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609、617页。

③④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94、463页。

⑤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14页。

⑥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16页。

毛泽东一贯强调在作战指导上，必须充分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部署的出发点，争取光明与胜利的最好结局。他在计划和指导作战时，从来都要求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情况。他指出："凡行动不可只估计到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① 在淮海战役时，毛泽东强调："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包括一种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② 1949年，当我军胜利地向全国进军时，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说："我们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③ 并指示"二野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④ 由于立足于最坏的可能性，进行充分准备，就为争取最好的结局创造了条件。正因为这样，我军在夺取大、中城市和歼灭敌重兵集团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坚定而灵活地实施战役合围

毛泽东指挥决战战役，十分重视战役合围的运用。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1月2日结束。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在歼灭绥中、兴城、义县之敌后，完成了对锦州的合围，于10月15日攻克锦州，全歼守敌范汉杰部。17日、19日，曾泽生和郑洞国先后率部起义，长春解放。第二阶段，从10月20日到28日，我军在黑山、大虎山地区，歼灭从沈阳方向驰援锦州的敌军廖耀湘兵团。第三阶段，从10月29日到11月2日，我军乘胜解放沈阳、营口，除部分敌军从海上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灭。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军47

①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01、528页。

③④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28、337页。

万余人，东北全部解放。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月6日到22日，毛泽东指出，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我强大的合围部队在新安镇、碾庄地区将其全歼。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毛泽东提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重心是合围歼灭黄维兵团，我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配合下，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围歼了黄维兵团。第三阶段，从1949年1月6日到10日，毛泽东提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重心，就是以华东野战军为主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合围歼灭杜聿明集团。我野战军采取多路、多层尾追，平行追击和迂回拦击的办法，将杜聿明集团合围于徐州西南的陈官庄地区。我军发起总攻，全歼了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历时65天，共歼敌军55万余人。经过这个战役，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为我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奠定了胜利基础。

平津战役，从1948年12月5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2月5日到20日，我军迅速完成了对平、津、张、塘的战略切割包围，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办法，达到稳住敌军的目的。第二阶段，从12月21日到1949年1月15日，我军先打两头，后取中间，1949年1月10日，我军解放天津。第三阶段，从1949年1月16日到31日，北平守敌陷入绝境，经过我方努力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我八项条件，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近两个月，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华北全境基本解放。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三大战役后，对于如何解决残余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提出了三种方式：一是天津方式，即用战斗来解决；二是北平方式，即迫

使敌军用和平方法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是绥远方式，即有意保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等把主要敌人歼灭后，再去改编。这三种方式，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活运用和发挥。

（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逃敌

1949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指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①毛泽东号召"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② 4月，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③接着，我军胜利地举行了渡江战役。5月，毛泽东部署各野战军分路向中南、西南、东南和西北地区进攻，追歼逃敌。

鉴于当时敌军已成惊弓之鸟，狡猾地进行战略机动防御，作战谨慎，既想尽力避免与我决战，力求保住老本；又想盘踞一方，静观待变，妄图东山再起；一遇风险，即企图从海上或陆上逃跑。因此，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说，和白（崇禧）部作战，"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④就是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这是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⑤毛泽东说："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到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⑥为此，

①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2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8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39页。

⑤⑥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40、342页。

我第一、二、四野战军以大迂回动作向广东、广西、云南地区之敌进击，封锁国境，切断敌海上和陆上退路，聚歼溃敌130余万人，解放了湘、鄂、赣、粤、桂、云、贵、川、康等九省广大地区，完全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彻底粉碎了敌人割据西南，妄图东山再起的迷梦。

我军依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在军事打击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运用政治攻势，即采取“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解除敌人的武装。我军在进军西南和西北地区时，争取敌起义和迫敌投降者，分别约占该地区歼敌总数的62%和60%。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中杰出运用的结果。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1949年初，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平津战役也即将胜利结束。在长江以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整个战线全部崩溃，其精锐部队基本被消灭。在长江以南地区国民党统治集团完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美蒋反动派面临着彻底覆灭的命运，但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一面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顽抗，一面又由蒋介石出面求和，玩弄新的“和平”阴谋。他们还企图策划某些人混入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一些口称人民的朋友的“自由主义人士”，打算劝说人民应该对敌人“怜惜”、“仁慈”；还有一些人，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认为人民已经得到了半壁江山，就可以“划江而治”，搞南北朝。在国际上，有的同志和朋友，也忧心忡忡，主张划长江为界，搞个南北政权。

在这种形势下，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全国人民的面

前。在这个革命发展的又一紧要关头，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彻底革命精神，以极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坚定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响亮地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和政策，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学说，驳斥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唯心史观，批评了“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种种幻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 一、坚持彻底的辩证法，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建立一个新中国。献词告诫一些朋友们，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决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

### （一）革命转变论的内在根据

早在抗日战争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① 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进一步作了系统的论述，他在谈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

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同时，明确地指出：“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②这就深刻地阐明了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向社会主义转变，实质上是相互联系着的一个问题，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既有质的区别，又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毛泽东还阐明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根据和条件。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才能“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③这就是说，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打碎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是革命转变的标志和条件。

在我国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及时地提出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势之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阐明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内在根据、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64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4页。

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① 这里所说的基本矛盾也就是主要矛盾。这就给我们指明了革命转变的基本原因，说明了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按照毛泽东的思想，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当革命胜利之日，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由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由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矛盾，让位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矛盾规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的方向，主要矛盾转化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也随之发生转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条基本原则。既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将成为主要矛盾，革命的性质也就必须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矛盾是什么决定着革命性质是什么，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着革命阶段、革命性质的转化。这就是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内在根据，为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

（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法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② 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中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来艰苦奋斗的结果。实践表明毛泽东指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时刻，党和毛泽东又及时地提出了这个转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4—1365页。

变，使全党能够自觉地适应这种巨大变化，迅速地掌握新的工作方式。

毛泽东指出，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同敌人作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同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不然，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同我们合作的人。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他强调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① "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② 在这里，毛泽东充分阐明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

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伟大历史任务，毛泽东还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份的状况，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转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6、1366页。

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①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国情，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当然也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出发点。为此，毛泽东具体地规定了：没收官僚资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对民族资本经济，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则必须逐步地谨慎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就是通过组织各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明确地提出了“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②这就鲜明地指出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对在实际工作中防止“左”倾或右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表明，革命转变论和革命阶段论是统一的，决不能把两者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混淆起来。我们既要反对离开革命阶段论来谈革命转变论，又要反对离开革命转变论来谈革命阶段论。所谓革命转变论，就是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地进行，把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衔接起来，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所谓革命阶段论，就是要区分不同性质的阶段，决不能把不同的革命阶段混淆起来，把未来革命阶段的任务拉到现在来完成。客观事物的发展，是有它的过程和阶段的，它的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革命转变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正是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应用了革命转变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一方面，把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8、1414页。

主义革命明确地区别开来，反对把两者混淆起来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把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衔接起来，反对把两者割裂开来的"万里长城"论的右倾机会主义。他明确指出：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①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转变论的新贡献。

## 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及其哲学意义

国家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人民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呢？在这个国家中各个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怎样？这个国家的对内对外的政策如何？这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是什么？这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重大问题，迫切要求作出及时的明确的回答。因此，为了正确回答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为了抨击民族资产阶级中存在的错误观点，为了驳斥国内外反动派的诬蔑和攻击，也为了答复国际朋友的关心，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候，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完整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这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的光辉范例。

### （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系统化的过程

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党和毛泽东的一个创造，它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提出了"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口号，把"建立人民民主主义制度"看成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

步骤。同年11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要“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以后不久，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提出，新中国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些论著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

1947年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出版的《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杂志，也使用过“人民民主”的概念。到了1948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他还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①同年6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把“人民民主专政”当作党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②这是毛泽东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所得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4—13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页。

的准确鲜明的结论，从而系统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新中国成立时，我们的国家政权就是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组成的。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从1956年起，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对我国的国家政权开始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仍然继续使用。例如，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两种提法同时使用。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仍然同时使用两种提法。他说，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在概念表述上也是科学的。它比较明晰、确切地表达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内容、职能和特点，并易于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掌握和理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学说。

（二）阶级、政党、国家逐步消亡是客观规律

毛泽东指出：“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还说：“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

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① 在这里，毛泽东指明了阶级是要消灭的、政党和国家是要逐步消亡的，这是人类社会的远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是共产主义者，才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者。同时，还指明了阶级的消灭，政党和国家的消亡是一个过程，是要有时间和条件的；这时间，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这条件，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我们必须促使这些东西的消亡而创设条件，不承认这一点，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者。

在对待国家问题上，毛泽东批判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永恒存在”论，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从其阶级立场出发，他们不但竭力歪曲、掩盖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而且“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②，极力宣扬政党和国家的永恒存在。他们根本抹煞事物的内在矛盾，否认事物的变化发展，否认事物生存和发展的辩证法。他们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不仅不承认阶级的消灭，政党和国家会走向消亡这一规律，而且拼死抵抗这个规律。这是由其阶级本质决定的，在世界观上就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同他们相反，“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和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③ 在这里，辩证法就是：阶级、国家、政党都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都有它生存和发展的规律。阶级、国家、政党是历史范畴，既不是从来就有，也不是永恒存在，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现象。这是彻底的辩证法，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这样的宇宙观，这是由无产阶级的本质决定的。阶级、国家和政党的消亡，是无产阶级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懂得了辩证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5—1406页。

法，懂得了事物生存和发展规律，自觉地努力创设条件，使人类进入大同境域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切共产主义者为之奋斗的人类美好远景和理想。

另一种错误观点是“立即消灭”论。持有形而上学观点的人，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他们看来，既然阶级、国家和政党终究要消灭，就应该立即宣布消灭。这一典型代表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废除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开始”①，提出“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也出现类似这种论调。有人别有用心地提出：“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妄图以此阻挠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诞生。针对这种错误论调，毛泽东极其鲜明地回答说：“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③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而不应当削弱或取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阶级的消灭，国家和政党的消亡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绝不能以行政命令或主观意志所能实现的。总之，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要消灭的，政党和国家是要消亡的，这是人类社会的远景；同时，作为阶级斗争的现实存在，又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要想消灭它，必先加强它，这是活生生的辩证法。

（三）人民政权中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历来认为，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人主张对帝国主义不能太“刺激”，说什么“你们太刺激了”。对此，毛泽东明确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4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2—1413页。

出，对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是这样，不刺激也是这样，因为它们是反动派。他坚定地回答说："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①他用武松打虎的生动比喻，来说明问题的实质。老虎总是要吃人的，刺激它或不刺激它都是那样。因此，"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②。这为几千年来阶级斗争史所证实。只有划清敌我界限，才能判明谁来革命，革谁的命；谁来专政，专谁的政；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为此，毛泽东严格地划分人民与敌人的界限，他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③敌人是什么？那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④。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既深刻揭示了一切国家的共同本质，也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特殊本质，从而划清了革命的专政与反革命的专政、革命的"独裁"与反革命的独裁、革命的暴力与反革命的暴力的原则界限，指明了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的辩证关系。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国家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是阶级压迫和统治的工具，而不是对一切阶级一视同仁的东西。列宁说："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⑤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0、1410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2页。

⑤　《列宁选集》第29卷，第435页。

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①这就透彻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性，阐明了一切国家的共同本质。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除了一切国家的共性外，还具有同以往剥削阶级的国家根本不同的特性。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都是少数剥削者对绝大多数被剥削者所施行的专政，就拿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就是"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②，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则是多数的被剥削者对少数的反动剥削阶级所施行的专政，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专政，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专政，是新型的国家政权。毛泽东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③这就深刻地指出了革命的专政与反革命的专政，革命的暴力与反革命暴力的根本区别。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反革命的暴力必须用革命暴力去打倒，反革命的专政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没有革命的暴力，不采取革命的行动，反革命暴力就不会被消灭，反革命专政就不会被粉碎，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国内外的反动派极端仇视我国的人民政府，他们极力攻击和诬蔑人民民主专政是"独裁"，是"极权主义"等等。对此，毛泽东严正宣告："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紧接着又说："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④这是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3。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2、141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2页。

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英勇尝试的巴黎公社，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阶级敌人过分“仁慈”、“宽大”，对反动势力没有彻底镇压，使反动派赢得了喘息时间，把革命扼杀在摇篮中。

毛泽东在正确区分了人民与敌人、革命派与反动派以及革命专政与反革命专政质的区别的基础上，精辟地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把对敌人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高度结合起来。他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这就告诉我们：对人民内部必须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二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只有对敌人专政，才能保障人民民主；只有对人民民主，才能更有效地对敌人专政。对敌人专政越坚决，人民的民主就越有保障，对人民的民主越充分，对敌人的专政就越彻底。这就是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为此，毛泽东强调指出：对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②与此同时，“对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③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对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又进一步做了发挥。

**（四）人民政权的历史任务与社会各阶级在政权中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2页。

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①具体说来有三方面的任务：第一，强化国家机器，对内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对外防御国外敌人的侵略和颠覆；并让反动分子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第二，人民的国家保护人民，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改造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第三，组织经济建设，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毛泽东说："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②在这里，毛泽东没有详说，但毕竟把任务提出来了。

毛泽东进一步运用阶级分析法指明了各阶级在人民的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他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力量，"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③。而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④。而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指出同它建立政治联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方面又指出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据主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群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3、141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5—1416页。

众”①。这是矛盾分析法的娴熟的运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学说，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三、唯心史观的破产，唯物史观的胜利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被推翻，标志着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彻底破产。因此，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中心是，究竟采用哪一种反革命方式，能够制止中国革命，以避免和挽救他们自己彻底失败的命运。美国的当权派为了替自己的失败作辩护，发表了一份“白皮书”。所谓“白皮书”，是由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5日炮制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一书和艾奇逊为发表该书于1949年7月30日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这两部分内容所构成。白皮书正文共分八章，另附有中美关系大事年表和有关对华政策文件一百八十六种，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主要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止的中美关系，其中特别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到1949年5月间，美国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惨败的经过。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作为白皮书的序言，概述了白皮书的要点和发表白皮书的用意。通观白皮书，尤其是它的序言，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卑劣手法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攻击和诬蔑，同时，为了说服争吵的反对派，推卸失败的责任，也不得已公开暴露了若干反革命的勾当。这样，白皮书事实上就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罪恶的自供状，也是其唯心史观彻底破产的纪录。此外，白皮书还提出了一个梦想挽救其失败命运的新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6页。

阴谋，就是鼓励中国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充当他们在华利益的新的代理人。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是美帝国主义侵华罪恶的自供状，因而是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可以教育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更加彻底地看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特别可以用来教育那些对美帝国主义还存有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取他们丢掉幻想，站到人民方面来。因此，毛泽东抓住时机，亲自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这些评论，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民主个人主义者”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并对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唯心史观进行了一次大扫除，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基本原因，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 （一）人民和敌人两种根本不同的逻辑

毛泽东在对“白皮书”的评论中，精辟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既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深刻地总结和论述了帝国主义、一切反动派和人民的两种不同的逻辑。他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① 这反映了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反映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只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世界上存在一天，它就不会停止捣乱，放弃侵略，也决不会从失败中接受教训，放下屠刀。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代表反动。因此，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决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3页。

想，一定要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点，认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永远保持革命警惕。

毛泽东还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①这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生动的深刻的发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胜利，都是经过斗争取得的。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没有斗争，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以为不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就能轻易取得胜利，只能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对立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中逐步发展变化的，它们的发展趋势是波浪起伏、曲折前进的，否认这一点就否定了辩证法。

毛泽东在揭示了两种不同的逻辑基础上，总结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深刻地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②在这里，不应该把毛泽东的这个论断等同于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标准。他只是着重阐明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社会历史，才能正确认识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抓住它的本质，掌握社会发展规律。

### （二）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批评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对美国"白皮书"的评论中，尖锐地批评了"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是指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们。他们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

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① 毛泽东指出，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是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的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②

对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美国有科学、有技术、有“民主政治”、有很多钱。照着他们的想法或说法，美帝国主义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③ 这就深刻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同时批评了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幻想。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5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2—142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

毛泽东着重指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①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由于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

1947年10月27日，蒋介石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并勒令其解散。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纷纷出走香港，1948年初，沈钧儒、邓初民等在香港召集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任务就是"恢复领导机构，决定继续奋斗方针"。并发表政治宣言，明确表示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提出推翻蒋介石独裁反动政权，支持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拥护土地改革，并表示在是非曲直之间不能有中立态度，愿意放弃原来的中间立场，重新制定了"反蒋反美，联共联苏"的政策、方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指出民主同盟在蒋管区被迫并由一部分领导人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要求全党根据党的行动纲领，继续争取民主党派的进步，当其已改变立场，拥护我党行动纲领，公开反对美蒋时，就应采取欢迎态度。

毛泽东还指出，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

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对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为什么“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往往陷人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呢？毛泽东指出：他们“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①

（三）中国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在美国国务院炮制的“白皮书”中，对中国革命的发生，讲了很多的神话。什么“人口太多”呀，“西方的影响”呀，等等。对此，毛泽东在对“白皮书”的评论中，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揭穿了美帝国主义胡诌的种种神话，批判了艾奇逊们散布的唯心历史观。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②在不明事理的人看来，很有点象。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

毛泽东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他问，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

② 转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7页。

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接着，毛泽东列举了中外很多的革命事实为例，痛斥了艾奇逊们的谬论。他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很多次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的反英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蒙古的革命，等等，其原因都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和革命，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①

在艾奇逊看来，"西方的影响"是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②在不明事理的人看来，也很有点象。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

毛泽东深刻指出，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③帝国主义者大讲"友谊"和"援助"，但在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7—1448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9、1450页。

帝国主义者嘴里，所谓“友谊”就是“侵略”，所谓“援助”就是“掠夺”。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式武器，这武器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

毛泽东通过对“白皮书”的剖析，最后指出：“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进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象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① “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②

毛泽东在对“白皮书”的评论中，在剖析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唯心史观谬论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的思想。他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④这不仅彻底驳斥了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攻击和诬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武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9页。

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

毛泽东还深刻地论述了正确的理论通过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他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① 在这里，不仅精辟地阐明了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体、实践的主体，而且也深刻地论述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可能和现实的历史辩证法。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

建国前夕，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需要，为了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加强唯物辩证的世界观的武装，党和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

1946年3月1日和16日，4月1日和16日，《北方文化》半月刊连续发表了张如心的《论毛泽东人生观》、《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毛泽东的作风》等多篇文章。后于1947年10月30日，由作者的讲演稿汇编成册，题为《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由冀中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文章和小册子从多方面介绍和阐述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1946年4、5月，延安《解放》周刊第3、4、5号，连载《论毛泽东思想》一文，摘录了朱德、刘少奇、（日）冈野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2页。

徐特立、王稼祥、陈毅、陆定一、彭德怀、范文澜、邓发等人对毛泽东思想的精辟论述。

1946年5月1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北方文化》特辟专栏，刊载的纪念文章有：肖三译《马克思略传》、王子野译《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百年》、葆荃译《马克思是怎样学习的？》、柯柏年著《马克思之为人》、智建中著《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大可著《马克思主义的新胜利》等，文章集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1946年7月1日，《北方文化》第2卷第3期，作为“七·一”、“七·七”纪念特刊出版，其中刊载了肖三撰写的《毛泽东同志略传》一文。文章对毛泽东的家庭、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和革命活动作了简要的介绍，并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理论、实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马恩列斯学说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得到了发挥、应用和发展的思想”。

1946年底，梅林著、罗稷南译《马克思传》一书，约四十万字，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1947年5月，林超真译《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该书收集了马克思在1862年12月到1874年10月间写给顾格尔曼的58封信。这些信件中，主要反映了马克思对于经济学、哲学、工人运动和国际上重大事件一些精辟的见解，为研究马克思学说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同年某月，迈耶尔著、郭大力译《恩格斯传》，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关于恩格斯生平传记的第一个中译本。

1947年，中央土地问题研究会编辑的《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一书，在当年夏天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书中说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同年11月，为纪念《共产党宣言》诞生一百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成仿吾、徐冰翻译

的《共产党宣言》，这个版本和抗战时期出版的成、徐译本在内容上没有增删，但由乔冠华根据英文版重新作了校订。

1948年，恩格斯著、于光远和曹葆华译的《从猿到人》（即《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由解放出版社出版。同年，周建人翻译的《新哲学手册》，由上海大同图书公司出版，这是一部马恩哲学著作选辑，向人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同年某月，普列汉诺夫著、唯真校译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发行中文版。

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在哈尔滨出版发行，这是解放区第一次出版。1949年5月，由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三卷本），由实践出版社出版。至此，郭大力前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把三卷本《资本论》和三卷本《剩余价值学说史》译成中文，献给读者。

1949年6月，肖棠编辑的《毛泽东思想初学入门》，由天津读者书店出版发行。书中选辑了毛泽东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和讲话。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同年7月，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一书，由大连新华书店出版发行。8月，解放社编译的《马恩通信选集》，由山东新华书店初版发行。该书主要收集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唯物史观、爱尔兰问题、俄国问题等书信。10月，恩格斯著、何锡麟译《"资本论"提纲》一书，由东北新华书店作为"马恩丛书"出版发行。这是恩格斯专门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几篇文章，全面概括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及其伟大意义，并指出《资本论》是真正唯物论研究的模范。10月，恩格斯著、梁武译题名为《新哲学典范》一书，由上海文源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反杜林论》一书中的"哲学篇"。同年，何思敬在40年代初期翻译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终于由解放出版社出版了。这对渴望了解马克思早期哲学

思想的读者来说是很及时的。

1949年2月，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以适应全国胜利后新的需要，党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由毛泽东审批提交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审定。这套“干部必读”共计十二种，就是：《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这套“干部必读”，从1949年统一版本后陆续出版，到1950年上半年全部出齐，印行总数达三百万册。

这十二种“干部必读”，成为建国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对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决战决胜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四年的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的新政权。这个伟大的胜利开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的新阶段。

##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学者撰写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和普及作出了贡献。

1946年6月，侯外庐、罗克汀著《新哲学教程》一书，由桂林新知书店出版发行。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它系统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规律和范畴，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运用和验证。同年某月，胡绳著《思想方法论》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该书从新哲学的立场上阐明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特别注重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某月，沈志远著《近代辩证法史》一书，由上海耕耘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从笛卡尔、斯宾诺莎经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近代哲学中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历史。

1947年4月，艾思奇在《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一文中说："研究哲学的目的，在我们，是为要使自己成为辩证唯物论者，不是口头上的，名词上的，仅仅善于引用文献的辩证唯物论者，而应该是实质上的，懂得辩证法唯物论的真精神的，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在斗争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辩证唯物论者。"他又说："要达到研究哲学的目的，要做一个辩证唯物论者，概括来说，就是要能够在研究实际问题的时候，在革命的行动中，能够努力表现出这样的一些事实：第一，一切要从具体的客观事实出发；第二，要能够善于找出客观事实发展的规律；第三，要能够善于使一般的规律与特殊的规律联系起来，善于把一般的指导原则具体化起来。"① 这相当深刻地阐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方法及其重要意义。

1947年6月，博古编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四册），由哈尔滨、佳木斯等地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次年7月，又由华北新华书店翻印发行。这是一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比较丰富的参考读物，在一段时期内流传和影响较为广泛。同年7月，桂林哲学研究社编著的《新哲学研究纲要》一书。由桂林新知书店出版发行。该书正文主要介绍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一般概念、范畴，书后还附有斯大林《辩

①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43页。

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研究提纲》两份参考材料。

1948年6月，吴恩裕著《唯物史观精义》一书，由上海观察社初版、再版、三版发行。作者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涵义，并根据唯物史观的本义，阐述了政治、道德、人性等社会现象。同年某月，罗克汀著《自然哲学概论》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作为“学习与研究丛书”之一。

1949年1月，胡明主编《新哲学社会学解释辞典》一书，由上海光华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本学习新哲学的工具书，内容包括哲学、社会学、论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以及与社会科学有关的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化学等必要知识，涉及范围广泛并较完备，但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同年4月，邓初民著《社会科学常识讲话》一书，由上海文化出版局出版发行。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了较为全面的而又通俗的说明。5月，武汉“改造丛书”第一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由武汉改造社出版发行。该书详细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书后附有“研究大纲”。同月，李达著《历史唯物论序说——社会学大纲》(第2编)一书，由天津新华书店出版发行。6月，李衡之著《唯物辩证法基本知识》、莫英著《历史唯物论浅说》，分别由上海神州国光社、香港新中国书局出版发行。7月，马特著《哲学研究提纲》、史家祺著《唯物论与法律学》，分别由上海读书生活新知联合发行所、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9月，艾思奇著《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由群众书店印刷发行，10月，北京新华书店初版发行，书名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11月，沈阳新华书店翻印发行。同年10月，沈志远著《新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形态发展史》、《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等三本书，均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发行。

在这一时期里，还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1949年4、5月，罗森塔尔著《辩证认识论》、《唯物辩证法》；6、7月，康士坦丁诺夫著《进步思想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历史观》；7月，米丁著《论群众哲学》、瓦因斯坦著《辩证法全程》、亚达米杨著《史的唯物论》；8月，斯摩拉克著《马列主义世界观》；9月，列昂诺夫著《马列主义论科学的预见》；10月，尤金等著《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米丁著《哲学》等一批著作，先后陆续翻译出版，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建国前夕，全国各地哲学工作者发起组织了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简称中国哲学会）。1949年7月8日，在北平召开发起人会议，会上讨论了筹备会组织章程和暂行草案，推选出李达、艾思奇、何思敬、金岳霖、张东荪、汤用彤、郑昕、何干之、马特、胡绳、夏康农等十一人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推举李达为主席，艾思奇、郑昕为副主席，胡绳、马仲扬为秘书。会议一致认为，组织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的意义是，“团结全国哲学工作者和传播马列主义哲学及毛泽东思想，以期正确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批判吸收旧哲学遗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展开对于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批判。”① 同年秋冬，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在北京每周组织一次部分哲学工作者的讨论会，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开展对各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并努力改造世界观，探讨改进教学和研究方法。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9月5日，艾思奇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从头学起》一文。文章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就要达到全国范围

① 《新哲学会筹备会的组成》，载1949年7月13日《光明日报》。

的完全胜利，在全国人民面前，还有更多复杂艰难的任务要完成，为了掌握思想武器，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新解放的大城市。到处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目前学习一般都是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第一步学习的主要内容。要求经过这一学习，较系统地建立起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的观点。他说："目前我们一般的学习运动还应该是一个从头学起的时期。"①

总之，全国解放前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出现了新的热潮，虽然这种新的学习运动还处于"从头学起"的阶段，但新的学习热潮毕竟已经开始了。

## 三、党的主要领导人倡导加强理论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都十分重视，不仅积极宣传、号召，并且身体力行。这是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需要。

早在1946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时就开始重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中，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尤为引人注目。比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暴力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打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当毛泽东重读这本书的时候，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暴力消灭反革命暴力、推翻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

① 《艾思奇文集》第2卷，第35页。

命运的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重温了列宁的这部重要著作，从中汲取理论的力量。

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塞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号召同志们认真读一读。他说：“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于6月1日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

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给周恩来发来一封电报。在电报中，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对此，8月15日，毛泽东《致吴玉章》的信中指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② 可见，毛泽东历来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结果。

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

① 转引自《毛泽东读书生活》，第27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3页。

说："你们学马克思主义，学理论知识，这对中国革命、对人民、对党都很必要。""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①他认为，为了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就必须学习马列主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他说："任何事情都有两条战线的斗争。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犯经验主义，又不犯教条主义。两条战线斗争，这是共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经常进行的、不能离开的。"②为此，他深刻指出："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理论，就是为了使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既要有实际经验，更要有理论知识，二者缺一不可。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③这就告诉我们，把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中国经验和外国经验结合起来，就有实现正确指导的可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1949年3月12日，刘少奇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十分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性，他说：要"大办工人训练班、短期训练班、选择优秀分子，办工人政治大学，象东北那样，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然后才是讲各种政策，才是具体问题和具体组织工作。"④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结论中，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工作方法，把它概括为十二条，题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他指出要把党的领导工作做好并提高一步，

①②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09、414、416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3页。

就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

1949年4月11日，朱德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所作的报告中也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他指出："我们的干部在理论学习方面是很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注意或没有理论学习，那末我们的行动就会变成盲目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的名言。理论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如果不掌握理论就会迷失方向。由此可见，不学习理论是很危险的。今后大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革命所给予的光荣任务。"①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的第三部分的节录发表时题名为《学习毛泽东》。报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作为人民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在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时，决不能把他看成是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不能把他当成一个"孤立的神"。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要学习他如何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②。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为了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夺取革命的新胜利，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为迎接全国解放，建设人民的新国家做好了理论准备。

---

① 《朱德选集》第259—260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6页。

# 简 短 的 结 论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大决战的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的哲学专著不多，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对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分析，从而在政治哲学、军事哲学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个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形势，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制定了革命的战略策略；指明了中国面临着两种形势、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定胜利的斗争，而斗争的中心是国家政权问题；科学分析了国际形势，阐明了新的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革命人民应当采取的对策；剖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外强中干的实质，阐明了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辩证法。

这个时期，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长期的实践经验以及战略决战时期的新鲜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战略决战中的一系列战略战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

这个时期，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坚持彻底的辩证法，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逻辑；创立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深刻批判了美帝国主义者炮制的“白皮书”，阐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宣告了唯心史观的破产和唯物史观的胜利。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出现了新的热潮。为了迎接全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为了给广大干部和群众提供理论武器，这时期除了继续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和外国学者的论著以外，我国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和许多

理论工作者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出现了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哲学概括和总结的好作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进一步丰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卷）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上）
作者＝
页数＝６５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章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１９１９年—１９２１年）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
一、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矛盾
二、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
三、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人和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入
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传播
第三节　五四时期三次大论争及其哲学意义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
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第四节　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一、向革命民主主义和近代唯物主义的转变
二、向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
三、毛泽东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
简短的结论
第二章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初步运用（１９２１年—１９２７年）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宣传
一、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二、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史学要论》的基本思想
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
四、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
五、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宣传，《现代社会学》的基本思想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
一、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二、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三、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一、中国国情的最初分析，民主革命纲领的制订
二、民主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四、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哲学根源
简短的结论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１９２７年—１９５７年）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研究和普及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苏联等国哲学家著作的翻译出版
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中的历史作用
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哲学大众化运动
四、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第二节　　三十年代哲学、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论争
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有论争
二、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争
三、关于“哲学到何处去”等问题的论争
四、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论争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日益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一、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提出
二、《反对本本主义》发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活动及其特点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由初步形成到系统化的过渡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哲学思想
三、刘少奇论白区工作中党的政策策略辩证法的运用
第五节　　《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一、“两论”的写作和流传
二、《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三、《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简短的结论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５年）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系统阐发
一、《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的发表
二、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三、战争中的主观和客观
四、战争和政治、战争和革命
五、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六、兵民是胜利之本
七、朱德《论解放区战场》及其哲学意义
第二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
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二、运用辩证法两点论，制定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三、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右两种倾向
四、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及其哲学意义
第三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
一、整风运动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阐述
三、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
四、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立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一、《新民主主义论》论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揭示
三、革命发展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
四、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法
五、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
第五节　美学、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实践
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
二、生活实践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三、普及与提高、政治与艺术的辩证法
四、哲学方法论和文艺创作的关系
五、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第六节　伦理道德修养与无产阶级世界观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
三、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道德评价理论
四、道德遗产的批判与继承
五、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
六、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第七节　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一、宇宙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四、抓中心工作，辅以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
第八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对各种唯心主义流派的斗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及其中国化
二、对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批判
三、对战国策派哲学的批判
四、对新理学的评述
五、对新心学的评述
简短的结论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色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１９４５年—１９４９年）
第一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与革命的两手策略
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新发展
一、十大军事原则
二、战略决战中的战略战术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一、坚持彻底的辩证法，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及其哲学意义
三、唯心史观的破产，唯物史观的胜利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三、党的主要领导人倡导加强理论学习

简短的结论

附录页